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中华文明的始原

严文明 ● 著



文物出版社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中华文明的始原

严文明 ●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 李 红
责任印制 陆 联
责任编辑 杨新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明的始原 / 严文明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 - 7 - 5010 - 3250 - 1

I. ①中… II. ①严… III. ①文化史 - 中国 - 文集②考古 - 中国 - 文集 IV. ①K203 - 53②K8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3654 号

中华文明的始原

严文明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 印张:19 插页:1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0 - 3250 - 1 定价:180.00元

前 言

本书是我最近十年所写的学术论文集，共 50 篇。其中除正式论文外，还有不少是为考古报告或朋友们的学术著作所写的序言。序言并不只是讲好听话，主要是向学术界推介优秀的著作，同时也要就某方面的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所以也算是一种学术论文。

本书论文虽然分为八个部分，主题则是围绕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来展开的。这与我近年来的工作有关。我从 1998 年起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参与主编四卷本《中华文明史》，我是全书四位主编之一和第一卷的责任主编。参加编写的都是对中华文明有相当研究的学者。从讨论主题和拟定提纲，再逐章逐节地讨论书稿，最后取得基本的共识。我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也受到许多启发和教益。当然，我的学术思想并不是在编写《中华文明史》的时候才形成的，有些基本观点在过去的一些著作中都曾论及，只是根据考古新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而逐步有所深化和推进。例如我过去认为龙山时代大体上相当于军事民主主义时期，后来根据新的发现，觉得那时已进入初级文明阶段，也许叫酋邦比较好。现在根据改进后的碳-14 测年，龙山晚期已进入夏代纪年的范围，这个问题自然又要做必要的调整。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一些。本书第一部分的几篇文章大致反映了我在现阶段对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认识。随着学科的演进和发展，这种认识还会不断地深化，甚至会有某些局部的改变，但基本思路和历史框架应该是站得住脚的。

我在讨论文明起源和发展一类的问题时，除了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进行研究外，还特别注意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以及人文环境的分析。因为任何文明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发生和演化的，自然环境对于文明特质和性格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北方居室多地窖式窝棚和半地穴式房屋；南方多平地起建或抬离地面的所谓干栏式建筑；北方的器物多粗大实用，南方器物多细致精巧，诸如此类。同时任何文明都不会是孤立的，总是跟周围的文明或文化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从而对自身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在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时，总是紧紧把握住这些关系，使自己的研究尽可能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不至失之于偏颇。在本书各篇文章的论述中也和过去

一样，尽量贯彻这一精神。

考古学研究文明起源及其发展的历史，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进行聚落考古研究。这是经过多年摸索而得来的经验之谈。本书第三部分总结了我国史前聚落考古的成果，特别介绍了长江中下游、郑洛地区和垣曲盆地等聚落考古研究的成功实践，最后又根据近年来聚落考古在全国开展的情况专门讨论了聚落考古的方法问题。这一部分的中心思想可以统括为“聚落考古的方法与实践及其在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文明发生和发展的时间和具体情况颇不相同，因此除综合性研究外还要进行区域性研究和个案研究。本书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北方地区和华南地区的考古都有一些专门的论述，大部分应该看成是对过去相关研究的补充，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近年来在这些地区史前和稍晚时期考古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其中华南考古是我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因为华南不但生态环境接近于热带，文化上有许多特点；还有很长的海岸线和广大的海疆，岛屿星罗棋布，海洋文化也很发达。而要研究海洋文化，在基本思路和方法上都和传统考古有许多不同。过去总是把中国看成是大陆国家，对海洋考古关注不够。近年来有所进展，是可喜的，今后还需要大力加强。

我个人多年来的研究领域虽然主要在新石器时代，但所作夏商周时代的田野考古工作并不少。例如1962年就曾参与指导对安阳大司空村商代晚期墓地的发掘，1974年主持过湖北江陵楚纪南城30号台基宫殿基址的发掘，1976年主持过陕西周原凤雏1号宫殿基址的发掘等，其他涉及夏商周遗存的考古工作还有许多，只是未曾系统研究，偶有涉及也难得深入。收入本书的几篇文章和书序，大体还是围绕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主题。

本书最后一部分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想强调在现代考古学中，科学技术的运用正显示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考古学者应该了解这种情况，并且同科技界的学者合作共同发展科技考古。二是对中国考古学的现状进行评估，说明当前既面临着极为严重的挑战，同时又有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一定要紧紧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使中国考古学得到快速健康的发展。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及其精神所在，必将得到更好的阐释。

目 录

一 中华文明的始原

中华文明的始原和早期发展	2
《古代文明》发刊辞	22
追寻中国文化的根	24
炎黄传说的考古学观察	29
重建早期中国的历史	36

二 文明起源的环境

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	58
瞄准学术前沿, 发展环境考古	64
从史前文化的演变看 8000 ~ 4000 年前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	67
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	73

三 聚落演变与文明起源

中国史前聚落的考古研究	78
聚落演变与中国早期文明	94
长江中下游史前聚落的考古研究	97
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演变的研究	102
垣曲盆地的聚落考古研究	106
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的起源	109
关于聚落考古的方法问题	111

四 黄河与长江

重温苏秉琦关于王湾二期文化的谈话	118
------------------------	-----

纪念西阴遗址发掘八十周年	123
大司空类型彩陶之分析	127
山东 20 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157
江淮地区的文明化进程	163
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个实例——凌家滩	168
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174
一部优秀的考古报告——《反山》	182
《纪仲庆文集》序	186

五 北方考古

北方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190
红山文化五十年	195
甘肃史前考古的丰碑	202
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	206

六 华南考古

华南考古的期望	210
甑皮岩遗址与华南地区史前考古	212
关于石峡遗址发掘报告整理编写工作的谈话	216
《石峡遗址——1973 ~ 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序	224
咸头岭遗址与咸头岭文化	227
海洋考古的嚆矢	230
中国东南地区的民族考古研究	233
百越与南岛语族的海洋文化	236
南中国史前考古的新进展	241

七 夏商周考古

二里头文化与夏王朝	248
洛阳皂角树的考古工作	252
商周时期的手工业生产	255
夏商周青铜文明的探研	264
陈振裕的楚文化与漆器研究	266
段宏振关于赵都邯郸的研究	268

八 科技考古及其他

自然科学技术与考古学	272
在第六次全国科技考古会上的讲话	276
现代考古学研究方法之一：定量考古	280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年	283
中国考古学：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	287
中国考古学的现状与思考	290

一 中华文明的始原

中华文明的始原和早期发展

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前后，人类历史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飞跃。西亚及其附近的北非诞生了苏美尔 - 阿卡德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南亚诞生了印度河文明，在东亚的神州大地也出现了文明的曙光，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世界那么大，人类历史那么长，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和这几个地方首先发生文明，并且深深地影响往后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这其中其实是有深刻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原因的。要讲清楚中华文明的始原，自然要从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分析着手。

一 中华文明发生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

中国位于亚洲的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临太平洋，北抵黑龙江边的漠河，南达南沙群岛南端的曾母暗沙，陆地面积约 960 万平方公里。伟大的中华文明就诞生在这一片神州大地上。

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好像三级巨大的台阶：第一级台阶在东南沿海和近海地区，包括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江南丘陵和珠江三角洲平原等，大部分海拔在 200 米以下，丘陵部分也多在 500 米以下；第二级台阶包括云贵高原、四川盆地、黄土高原、新疆和内蒙古高原等，平均海拔 1000 ~ 2000 米；第三级台阶就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边境还有世界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因此整个中国地形的态势是西高东低，背靠亚洲腹地而面向浩瀚的太平洋。中国的海岸线长达 18000 多公里，有包括台湾岛和海南岛在内的 5000 多个岛屿，还有作为我国内海的渤海和宽阔的大陆架，海疆面积约 300 万平方公里，海洋资源十分丰富。可见中国不但是一个有着广阔腹地的大陆国家，同时也是一个面向海洋并且拥有广大海疆的海洋国家。在研究中华文明形成的地理环境时，不能不首先考虑这个基本情况。

由于地域辽阔，南北纬度相差甚大，气温有很大的变化，从北往南跨越了寒温带、温带、暖温带、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亚热带和热带。降水量因为距离海洋的远近也有很大的差别，从东南往西北可以分为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和干旱等区。加以地形复杂，所以各地的自然环境很不相同。

根据自然环境最主要因素的差异,可将全国划分为三个大自然区,就是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①。东部季风区大约占全国面积的46% (一说45%),现今人口占全国的96%以上,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主要地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大约占全国面积的55%,而人口不足4%。前者地处内陆,干旱少雨,多沙漠和草原,历来是我国重要的牧场。后者地势特高,水分不足,植被发育不良,只有河谷地带才有一些森林,经济文化的发展自然会受到很大的制约。

即使在东部季风区,各地的自然环境也是有很大差异的。根据综合自然区划的原则,本区又被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西南五个地区。东北地区纬度最高,因为接近世界上最冷的地方——号称寒极的维尔霍扬斯克和奥伊米亚康,又受西伯利亚与蒙古高压气团的控制,所以冬季漫长而气候严寒,比世界上同纬度的其他地区平均低10℃左右。植被多为冷湿性森林与草甸草原,森林资源十分丰富。在史前时期,这里是发展狩猎和采集经济的好地方,但是不适于发展农业。华南地区位于我国最南部分,年平均气温超过20℃,年雨量约1400~2000毫米,是一个高温多雨、四季常绿的热带—亚热带区域,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一年四季都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取天然食物。如此优越的条件反而不易激发人们的创造精神,缺乏用人工方法生产食物的压力和动力,加以境内多山而少平地,农业的发生就相对滞后。西南地区的气候接近于华南地区,但是地势较高,更加多山而极少平地,也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世界上的古老文明都是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发生的,上述各地区既然不利于农业的发生和早期发展,自然也不利于文明的发生和早期发展。这样人们自然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华北和华中两个地区。

华北地区的自然环境有三大特点。一是属于中纬度暖温带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水热同步。年降水量约400~800毫米,基本上是半湿润至半干旱状态。冬季受极地大陆气团控制,时有寒潮,气候寒冷,年平均气温比世界上同纬度的其他地区低8~10℃。加上春季干旱且多风沙,大陆性气候的特点比较明显。二是黄土广泛分布。从更新世早期开始,定向的西北风把蒙古高原的沙尘吹向整个华北大地,形成世界上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和发育最全的黄土。黄土最集中的地方在黄土高原,中心地区的堆积厚达100~200米。一般地区也有50~100米。华北平原则主要是从黄土高原冲刷下来的黄土的再造堆积,但在山丘地带包括山东丘陵直至渤海与黄海之交的长岛也都有原生的黄土堆积。黄土质地疏松,易受侵蚀。而黄土高原又是我国著名的暴雨区,每年夏季暴雨的冲刷会造成千沟万壑,使黄土高原的地貌十分破碎,土壤发育不良。但在河谷和平原地带土壤比较肥沃,是发展旱地农业的好地方。三是黄河贯穿全境。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国的第二大河。她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支脉的卡日曲,经青藏高

^① 中国自然地理编写组:《中国自然地理》(第二版)153~16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84年。

原、黄土高原和華北大平原注入渤海。在进入黄土高原时，一遇夏季暴雨，就有大量的泥沙汇入。据河南陕县水文站的记录，多年的平均含沙量高达每立方米 37 千克，是世界上大河中含沙量最高的。黄河的输沙量更是多得惊人，据陕县站的记录平均每年约 16 亿吨，1933 年曾经达到 39.1 亿吨。黄河在经过三门峡后地势平缓，大量泥沙沉淀下来，河床不断淤高，河流就不断改道。据有历史记载的 2000 多年中，黄河决口泛滥就有 1500 多次，大幅度的改道有 26 次。向北的决口破坏了海河的水系，甚至夺海河从天津注入渤海；向南的决口破坏了淮河水系，有时甚至夺淮入江。这是在有堤防时出现的情况，在史前时期更可以自由摆动。这样就造成了以郑州西北的沁河口为起点，北至天津，南到淮阴大约 25 万平方公里的平原地带，都是黄河泥沙淤积的范围。换句话说，整个华北大平原主要就是由黄河的泥沙淤积而成的。本区土壤发育较好，含矿物养分较高，适于发展旱地农业，水洼地带也可以发展水田农业。

华中地区位于北纬 $25^{\circ} \sim 34^{\circ}$ 之间，按照一般规律应该属于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干旱气候。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导致行星风系的改变，使这里成为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冬温夏热，四季分明，降水丰沛且季节分配比较均匀，是全球同纬度气候条件最好的地区。本区年降水约为 1000 ~ 1600 毫米，个别地方可达 2000 毫米以上。因此本区的江河纵横，平原地区水网密布，湖泊星罗棋布。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大部分流经本区，其流量是黄河的 20 倍。中国的四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和洪泽湖都在华中地区，湖泊最多的湖北省更有千湖之省的称誉。加上有较长的海岸线和众多岛屿，所以水产资源十分丰富，水上交通也十分方便。本区有肥沃的长江中下游平原，水热条件都很优越，适宜于种植水稻等农作物，历来是我国农业和多种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上面的分析说明，在广阔的神州大地上，最有利于农业发生和发展的事实上只有华北和华中两个地区，它们是农业发生与发展的两大温床。这两大温床比西亚和中美洲的两个农业温床要大得多，而且正好处在中国的核心地区。二者紧相毗连又各有特色，能够相互补充，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们的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文明特点的形成以及往后的发展道路都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是伟大的中华文明的摇篮。

在中国地理环境中还有一个特点是不能忽视的，就是在国境的周围有明显的天然屏障。最西部有帕米尔高原，从那里往东北走有天山、阿尔泰山、蒙古戈壁沙漠、大小兴安岭和黑龙江，往南折有长白山等；从帕米尔高原往东南走有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和与中南半岛交界的一系列山脉；东部和东南部则是广阔的海洋。在史前或上古时期，这些屏障都是难以逾越的。加上世界上几个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离中国都很远，同距离最近的古印度河文明中间恰巧又隔着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同中华文明的核心区仍然很远而难以沟通。因此中华文明只能是本地起源的，在早期的发展中也很少与外界文化发生关系，是世界上少有的原生性文明之一。

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类居住，是考古学者一直关注的问题。一些迹象表明，在地质上的更新世早期，在现代中国的大地上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安徽繁昌人字洞、河北阳原泥河湾地区的马圈沟等地都发现了当时人类使用的石器，绝对年代都在200万年以前。据说重庆巫山也发现了200万年以前的石器，同时还有人类牙齿化石出土，并被命名为巫山人，但学界还有不同看法。云南元谋上那蚌更新世早期地层中也出土了石器和人类牙齿化石，据古地磁测定大约为175万年。此外在湖北建始高坪龙骨洞和郧县龙骨洞采集的人类牙齿化石也被认为是属于早更新世的早期直立人^①。这些遗存尽管还比较零散而不丰富，但是涉及的范围很大，年代之早已经离人类起源的时期不远。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在探讨人类起源和早期发展的问题时，除了要重视非洲，亚洲也应该受到必要的关注，尤其不能忽视中国的有关发现^②。不过这些最早的年代记录都是由古地磁方法测定的，准确性不是很高。中国火山不甚发达，至今没有发现被火山灰覆盖的古人类遗址，无法像非洲那样用比较准确的钾氩法测定年代，选择古地磁法测年乃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样，在研究人类起源的实际年代时，亚洲（主要是中国）和非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可比性。再者，由于亚洲至今还没有发现比直立人更早的相当于非洲能人的化石，没有证据说明亚洲有过南方古猿，早期直立人的材料又比较零散，多数学者还是认为人类最初起源于非洲，而后扩散到亚洲等地，由于遗传和选择因素的作用，造成了群体变异和地区性的连续性特征^③。看来这个问题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相比之下，中国晚期直立人的资料是相当丰富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陕西的蓝田人、北京的北京人、安徽的和县人、南京的汤山人和湖北的郧县人等。蓝田人化石包括一个中年女性的头骨和一个老年女性的下颌骨，分别发现于蓝田县的公王岭和陈家窝。二者在形态上也有差异，前者明显比北京人原始而后者则比较接近于北京人。据古地磁测量，前者的年代为115万~110万年，而后者只有65万年^④。北京人化石出自北京西南周口店第一地点的第3~11层，从1927年起连续多年的发掘，获得了属于40多个个体的大量标本。据裂变径迹、铀系、热释光和古地磁等多种方法的测定，其绝对年代为46万~23万年。北京人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直立人之一，资料又十分丰富，长期以来成为研究直立人的典型标本。

① 董兴仁：《中国的直立人》，《中国远古人类》第二章19页，科学出版社，1989年。

② 张森水：《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1949~1999）20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③ 张森水：《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1949~1999）23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 吴汝康：《陕西蓝田发现的猿人头骨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0卷1期，1966年。

中国早期智人的化石标本也很丰富，比较重要的有辽宁营口的金牛山人、陕西的大荔人、山西襄汾的丁村人、山西阳高的许家窑人、安徽的巢县人和广东曲江的马坝人等^①。中国的晚期智人化石已经发现有40多处，其中出有比较完整头骨的有北京的山顶洞人、广西的柳江人、四川的资阳人、陕西的黄龙人和贵州的穿洞人等。在原河套人地点附近的萨拉乌苏层中就发现了23件人骨化石^②。至于与晚期智人同时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更是遍及全国各地。

从上述各个阶段的人骨化石中可以看出其发展有明显的承袭性与连续性。例如蒙古人种特有的铲形门齿，从最早的元谋人，经过北京人、金牛山人、丁村人到山顶洞人都是一脉相承的。一些重要的体质特征如面部较扁、鼻部较宽、鼻骨较直、上颌骨颧突与颧骨交接处有显著转折等，在各个阶段的化石人中都可以见到。这些特征的承袭与连续性，证明中国古人类的演化模式是以地区连续性进化为主，与周围地区的基因交流为辅^③。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理论，认为全世界的现代人都起源于非洲，他们扩展到世界各地取代了原先在那里生活的早期智人。中国古人类化石研究的结果与这种理论是相冲突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也是与这种理论不相符合的^④。

人类进化到晚期智人，也就进化到了现代人，而现代人是种族区别的。世界上有三大人种：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和尼格罗人种。人种的区别主要根据肤色、发色、眼色、发型、脸型、头型和身高等，其中不少与环境的长期影响有关，这与三大人种各有其主要分布区是不无关系的。不过这种分布区并不是在晚期智人形成的时候才出现的。早在直立人时期各大人种的主要分布区就已经有人类居住，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后来全部或绝大部分绝种了。所以人种某些特征的萌芽可以在早期智人乃至直立人化石上看到，蒙古人种尤其如此。据研究，欧罗巴人种和尼格罗人种之间的差别在童年时期比较小，到成年时期才比较显著；而蒙古人种在童年时期就与其他两个人种有显著的差别。这可能是因为蒙古人种的祖先同其他两个人种的祖先长期处于相当隔离的状态所致^⑤。

中国是蒙古人种的主要分布区。在旧石器时代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已经具备了蒙古人种的基本特征。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数以万计的人骨，其中经过鉴定研究的毫无例外地属于蒙古人种。韩康信和潘其风在全面研究我国古代人骨的体质特征后指出：“黄河流域一些地点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的遗骸一般地接近东亚或南亚人种，青铜时

① 吴新智：《中国的早期智人》，《中国远古人类》第三章24~41页，科学出版社，1989年。

② 吴茂霖：《中国的晚期智人》，《中国远古人类》第四章42~61页，科学出版社，1989年。

③ 吴新智：《论中国古人类的连续发展》，《中国原始文化论集》27~34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④ 王幼平：《更新世环境与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发展》1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⑤ 见阿列克谢耶夫为罗斯基和列文所著《人类学》一书中文版所写的序言（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代居民接近东亚人种，与现代华北人有相当明显的关系。我国南方的早、晚新石器时代居民则有更明显的接近南亚人种的性质，并有同赤道人种相对比的性状。在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发现的青铜时代和更晚的古人骨骼上，较常见北亚人种或北亚与东亚人种混合的性质。”新疆没有发现青铜时代以前的人骨，从公元前13世纪以后才陆续有欧罗巴人种进入。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古代文明是在同其他人种成分相对隔离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对尔后中国古代文化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①。总之，从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来看，中国是蒙古人种的故乡，从古至今，中国的居民都是以东亚和南亚蒙古人种为主，兼有少量北亚蒙古人种，相互之间有不少混血的情况。从三千多年前起，一些欧罗巴人种进入新疆，以后更有少数人逐渐进入内地，华南一些地方甚至有尼格鲁人种的成分。所以在人种的问题上，中国虽然一直以蒙古人种为主，但是对于少数其他种族的人，从来是采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态度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如果说种族主要是依据人类体质特征来划分的，民族则主要是依据语言和文化等特征来划分的，与种族不是一个概念。中国现在是以汉族为主体，结合55个少数民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汉族人口约占92%，少数民族人口不足8%^②。其中400万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有壮、蒙、藏、回、维吾尔、满、苗、彝8个。各民族有相对聚居的地方，也有一些是同汉族或别的民族杂居的，相互通婚的情况也不少，形成非常密切的关系。费孝通曾经把这种关系形成的格局称之为“多元一体格局”^③。它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其始原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

现在知道，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具有明显区别于非洲或欧洲旧石器文化的特点，同时自身又有不同的区系。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更加明显，并且逐渐形成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若干文化区为主体，再联系周围许多个区域性文化的一种重瓣花朵式的格局^④。从而为往后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奠定了基础。从古史传说的研究也可以略知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而非一元，同时在不同的部落集团之间又有密切联系的。到夏商周华夏民族形成之时，其周围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民族性群体。

① 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2期257、260页。

② 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为5.826亿，少数民族为0.3532亿，占全国人口的6.06%；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为6.9458亿，少数民族为0.3993亿，占全国人口的5.78%；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为10.0871亿，少数民族为0.6729亿，占全国人口的6.7%；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为11.3368亿，少数民族为0.912亿，占全国人口的8.04%。由于政府实行对少数民族适当优惠的政策，有些原来申报汉族的改报少数民族；加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实行有区别的人口政策，使得少数民族的人口出生率比汉族为高，所以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有所上升。

③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④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3期。

例如夏的东方就有一个强大的夷人族群，近年来发现于山东一带的岳石文化，是直接继承龙山文化而发展起来的早期青铜文化，一般认为它就是夏代东方夷人的文化^①。事实上相当于夏王朝的东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北方的朱开沟文化、西北方的四坝文化和东南方的马桥文化等都已经都是青铜文化，应该初步形成了各自的民族群体，并且都与可能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发生不同程度的关系^②。商族有自己的起源，但商的先公在夏朝做官，事实上也属于夏。成汤革命，推翻了夏王朝而建立商朝，势力大为扩张。同样周族也有自己的起源，周文王原在商朝做官，当了西伯，所以周族的地方也应该属于商朝。武王革命，推翻了商朝而建立周朝，势力范围又扩大了许多。由于周朝统治的范围内包含了许多被征服的非华夏民族，除了周人故土和当时王畿范围以外，大多难以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所以从武王时期起便广泛地实行封邦建国的办法，在各地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为了能够对各诸侯国实行有效的控制，中央王朝便制礼作乐，在各封建国内大力推行王化，从而大大加速了华夏化的进程。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称霸称雄，周朝作为政治实体事实上已经分裂，但是在名义上大家还是承认有一个周天子，必要时“假天子以令诸侯”。这时期各国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大家使用同一种文字，只是写法稍有不同，相互交往并没有多大困难。一些学者可以到各国讲学，一些政治家也可以到不同的国家做官，促进了各国的接近，事实上也就是促进了各国的华夏化。华夏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华夏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由于华夏文明在中国处于核心地位，又是最先进和影响力最大的，所以成为中华文明上古时期的代表。

二 神话、传说和历史

中国人十分重视自己历史的记述。早在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就有了系统的历史记载。在此以前尚有所谓虞、夏、商、周之书。如果说商、周之书多是可靠的，那么所传虞、夏之书则多为后人的追述。再往以前追溯便只有零散的传说，在可能包含有历史真实的传说时代以前的荒远年代，已经越出历史记忆的范围之外，在考古学发生以前，人们不可能获得任何真实的知识，只能构建一个可以任意驰骋想象的神话世界。而传说时代的许多人物和事件，也往往附丽以神话的色彩。

关于开天辟地和创造人类的神话，有女娲和盘古的故事。女娲的故事出现得较早，《山海经》中有所谓“女娲之肠”。楚辞《天问》云：“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是

① 岳石文化的个别遗存虽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有所发现，但直到 80 年代才被确认并提出命名。现在确知这个文化是直接继承龙山文化而发展起来的早期青铜文化，绝对年代经多次碳-14 测定大约在公元前 19 世纪至公元前 17 世纪之间，正好落在夏代纪年范围之内。详见严文明：《夏代的东方》和《东夷文化的探索》，《史前考古论集》306~333 页，科学出版社，1998 年。

②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 年 2 期。

说女娲造了人类，谁又造了女娲呢？《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讲得比较详细：“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凡庸者，絅人也。”一说女娲和伏羲均为华胥所生，人身蛇躯，兄妹结婚以繁衍人类。在汉代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以及壁画墓中，多有伏羲、女娲人身蛇躯相互交尾的图像，说明这个故事在古代是流传很广的。女娲补天的事首见于《淮南子》，其《览冥》篇云：“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熒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她创造了人类，还要给人类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的确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天神。

盘古的故事较早见于三国徐整的《三五历记》，书中写道：“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灵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五运历年记》又说：“首生盘古，垂死化生：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这个故事可能首先产生于南方，而后在全国民间广为传播。创世神话中还有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燧取火、伏羲氏制作网罟、神农氏教民稼穡等等，多系后人对往昔历史的逻辑推测，把人类产生之后一些最重大的发明附丽于几位想象中的圣王身上。

进入传说时代，涉及的人物和事件较多，加以各家说法不一，真假杂糅，董理实属不易。《尚书》仅追溯至尧舜，《史记》则以《五帝本纪》作为开篇。于是人们常常把五帝所处的时代作为传说时代，五帝的历史便成为传说时代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所谓五帝不过是一种整齐化的说法，在不同的著作中五帝的具体人物和排比秩序多有不同。《史记》主要依据《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和《帝系》，把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作为先后相继的五帝，《国语·鲁语》和《吕氏春秋·古乐》等也持这一说法。第二种说法是把伏羲、神农、黄帝、帝尧、帝舜列为五帝，见于《易·系辞》、《战国策·赵策》、《庄子·缮性》、《淮南子·俶真》等。第三种说法是把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称为五帝，见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天文》等书。第四种说法是把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作为先后相继的五帝，见于《世经》和《帝王世纪》。可见直到汉代，五帝的问题并没有形成定论，只是因为《史记》采取了第一种说法，所以影响较大。实际上传说中称为帝的人物还有不少，例如帝俊在《山海经》中的地位就非常显赫，他如帝鸿、帝江、帝丹朱等还有许多。反映当时大约是一种万国林立的局面，那些所谓帝大约就是各个大小国家或部落的首

领。他们出现的先后次序除了尧舜较晚似乎没有异议以外，其他多不易确定。

蒙文通注意到不同的传说出自不同的史学系统，他认为晚周史学可以分为东系、北系和南系^①。各系所传承的古史系统不同，追根溯源，可知其远祖有可能属于不同的族系，可以相应的划分为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和江汉民族^②。而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则划分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并且有更加详细的分析^③。这种划分虽然难以十分准确，但是如果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系统相互参照，大致上还是符合的，说明这种划分的确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

反映各民族集团关系的事件中，最有影响的有两件事，较早是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较晚是尧、舜、禹连续征伐三苗的战争。此外见于先秦文献的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战争，这是行将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前兆。如果说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在考古学文化上还难以得到印证，那么征伐三苗的事则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明确的迹象，证明这一类传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包含有真实历史成分的。

各种五帝说的前三帝多有矛盾，也许根本就没有传承关系。但是后二帝尧舜以及禹的关系则是比较清楚的。在先秦古籍中，舜继尧、禹继舜是没有不同说法的。但是儒家和墨家认为这种传承是依据选贤举能的原则，是禅让。而在古本《竹书纪年》和法家的著作中则说成是争夺，是斗争。尧本属陶唐氏，地处冀方；舜本属有虞氏，地望偏东；禹为夏后氏，地望略偏南。三者有些像联盟的关系。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又有联姻的关系。据《尧典》所述，尧舜的政府机构已经比较复杂，而且有刑法和军队。政府的职官并不是各个氏族或部落的代表，而是负责各专业部门的管理。因此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国家，而不是什么部落联盟了。而且在尧舜寻找继承人的时候，首先被举荐的都是他们的儿子。只不过他们觉得自己的儿子担负不了那么重大的责任，才采取选贤举能的办法。禹也曾先后举皋陶和伯益，授之政，禹死后才由他的儿子即位。所以孔子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

传说时代的各项事件中，影响最大，并且几千年来传诵不息的莫过于大禹治水的故事了。在先秦的古籍中，讲到大禹治水最生动的是《孟子·滕文公上》的一段话。孟子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禹疏九河，濬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下》也有很生动的描述。此外，《尚书》中的

①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经史抉原》241~254页，巴蜀书社，1995年。

② 蒙文通：《古史甄微》，商务印书馆，1933年。

③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

《尧典》、《皋陶谟》和《禹贡》，《诗经》、《论语》、《墨子》、《左传》、《国语》、《庄子》、《荀子》、《韩非子》、《尸子》和《吕氏春秋》等，也都有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或者赞颂之词。例如《诗经》中的《商颂·长发》就有“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的诗句；《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流，维禹之绩。”《鲁颂·閟宫》：“奄有下土，缙禹之绪。”莫不是颂扬大禹的丰功伟绩。大概由于他的事迹过于神奇，所以在有些书中又把大禹描述为神。

在传说中讲到洪水的地方还有很多，所以大多数人相信中国远古时代曾经有过一个时期给人类造成重大灾害的大洪水。治水的人物也有很多，例如共工就是一位著名的治水人物，但是有的书又说“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穷桑”（《淮南子·本经训》），《国语·周语下》也有类似的说法，成了一个反面的神话人物。但共工的后裔佐禹治水还是有功的。《左传·昭公元年》说金天氏和他的儿子台骀疏通了汾水和洮水，后来成为汾水之神。《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引蔡墨曰：“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可见修和熙是专职的治水官，而且很有成绩。至于大禹的父亲鲧治水失败因而被诛的故事更是大家所熟知的。治水难，在技术水平比较低下的远古时代更难，而大禹获得成功，无怪乎人们对他是那样地崇敬。

传说时代的创造发明，最集中地见于《世本·作篇》。但《世本》早已失传，根据他书所引，大致有伯余作衣裳，史皇作图，沮诵仓颉作书，大桡作甲子，鲧作城郭，尧作宫室，化益作井，祝融作市，仪狄作酒，夔作乐，昆吾作陶，芒氏作罗，棣首作算数，容成作调历，伶伦造磬作律，蚩尤以金作兵，巫咸作筮，巫彭作医，奚仲作车，共鼓货狄作舟，垂作规矩准绳，咎繇作耒耜，挥作弓，夷牟作矢，雍父作柞臼，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马，宿沙煮盐等等，惜多语焉不详。其他许多先秦古籍也有不少关于创造发明的记述。把所有创造发明都系于个人不一定正确，何况有些说法又相互矛盾，所以不足凭信。但这些发明大多可以与现今的考古发现相参照，显然并非向壁虚构。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个人而把那些发明看成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可能更加接近于真实。由此可见，在传说时代，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生活、文物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都已略具雏形，从而为文明社会的成立奠定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传说时代还有一件重要事情是专职巫师的出现。《国语·楚语下》记观射父对昭王问曰：“古者民神不杂……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这就是说，在颛顼之前是民神杂糅，家为巫史，没有专职的巫师。而颛顼时则设立专职巫师，只有他们才能够沟通民神与天地。这是世界宗教发展史上的通例，是走向文明的重要步骤。关于颛顼的宗教改革，徐旭生有过非常详细的论述^①。应当指出的

^①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版）74~87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是，由于有专职司天司地的巫师，他们不但执行宗教职事，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经验注意天文和地上的变化，于是就有可能创造出历法。传说中的颛顼历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创造出来的。

从以上情况来看，传说时代是一个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一方面生机勃勃，充满着创造发明；一方面社会剧烈动荡，冲突不断，英雄辈出。那是中国的英雄时代，文明的曙光就是在那个时代开始从东方显露出来。

如果说传说的历史不免掺杂许多后人的想象，或者如徐旭生先生所说，一些学者为了理出一个大致能够自圆其说的系统，把一些不相干的人物和事件硬拉上关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历史的真实。那么自从考古学出现以来，对于这段历史的情况就越来越清楚了。

在中国，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学是从1921年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才起步的。仰韶村遗址距今约7000~5000年，稍后对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又发现了距今将近50万年的北京人及其文化遗存。至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大规模发掘，更是使商代晚期以来的中国文明史得到了丰富的地下实物遗存的确证。不过那时的考古工作还处在初创阶段，只是在少数遗址上有较大的突破，仅仅根据那些资料还无法对中国的史前史和早期历史形成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认识。

近50年来，中国考古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初步理清了史前文化的发展谱系和复杂的结构，基本上弄清了农业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全国史前经济的格局及其对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影响。对聚落演变的研究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对夏文化的探索有明显的进展，对商周文化的研究日益深入，而且对夏商周周围的诸多青铜文化有了基本的体系性的认识。特别是近年来甲骨文（包括西周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等古文字资料大量涌现，大大充实了我们关于先秦历史的知识。

三 中华文明的曙光

前面谈到中国有两个农业起源的温床，而且实际上形成了两个农业起源中心。这两个农业起源中心后来发展为两大农业区，并且形成两大农业体系。至此整个中国的经济区划以及由不同经济对文化造成的影响而形成的格局，事实上已经基本上奠定了。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发生的事，也就是距今9000~5000年之间发生的事情。这个格局的基本情况是：

1) 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华北地区为旱地农业区，主要种植粟和黍，也有少量水稻，可能还有大豆。有成套的适应耜耕农业的农具。饲养家畜以猪为主，其次有狗、牛、羊，但没有马。居室多采用单间半地穴式或窑洞式，可以称为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

2) 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华中地区为水田农业区，主要种植水稻，也有少量粟和黍，

有成套的适应水田耕作的农具。主要养猪，也养水牛、狗和羊。居室多为分间长屋，采用台基式或干栏式，可以称为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

3) 华南地区自然资源丰富，采集经济发达，同时受华中地区的影响而有一定的水田稻作农业，沿海地带则主要是渔捞采集经济，这里有比较多的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是半农半采集经济文化区。

4) 东北地区史前文化中常有较多的细石器，是狩猎经济比较发达的表现。同时因受华北地区的影响而有一定的旱地粟作农业，北部兴安岭一带则主要是狩猎兼采集经济，是半农半狩猎经济文化区。

5) 内蒙古、新疆和青藏高原，也就是自然地理区划中的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在新石器时代人烟稀少，也没有发展农业的条件，是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后来发展为我国主要的畜牧经济区。

从这个经济文化区的基本格局便可以看出来，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已经确立为华北和华中，或者说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在华北和华中地区不但农业经济比较发达，手工业也是比较发达的，正是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开始手工业是与农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人农忙的时候务农，农闲的时候从事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制造，没有专门的手工业者，只有一些在某些专业上比较能干的人。到了铜石并用时代（大约为公元前3000年~前2100年）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些高档的、技术要求很高而并非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手工业品发达起来了。例如玉器、漆器、象牙雕刻、丝绸、铜器和高档陶器等，其中大部分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就已出现，只是规模不大，技术水平也不甚高。这时则完全为贵族所控制，不但有了一定的规模，技术水平也大为提高。这样就出现了两种手工业：一种是与一般人日常生活与生产紧密相连的，例如石器、木器、陶器、骨角器的制造，筐篮的编织和普通的纺织与衣服制作等，不一定要专门的手工业者，普通人就可以做，可以叫做普通手工业。一种是高档手工业，必须有专门的手工匠人，他们具有较高的技艺、智慧和文化素养，却是专门为贵族服务的。因此手工业的分化又加强了社会的分化和等级化，进而又促进了社会文明化的进程。我们注意到一些高档的手工业有明显的区域性，例如玉器最发达的地方在长江下游，其次在燕辽地区，再次在陕甘地区；漆器和丝绸主要在长江中下游；最高档的陶器蛋壳黑陶和有细密针刻花纹的磨光黑陶分别出于山东的龙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之中，从而这些地方文化的文明化程度也比较高，应该不是偶然的。

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了所有制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的进步，促进了从村落到国家演变的历程。这种情况，从聚落形态演变的过程中

可以比较明显地反映出来^①。新石器时代早期，由于农业的发生以及集约性采集经济的发展，人们普遍地走向定居，出现了一些规模甚小的聚落。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主要是由于农业的发展，农业区的聚落明显扩大，一个聚落中有几十座以至上百座房屋。聚落的布局往往是凝聚式的，房屋虽然略有大小但没有质的区别，反映一种自给自足的平等的有组织的社区生活。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规模又有所扩大，至少在农业区是如此。聚落布局往往是凝聚式和内向式的，同时内部又是有区划的。从房屋、墓葬和一些生产设施反映的情况来看，当时的社区经济仍然是自给自足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基本平等的、有组织的和有相当凝聚力的。不过有些产品的交换还是经常发生的，例如长江三峡地区土地狭窄不宜农耕，而江边的砾石则是制造石器的好原料。那里的许多聚落便以制造石器为生，并且初步形成了一个石器交换网。类似的情况在别处也能够看到一些。在一些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个别的中心聚落，其中房屋和墓葬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个别聚落甚至筑土城防护，预示社会将有一个显著的变化。

到铜石并用时代，聚落内部和聚落之间都发生了分化，大经济文化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现象也突显出来。在一个考古学文化的范围内，有时可以看出中心聚落、次中心聚落和普通聚落的金字塔式的结构。在中心聚落的内部，有时可以看到殿堂式的建筑、高等级房屋和普通房屋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在墓葬中表现更为明显，说明这时的社会已经分裂为不同的等级。从前武器和狩猎工具是不分的，现在则普遍出现了专门用作武器的石钺，军事指挥者则用玉钺。到处都有被杀死者的乱葬坑，说明战争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严重问题。为了有效地保护自己，一些中心聚落的贵族们便组织大量人力修筑城池。到目前为止，在全国发现的史前城址已经达到 50 多处^②，其中有的只是军事城堡，有的则可能是古国的都城。例如山西襄汾陶寺古城的城内面积就超过 200 万平方米^③，城内有多处夯土台基和高等级建筑的残迹；有估计超过一万座墓葬的公共墓地，有可能是王者的大贵族墓葬。说明城中聚集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而且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氏族一部落的界限。从这些情况来看，陶寺古城已基本具备了都城的性质，说明这时很可能产生了最初的国家，而且此类国家大小大小还有许多，是一种小国林立的状态。中华大地上出现了文明的曙光，这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的情况是基本上相合的。

上述变化并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实现的，更不是沿着直线顺利发展的，期间还有不

① 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 年。

② 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古代文明》第 1 卷，文物出版社，2002 年。

③ 何弩、严志斌：《黄河流域史前最大城址进一步探明》，《中国文物报》2002 年 2 月 8 日。

少跌宕起伏。在铜石并用时代早期，长江流域中下游、黄河流域中下游和燕辽地区文明化的势头都很旺，甚至有进入初级文明的许多证迹。但是到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中下游和燕辽地区的发展明显走向低谷，而黄河流域中下游则继续发展，从而为夏商周文明的相继勃兴奠定了基础。这种全局性的转变之所以发生，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就长江中游而言，可能与尧舜禹时期连续征伐三苗有关；在长江下游，也许与良渚文化的过分特化，将过多的社会资财用于非生产性的工程和宗教性活动有关，加上自然灾害和外族的入侵，自然就会衰败下来。不过这只是文明发展进程中一时的起伏，并不是黄河周围的文化都消失了。只要看一看东周时期各大国的疆域同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几个大文化区的范围基本相合，就知道几个暂时走入低谷的文化，其实还保存有深厚的底蕴。

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夏鼐和苏秉琦都提出过十分重要的见解。夏先生认为文明的起源应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①。苏先生则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应该有不同的模式。有原生型，还有次生型和续生型，最后才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②。他们的论述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四 灿烂的夏商周三代文明

如果说龙山时代或五帝时代还只是初露文明的曙光，只能算是中华文明的前奏，那么夏代就应该是中华文明的开始，商周便是中华文明第一次走向繁荣的时期。先秦文献中常常以三代指称夏、商、周，把夏看成是和商周一样的王朝，只是时间有先后，发展水平当然也会有高低。可是夏代没有文献流传下来，所谓《夏书》至多不过是后人的追记。这样所谓夏代实际上也只是一个传说的时代。自从王国维于1916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二文，看到卜辞中的殷世系与《史记·殷本纪》所记基本相同，证明《殷本纪》所记是可靠的。而殷的先公适当夏王朝之世。既然司马迁对殷先公的世次还很清楚，那么他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夏王朝的世次和有关事迹也不会是没有根据的。至于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基本上是从1959年以来才逐步展开的，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般认为，分布于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的二里头文化，无论从相对年代、分布地域、发展水平还是某些文化特征来看，都应该是夏文化。在这方面邹衡^③和郑杰祥^④有比较详细的研究，但是也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问题还

①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9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②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07~140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③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④ 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不能认为已经最终解决。

比起夏王朝来，商代的历史就明确得多了。除了有为数不多但十分珍贵的文献史料外，还有超过15万片甲骨卜辞及数量巨大的田野考古资料。这些资料不但使整个商代的历史成为信史，而且对商代文明发展的高度及其丰富内容都可以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周代特别是东周的历史文献已经比较丰富了，举凡政治、军事、哲学、思想、礼制、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方面莫不有开创性的著作。周代考古也有许多重要的发现，诸如列国都城勘察和诸侯墓地的发掘，大批金文和简帛文书的发现，都极大地充实了周代文明史的内容。

根据文献记载，夏、商和周既不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也不完全是并行发展的不同文化。固然在夏朝时商人就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是二者关系密切，地域相邻。据说商汤的重臣伊尹曾经五就于桀，另一位重臣仲虺则是夏车正奚仲的后人。根据文献记载，商灭夏并不是异族的征伐，而是因为夏桀昏庸无道，人民痛苦不堪，而汤行仁政，他灭夏是打着诛无道以拯救百姓的旗号。汤在推翻夏朝以后所建立的商朝，是“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吕氏春秋·分职》），不但全面继承了夏和自己祖先的基业，而且又有很大的发展。周人灭商之前也有自己的国家，但是周文王曾经受商朝封为西伯，成了商朝的地方官，关系是很密切的。周人的文字就是商人使用的文字，周人的青铜器也是仿效商人的青铜器而发展起来的。至于周人的封建制度和宗法制度等，也应该是在商人有关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起来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有所损益；周因于殷礼，有所损益^①。总之，夏、商、周三代虽有差别，但是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还是应该视为一个整体，代表中国文明的第一个高峰——上古时期的华夏文明。

这个时期国家的显著特点是分封世袭制，社会上氏族组织长期存在，统治集团则在氏族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为一种严密的宗法制，这在周代表现得特别明显。周初大封建，除了都城附近的王畿之地由王朝的官吏直接统辖外，绝大部分地方都被分封给王室近亲或当地首领以建立诸侯国。所谓分封，就是把一个地区的土地和人民都授予一位诸侯全权管理，即所谓授民授疆土，代代世袭。诸侯对王室的义务则是要镇守疆土，按时朝觐纳贡，必要时还要率领军队勤王。同样诸侯在自己的封疆内也可以把土地和人民授予亲属和亲信以为卿大夫，卿大夫又可以按照同样的道理封赐家臣。这样层层分封既是一种国体，又是一种政体。由于强调嫡长子继承和大宗小宗的区别，使得这种体制能够把政权和族权乃至神权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能保证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巩固，又能够照顾

^① 《论语·为政》：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到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维系广大领域内不同族系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各诸侯国的统治，并使之逐渐华夏化，为往后建立更加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奠定了基础。

分封制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既然周天子可以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下属，那么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就不能看成只是名义上的或只具有象征意义。在诸侯国内也是一样。《左传·昭公七年》说：“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诸侯以下的情况应该也是一样。除了层层分封，土地还常常作为对下属的赏赐。这样土地事实上成了从天子到以下各级贵族官更多级所有的公产即所谓公田。先秦文献中常常把公田和私田对举，而且常常和井田制相联系^①，说明农民是被组织起来的，他们的私田也只可能是按期分配的份田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田。这种土地制度还深深地影响到赋税制度和军事制度，农民不仅要服劳役，也还要服兵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整个三代文明就是建立在这些根本制度之上的。

这个时期的物质文明不仅在许多方面是开创性的，而且是光辉灿烂的。例如都城的建设就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可能为夏代都城的二里头遗址面积在6平方公里以上，可能为商代早期亳都的郑州商城有内城和外郭，内城有3平方公里以上，外郭则近20平方公里^②。新近发现的安阳花园庄商代中期的都城规模甚至更大，而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岗王陵规模之宏大，殉葬人性之多，也是十分罕见的。到东周时期，随着诸侯国势力的膨胀，他们的都城也得到极大的扩展，甚至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果说以前的外郭城仅是偶见，那么到东周就几乎成为定制。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吴越春秋》），说明都城的居民有所增加，对他们的安全不能不有进一步的考虑。这是都城制度的一个转变^③。

三代物质文明的集中表现是青铜器。现在知道，中国的青铜时代基本上是与夏商周三代相始终的。江西瑞昌的铜岭、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安徽的铜陵和南陵等地都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大型铜矿遗址，井巷系统和采矿设备都已十分完备。一些都城级的遗址如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早商的郑州商城、晚商的安阳殷墟、西周的洛阳北窑和东周晋国的新田（山西侯马）等处都发现了巨大的铸铜作坊遗址。制造的青铜器主要有鼎、簋、

① 先秦的井田制的具体情形究竟怎样，甚至是不是真有井田制那么一回事，学术界多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所谓井田制虽然不会像孟子讲的那么规整划一，但是如果把它看成是基层的社会组织和农业生产单位，其中有公田和份地，代表着一种从原始公社所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农村公社制度，应该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这种制度可能从夏代就开始实行，直到战国废井田开阡陌才完全改变，是三代实行的根本制度之一。参见徐喜辰：《井田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③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觚、爵、鬲、尊、盘等包括炊器、食器、酒器、盛储器等通常作为礼器的容器，钟、铙、铃等乐器，钺、戈、矛、剑等兵器，辘、辖、衔、套等车马器，斧、斨、凿、锯等手工工具，锛、耨等农具，镜、带钩等生活用具，以及货币和各种装饰品等，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尤以种类繁多、造型优美、纹饰独特的礼乐器，堪为中国青铜文化的一大特色。

近年来的研究证明，在夏商周青铜文明的周围还有一系列青铜文化。例如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中有大量神人和假面具的造型，还有高大的神树，表现丰富的神话故事；江西大洋洲的青铜器中也有反映神话的内容，同时还有大量的农具；湖南宁乡发现的特大型铙也是别的地方所不见的。它们固然都受到夏商周青铜文明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夏商周青铜文明。至于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内以游牧民族或半农半牧的民族为主体所创造的青铜文化，其青铜器多武器、用具和装饰品，体量轻巧易于携带，其装饰多用圆雕或半圆雕的鹿、羊、马、骆驼等动物形象。因此中国青铜文明是以夏商周为主体，同时结合不同系统的大青铜文明。只有全面地了解这些青铜文明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才能更深刻地了解夏商周青铜文明的成就和历史地位^①。

在青铜文化的推动下，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手工业品这时也纷纷涌现，例如原始青瓷器、玉器、丝绸和漆器等。原始青瓷器在商代早期就多有发现，到西周更加普遍。中国瓷器的大发展虽然在唐宋以后，其始原则应追溯到商周时期。丝绸虽然是在新石器时代就已肇其端倪，大发展却是在商周时期。至迟在商代就有提花的文绮，还有刺绣，到东周各种织法的丝绸都已面世，花纹活泼流畅。从此丝绸在我国历久不衰，成为中国服饰的一大特色。

三代的精神文明集中表现在一大批古文献资料上，这与作为其载体的古文字（指作为中国主体文字的汉字的早期形式）的形成和广泛应用是分不开的。汉语的特点是词根语，单音节词发达，即使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也多是由单音节词组合演变而成的。汉语的这种特点，使得汉字长期保持一字一词，一字一音，而同音字用不同的造型来表达不同的意义，成为以形声字为主体并且将形音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文字体系。与拼音文字特别强调发音准确不同，汉字可以用不同的方言朗读。在一个方言众多且发音差别极大的社会里，汉字可以毫无阻碍地起到沟通思想和传递信息的作用，甚至不同族系的人都可以比较容易地认识以至借用为自己的书面语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长期传承而不中断，并且有很强的亲和力，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汉字的推广无疑也发

^①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

挥了积极的作用^①。

三代在天文、历法、算学、医药、哲学、史学、文学、音乐等许多方面都有开创性的成就，成为后来有关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

历法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由于农业的发展使得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历法。传说最早有所谓黄帝历和颛顼历，后来又有夏历、殷历和周历。孔子提倡行夏之时，可能那时是夏历和周历并用。直到现在民间还是喜欢用夏历，它是一种改进了的阴阳合历。传说为夏历的《夏小正》成书虽晚，也可能反映夏历的基本精神。至于殷历则由于甲骨文的研究而有较多的了解。殷历也是以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阴阳合历。用干支记日，一年分春秋两季并划分为十二个月，多余的天数设闰月来调整。由于历法还不十分精密，需要根据星象来进行调整，因此观象授时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②。

三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而臻于鼎盛。这个时期各诸侯国都在酝酿深刻的改革：废井田开阡陌，履亩计税，设郡县，改革世袭官制等等。社会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乡校的设立和士人的兴起，打破了文化教育完全由官方垄断的旧传统，开始出现私人讲学，学术思想也空前活跃起来。首先创办私学的是孔子，他提倡有教无类和诲人不倦，并且很重视因材施教。他的门徒号称有三千人，其中有不少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孔子虽然相信天命，但着力研究的是人世间的問題而不大愿意谈鬼神。他提倡周礼，主张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当政者要节用而爱人，反对苛政暴政。孔子思想的核心和最高道德标准是仁，仁者爱人，做人要有仁爱之心。孔子自称是述而不作，但在整理和传播古代文献典籍方面还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据说经他删订过的有《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书籍，后来被视为儒家经典而流传至今，成为研究商周时期历史文化的最重要的典籍。孔子和以他为首的儒家学派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受到推崇而发挥极大的作用，他本人则被尊崇为至圣先师，成为上古时期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

比孔子稍后的墨子和他创立的墨家学派，在战国时期和儒家一样被视为显学。墨子主张兼爱，爱无差等。延伸到国家关系上就反对相互攻伐即非攻。他的尚贤比儒家的选

① 由于汉族的重大影响，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也仿照汉字来创造自己的文字。例如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以及壮族、瑶族、白族、水族和布依族等民间使用的土俗字，无不是以汉字为蓝本制定出来的。汉语和汉字还曾经对东亚一些国家产生过重大影响。例如朝鲜、日本和越南在古代就长期用汉语作为书面语言，或者用汉字语音记录自己的语言，形成一个超越国界的汉字文化圈。后来出现的朝鲜的谚文、日本的假名和越南的字喃等都是借用汉字的笔画、偏旁或方块字的构形创造出来的。

② 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

贤举能更为彻底：“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要做到“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均见《墨子·尚贤》上），反对贵族的世官世禄。他的节葬和非乐等主张也是和儒家思想相对立的。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连绵不断，各国国君和贵族为了寻求富国强兵乃至统一天下的方略而争相礼贤下士，养士之风盛行。在这种情况下，士人的队伍空前扩大，他们著书立说，各成一家。除儒、墨外，还有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及兵家、名辩家和阴阳家等。即使在同一家内也分成不同的派，所谓“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儒家中最有名的孟子和荀子就属于不同的派。可谓学派林立，群星灿烂，大师辈出。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可以不分国界到处游说讲学，而当权者也多不主一家，允许各家之间相互批判和论争，从而形成了我国学术历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的盛况。各家的著述内容或有短长，但都有理有据，自成体系，处处闪烁着华夏文明的光辉，不但是整个中华文明的重要财富，也是对世界文明史的伟大贡献。

三代在精神文明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前面谈到的以外，在史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也都有开创性的成绩。

先秦古籍中多次引用《夏书》，其中有不少内容是今文《尚书》中没有的。《尚书·多士》中谈到“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大概夏、商时期都已经有了官方的典册文书。到了西周，除了《尚书》中的周书以外，《诗》中的雅、颂有不少可以看做是商、周及其祖先的史诗。到西周晚期，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先后设史官修编年体的国史，有的卿大夫也编家史，可惜这些书都没有流传下来。到春秋末年，孔子主要依据鲁国的国史新编了一部《春秋》，除非常简练地叙述史实外，还包含有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所谓笔则笔、削则削，寓褒贬、别善恶，以至于使乱臣贼子惧。《春秋》之后出现了一系列历史著作，其中有号称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和被称为春秋外传的《国语》，还有《世本》和后来发现的《竹书纪年》等。这些大部分是私人著作，体裁不一，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等，其中以《左传》所记史实最为翔实。《竹书纪年》自黄帝、夏殷周写至战国时期的魏襄王，《世本》自黄帝写至春秋或战国末年，已带有通史性质。由于这时期历史撰述不拘体裁和形式在多方面的实践，为后来史学的大发展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商周时期是文学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主要的文体是散文和诗歌。春秋以前，《尚书》的一些篇章和某些铜器铭文可以视为最初的散文，文风古朴简练。到春秋战国时文风为之一转，特别是《左传》和诸子的一些著作，语言渐趋通俗化，记事条理清晰，形象生动，常常引用神话寓言和历史典故，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诸子中的庄子更是具有极高的文学天才和驱使语言的能力，他思想豁达，感情奔放，气质浪漫，文章如行云流水，不可遏止，成为后世散文的范本。这时期诗歌的成就集中表现在《诗经》

和《楚辞》上。《诗经》是西周到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类。既有王室庙堂的乐诗，又有各诸侯国的许多民歌。当时有一种采风制度，采集反映民间生活和风俗的诗歌再经过文人加工便成了《诗经》中的国风。《诗经》多为四言体，能够配乐歌唱，是中国诗歌的开山之作。战国时期，在南方的楚国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楚辞》的骚体诗，其代表作是屈原的《离骚》，这首诗长达 337 行，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篇幅最长的个人抒情诗。《楚辞》是一种与《诗经》不同的诗体，其中大量引用神话传说，思想丰富，文采华丽，感情奔放，富有浪漫色彩，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这个时期在艺术方面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由于考古学的发展，人们对当时的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开始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当时在音乐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周人礼、乐并重。前举《诗经》和《楚辞》很多是可以配乐歌唱的。许多音乐还跟舞蹈结合在一起。孔子是很懂音乐的，他特别喜欢韶乐而不喜欢郑声，他在齐国听韶乐听得入神，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可惜那些音乐没有曲谱留下来，只可以从乐器组成情况约略推知一二。例如湖北随州发现的曾侯乙墓中随葬了用于庙堂的整套乐器，包括编钟、编磬、鼓、琴、瑟、笙、排箫和篪等，编钟、编磬都挂在架上，俨然一个演奏室的样子。编钟上有错金的乐律铭文，其音域极宽，达到五个半八度。中心音域的三个半八度 12 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可以演奏各种复杂的乐曲，令当今音乐理论家为之惊叹。可是曾侯只是一个小小的国君，就能够达到如此的气派，由此可以想见当时音乐景况之盛与水平之高。

上面的叙述说明，夏商周时期的华夏文明，不论在物质方面、制度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有了开创性的成就和相当的发展，多元一体格局已基本奠立，中华文明的特质已基本形成，不但大大丰富了世界文明史的宝库，而且为往后更高水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原载《国学研究》第 12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古代文明》发刊辞

人类的历史有几百万年，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只有几千年。而且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地方只有很小的几片，四大文明古国面积的总和还不到全球陆地面积的百分之一。可是就在这几个古老文明产生之后，人类社会便大大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不断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一部几千年的文明史，乃是人类不断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同时不断地认识自我和发展自我的历史。尼罗河畔的大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和中国的万里长城等号称世界奇迹的伟大建筑，不过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初试身手的无数事例中比较突出的几个。时至今日，人们已经能够登上月球、遨游太空，运用纳米技术甚至可以制造像米粒一样大小的机器人进入人体内脏施行手术，可以把无数册书的内容压缩到一张小小的光碟里，我们的餐桌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转基因食物，克隆技术已经复制出来跟母体一样的绵羊和小牛，下一步是不是要克隆人正在引起严重的关注——因为不知道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总之，现代文明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使之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可惜事情总是伴随着相反的一面，今天人们面临着比任何时候都严重的危险，因为现代文明的能量已经发挥到如此之大，稍一不慎就会酿成灭顶之灾。这使得人们不得不更加理智地面对现实和思考自己的未来。人类文明到底会走向何方？我们的前途和命运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虽然不能预卜先知，却可以从历史的演变中寻求必要的启示。仅此一端就有充足的理由切切实实地研究几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上从文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建设与破坏、正义与邪恶以及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人类总是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让文明的火炬，永不熄灭越燃越亮。研究古代文明，可以追溯人类走过的光辉而曲折的道路，正确地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化遗产，吸取丰富的经验和历史教训，从而起到温故知新的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地区之一。全世界独立发生的文明，有的学者认为有六个，有的认为只有三个，不管怎样中国都是其中之一，并且是唯一没有中断而连续发展下来的，地域之广和人口之众也是首屈一指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在世界历史上应该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而过去的研究十分不够，或者仅就中国历史来研究中国历史。这种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本集刊的宗旨，就是要在研究世界

古代文明的大背景下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我们相信，如果不了解世界古代文明发展的大背景，就难以把握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及其在世界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同样如果不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对于世界古代文明的认识将是不完全的，也是难以深入的。从这样的视角来研究古代文明，需要有许多人的努力，我们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但我们认为这是值得努力的一个方向，哪怕是做一些试探也是好的。我们将发挥北京大学多学科的优势，集中研究中国以及东方和西方古代文明的力量，共同努力。这还不够，我们不仅要依靠北京大学有关学者的支持，还将特别欢迎海内外有志于这一事业的学者来参加此项工作，努力开拓古代文明研究的新局面。

在古代文明研究中，考古学发挥着十分突出的作用。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和美洲玛雅文明等，无一不是首先由考古学揭示出来的。中国虽然从周代起就已经有比较丰富的文献资料，但周代以前的文明史也几乎全靠考古学建立起来。因此我们关于古代文明的研究自然会以考古学为基础或集合点。但现代学术的发展往往需要多种学科的交叉与结合，考古学本身就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中多种学科结合的产物，研究古代文明更应该如此。因此我们不但希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通力合作，还希望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生物学、地质学和其他有关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学者积极参与，让古代文明的研究能够充分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

在新的千年到来之际，各个学科都在规划今后发展的宏图。在这种形势下，古代文明的研究必将出现新的气象。本集刊的作用虽然有限，但愿意积极参与，期望在这个世纪的新潮中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原载《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

追寻中国文化的根

上海学林出版社的雷群明先生先后约了石兴邦先生、张忠培先生和我，要我们主编一部中国原始文化的大型图书，作为中国文化系列丛书的第一册。要求是要体现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最新成果，图文并茂，特别是要有几百幅质量上乘的彩色图版。我们知道这件事做起来很难，首先弄那么多彩色照片就非常不容易。不过就这件事本身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出版社雷先生的热情也很使我们感动，思虑再三，还是乐意地接受了。我们随即约请了几位对中国原始文化颇有研究的学者一起商量，并且进行了初步的分工。大家积极努力，仍然几经周折，花费了许多时间，现在终于完成可以付梓了。我们所做的事情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追寻中国文化的根！

世人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过非常灿烂的文化，中国人的祖先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过许多杰出的贡献。至于中国文化是怎样起源的，则是要花大力气进行探索才能说清楚的。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主要是由于考古学家们孜孜不倦的努力，对中国文化的孕育和早期发展，至今方才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我们现在知道，中国文化乃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断地认识和利用周围的环境，在不断地解决人地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自然地理的基本情况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幅员广大，有960万平方公里，周围有高山大海的屏障，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使得中国文化只能从本土起源，并且能够成长成为一种极富特色的大型文化。二是地势西高东低，有三级阶梯，最好的地方在东部的一级阶梯。东部和南部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疆，有台湾岛、海南岛、舟山群岛、西沙、东沙、中沙和南沙群岛等岛屿，所以中国不但是大陆国家，也是面向海洋的国家，中国文化自然是既有大陆性特点，又具有海洋性特点。三是地形复杂，各地气候、水文、土壤、植被和动物群落等千差万别，而条件最优越的地方在中部偏东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就使得中国文化一开始不可能是统一的，而是多头发展，异彩纷呈。同时又是具有主体的，有强大凝聚力的，以至逐步发展为多元一体和多元一统的格局，它是使中国文化得以连续发展而长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也是使得中国最终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结合几十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原因。四是中国国境附近在古代没有强势文化，不可

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中外文化的交流主要是通过三个方向的三条路线来实现的，第一条是东北方向经朝鲜到日本的所谓稻米之路，第二条是西北方向从新疆到中亚以至西亚的丝绸之路，第三条是南方通过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直到西亚、北非的所谓海上丝绸与香料之路。这些路线是逐步开发的，在史前时期的交流十分有限。即使在开发以后，相互的交流也是有起有伏，逐渐增加的。由于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大型的强势文化，所以一直是文化交流的主体，外来文化固然对中国文化有过多方面的影响，却从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的特色和发展方向。这种情况直到近代才有所改变。

中国文化的根到底可以追溯到多么古远，这是一个很难用几句话说明清楚的问题。我们只能说，至少在 200 万年以前就已经有人类生活在神州大地上了，他们应该是中国人的祖先，也可能是其他地方的人特别是东亚和美洲人的祖先。200 万年距离人类诞生的年代已经非常逼近了，所以中国是不是人类起源的摇篮之一，成了学术界非常关注的问题。从那以后，以中国为主体的整个东亚地区，就发展了一种以砍砸器和石片石器为特征的旧石器文化，明显区别于西亚、北非和欧洲的旧石器文化。

中国的旧石器文化大致可以区分为早中晚三期，每期又都可以分为北部和南部两大地区，南北的文化面貌有所不同。甚至北部地区的北半部与南半部以及南部地区的华中、华南与西南也存在一些区别，从而构成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基本发展谱系。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间是不是还有一个过渡时期，学术界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里暂时不去讨论。由于旧石器文化已然出现区域化的情况，所以新石器时代文化一开始就是多源的，而不是从一个地方首先发生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成就是农业的发明。由于农业经济对于自然环境的要求较之采集—狩猎经济更为严格，有的地方可以发展水田农业，有的地方只能发展旱地农业，有的地方暂时还难以发展农业而仍然实行采集—狩猎经济，从而逐步形成为不同的经济文化区，这也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呈现多元化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中，区域性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尽管如此，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毕竟还有大致相同的发展规律，从而可以统一地划分为几个连续的发展阶段。

大致说来，新石器时代早期是发明农业、陶器和磨制石器的时期。这些部门虽然在技术上还很落后，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不大，但是它们的出现乃是划时代的大事。特别是农业的发明，乃是人类经历的最重大的革命之一，以至于大大改变了往后历史的面貌。不过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还不大普遍，对于它的全貌还不大清楚，甚至它的起始年代都不容易确定，这是以后要加强调查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新石器时代中期无论在农业、陶器和磨制石器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发展，已经可以明

确的划分为几个经济文化区。华北是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华中是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东北是旱地农业和狩猎经济文化区，华南是水田农业和采集经济文化区，广大的西北和青藏高原人口稀少，可能是狩猎、采集也不很发达的经济文化区。每个经济文化区都有一些区域性考古学文化，例如华北区有磁山·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和老官台文化等，华中区有彭头山文化和城背溪文化等，其年代大致在公元前7000~前5000年，有的地方的起始年代可能稍晚。

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一个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时期，聚落遗址的数目成倍增加，反映人口大幅度增长。区域性的考古学文化进一步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有华北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华中的大溪文化、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等，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由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有些地方的年代稍有出入。

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甚或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到公元前2000年基本结束，它是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之间的一个过渡时代。这时期发明了铜器，主要是制作小件的工具、用具和装饰品。铜器的质地不纯，还不会有意识地冶炼青铜器，也不会制作大型器具。这时农业和手工业都有较大的发展，社会开始分化为贵族和平民两大阶层，这从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情况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新发展的高档手工业品差不多都为贵族所有。这时武器有很大改进，到处都发现有尸骨凌乱的所谓乱葬坑，说明战争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防止敌人的进攻，在一些最重要的地方筑起了城壕，中国最早的一批城址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这时整个社会都在酝酿着深刻的变化，预示着一个崭新的文明社会即将来临。正是在这原始社会行将走完它的最后里程的时期，原始文化也发展到了它的顶峰。中国文化的许多光辉成就，其根基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有的还可以追溯到更古时期。下面我想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先说农业。人们常说中国是以农立国，这话并不是没有一定道理。因为中国农业有悠久的历史，有许多重要的成就，从而支持了中国古代文明大厦的建立与发展。但中国农业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和怎样发生的，一般人并不清楚。近年来的考古研究表明，中国的农业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万年以前，并且有两个起源中心。华中的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华北的黄河流域是粟作农业的起源中心。以后在这两个起源中心的基础上发展成两个相辅相成的农业体系，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国的农业从一开始就是有畜农业，就是与作物的种植相伴还有家畜的饲养，而首先被饲养的主要家畜是猪。直到现在，中国人最爱吃的还是猪肉。

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是纺织。我国最早用于纺织的纤维是麻，第二种就是蚕丝。传说黄帝的妻子嫫祖劝民养蚕，现在知道至少在公元前40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便已经有丝织物了，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遗存中更发现有织得很好的丝绸。从此以后，丝绸成为中国人的上好衣料，并且通过漫长的丝绸之路传到西方。人们对丝绸钟爱

有加，以至于把中国称为丝国。

中国的陶瓷也是世界著名的，英文的瓷器和中国是同一个字。现在知道我国至少在公元前一万年以前就已经发明陶器了。各地陶器的品种、造型和纹饰风格可说是千差万别，丰富多彩。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黑陶都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中原龙山文化遗存中甚至出现了个别的原始青瓷，可说是我国瓷器的鼻祖。

中国的房屋建筑在世界上别具一格，其中有不少特点可以一直追溯到史前时期。例如在布局上讲究中轴对称、前堂后室，在结构上常用柱网和梁架，大量使用木材等，在新石器时代都已初露端倪。至于房屋建筑在与环境的适应与协调方面更是有许多方面的创造，例如北方气候寒冷干燥，居室往往作成地穴或半地穴式；南方炎热潮湿，所以往往先打地桩，在上面铺设地板，再来架设梁柱和屋顶，这就是所谓干栏式建筑，至今在华南和云南等地还能够经常见到。在黄土地带挖掘窑洞更是利用黄土特性的一种巧妙的创造，因为它几乎不需要别的建筑材料，主要靠人工挖掘，冬暖夏凉，四时相宜。早在龙山文化时期，这种窑洞式房屋就已经广泛分布于内蒙古、山西、陕西和甘肃的黄土高原地区，直到现在这些地方的民居还常常采用窑洞的形式。

丧葬制度也往往能够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我国多数民族实行土葬和厚葬，把许多好东西都埋到地下了。不过这也有助于考古学者了解历代的埋葬习俗和丧葬制度。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各地的埋葬习俗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也存在着相似的发展规律。一般都有较大的公共墓地，墓葬按一定秩序排列，它是后来族坟墓制度的始原。较早的墓葬都比较小，随葬的东西也少，反映那时的生活水平不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后来出现了少数贵族的大墓，与多数平民的小墓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贵族墓又有明显的等级之别，一些墓中开始随葬礼器，成为后来丧葬礼制的嚆矢。

在原始文化中，造型艺术是一项重要内容，其中主要是绘画和雕塑两类。在欧洲，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洞穴中就出现了很好的壁画。我国至今没有发现，只是在各地发现了许多岩画，其年代最早恐怕也只能到新石器时代。所谓岩画有的是用颜色画的，多数则是琢刻而成，应当属于雕刻的范畴。我国史前的绘画大多数发现在陶器上，那种陶器因而得名为彩陶和彩绘陶。花纹的内容多半是几何形图案，也有人物、动植物和日月星辰等，除单个图像外，偶尔也有成组的图画。有单色也有多色的，画法上有勾勒、平涂，也有点染。屈家岭文化中那种用浓淡不同的墨色晕染再点上浓墨的画法，很有点后世国画的风韵。史前的雕刻品较绘画更为普遍，所用材料有玉、石、骨、牙、蚌、木、陶等多种，技法有线雕、浮雕和圆雕等。此外还有泥塑，有的泥塑被烧成陶质。雕塑的题材十分广泛，举凡人物、动物、植物、神怪、天象和各式各样的图案花纹都有。良渚文化玉器上刻的神人兽面纹，精细程度已接近于微雕。辽宁凌源牛河梁的泥

塑女神像不但造型逼真，而且个体比真人还大，实为史前雕塑的巨擘。

玉器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特殊的位置。现在知道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经有玉玦等装饰品，但数量很少。新石器时代晚期略有发展。到铜石并用时代，随着贵族阶层的出现，玉器的制作便得到极大的发展，玉器加工技术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除各种装饰品和镶嵌物品外，最重要的是象征军事指挥权的玉钺和用以沟通天地神明的法器玉琮和玉璧等，它们还往往用做表示身份的礼器。

最后我想讲一下中国文字的始原。因为文字是文明的象征，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待言的。汉字的构成虽然有六书之说，但主要是指事和象形两种，其他各种都是由这两种拼凑或孳乳而成的。现在发现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那是一种很成熟的文字，明显不像最初文字的样子，可见汉字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考古学者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发现有个别的刻画符号，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数目显著增加，并且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系统，其中几乎没有象形的。到铜石并用时代除有某些可以归入指事一类的符号外，还出现了不少象形的符号，它们也有几个不同的系统。由于它们主要是刻画在陶器上，除极个别有几个符号联系在一起外，绝大多数都是以单个符号出现的，所以无法识别。其中有一些符号明显与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相同或相似，我们虽然不能因为它们相同或相似就认为它们是某某字，但如果说后来的汉字就是在这些符号的基础上创造发展出来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由于汉字走上了以形声字为主体的道路，形、音、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很适于汉语的特点，各种方言都可以读，所以一直沿用至今。中国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与汉字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以上所举各项，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其始原都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记载以前的时期，可见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她的根基深植于遥远的史前时期。因此我们编写《原始文化》这部书的目的，就是要追寻中国文化的根。中国的原始文化是十分丰富的，而且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我们对于中国原始文化的了解会越来越深，越来越丰富多彩。在这部书有限的篇幅中，事实上难以全面地反映它的方方面面及其发展过程。我们经过认真的讨论，决定选择一些最主要而且是目前研究比较好的方面编成本书，希望她能够基本上反映当前的研究水平，并且尽可能提供读者感兴趣的一些有用的知识。我们深知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容易，如果有选材或论述不恰当的地方，诚恳地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原为上海学林出版社拟出版的《原始文化》所写的序言，待刊。后转载《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炎黄传说的考古学观察*

长久以来，中国人和海外华人都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子孙或炎黄裔胄，我和在座的各位当然也不例外。但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一向以重建中国上古史为己任，在考古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许多重要成果的情况下，自然希望新的基础上来重新梳理炎黄传说，看看哪些部分确实包含有真实的历史素地，哪些只是后人的推演，这两方面的内容又是如何融合为一种炎黄文化而为后人所欣然接受的。

我首先注意到，在先秦时期关于黄帝的传说比炎帝多得多，黄帝的地位也特别崇高，往往被视为人文始祖。例如《世本·帝系》和古本《竹书纪年》讲帝王谱系都是从黄帝开始的，各种五帝系统的排序中，为首也多为黄帝。《国语·鲁语》引展禽的话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颡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颡顼，郊鲧而宗禹”。可知虞夏都把黄帝尊崇为自己的始祖而没有提到炎帝。《世本·作篇》记载的许多创造发明多说是黄帝臣做的，发明养蚕治丝者则归功于黄帝的妻子嫫祖。再说先秦的六种历书中就有黄帝历，中国最早的医书就是《黄帝内经》，炎帝无法跟黄帝相比。

最早把黄帝和炎帝联系起来讲的主要有以下三条：

(1)《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这里黄帝和炎帝俨然是两兄弟。

(2)《逸周书·尝麦解》：“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这里的赤帝应该就是炎帝。赤帝打不过蚩尤，就去求救于黄帝，只有黄帝能够打败蚩尤。《史记·五帝本纪》讲的涿鹿之战可能跟这个故事有相似的本源。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黄帝的势力是最大的，地位显然也是最高的。

* 2010年4月17日在炎黄文化研究会等主办的“新时期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会后做了修改。

(3)《左传·昭公十七年》引郯子的一段话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里同样是把黄帝放在最前面，炎帝次之。郯子是东夷人，所以把东夷的远祖太昊和少昊同黄炎并提。

以上三条都同时讲述黄帝和炎帝，且都是把黄帝放在最前面，炎帝次之。不但华夏人如此，连东夷人也如此，可见黄帝影响之大。

有些古文献之所以把炎帝放在黄帝之前，是因为汉代刘歆（公元前？～公元23年）编《世经》时错把炎帝跟神农当成一个人了。其实《史记·封禅书》说“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和炎帝明显是两个人。神农的传说很多，有时与燧人氏、伏羲氏等相联系，成为五帝之前的三皇之一。而所谓三皇好像各代表一个时期，所以时常有神农之世的说法。有时则是指一个人，如神农尝百草、发明农耕之类。到晋代皇甫谧（公元215～282年）在《帝王世纪》一书中干脆叫“炎帝神农氏”。书中写道：“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本起烈山，或称烈山氏……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代及轩辕氏也”。这里的轩辕氏明显是指黄帝^①。按照这个说法，炎帝比黄帝早了许多代，根本不是黄帝的兄弟，也无法跟黄帝打仗。但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吗？

从先秦的传说来看，炎帝应该是跟黄帝同时并且有密切关系的人，跟神农好像不是一回事。也许炎帝的部族比较重视农业，或在农业方面有所创造或改进，所以后人就把他和神农挂起钩来。如果像《帝王世纪》说的那样，神农同黄帝就是两个时代的开创者，其意义当然就非同一般了。《商君书·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这是先秦学者比较普遍的看法，说明神农和黄帝代表着判然两个不同的时代，从黄帝起社会才开始发生本质的变化。从考古学来观察，神农是代表农业革命的先驱，黄帝则是文明起源或所谓城市革命的先行者^②。

①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名曰轩辕”，而且“居轩辕之丘”。皇甫谧解释说“黄帝……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可是《越绝书·宝剑篇》引用春秋时风胡子的话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按照这个说法，轩辕和黄帝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轩辕不但比黄帝早得多，甚至比神农还早。孰是孰非已经无法考证了。

②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 Gordon Childe）首先提出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的概念，而前者主要是农业革命，后者则应是文明社会的开端。见所著《远古文化史》（Man makes himself），周进楷译，中华书局，1958年。

传说中神农的事迹主要是发明农业。《易·系辞》说：包牺氏（即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班固《白虎通·号》解释说：“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

传说中发明农业的不止一人。周人就认为他们的始祖后稷是首先发明农业的，以至被后人尊崇为稷神。还有一位烈山氏之子。《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引晋太史蔡墨的话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国语·鲁语》则说：“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后人又往往把烈山氏跟炎帝神农氏画等号。前述《帝王世纪》就有这种倾向。

从考古学来观察，中国农业的起源至少有上万年的历史。等到有文字记载的时候，这段历史已经记不清楚了，所以只有一些半神话式的传说，挂到什么人身上其实并不重要。再说农业的发明也绝不是一个人的事。中国历来号称以农立国，把农业的发明看成是非常神圣的事而造出一个神农来加以膜拜，也是情理中之事。

但中国农业的起源毕竟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有两个主要的农业起源中心。一个在华北的黄河流域，是以种植黍和粟为主要作物的旱地农业起源中心；一个在华中的长江流域，是以种植稻米为主要作物的水田农业的起源中心。这两个中心紧密相连，可以互补。而且因为处在全国的核心区域，占地面积又大，对于往后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持续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更有进者，由于这两种农业分别传播到东北亚和东南亚，从而对整个东亚文明的起源和历史进程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于黄帝的传说往往与五帝的传说相联系，真实性似乎大一些，但要坐实为信史还是很难。过去考古学者对这个问题一般比较谨慎，不轻易跟具体的考古学文化相联系。不过在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和发展谱系越来越清晰的情况下，也不妨做一些试探。近年来先后出了三本讨论五帝时代的书就值得注意。一是郭大顺的《追寻五帝》，认为“黄帝族本是在燕山地区土生土长的一个部族”，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应该是红山文化，对应炎帝族的则是仰韶文化^①。此前田昌五也有类似的说法^②。二是许顺湛的《五帝时代研究》，认为黄帝都有熊应该在今河南省新郑市，居轩辕之丘也在新郑市，而灵宝市铸鼎原则“是黄帝时代的一处祖庙和祭坛”。因此黄帝族团活动的

① 郭大顺：《追寻五帝》127~128页，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

② 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35~6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地域与河南地区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遗存关系最为密切^①。三是韩建业的《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认为仰韶文化的东庄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才是黄帝族系的主要文化遗存，分布区主要在晋南豫西；对应炎帝族系的则应是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和泉护类型，分布区在渭河流域^②。三位学者对黄帝的研究都有其独到的地方，但对其活动的主要地区和所属考古学文化的推断则不尽相同。

从考古学研究来看，大约在距今5000年，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崧泽—良渚文化、湘鄂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和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都已开始走向文明化的进程，其中仰韶文化的表现较为突出。在仰韶文化中期也就是庙底沟期以前的聚落遗址规模一般不大，无论从聚落内部还是从聚落之间的关系来看，都体现出一种基本平等的状态。但从庙底沟期开始就出现了少数中心聚落，不但规模较大，其遗迹和遗物的规格也远高于一般聚落。稍晚更出现了郑州西山那种防卫性的城址^③。有的学者以为那就是黄帝城，但那城复原起来的面积不过25000平方米，出土遗物的规格也不甚高，年代又略显偏晚，似乎与黄帝拉不上关系。传说黄帝的都城主要有两说，即涿鹿和有熊。谯周（公元201~270年）《古史考》说黄帝是“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史记集解》引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话说：“黄帝……受国于有熊”。《太平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的话说“或曰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后人多依此传说认为黄帝就是建都有熊，地在今河南新郑境内。谯周和皇甫谧究竟根据什么资料认定黄帝是有熊国君且建都于有熊已不可考，按《五帝本纪》所说，黄帝确实是建过都邑的，不过不是有熊而在涿鹿。那时的情况是天下大乱，“诸侯相侵伐”，黄帝则“习用干戈以征不享”。先是跟炎帝大战三次才取得最后的胜利，接着又打败了更强大的蚩尤，从此声威大震。不仅如此，凡“天下有不顺者”，他都要去征伐。大家只好服从他的领导，即所谓“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于是他就与诸侯“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这个邑当然是都邑，就像商代的首都称为大邑商一样。《史记·封禅书》说黄帝筑五城十二楼，理应首先给涿鹿之阿的都邑筑城。涿鹿的地望，多说在今涿鹿，也有说是在上谷或邯郸附近的彭城的，莫衷一是。而且在这些地方包括新郑在内至今都没有发现史前城址或较大的中心聚落遗址，黄帝的都邑究竟在什么地方，还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不过按照

① 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127~128页和517~52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② 韩建业：《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28~29页和149~154页，学苑出版社，2006年。

③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7期。

《五帝本纪》的说法，黄帝是“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建都也不会像以后那样正规的都城，规模也不会很大。

现在知道庙底沟期最大的中心聚落遗址为河南灵宝的北阳平，其面积大约有 100 多万平方米。从断崖上可以看到很大的房屋基址。因为至今没有进行发掘或详细勘探，不能确定是不是有城墙的设施。在北阳平遗址的周围还密集地分布着许多同时期的遗址，其中的西坡已经过多次发掘，发现有回廊的超大型房屋建筑和蓄水池等配套设施。其外部更有防御性壕沟^①，隔沟有一片墓地，其中较大的贵族墓都随葬玉钺和专门烧制的陶器^②。钺是在我国考古学文化中最早出现的专门性武器，表明这个时期确实出现了战争。普通战士只可能使用石钺，玉钺是贵族使用的。在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众多遗址中，至今还只有西坡的大墓有用玉钺随葬的情况，表明北阳平—西坡确实是当时最重要的中心聚落遗址。《越绝书》说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这玉兵当为玉钺。林沄曾认为王字本是依据钺的形状而创造的^③，掌握玉钺的人自然就是王，这与西坡墓地的情况也大致相合。历来认为北阳平一带是传说中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的所在地，所以又叫铸鼎原，其南面有一座山就叫荆山。在铸鼎原旧址上现存有唐贞元十七年所立石碑，上刻《轩辕黄帝铸鼎原碑铭并序》。明清时期所立石碑中还屡次提到汉唐时期在铸鼎原上有黄帝庙。这个古老的传说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另当别论，但总是跟黄帝有些形影不离的感觉。

当时既然是天下万国，不但黄帝的都邑应该有城，各小国也应该有自己的都邑或中心聚落，有的也可能有城。庙底沟期除了北阳平和西坡，其他地方还有一些比较大的中心聚落遗址。例如在陕西渭河流域就有华县泉护村、华阴西关堡和临潼杨官寨，山西南部的夏县西阴村和芮城东庄村，河南洛阳王湾以及郑州青台与大河村等处。这些中心聚落也许就是一些小国的都邑。在青台的婴儿瓮棺葬中发现了我国最早的丝绸遗存^④，这似乎又与黄帝妻子劝民养蚕治丝的传说相合。更有进者，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期乃是一个大扩张的时期，这也与黄帝到处征战的传说相合。不过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分布于陕西、山西、河南中西部和河北、内蒙古及甘肃的部分地区，其中又分为许多地方类型，黄帝直接统治的地域不可能有那么大。这只要看发展水平更高、实力也更强的夏朝统治区仅限于晋南豫西就知道了。许顺湛和韩建业从不同的角度把黄帝族系的中心地区推断在河南中西部或晋南豫西的庙底沟类型，应该是近乎事实的，后者所作有分寸的分析可能更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 105 号仰韶文化房址》，《文物》2003 年 8 期。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墓地 2005 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 年 1 期。

③ 林沄：《说王》，《林沄学术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④ 张松林：《荥阳青台遗址出土纺织物的报告》，《中原文物》1999 年 3 期。

加合理。

黄帝与炎帝和蚩尤战争故事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一直是学术界聚讼纷纭而难以得到确切解释的难题。按照《国语·晋语》的说法，黄帝、炎帝是兄弟，或者用现在流行的解释是两个兄弟氏族，以后各自发展。虽然是“成而异德”总不至于打得天翻地覆，黄帝最后才“三战而后得其志”。更不可理解的是，黄炎成业时期的姬水、姜水，按照逻辑推测应该相距不远，总不离渭河流域及其左近，各家的考证也是如此，怎么会一同跑到远隔千里的涿鹿去一战再战呢？有的学者看到了这个矛盾，提出黄帝与炎帝和蚩尤的战争其实是一回事，是一个故事的翻版。只有黄帝与蚩尤打仗，包括黄帝联合炎帝与蚩尤大战并最终打败蚩尤，不大可能有黄帝与炎帝的大战^①。

黄帝在战争中不仅联合炎帝，还能率领其他小国的军队，即所谓“征师诸侯”。而且在打败蚩尤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司马迁在这里讲的“诸侯”、“天子”都是后来才有的称谓。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一些小国和部落的首领慑于黄帝的军威而不得不服从他的领导，使得黄帝在当时诸小国中处在一种非常突出的位置。这应是黄帝传说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黄帝不但有一支很能打仗的军队，建立了一个不甚稳固的都城，还组织了一个很能办事的小朝廷，也就是最早的政府，设立了各种官职。《五帝本纪》说，黄帝“官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所谓以云命官是根据东夷人郟子的说法。《淮南子·览冥训》也说“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管子·五行》则说“黄帝得六相而天下治”。这里说的是主要的官职，下面还应该有许多臣僚。

黄帝时期还有许多创造发明，其中有些就是黄帝臣做的，《世本·作篇》述之甚详：“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作调历，沮诵、仓颉作书，沮诵、仓颉为黄帝左右史”。还说黄帝臣“雍父作杵臼”、“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伯余作衣裳”等等。至于黄帝之时以玉为兵，黄帝采首山铜铸鼎和西陵氏劝民养蚕等传说，在相应的考古学文化中都有所反映^②。因此说黄帝是文明起源的先行者或人文始祖是并不过分的。

近年来的考古研究表明，中国在文明起源时期至少有五个重要的地区，各地的发展水平相近而各具特色，相互之间又有密切的关系，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只

① 我在《炎黄传说与炎黄文化》一文中曾谈到这件事，并引用了束世澂和童书业两位先生的论述。见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274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 仰韶文化中已发现小件铜器，尚未发现铜鼎。

有仰韶文化的发展最稳定，成为往后逐渐形成的华夏文化的主要基础^①。而以黄帝为代表的所谓炎黄文化所依托的正是仰韶文化。华夏文化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由文化融合到民族认同的过程，以至于广大地区的人民都认同黄帝或炎黄为自己的祖先。炎黄文化几乎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其原因盖在于此。

^① 严文明：《重建早期中国的历史》，简本载《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文物出版社，2009年。全本见本书。

重建早期中国的历史

一 为什么要重建早期中国的历史

重建早期中国历史的任务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了打破封建的史学体系，一些学者对先秦史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辨，觉得很不可靠，必须推倒重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在总算有了初步的结果，若是要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则还需要进行长期的努力。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首先要了解中国传统的古史系统是什么。

1. 中国传统的古史系统

中国很早就有编写史书的传统，到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有一些官修或半官修的史书问世。其中有些是纪年体，有的则记述帝王谱系，追溯较远的多是从黄帝开始。最早提出古帝王谱系的当为《世本》中的《帝系》篇。《汉书·艺文志》载：“《世本》，十五篇”。班固解释说，《世本》是“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书中除《帝系》外，还有《王侯世》、《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居篇》和《溢法》等篇，古书多有引用，可惜到宋代就失传了^①。其中《帝系》篇又曾收入《大戴礼记》中。二书文本基本相同而略有出入。《大戴礼记》叙述商人先祖世系至契为止，周人先祖世系至稷为止；《世本》则多了契子昭明至天乙汤，稷子不窋至文王。关于楚人先世的说法也不尽相同。古本《竹书纪年》的帝王谱系也是从黄帝算起的，继而叙述夏商周直到战国魏襄王时为止的历史。而此书即出于魏襄王的墓中，是一部纪年体的通史，只是文句简略。相比之下，《帝系》仅写到春秋，似乎成文比《纪

^① 清代以来有多位学者在古书中辑录所引《世本》原文，其中以雷学祺和茆泮林的两种辑本较佳。见《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9年。

年》要早^①。成书于战国早期的《国语》和《左传》讲述古史也多从黄帝说起，这大概是当时许多人的共识，所以后来司马迁写《史记·五帝本纪》也是从黄帝讲起的。

一些史书把古代比较著名的领袖人物称为帝某或某帝，例如黄帝、炎帝、帝尧、帝舜之类。帝的本义是禘祭，首先是对神的祭祀，跟着就有对已故首领的祭祀。被祭的神称为某帝，被祭的人王也可称为某帝。以黄帝为始祖的谱系中也有不少是没有帝名的，他们是不是当过首领不得而知。到了战国五行说盛行，一些学者往往把自认为最有名或最有影响的帝找出五位而称为五帝。《孔子家语·五帝》假托孔子答季康子问时说：“天有五行……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是为五帝，其名称为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的《天文训》和《时则训》等也有同样的说法，但此说影响不大。

较早出现的五帝排序见于《国语·鲁语》，其中写道：“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大戴礼记·五帝德》假托宰我问孔子五帝的事，排序就是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这是最有影响的一种五帝说。《吕氏春秋》的《古乐》和《尊师》两篇也引用此说。到《史记·五帝本纪》引用此说后便成为最权威的一种说法。

还有别的五帝说。例如《战国策·赵策》、《易·系辞下》和《庄子·缮性》等便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伪《古文尚书》序则以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甚至到王莽和萧梁时期又各排出了新的五帝。主要因为《史记》的权威，《五帝本纪》所排定的五帝为大多数人所尊重。其中所述五帝的事迹基本上是照抄《五帝德》和《帝系》。

在战国时代还有所谓三皇的说法，据说那是比五帝时代更早的一个时代。有各种各样的三皇，但没有一种说法具有权威性，内容也更加虚无缥缈，所以司马迁没有采用。《史记》之后，历代都有官修的史书，也都依照司马迁所定的古史体系，这就是传统的中国古代历史的系统。可是有些人觉得中国历史应该比五帝更早，起码要追溯到所谓三皇的时代。到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时，干脆在前面加了一个《史记补》，叫做《三皇本纪》，可谓画蛇添足，受到一些人的批评。

其实司马迁也是很无奈的。他明明知道有些记载是不可靠的，有些记载是矛盾的，却要想法子捏合到一起。他在《史记》卷十三的《三代世表》中说：“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缺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

^① 刘起鈇根据《世本》书中写赵王迁为今文迁，认为成书之年应该在战国末年。见所著《古史续辨》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慎也。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这些话讲得多么好！说明他对于古代历史的传说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可是他对于那些传说舍不得割爱，紧接着就说“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迄共和为世表”。我们把他所制世表加以简明化，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矛盾之处。例如《五帝本纪》根据《尚书·尧典》说尧把天子位传给舜，舜又传给禹。可是表中这三个人都是黄帝的后裔，而尧和禹是同辈，都比舜长四辈，怎么能说得通呢^①？至于夏商周先人的世次矛盾就更大了。显然司马迁的本意还是“疑则传疑”，并没有把它看成是真实的信史。

黄帝	昌意→颛顼	穷蝉→敬康→句芒→螭牛→瞽叟→帝舜（重华）
		鲧→禹（文命）→启→太康→仲康→下传十四世至桀
	玄嚣→螭极→帝喾	帝尧（放勋）
		契→昭明→相土→下传十一世至汤→再传十六世至纣
		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下传十一世至武王

2. 对传统古史系统的质疑

很早就有人对《帝系》和司马迁《三代世表》所拟定的古史系统提出质疑。宋代的大学者欧阳修在《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四十三《帝王世次图序》中说：“迁所作《本纪》出于《大戴礼》、《世本》诸书，今依其说图而考之，尧、舜、夏、商、周皆同出于黄帝。尧之崩也，下传其四世孙舜；舜之崩也，复上传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寿百岁。稷、契为高辛之子，乃同父异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汤与王季同世，汤下传十六世而为纣，王季下传一世而为文王，二世而成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孙纣，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孙纣而代之王。何其谬哉！”

欧阳修主要是说世表中世次的紊乱达到了荒谬的程度，更为荒谬的是表中把不同族系的人硬派上血亲关系，说他们都是黄帝的子孙，黄帝就成了千古一系的人文初祖。封建史学体系的核心就是以帝王为中心，帝系和世表正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观的代表作。其实商王的始祖契和周王的始祖稷都是知母而不知父的，有点像母系氏族社会的情

^① 《汉书·律历志》引《帝系》说：“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禹”。王逸注《楚辞·离骚》，也引《帝系》说“颛顼后五世而生鲧”。可能那时所传《帝系》有不同的版本，抑或有人看到有矛盾而有意加以调和。

形。夏后的先祖也只能上推到鲧。这些情况司马迁是知道的。他在《殷本纪》一开头就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诗·商颂·玄鸟》开头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周本纪》开头就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嫄……姜嫄出野见大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诗·大雅·生民》开头也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履帝武敏歆……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这里都说得清清楚楚。可是这位太史公觉得契和稷不能没有父亲，于是按照《帝系》的说法，硬说简狄“为帝誉次妃”，说“姜嫄为帝誉元妃”，殷人的始祖契和周人的始祖稷这两位毫不相干的人物便变成了同父异母兄弟，自然也都成了黄帝的裔孙！这样编排的古史系统怎么能令人相信呢？

对于《帝系》和司马迁等确立的古史系统提出质疑的不只一人，清代的阎若璩和崔述等就曾经作过详细的辨正工作。到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顾颉刚为首的一批学者以《古史辨》为阵地，做了大量考辨古史的工作。诚如顾先生自己所说：“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至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这是实话，也是谦辞。他们比以前的学者站得更高，方法更科学，而且目标明确，就是要彻底推倒两千多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统，作为“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一项重要任务。可是推倒了旧有的古史体系，真正的中国古代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顾颉刚曾经明确地指出，应该借重考古学来重建中国的古代史^①，这是很有见地的，尽管他自己并不从事考古学研究。

但是在近代考古学开展以前，有一件事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就是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和被确认。

二 甲骨文研究的贡献

1899年时任清代光绪朝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发现中药的所谓“龙骨”实际上是古代的龟甲片，上面发现有刻划的文字，于是委托古董商购买更多的有字甲骨，认出其中有祖乙、祖辛等商王名号，断定是殷商遗物。之后各家竞相收藏和进行研究，成绩卓著。王国维1917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②，接着又发表《续考》和《殷周制度论》等宏文，影响颇大。他用二重证据法证明《史记》中的《殷本纪》所述殷先公先王的世系基本上是正确的。而《史记·殷本纪》主要是根据《世本》的《帝系》

^① 顾颉刚在《答李玄伯先生》一文中说：“读到李玄伯先生的《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非常高兴。李先生所说的‘用载记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确是极正确的方法”。载《现代评论》一卷10期，1925年。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405~435页，中华书局，1961年。

篇。由此看来,《帝系》所记也应该有它的根据,不能因为前面谈到的一些自相矛盾之处而一概否定。

至今殷代的甲骨文已经发现 15 万片之多。王国维之后经过董作宾、郭沫若、陈梦家和胡厚宣等许多著名学者的研究,对于商代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已经有了相当详细的了解,只要看看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①和由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②就会明白,现在殷代的历史已经成为信史。至于殷代以前的历史,根据甲骨文的研究也可以获得不少信息和有益的启示。因为商代王室实行周祭,不仅祭祀商汤以下诸先王,还要祭祀汤以前的所谓先公。因此甲骨文中就有从始祖契以来诸先公的名号,排列的顺序跟《帝系》和《殷本纪》基本相同。这个商先公谱系的确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先公所处的年代适当夏朝的年代。按照《帝系》和《史记·夏本纪》,夏朝自禹至桀共十六世,商先公自契至汤是十三世。每世的年数总是或短或长,十六世和十三世的年数便有可能是相当的。商先公时期曾经有八次迁徙,是很不稳定的,其谱系还能传到春秋战国之世而没有发生大的错误。夏朝虽然一开始也有些不稳定,但自少康以后就相当巩固了,国力远比先商的小朝廷要强。先秦古籍中常常征引《夏书》,不管是夏代的书还是夏朝后人追溯历史所写的书,都说明直到春秋战国时还是有人多少了解夏朝的历史的。所以孔子才说要“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还说“夏礼吾能言之”,同“殷礼吾能言之”相并列(《论语·八佾》)。虽然感到“文献不足”,却并非全然不知。由此可知《帝系》和《夏本纪》所载夏朝世系是有一定根据的,说契曾经佐禹治水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有些学者因为没有发现夏朝的文书而怀疑夏朝的存在是大可不必的。

三 考古学家的追求

中国考古学家一开始就肩负着重建早期中国历史的使命,而早期甲骨文的研究直接引发对安阳殷墟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考古发掘。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组,主要工作就是发掘殷墟遗址。从 1928 年至 1937 年连续进行了 15 次发掘,发现了商代晚期成组的宫殿宗庙基址、巨大的王室陵墓、大量的窖穴、祭祀坑和殉人、殉牲等遗迹,其中的 H127 甲骨文坑出土刻有文字的甲骨一万七千多片,不啻为一座商代卜辞的大型档案库。至于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玉石器、骨器、蚌器和象牙雕刻等更是不计其数,为此发表了大批田野考古报告和研究著作,商代晚期的历史由此大大丰富起来。但作为一个都城遗址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厘清,所以从 1950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

①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

② 郭沫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共 13 册,中华书局,1978~1982 年。

究所成立时起即恢复了殷墟的发掘，除“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几年，一直持续至今。一般认为殷墟是盘庚迁殷以后直到末代纣王的都城，证实了《古本竹书纪年》中“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说法^①。近年来在殷墟东北发现了一座巨大的洹北商城，年代略早于以小屯为中心的殷墟，或谓那就是盘庚迁殷始建的都城；而小屯殷墟则为武丁以后的都城^②，这是后话。盘庚以前的都城究竟在哪里，自然成为考古学家关注的焦点。

1950年，在河南郑州发现一处可能属于商代的遗址，1952~1955年陆续发掘了制铜、制骨和制陶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并且发现了早于殷墟晚商文化的地层关系。当时即有学者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早于殷墟的都城遗址，并推测可能是仲丁所都之囿^③。后来的发现越来越多，特别是发现了略呈长方形的城垣遗迹，城内面积约3平方公里，东北部有宫殿遗址群，还有给排水系统和大型青铜器的窖藏等。后来又发现了规模更大的外郭城^④，从而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在分析郑州商文化遗存时，人们发现其建都年代应该在商代初期，于是提出了所谓郑亳说^⑤。到1983年又在洛阳附近发现了偃师商城，其始建年代同郑州一样早。学者多认为它应该是古文献上所说的西亳。两个亳都是什么关系，成为学者们探讨的新课题。

进一步的问题，自然是寻找夏文化和重建夏代的历史了。

四 夏代历史的探索

根据历史记载，大约在公元前2000多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诞生了。夏代究竟应该从大禹算起还是从他的儿子夏启算起，学术界虽有不同的看法，却无关宏旨。按照《古本竹书纪年》的说法，启曾经同益争夺王位，把益杀了。又曾经与有扈氏打了一大仗，政权还没有稳固，到他的儿子太康时就被东夷有穷国的后羿推翻了。后来羿又被寒浞推翻，等到太康的重孙少康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得以复国，史称“少康中兴”，夏朝的统治才稳固下来，在考古上要把这一段历史弄清楚是十分困难的。用已知推未知的方法，还是应该从早商文化往前推，把夏代晚期的遗存找出来，再来探讨早期夏文化的问题。

距离河南偃师商城以西约6公里有一个二里头遗址，那是著名的古史学家徐旭生先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276~2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③ 邹衡：《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6年3期。

④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⑤ 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文物》1978年2期。

生 1959 年为寻找夏墟而发现的。遗址规模之大和遗物之丰富让徐先生特别关注，认为那应该是一个都城级的遗址。可是徐先生并没有把它判断为夏墟，而推测“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①。那个遗址现存约 300 万平方米。由于遗址的北边被洛河冲毁了一部分，估计原先应该有 400 万平方米^②。发现有多处宫殿遗迹，其中 1 号宫殿基址就有 1 万平方米，上面有宫殿、门厅和回廊，中间是一个大庭院。二号宫殿略小，但结构更加规整。前不久又新发现了几座宫殿基址。所有宫殿都是坐北朝南，方向一致。围绕宫殿有道路和城墙，城内面积达 10 多万平方米，明显是一座宫城。照理外面还应该有更巨大的城圈，也就是王城的城墙，可惜至今没有找到。不过既然有这么大的宫殿和宫城，自然应该是王都所在。二里头遗址可以分为四期，宫殿主要在二、三期，延续使用至四期之末。一期虽然没有发现宫殿，但一些迹象表明其规格不同一般。出土物中有稀有的白陶、象牙器和绿松石制品等，还有青铜工具，这些都不是一般聚落所可能有的。从一开始就有这种规模和规格，应该是有计划建设的都城。只是由于后期的破坏比较严重，整个布局还不大清楚。

二里头遗址除宫殿外，还有面积达 1 万平方米的铜器作坊遗址。在一些中小贵族墓中出土的青铜器有鼎、鬲、爵、盃、铃等礼乐器，戈、钺、戚、镞等兵器，铈、凿、钻、锥、刀和鱼钩等工具，还有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等。从铜器作坊遗址中出土的铸铜陶范来看应该还有更多更大的器物。可以说在后来商周时期各主要类别的青铜器在此时都已初具规模，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先河。二里头宫城外的道路上还遗留有双轮车的车辙痕迹，这一发现与所谓夏代奚仲造车的传说不谋而合。

二里头一期到四期的文化发展是连续的，第四期之后突然衰败，此时正是偃师商城兴建之时。许多学者认为这一兴一衰，正是夏商王朝更迭最直接的物证，是划分夏商两代之间最好的界标。结合两者文化特征的比较分析，推测二里头遗址应该是夏代的王都，是中国第一个世袭王朝的都城。不过二里头遗址的年代，据碳-14 方法测定，大约在公元前 19 世纪中叶至前 16 世纪中叶，前后只有 300 年左右^③，最多只相当于从少康中兴直到最后一位帝王夏桀的时期。

至于夏代早期的都城，由于那时政局的不稳定性，要在考古遗存上找到确切的证据颇不容易。不过最近找到的一些线索，也许为进一步的探寻提供了一线希望。一个是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的晚期。有大城和小城，大城至少有 30 万平方

① 徐旭生：《1959 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 年 11 期。

② 许宏：《最早的中国》65 页，科学出版社，2009 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80、81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米，其中有多处用人牲奠基的情况。旁边的东周城址出土有多个“阳城仓记”戳印的陶器残片，所以发掘者认为王城岗就是传说中“禹居阳城”的那个地方。碳-14 测年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也与夏代早期的年代基本相合^①。二个是河南新密市的新砦遗址，那里也有一座 30 万平方米的属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在稍晚的新砦期又包着龙山文化的城址筑城。在后者城内有大型建筑基址，遗物中可以看出不少东方的因素^②。所以有的学者推测它可能是后羿代夏时期的都城。这两个地方的考古工作都还仅仅是个开始，是否真是夏代早期的都城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

应该强调的是夏王朝并不是孤立的，和夏王朝同时还有其他国家或王朝，只是夏王朝的势力最强，文化先进，因而影响也最大。从《殷本纪》和甲骨文所见商先公的世系和事迹来看，那时的商人也建立了一个与夏王朝并立的世袭王朝。过去以为商的先人起自东方的山东一带，现在看来并不正确。真正代表商先公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应该是所谓漳河型的先商文化，这是从文化特征的比较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它分布于河北省的中南部和河南省北部，与代表夏的二里头文化相邻，只是至今还没有发现一处先商的都城遗址。最近在河南濮阳戚城发现一处龙山时期的城址，是否与商人早期的活动有关，值得注意。与夏朝发生关系较多的是东夷。近年在山东、河南东部和江苏北部发现的岳石文化已被证明是夏代至商代初期的东夷的文化，它是继承山东龙山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其中心可能是章丘的城子崖，那里发现的岳石文化城址颇具规模，城墙的版筑技术已很成熟，说明其文化发展水平不低。

如果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看，夏文化影响的范围更为广大。例如远在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敖汉旗大甸子墓地中，就有 13 座出土陶鬲（或盃）和陶爵，形制和二里头的出品十分相似^③。在甘肃、青海地区的晚期齐家文化，四川成都平原的早期三星堆文化，江汉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以及江浙地区的马桥文化等，也都出土了类似的器物。这些文化还或多或少出土过一些青铜器，开始步入了青铜时代。如果说夏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崛起代表着华夏文明基本特质的形成，那么它在整个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和辐射作用，则为往后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 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 年。

②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密新砦——1999～2000 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 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 年。

五 古国历史的重建

从夏代历史再往前推，按照传统的说法就到了五帝时代。正如本文一开始就提到的，所谓五帝的说法跟战国时期流行的五行说有关。各人的观点不同或掌握的情况不同，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五帝说，莫衷一是。实际上那时并没有统一的国家或统一的王朝，而是小国林立，即所谓天下万国。这在古史传说中也是多次提到的。例如《荀子·富国》篇说：“古有万国，今无十数焉”。《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时“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尚书·尧典》说尧时“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史记·五帝本纪》转述作“百姓昭明，合和万国”。《战国策·赵策》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战国策·齐策》记颜觸对齐宣王的话说：“觸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左传·哀公七年》也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所谓万国当然不是实数，只是说有众多国家的意思。这种观念差不多已经成为先秦时期许多学者的共识。考古学上是不是也可以看到这种小国林立的局面呢？

我们知道夏代在考古学文化上属于早期青铜时代，在它以前是铜石并用时代，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①。大量考古资料证明，这是中国历史开始走向文明以至产生最初国家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的总体特征是农业和手工业有较大的发展，手工业开始分化，出现了专门为贵族生产的高档手工业部门。从聚落和墓葬的等级分化可以明显地看到社会的分层化，原先基本平等的氏族一部落成员开始被分化为贵族和平民。不少中心聚落筑起了防卫性的城墙，同时出现了用于战争的专门性的武器，到处都有战死者或非正常死者的乱葬坑，有些地方还发现了用人牲为城墙或房屋奠基或用人为贵族殉葬的情况。这些都说明这个时期的社会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迈出了从部落到国家的关键一步。在这个过程中，走在前面的是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两湖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江浙地区的崧泽—良渚文化以及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稍晚在四川成都平原也出现了水平相近的宝墩文化。在如此广袤的大地上，各个大文化区的主体文化都以自己的方式建立各具特色的文明，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下面将着重阐述各大文化区主体文化的基本情况和各自文明化的进程与特点。

1. 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

这个文化主要分布于中原的河南、山西和陕西三省，外及河北、内蒙古和甘肃的部分地区。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最后还有一个末期——庙底沟二期文化，其特征表现

^① 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为从仰韶文化向中原龙山文化过渡的状态，所以有时又被划入中原龙山文化的早期。在仰韶文化早期，各个聚落的差别还不显著，到中期即庙底沟期开始分化，出现了若干中心聚落。其中以河南灵宝的北阳平和西坡遗址表现得最为清楚。仰韶文化分布的主体有三个地区，即陕西的渭水流域、山西的汾水流域和河南的伊洛河流域，灵宝适处在三区的交汇地带，也就是仰韶文化的核心位置。北阳平遗址有将近百万平方米，从遗址旁边的断崖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型的房屋基址。在近旁的西坡遗址应该是以北阳平为中心的聚落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由自然冲沟和人工壕沟所构成的防御系统，聚落的中心有两座建筑讲究的大型房屋。其中的 F106 室内面积有 240 平方米，如果包括墙体则有 296 平方米。地面和墙壁经过多层夯筑，表面还特地涂成朱红色。F105 室内面积 204 平方米，略小于前者，但设有回廊，门道上也架棚，总面积达 516 平方米，附近还有蓄水池等设施^①。在聚落的南边，隔着人工壕沟有一片墓地，其中墓葬明显有大中小的等级差别。大墓一般在 10 平方米以上，最大的墓葬有 16.9 平方米。有椁板，上面覆盖麻布，脚下有专门的器物坑。有 8 座墓人体的手臂旁放置玉钺，上面有明显的线切割和管钻的痕迹，代表着当时最高的技术水平^②。钺是从石斧中分化出来的第一种专门性武器，西坡墓地是最早用玉钺随葬的，说明当时的贵族已经握有专门的武装，也说明当时出现了真正意义的战争。而掌握军权的首领是最有可能建立王权的。仰韶文化中期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对周围文化有强烈的影响^③，是否与军事扩张有关，值得研究。

仰韶文化中期在各地还有一些规模较大的中心聚落，如陕西华县泉护村、高陵杨官寨及山西夏县西阴村和河南洛阳王湾等，说明当时的社会确实走上了分化的道路。泉护村有大房子 F201，其形制酷似西坡的 F206，只是后半部分因临近断崖而塌毁了。它的前墙宽 15 米，F206 宽 15.7 米，二者大小十分接近，形状和结构几乎完全相同。在这座大房子的南边约 300 米的地方发现的墓葬 M701，也是在脚下随葬多件陶器，其中的单耳小口壶与西坡墓中所出别无二致。墓中一件穿孔石斧也可能是石钺。同出的陶器中还有一件黑陶大鹰鼎，更是极为罕见的重器^④。此墓的主人很可能是一位贵族中的首领级人物。河南中部嵩山周围的阎村类型以所谓伊川缸的成年人瓮棺葬为特点，其中心在汝州一带。在汝州阎村有一位首领的瓮棺葬，瓮棺上画了一幅寓意深刻的“鸛鱼石斧图”。那“石斧”很可能也是玉钺，与灵宝西坡的墓葬随葬玉钺者有异曲同工之妙^⑤。洛阳王湾则发现过长 21 米，宽约 10 米，面积约 210 平方米的长方形房基，只是过于残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 105 号仰韶文化房址》，《文物》2003 年 8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灵宝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 年。

③ 严文明：《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载《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 年。

④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华县泉护村》27~29、73~77 页，科学出版社，2003 年。

⑤ 严文明：《鸛鱼石斧图跋》，载《仰韶文化研究》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9 年。

破而难于复原。附近的 H421 为一椭圆形灰坑，直径达 4.5~5.5 米，深 2.5 米，如此巨大的坑很像西坡的储水池^①。据此可以说明王湾也不是一般的聚落遗址。

仰韶文化晚期大约是从公元前 3000 年开始的。此时生产有所发展，地方差别明显扩大，社会分化现象也有若干表现。在甘肃东部的中心聚落有秦安大地湾遗址。那里出现了体量甚大、建筑规格甚高的所谓原始殿堂。它有前堂、后室和东西两厢，面积达 290 平方米。地面用三合土铺砌，十分坚硬光滑。房前有广场，有立柱等设施^②。这样的房屋是前所未有的，而庆阳南佐疙瘩发现了另一种形式的原始殿堂，规模更大。陕西高陵杨官寨在聚落旁的断崖边一字排开有 12 座窑洞式的小型房屋，旁边几乎都有陶窑，附近还有一个盛陶器的仓库或大型窖穴，里面存放了许多陶器，光是小口尖底瓶就有 18 件之多。这里应当是一处专门生产陶器的作坊遗址，说明当时已出现专门化的，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与农业紧密结合的手工业生产。生产的专门化自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加速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层化的进程。河南郑州西山虽然是一个不大的聚落，却出现了夯土筑成的城墙，可见当时对于防卫设施已十分关注。而郑州大河村遗址远比西山为大，出土遗迹遗物的档次也更高，显然也是一个中心聚落。

通观仰韶文化中晚期的情况，可以看出生产力稳步发展，实力有较大的提升，因而有能力对外扩张，成为一个强势的文化。从房屋建筑特别是墓葬的情况来看，比较强调军权和王权，讲求气派（如大型房屋和大型墓葬）却不尚浮华，即使最大的墓葬，随葬器物也不很多，缺乏高档的手工业品。也没有看到特别的宗教遗迹。晚期大量吸收周邻文化的积极因素并加以融合，让人看到一种比较务实进取的精神。

2. 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

这个文化分布于黄河下游的山东全境，南至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西至河南东部。其中心即位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该遗址面积约 80 多万平方米，曾经发现有许多大型柱洞（表明有大型建筑遗迹）和同时期最大的陶窑。墓葬从早期（约公元前 3000 年前，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期阶段）起即可看出一定程度的分化。其中最大的 2005 号墓有两级二层台，随葬器物达 104 件，包括石器、陶器、骨器、象牙器等，还有若干猪下颌骨和一个牛头骨。小墓仅有几件普通器物，有的一件也没有^③。到中晚期分化更加显著。晚期的大墓如 M10 有棺有椁，随葬玉钺、象牙梳、鼉鼓（只剩下蒙鼓的鳄鱼皮鳞

①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王湾》图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②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413~428 页，文物出版社，2006 年。

③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106~141 页，科学出版社，1997 年。

板)以及大量精美的白陶、黑陶和彩陶器等,还有数目不等的猪头。这在同一时期的墓葬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余的墓葬显然级别较低,最低等的墓葬仅有人骨,没有任何随葬品。社会的等级分化十分明显^①。这个文化的次中心聚落有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五莲丹土村、诸城前寨、莒县陵阳河与大朱村等处。后三处在随葬的大陶尊上有刻划的原始文字。据说有的地方发现有城墙遗迹。大汶口文化也强调军事。作为专门性武器的石钺在早期即已出现,但数量不多,中晚期逐渐增加,在大墓中还有精致的玉钺。贵族垄断的高档手工业如玉器、象牙器、高档陶器等制造业甚为发达,社会分化也更为明显。大汶口文化也是一个强势文化,它同仰韶文化一起并立于黄河的中游和下游,相互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受仰韶文化的影响较多,到晚期反过来大力向西扩张,其势力差不多到了河南省中部仰韶文化的核心地区。向南则到达江苏和安徽省的北部,并与南方的良渚文化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也是由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因而实力较强的一种表现。

3. 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

这个文化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省西部、南部及河北省的东北部。年代大体与仰韶文化相当,晚期发展为小河沿文化。早期的聚落同样没有明显的差异,到中晚期则为之一变,出现了整个文化的中心——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群,在约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40多个遗址点。其中有“女神庙”、大小祭坛、广场(周边用石头砌筑的方形山台)和多处规模巨大的积石冢。女神庙中有彩绘壁画,有多个巨型似女性的泥塑残块。如果复原起来,小的如真人一般,大的超过真人一两倍!积石冢的规模极大,较早的为圆形,较晚的多为方形或长方形。每边长约20米上下,用石头砌边,逐级收缩成三级台阶。最外边砌的石头内侧摆放成列的彩陶筒形器,冢上覆土积石,正中安放一大型彩陶塔形器,十分壮观。每个积石冢有一座中心大墓,并随葬多件精美的玉器;同时有若干较小的陪葬墓,其中有些也随葬玉器,有的则一无所有,一个等级分化的社会明确地展现在眼前^②。我们注意到在牛河梁附近并没有发现与之相称的大型聚落遗址,似乎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分散在牛河梁各个山梁上的众多积石冢当是不同地方的首领级人物及其亲属或近侍死后远道运送到这个神圣的地方来安葬的。女神庙、山台和特大型祭坛很明显是统一规划下建造的,也可能还有统一的大型宗教活动或祭祖仪式。这种有组织的宗教和祭祖活动,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必然会导致统一的政治组织的形成。除牛河梁外,其他有积石冢的遗址还有多处,只是没有牛河梁那样

^①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3~33页,文物出版社,1974年。

^②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待刊。

的规模。例如在内蒙古敖汉旗草帽山就有几个积石冢排成一列，出土的石雕人头像头顶挽髻，面带微笑，艺术造诣与牛河梁泥塑人头像不相上下。这类有积石冢的地点当为红山文化的次中心所在。这些次中心跟牛河梁是什么关系，应该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牛河梁积石冢中的随葬器物几乎全部是玉器，虽不丰富但规格甚高。其内容主要是宗教用品和装饰品，缺乏生产工具和武器。不过在墓葬中经常随葬一种有刃的“璧形器”，一般为圆角，方形、长方形或梯形，中间有大孔，三边有刃，背端钻一二小孔。有的学者认为它是玉钺或石钺衍生而来佩于萨满身上的神器。由此可以推知当时也许有实用的武器钺，只是至今还没有发现。

红山文化的经济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比起仰韶文化或大汶口文化等来说还是有较大的差距。从生产工具中还有较多的细石器来看，狩猎业显然还占有较大的比重。在众多红山文化的遗址中至今还没有发现一处大型的规格较高的聚落遗址，也与其经济形态的特点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却能调集大量的人力资源，在一个选定的地区营建宗庙、祭坛和巨大的贵族冢墓，所能凭借的似乎不是武力，而应当是强烈的宗教信仰和有效的组织能力。红山文化玉器中的猪龙或熊龙，形态非常特殊，可称为红山文化的标志物，论者多认为可能是红山人的图腾，表明红山文化的人民有着统一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一经同某种权力机构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传统的氏族一部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说红山文化时期已经产生某种“基于公社又高于公社的政治实体”（苏秉琦语）是合乎情理的。大概正是因为过分地使用了人力和物力而难于长期支撑，红山文化之后的小河沿文化时期很快就衰落了。红山文化虽然颇为发达，它对外面的影响却很有限，军事色彩也不明显。只有玉器对南部的山东地区有些影响，陶器反而受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到小河沿文化时期又受到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双重影响。

4. 江浙地区的崧泽—良渚文化

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二者基本上是属于同一文化系统的前后两大阶段。崧泽文化的年代大体与大汶口文化早期相当或略晚，此时开始出现中心聚落。例如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在已发掘的局部范围内，发现在居址东西各有一片墓地。东部20多座都是小墓，西部的10多座都是大墓，社会分化十分明显。在大墓中一般随葬石钺、石铤、玉璜、玉玦、玉环、玉珠和数十件陶器，普遍随葬石钺是其特点。与崧泽文化大体同时的安徽凌家滩文化的发展水平更高，社会分化更为明显。含山凌家滩墓地明显分为几个墓区，其中有大贵族墓区、玉石匠等手工业者墓区和穷人墓区等^①。最高等级的墓为07M23，其墓坑长3.45米，宽2.1米，深0.3米，规模

^① 严文明：《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序，文物出版社，2006年。

并不算大，但随葬器物之多而精，则是前所未有的。其中仅玉器即达 200 件，加上石器和陶器等，总数达 330 件之多。其中有玉钺、大批石钺、石镞等武器和手工工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几件玉龟形器内放置玉签，墓上还有重达 88 公斤的玉猪，说明墓主人在手工业生产、军事和宗教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①。其他墓葬中出土的特殊玉器有玉人、玉猪翅鹰、玉龟及玉杖等。此墓地随葬玉钺和石钺特别多，仅 87M6 就有石钺 32 件之多。年代如此早的凌家滩社会发展到如此高度是很少见的。不过凌家滩文化之后的情况至今还不大清楚。至于玉器工业更为发达的良渚文化是直接继承崧泽文化而不是凌家滩文化，而崧泽文化的玉器工业远不如凌家滩文化。也许良渚文化玉器工业的高度发达与凌家滩玉文化和技术的转移有关。

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似乎有一个急速的发展，其标志可能是其政治中心的建立^②。这个中心不在良渚文化分布区的中心位置而在偏于南边的杭州市西北郊。那里在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仅有个别小型遗址，到良渚文化早期就突然出现了多处遗址，其中就有贵族坟山和祭坛等。到中期更有巨大的发展，在 40 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逐步形成有一个有一百多个遗址点的遗址群。这里的核心是一座 290 多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城墙的基部铺满石头，上面用经过选择的黄色黏土夯筑。城内的中心部位有一座 30 万平方米的长方形台城——莫角山，上面有 3 万多平方米的夯土基址，说明原先应该有宫殿之类的高等级建筑。如果是这样，这个台城便具有宫城的性质^③。大城的周围还有不同等级的房屋基址，有制玉等手工业作坊，有两处专门营建的祭坛和另外的贵族墓地。在良渚港还发现有大量木桩和跳板等可能是码头的设施。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处人口密集、设施齐全而且规格很高的都城级遗址群。紧靠莫角山宫城的西北不远处有最高等级的贵族甚至是王室的墓地——反山^④。这个墓地原先是在一块小高地上由人工堆筑起来的坟山，土方量将近 2 万立方米。在已发掘的十多座贵族墓中以 M12 最为显赫。它有漆棺，随葬品中仅玉器就有 647 件之多，其中有重达 6.5 公斤的“琮王”。同时还有镶玉的漆盘和漆杯等品位极高的器物。在玉琮、玉钺、玉柱形器和玉权杖头上都雕刻有人形兽面纹的所谓神徽，也许即是良渚国王神化的形象。因此 M12 应该是一座王墓，而良渚古城即应是良渚古国的首都。

良渚文化本身可以分为几大区块，每个区块都有自己的中心。太湖以北的中心遗址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 年 3 期。

② 严文明：《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载《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 2006~2007 年的发掘》，《考古》2008 年 7 期。

④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 年。

有江阴高城墩和武进寺墩，东北区块的中心有苏州草鞋山和赵陵山，东部区块的中心有上海福泉山，东南区块的中心有桐乡普安桥等，南部区块的中心就是良渚古城。各个中心都有人工筑造的贵族坟山，随葬同良渚相似的玉器，特别是反映宗教信仰与仪式的琮、璧等法器和代表军事指挥权的玉钺等。

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但远远高于红山文化，而且是五大区块主体文化中最发达的。良渚文化的宗教色彩表现在具有自己独特的神徽和玉璧、玉琮等相当统一的宗教法器。一些祭坛最后又成为贵族墓地，表明宗教的权力掌握在贵族手里。良渚文化修城池、盖“宫庙”、筑祭坛、造坟山，土木工程之巨远远超过红山文化和同时期的任何文化，必然要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良渚文化的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水平之高也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任何文化，同时还有漆器、象牙器、丝绸和精美陶器等高档手工业，全部都是为贵族所享用的，对于发展经济并无直接的好处，但其精湛无比的手工技术和独具匠心的造型艺术却处处闪耀着早期文明的光辉。良渚文化的墓葬几乎都随葬石钺，贵族则随葬玉钺，差不多是全民武装。到晚期更是大力向外扩张，北到江苏北界，西到安徽、江西，南到浙江南部，至于影响所及的范围就更大得多。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良渚文化的扩张情况：江苏新沂花厅村本是大汶口文化分布范围，这里早期墓葬全部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了大墓，且与早期墓地明显隔开。其中除随葬有部分大汶口文化的器物外，还有良渚文化的玉器和部分陶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墓中有不少殉人，主要是儿童和个别妇女，把他们同猪狗放在一起。在其他地方的大汶口文化的大墓中从来没有发现这种情况。这说明是良渚文化的战士占据了大汶口文化的领地，后者的男子或战死或逃亡。而良渚文化的战死者则像英雄一样给予厚葬，并且把大汶口文化居民中逃不掉的孩子和个别妇女同猪狗一起殉葬^①。这种情况在当时应该不是个别的例子。不过尽管良渚文化实力强大，毕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最终也只能像红山文化一样快速衰落。

5. 湘鄂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仰韶文化的晚期，与良渚文化的年代相若。早在其前的大溪文化时期就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遗址如湖北枝江关庙山，有些地方更建造了夯土城墙，如湖北江陵阴湘城和湖南澧县城头山等^②。到屈家岭文化时期便出现了许多城址，大都分布于湖北的江汉平原和湖南洞庭湖西北平原上，其中以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为最大。这个城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持续使用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全城大约有120万平方米，城垣基底宽约50米，残高约5米，护城壕宽约60~70米，工程巨

^① 严文明：《碰撞与征服》，《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2007年。

大。城内有中心居住区、宗教活动区和墓地等^①。屈家岭文化时期在宗教活动区发现有祭坛和象征陶祖的巨大“筒形器”，石家河文化时期则有数以百计的大陶尊相互套接，有的陶尊上有刻划的原始文字，器物造型和刻划方式都跟大汶口文化的陶尊十分相似，只是“文字”不同。更有进者，在这些大陶尊附近还发现有数以千计的人形和各种动物形陶偶，人偶跪坐抱鱼做祈祷状，显然也是进行宗教法事活动的遗留^②。可见这座古城既是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宗教中心，犹如良渚古城一样，只是规模略小而已。这个文化的经济也比较发达，同样也很重视武装，墓葬中多随葬石钺。有一个陶罐上还刻划一位军事首领高举石钺或玉钺进行指挥的形象^③。这个文化凭借自己的实力，曾经一度扩张到河南南部，但是后来也忽然衰败了。究其原因可能与历史传说中尧舜禹时期大规模征讨三苗的事迹有关。这个文化修建的土城比同时期任何文化都多，明显是为了防卫的需要。而且在石家河文化之后的所谓后石家河文化中大量出现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也反映了这一事实。

除了五大区块的主体文化以外，安徽的凌家滩—薛家岗文化、江西的樊城堆文化、广东北部的石峡文化和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等也都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不过相对而言，五大区块的主体文化的发展势头是最强的，而且大约在公元前 3500 年都十分明确地走上了文明化的道路。只是文明化的具体进程和表现形式不大相同，对相邻文化影响的程度也不相同。

比较起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宗教色彩是最浓的，其次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发展得十分快速，在达到顶峰以后衰落得也很快。真是其兴也骤，其衰也忽。共同的原因是过分地消耗了人力物力。石家河文化的衰落则另有原因。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宗教色彩比较淡薄，也没有那么多巨大的工程。而且文化中心与次中心的差距并不十分突出，说明各地的发展比较平衡，整个文化的发展也比较平稳。但二者之间也有差异，这里显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其结果就很不相同。

6. 龙山时代的大变动

到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即从约公元前 2500 年到前 2000 年，继续顺利发

①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年。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 年。

③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161 页图一二七，文物出版社，1999 年。

展的事实上只有继承仰韶文化的中原龙山文化和继承大汶口文化的山东龙山文化了，二者都在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和燕辽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暂时转入低谷，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对于往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有趣的是原来悄无声息的成都平原就在这时反而冒出了一个水平不太低的宝墩文化，它有以新津宝墩为中心的一系列城址，并且是后来更高发展水平的三星堆文化的主要源头^①。不过由于交通不便，它同其他主要文化区的联系十分有限，对当时中国主体文化的影响也小。

中原龙山文化本身是一个复合体，它包括了河南中西部的王湾三期文化或王湾文化、河南北部和河北中南部的后岗二期文化、山西的陶寺文化和陕西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或客省庄文化等一系列亚文化。其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位于山西南部的陶寺文化，那里发现有几个大型遗址，最大的就是襄汾的陶寺。陶寺遗址的早期就已建立夯土城墙，到中期修建的大城面积已达 280 万平方米以上^②。城内有面积达 1 万平方米的夯土基址，夯层中有多处奠基的人骨。基址上有大型柱网结构。从毁弃的建筑残迹中，发现墙壁上抹白灰并有彩画，说明此建筑的规格不同一般，应该是属于宫殿级别一类的^③。陶寺的墓地规模极大，据估计大约有上万座墓葬，并且分为几个墓区。说明城内居住有不同身份的大量人口。在已发掘的一千多座墓葬中，主要属于早期。随葬 100 件器物以上的大墓不到 1%，随葬少量器物的中等墓约占 10%，而将近 90% 的小墓则没有任何随葬品。大墓中的随葬品不但数量多，而且规格高，有不少是表现权力和身份的，如玉钺、鼉鼓、特磬和龙纹盘等。到中期的贵族墓规模更大，其中的 M22 长 5 米，宽 3.65 米，深约 7 米，总容积达 130 立方米以上。墓中木棺系用巨大的整木挖凿而成，长 2.7 米，宽 1.2 米，厚仅 3 厘米，里外均涂红彩。棺内置尸床，墓主人即置尸床之上。墓内随葬品有漆柄玉钺、玉戚、玉璧、玉璜、木弓 2 张、骨镞 8 组、多格木盒、厨刀、木案板、猪肉、带漆木架的彩绘陶盆、绿松石和子安贝等，还有全都劈成两半的 10 头猪。该墓四周近底部有 11 个放置随葬器物的壁龛，其中有装漆觚的彩画漆箱、彩绘陶簋、陶罐和彩色草编篮筐等^④。如此豪华又气派的埋葬，在同时期的墓葬中是前所未有的。山西芮城清凉寺与陶寺同一时期的墓葬中还有不少殉人的现象，它反映出当时已经出现了初步

① 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载《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 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 2002 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 年 3 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考古》2008 年 3 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 年 9 期。

的阶级分化，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少数人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并掌握着最高的统治权力，明显具备了国家的基本特征。有的学者认为陶寺为尧都平阳的遗址，可备一说。

中原龙山文化的后期，社会发展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河南西部的王湾文化。那里发现有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和密县古城寨等一系列城址。古城寨的城墙至今还高达15米，夯筑技术有明显的进步。而王湾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经过新砦期之后便是二里头文化，成为夏文化构成的主体部分。

这个时期在山东的龙山文化也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桐林、寿光边线王、阳谷景阳冈、五莲丹土村和日照两城镇等许多城址。其中较大的城子崖和桐林两处城址均仅20万平方米^①，远比良渚或陶寺的城址为小。不过临淄西朱封和泗水尹家城都发现有一棺二椁的大墓^②，开启了往后贵族多重棺椁埋葬制度的先河。说明这时社会的分层又进了一步，在贵族中也已经有明确的等级划分了。边线王的城墙基槽中有多处用人或猪狗奠基的情况。山东龙山文化的陶器制作技术的水平是最高的，绝大部分陶器是直接由快轮拉坯成型的。其中尤以薄如蛋壳、漆黑发亮、造型优美的黑陶杯最为上乘。有些大墓中出土的玉器也极为精美。正因为山东龙山文化的发展水平较高，所以在夏代早期才有可能发生后羿代夏的重大政治事件。而这在考古遗存中也多有形迹可寻。

7. 古国或是邦国？

综上所述，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都城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但各地的文明化进程不同，发展模式不同，最后的结果也颇不相同。各国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被征服或被兼并了，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古史传说中常常提到古有万国或万邦，研究古史传说的学者则把它们区分为不同的民族或集团。例如蒙文通在《古史甄微》中曾将其区分为河

①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231~236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临淄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年7期；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44~46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洛民族、海岱民族和江汉民族^①。徐旭生的划分与其相仿，只是改称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②。这跟几个进入文明化时期的主体文化的分布范围十分接近。至于长江下游、燕辽地区和四川盆地文明化过程的发生虽略有先后，但并不很晚，而相关的传说不多，则可能与这些地方完全华夏化的时间较晚，又不处在华夏化的中心或主体的地理位置有关。

有些古史传说跟考古发现的情况大致相合，例如《史记·封禅书》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世本·作篇》则说是鲧作城，在考古发现中正是在这时出现了很多城址；《越绝书·宝剑篇》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考古发现最早的贵族墓葬，如在仰韶文化的西坡遗址、崧泽文化时期的凌家滩遗址和东山村遗址中所见的那样，都是以玉钺随葬的，在此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传说黄帝战炎帝，战蚩尤，尧舜禹征三苗等等，可说是战争不断，也与这时普遍发现专门性武器石钺和玉钺以及许多战争的遗迹大致相符。传说黄帝设左右大监等官职，尧舜时官职更加复杂，还有各种刑法等等，表明这时已经出现了初级形态的国家政权，这跟考古发现的情况也是基本相符的。由此说明许多古史传说的资料确实包含有真实历史的素地，不能一概抹杀，而要参照考古资料去重新整理。但传说毕竟不是信史，其中往往掺进了许多后人的揣测或误传，矛盾百出，莫衷一是，不可能拿考古资料去一一对号，这个道理应该是很明白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早期文明古国的资料可能还不够完整，它本身也还不够成熟，毕竟跟以前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氏族社会有本质上的区别。有人称这个时期的社会为首邦，但什么是首邦，各人的解读并不一致。有人参照欧洲早期的政治组织称为城邦更不合适，因为中国早期的国和野或都和鄙是联系在一起而不可分的，不存在典型的城邦国家。我国先秦古籍多将黄帝以下至夏代以前的社会称为万国或万邦，邦是有封疆的国，国是有都城的邦。所以有的学者就把那个阶段称为邦国时期，以与后来以世袭王朝为特征的王国时期相区别，不啻为一个较好的办法。不过商周及其以后的国家也可以称为邦或国或邦国，所以一些学者又倾向于称为古国。或者用一种比较模糊的说法，叫做早期国家也未尝不可。而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时期的国家的实质内容到底有哪些，能不能明确地概括出几条特点。这既要大量的实际工作，又要有更加深入的理论思考。

六 今后的任务

早期中国历史的重建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通过几代人近百年的不懈努力，至今

^① 蒙文通：《古史甄微》，商务印书馆，1933年。

^②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

总算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如前所述，早期中国文明最初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西南部这一广大地区发生的。由于各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不同，早期文明发展的模式也不相同，其中有许多跌宕起伏。尽管如此，各早期文明之间仍然有许多因素的交流、渗透与碰撞，很多情况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实际上还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其中心位置在中原地区，从而为往后发展为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为古国或邦国时期。这个时期开始的具体年代各地略有先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大致在公元前3000年或略早一点，燕辽地区可能要晚二百年，其他地区更晚一些。这种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态正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由于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原因，从古国或邦国后期开始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黄河流域的力量逐步加强，并且进一步集中到中原地区，从而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世袭王朝——夏。夏朝的实际统治地区不大，却占据了古代称为中国或天下之中的核心地区，经济发展快速而平稳。其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善于吸收周围地区的优秀成果；同时又有很强的辐射能力，使得周围地区往后逐渐华夏化。这与中原地区文化本身不尚浮华而重实际，强调王权而不过分渲染宗教的神力，在文化方面比较开放而不故步自封的传统有关。

早期中国发展到商代早期，它所代表的华夏文明已经十分强大，并给予周邻的文化以巨大的影响。四川的三星堆文化、湖北的荆南寺文化、湖南黄材的青铜器、江西的吴城文化和大洋洲青铜器、辽宁喀左的青铜器和内蒙古鄂尔多斯青铜器等，都是在商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并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这些文化又对更外围的文化以积极的影响，形成一个以华夏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中华古文明体系，这个体系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内部活力，深深地影响到往后中国历史的发展。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早期中国的状况大致如此。这还只是一个粗线条的，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需要做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商代的历史因为有甲骨文和包括几个都城级遗址的大量考古发现，已经是比较清楚的了。但甲骨文只见于商代晚期，而且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所以许多学者推测商代早期乃至夏代都应该有了文字和官方的文献，今后在都城级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应该特别留意。史载商人曾经多次迁都，有所谓前八后五的说法。现在发现的都城级遗址还凑不够这个数目。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到底是什么关系？总不能两个都是成汤的亳都吧。郑州商城器都说到有没有一点道理，洹北商城又是何王所建，这些都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再说这几个都城级遗址近旁至今还没有发现王陵级的大墓，势必影响对当时社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估计。至于商代各方国的情况就更不清楚了，大量乡村遗址几乎没有一个是经过全面发掘的，对基层社会的了解就十分有限。

现在对于夏代历史的了解还远不如商。夏代都城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究竟有哪些都城还心中无数。考古工作做得最多也最好的二里头遗址都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弄清楚。至今没有发现一座王陵级的大墓，连中小墓的发现也不算多，从而限制了对当时社会更深层次的了解。

古国或邦国历史的重建虽然是很吸引人的工作，难度之大也是可以想见的。各地的情况不同，考古工作也要有不同的对策。现在启动的“探源工程”，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主要就是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的。希望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至少能为今后长期的研究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

（初稿载《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文物出版社，2009年。修改增订稿载《国学研究》第二十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二 文明起源的环境

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

——在中国第三届环境考古学大会上的学术演讲*

我对环境考古没有什么研究，只不过是一个积极的关心者，出于职业的需要，也出于对当前环境问题的忧虑，所以特别关心这方面的研究和进展状况。大会给我一个在这儿学习的机会，非常高兴。请允许我表示对大会的祝贺和由衷的感谢。

刚才听了刘东生先生的报告，很受启发。这是一个创新的、高水平的、振聋发聩的学术报告。报告从全新的角度，运用全新的材料，构筑了一个环境考古和人类起源的新理论。能有这么一个报告在这个会上演讲，确实给大会添色不少。很惭愧我无法望其项背，也没有什么准备，讲不出什么新鲜的道理。但既然坐在这个位置上，总要说点什么。考虑了一下，就谈谈个人关于环境考古方面的一些想法吧，题目就叫“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古环境与古文化”，非常好。当代社会发展的最大课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开始是自然力量主宰一切，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人类总想有所作为，为着自身的发展而试图改造自然。有的人把自己的力量看得很大，说什么“人定胜天”。有的人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一定要与自然取得协调，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国古代这两种思想都有，并不是像一些学者讲的西方只提改造自然，中国只提天人合一。

在采集经济的时代，人对自然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破坏很少建设也很少。农业发生以后人对自然的干涉大一些了，有些建设也有些破坏。人对自然的认识有所提高但毕竟有限，自然对人类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则表现出至关重要的作用。到工业社会人对自然的认识大有进步，建设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展，而破坏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如果不加以控制，势必造成极大的灾难，到头来毁了地球也毁灭了人类自身。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发展的，古今相通的。研究古环境与古文化，对今天也会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 2002年9月15日于山东济南。

作用。我们这个世界究竟是怎样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以后将变成什么样子？这是谁都关心的问题。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很受欢迎的传统栏目“人与自然”，就是讲的这个问题。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既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记得苏秉琦先生为第一届环境考古大会题词中说：“环境考古之所以被提出，是社会与考古学科发展的需要。（是为了）在自然与人的关系方面给以科学的阐述，从历史角度提高认识，更自觉地尽力建立人与自然协调的关系”。苏先生把环境考古的作用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应该放在这个高度来认识。

我们中国环境考古的研究差不多是同近代考古学的发生一同出现的，只不过长期处在比较零散的状态，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也没有一个适当的组织机构。自从1990年在西安召开第一届环境考古大会和1994年在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下设立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实际上相当于中国环境考古学会）以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我国的环境考古就有了比较全面而快速的发展。我们会议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内容一次比一次充实和深刻，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看来我国环境考古学当前的形势和发展前景是非常喜人的。

最近我参加了一项“中华文明史”的编写工作，深感受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不能不了解中国自然环境的特点，不能不关注环境考古研究的成果。我们组里有很多历史学家、哲学家，他们都注意环境问题，但因没有研究，难以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发展很有特色，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各人的解释就很不相同，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其实这个问题如果放到历史环境里面来看，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比如中国的农业起源，通过最近若干年的研究，逐步地了解到中国有两个起源中心，一个在华北地区的黄河中下游一带，一个在华中地区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前者主要是小米等粟类农业的起源地，后者则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为什么中国的农业起源地是这两个地区而不是别的地方呢？这显然与环境有关系。你想，在东北地区气候比较寒冷，不可能成为农业起源地。过去经常谈到华南地区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农业发源地，因为那儿有很多野生稻。但我们从人与环境的关系考察，它并不是一个适合农业发生的好地方。因为这一带纬度低，生长期长，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而地形又比较破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起源阶段人类比较稀少，没有一个地方能聚集大量人群。在人口比较稀少、而获取食物又比较方便的情况下，就没有发展农业的压力，没有这种紧迫的需要。而需要是发明之母。没有社会的迫切需要，发明了也难以推广和传承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尽管发现不少，就是没有看到什么农业遗存，比较明确的农业遗存直到石峡文化（约公元前2400多年）才出现。

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具有革命意义的伟大事件，对中国史前文

化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从此迅速发展起来，远远走在周围地区的前面。而中心地区一旦走在周围地区的前面，便会对周围地区起着吸引和凝聚的作用，使得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逐渐形成一种重瓣花朵或多元一体的格局。进入文明时期以后还是这么一个格局，并且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样我们就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文明的发展老是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长期持续发展下来。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唯有中国这个文明没有发生中断，就与这么一个本身有核心、有主体、有周围四裔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民族的结构有很大关系。而这个结构是怎么来的呢？很明显，与中国的这个特殊环境有密切关系。

讲环境还包括中国周围地区。中国周围有很多自然屏障，在这些屏障之外，没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这一点很重要，过去讲中国文化外来说不管是西来说还是其他什么说都没有充分考虑这个环境因素。在中国之外而又离中国最近的，比较早和高度发达的是印度河文明，在现在的巴基斯坦。印度河文明要影响中国文明的发展，必须穿越喜马拉雅山脉，途经青藏高原，这谈何容易。想一想直到唐代玄奘去西天（就是现在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一带）取经还要绕道新疆和中亚，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若是在史前和文明时代早期，可以想见该会有多么困难。这个问题绝不意味着在古代中国与外国的文化没有交流，只是说这种交流仅限于在局部有限的范围，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不可能因为这些有限的交流而改变中国文化的特性和发展方向。由此可见环境因素对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的作用是非常巨大和非常明显的。

人们都说中国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为什么会出现多元的特点呢？归根到底是中国各个地方环境不一样造成的。到现在我们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文化、风俗习惯和经济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因此文化起源呈现多元化形态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中国文化在多元化的同时，又具有一体的特点。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苏秉琦先生借用过来，认为中国的考古学文化同样如此。因为各个地方的生态环境不同，自然人群也不一样。但是在中国，它的主体在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两个地区是紧密相连的，是可以互相交流的，相互之间形成非常密切的联系，同时与周围地区保持不同程度的联系。我们说的所谓多元一体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并不是指完完全全一样才叫一体。

这种多元一体的格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什么？第一，因为它内部是多元的，就会有比较和竞争，在比较和竞争中各自尽量发挥自己的优势，就会不断地产生内部的活力。第二，因它有主体和中心，所以会自然地形成一种凝聚力，各地互补性的经济文化关系又加强了这种凝聚力。有活力又有凝聚力，那么这个文化就会不断地发展。这与过去讲的中国文化是落后的、保守的、停滞的理论完全不一样。这个内部活力并不需要外界文化的冲击，所以它能够保持连续性而不会中断。因为它的主体部位很大，本身包含

有两个农业起源地和由此而发展起来的两大农业体系，这样的基础非常扎实而宽广。在这样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它摧毁或完全改变。我们只要把它跟古埃及、古印度、古代两河流域这些文明进行比较，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当然这里还有很多人文方面的因素，人文方面的因素各个文化又不一样。但是我们从各个古文化和古文明所处自然环境不一样就看得出来，中国文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生命力。这是我们在编写中华文明史时体会非常深刻的一点。

中国在历史上内部曾发生过很多战争包括民族战争，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战争是北方游牧民族对黄河流域农业地区民族的侵袭和掠夺。为防止此类冲突的直接发生，中国修筑了长城，将双方隔离开来，只在一些关口进行有控制的交往。北方游牧民族和黄河流域的农业民族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冲突呢？这又有环境方面的因素。很早以前李四光先生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把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气候变化跟这段时间内发生较大的战争以及人口的变化画了几条曲线，并一一作了对比，发现它们之间有密切的关联。就是说，大概气候一旦变得恶劣，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牲畜会养得不好，有时甚至大批死亡，导致牧民的生活发生困难。怎么办？最就近的解决办法就是到黄河流域的农业民族那里去掠夺。而农业民族当然要起来抵抗，这样就发生战争。有时黄河流域的农业民族抵抗不住，再继续往南方施加压力，所以导致人口的迁移。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多半由北向南，环境变迁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有人文方面的因素，不都是环境因素造成的。但是，我认为李四光先生的这篇文章还是很有见地的，他从环境的角度研究几千年来重要战争、人口迁移和古代气候变化的关系，而且发现三者的变化曲线相关联。这是客观事实。我觉得这是个从环境方面来研究中国历史的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北方游牧民族进入黄河流域乃至更南的地区不完全是一种骚扰和破坏，同时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发展。例如南北朝时期许多北方民族入驻中原，造成了民族大融合的局面，而这种民族大融合对后面唐代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特别辉煌的大唐盛世。唐代大诗人李白、元稹、白居易和一些大将军实际上都是少数民族的后裔。

所以要把中国的这段历史弄清楚，只看文献和只管人文方面的资料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从环境方面来分析就可能看得比较清楚。还有，中国文化真正跟西方大规模的沟通应该发生在汉代。汉代国力强盛以后，便向三个方向发展，一个朝东北，通过朝鲜影响到日本，在朝鲜建立了几个郡；一个朝南方，通过越南影响到东南亚以至阿拉伯世界，在越南也建立了几个郡；另一个是西方，张骞和班超先后通西域，直达中亚和西亚的许多国家。为什么恰恰是这三个方面，而不是全方位呢？这不恰恰是与地形和环境有关系吗。因为别的地方都有难以逾越的障碍，只有这三条路勉强可通。其中西边是最远和最长的一条路，能过得去，那是因为甘肃有河西走廊，新疆有天山，在天山雪水浇灌

下形成了许多沙漠绿洲。绿洲与绿洲之间相隔不远，相互之间有联系，这条交通路线才能建立起来。要不丝绸之路能走这儿吗？没有这种环境，你能建立这条路线吗？

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是这样，研究世界历史也是这样。世界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发展，为什么开始就那几个文明中心，而且过了一段时间中心又会有转移，当然有很多人文方面的原因，但不能否认环境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著作等身，光《历史研究》就有几十部。他最后完成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叫做《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中译本（徐波等译，2001年出版）。这是一部有广泛影响的著作。书中前面从大地、生物圈讲到人类的起源，文化和文明的起源，为什么在不同地方会产生性质很不相同的文明，讲文明之间的关系和不同的发展道路，讲文明发展的前途，最后还是归结到生物圈。对以后人类的前途、整个地球的前途也都作了展望。我觉得他把事情看得很深很透，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可见环境研究不仅考古学界重视，历史学界也很重视，其他有关方面的人也很重视。如果把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汇总起来，会对我们的环境考古开辟一个新天地。

前面讲的这些内容都是宏观的，环境考古除了要注意大环境、宏观环境，还要注意小环境和中环境。小环境方面我举个例子。前些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同美国安德沃考古基金会的著名农业考古学家马克尼士等合作组成中美农业考古队，对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做了些工作。这两个遗址相距只有七八百米，一个在小山包顶上，一个在山脚下傍着小溪。一个文化堆积大约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一个是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两个洞穴的堆积不完全一样，有同时的，也有不同时的；同一时期的也有差别。为什么会有不同？我们说不清楚，就专门邀请夏正楷先生去看。他去过两次，经过观察和分析，发现较低的仙人洞里有水浸的痕迹，进水时期不能住人，只能住到较高的地方。所以两个洞穴堆积的差别，除了人文因素以外，还应该与当地的地形和水文变化有关系。我请他在附近再做些工作，把遗址周围史前时期的小环境弄清楚，这对于复原当时人们的生业和生活状况是非常必要的。小环境、中环境和大环境研究的对象不同，回答的问题也不相同。不能用研究小环境的结果引申为大环境的结论，也不能用大环境的结论去套小环境。当然它们之间也是有联系的，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这次会议报告的题目非常广泛，我粗粗看了一下，有不少优秀论文，是对近年来环境考古研究的一次检阅。对今后环境考古的发展将会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今后环境考古的发展恐怕要注意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注意多学科的合作，首先是考古学和地学与环境科学的合作，同时又要以考古学为基础。因为环境考古的课题归根结底是考古学研究的课题。如果把关系倒过来，可能问题就说不清楚。

二是在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合作的过程中，要尽可能了解对方田野作业与室内分析、研究的方法，做到相互了解、相互支持、逐渐磨合，不能各是一张皮。否则最后得出的结果也不会理想。例如植物孢粉的研究对复原古环境是很重要的，但过去测试的标本多是从文化层中按照等距离的深度进行采集，测出的结果必然同实际情况不符。因为文化层的土是经过扰动的，文化层形成时期的孢粉和更古老的孢粉会混在一起，当然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再者文化层形成的速度不是按等距离的深度进行的，用等距离的深度进行采样并没有实际意义。而如果只是从自然层中去采样，样品的年代又难以确定。最好是找到与文化层有对应关系的自然层，像周昆叔先生在洛阳皂角树做的那样。如果不了解考古学地层的性质，就必然会出现差错。

三是要积极引进新技术和新方法，同时又要尽可能了解它的性能，它的优越性和局限性，还要跟传统的方法进行比较，否则在评价或引用其结果时会出现失衡。例如DNA技术的应用对考古研究有很大帮助，可以用来研究古人的血缘关系和种族差异。但若做得不好，也会产生莫名其妙的结果。例如不久前有人用DNA方法测量了山东临淄齐国墓葬的人骨，说是像欧罗巴人种的土耳其斯坦人，这不仅与用传统体骨测量方法得出的结果不一致，也与历史常识不一致，对待这样的结果自然要格外慎重。

以上几点是我个人的体会，不一定对，提出来仅供参考。我们这些学考古的人，平常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比较少，更应该多学习一些。知道运用自然科学技术能够解决一些什么问题，要解决某某问题知道去找谁，跟谁合作，怎样合作。按照这样一条路线走下去，环境考古学才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原载《环境考古研究》(第三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

瞄准学术前沿，发展环境考古

——在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演讲*

首先，衷心感谢东道主邀请我来参加这个盛会。

中国环境考古大会开过三届，这是第四届。前面三届在北方。记得第一届在西安召开，第二届在洛阳召开，第三届在济南召开。方向是由西向东，总之都在黄河流域。这很自然，因为以往黄河流域的考古工作做得比较多，也比较深入。按照过去的理解，那里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是中国文明的摇篮。再者，关于第四纪环境的研究和第四纪地质地貌的研究，在黄河流域做的也比较充分，所以从西到东，都沿着黄河流域走，是有道理的。

不过长江流域的考古在20世纪50~60年代就有一定的发展，到80年代以来更有长足的进步。事实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和古文明发祥的重要地区。而地处长江下游偏南的浙江的考古，最近一些年更是突飞猛进，特别是在史前阶段，新的发现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做考古的人简直都觉得目不暇接。这里发现的诸多考古学文化年代不同又各具特色，它们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具体情况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总是离不开各自所在的自然环境。这正是开展环境考古研究的极好条件。因此这次会议下决心作一个战略性的转移，拐直角指向南方，“打”到浙江来，我觉得很有意义。

浙江的史前考古给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良渚文化的“勃兴”和“突然消亡”就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在环太湖流域，从马家浜文化经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是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只是发展中有起伏。到了良渚文化，余杭的良渚、安溪、瓶窑一带急速发展起来，成了整个文化的中心。到良渚文化中期，更出现了反山、瑶山和莫角山等一系列闪耀着文明光辉的遗迹，成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学者最关注的地方。它的发展水平那么高，那么有特点，除了文化本身的原因以外，是不是跟当地的环境也有某种关系？过去我们常常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就是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养成了

* 2006年11月5日于浙江浦江。

这个地方的文化, 那我们要弄清楚这个地方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到底优越在哪里。那么发达的文化, 应该有更加发达的后继者。但良渚文化之后的马桥文化似乎还不如良渚文化发达, 从文化的内容来看, 好像也不是良渚文化的直接继承者。良渚文化似乎是突然消亡了。人们找了许多原因, 除文化本身的也就是社会的原因外, 还有一个洪水说, 有的学者说有大洪水, 有的学者说没那么大的洪水。即使有大洪水, 那它从哪里来? 能把一个文化淹掉吗? 这都是问题啊, 需要环境考古学者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记得 20 世纪 70 年代河姆渡文化初发现的时候, 考古界都感到很吃惊啊! 怎么那么早? 有那么高水平的建筑, 那么高水平的稻作农业, 总的文化水平那么高, 特点突出, 跟别的文化很不一样。那时人们总以为黄河流域的文化是最发达的, 浙江这个地方偏处一隅, 理应比较落后。事实却不是那样。那是怎么回事? 提出了很多问题。90 年代发现了跨湖桥文化, 我们也曾经专门为跨湖桥文化召开过学术讨论会。它不但比河姆渡文化年代早, 而且文化内涵非常丰富, 跟河姆渡的文化大不一样。有的学者把它跟湖南的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做了比较, 觉得倒有几分相像。它是从湖南发展过来的吗? 什么样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使得这种迁移或传播成为可能呢? 为什么后来又突然消失了呢? 21 世纪初又发现了上山遗址, 主体文化明显比跨湖桥早, 文化面貌大不相同。紧接着又发现了与上山遗址类似的小黄山遗址, 我们也开过学术讨论会。在那里发现有一部分跨湖桥文化的因素, 大家很感兴趣。但是跨湖桥文化跟小黄山的主体文化是什么关系, 在那次会议上没有解决。这次, 我是第二次“上山”哪, 第一次在这里看到的, 没有跨湖桥的内容。经过第二次发掘, 不但大大充实了主体文化的内容, 而且发现有跨湖桥文化的遗存叠压在上山类型的文化遗存之上, 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可是上山的文化跟跨湖桥的文化内容太不一样了, 不像是相互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为什么不一样? 值得好好研究。在别的地方, 比如说环太湖流域, 从马家浜经崧泽到良渚, 相互承袭演变的线索很清楚。而上山、跨湖桥、河姆渡这几个文化的演变却是跳跃式的, 相互替代而缺少继承。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会有文化本身的问题, 也就是社会的问题。我想很大的程度上恐怕与环境的变迁、不同地方的环境差异, 有很大的关系。我想农业的起源也好, 文明的起源也好, 文化的变迁也好, 都应该是环境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几个问题在浙江都汇聚在一起, 所以把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放在浦江召开, 是一个非常见地的决策。当然我们开一个会, 是希望不但提出问题, 还希望大家交流看法, 能解决一些问题。可能大会提供了好多这方面的文章,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我希望大会在这些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交流。有一些问题, 我们研究考古的人简直不得其解, 比如说跨湖桥这个地方离开钱塘江口还是比较远的, 但是跨湖桥文化地层之上有海相地层。距今 8000 年左右, 海水淹到这里来了, 有点奇怪。说是潮水也有点勉强。按道理, 距今 8000 年还不是海平面最高的时候, 如果海平面比现在低, 怎么能淹到跨湖桥呢? 浙江

这块地方，从整个陆地构造来讲还应该是下沉的，也就是说几千年前，它还应该再高一点。陆地再高一点，海平面再低一点，但在这种情况下，海水却淹到这里来了，这怎么解释呢？跨湖桥文化之后才是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离海很近，接近宁波了。时间是距今 7000 年，按道理是海平面最高的时候，遗址的海拔高度几乎和跨湖桥一样，应该被淹掉，可是它在那个地方建立了村落，文化兴盛起来了，这又怎么解释呢？这几个文化都有稻作农业，从上山到跨湖桥到河姆渡，而且一个比一个发达，在总体文化上却看不到继承性。稻作农业是相互传递的么？还是都从野生稻来进行栽培的？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想这个会在这里召开，碰到这么多尖端的考古学 and 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非常非常好！我们的研究就是要研究这些尖端的前沿性的问题。大会让我在前面讲几句话，做个开场白。我没有研究，只有问题。我提出这些问题无非是对大会的一种期待。我希望在接下来的会议中能听到非常精彩的报告，对这些问题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谢谢大家！

（原载《环境考古研究》（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从史前文化的演变看 8000 ~ 4000 年前 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

关于黄土高原全新世的自然环境，地质学家已经有许多研究。我想，假如换一个视角，从史前文化发展演变的情况来进行分析，或许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自然环境的特点和变化的趋势。

在史前文化的发展中，农业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情。全世界农业起源的中心，农学家虽然有不同的说法，但是经过考古证明了的的最重要中心只有三个，中国是其中之一。根据近年来的研究，中国实际上有两个起源地，分别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农业起源固然有人类文化自身发展的原因，也有自然环境的因素。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农作方式，种植什么样的作物，都必须考虑自然环境的情况。黄土高原最早的农业见于白家文化（或称为老官台文化）。这个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年代大约距今 8000 ~ 7000 年，分布范围主要在渭河流域。在白家文化的遗址中发现有石铲、石刀和石磨盘等掘地、收割和加工谷物的农具，有的遗址中还发现有粟、黍、大麻和菜子等农作物，可以断定当时已经有旱地农业，种植的作物主要是粟和黍。

粟和黍都是耐旱作物，在以黄土为母质的微带碱性的土壤中能够顺利地生长。黄土高原春季干旱，一般作物种子难以发芽生长。粟和黍种子发芽所需的水分比麦类作物低得多，一般情况下可以顺利发芽，幼苗期遇干风也不至于枯死。到夏季雨量集中的时候，也正是它快速生长的时候。可见在没有灌溉的情况下，粟和黍是最适合于在黄河流域种植的农作物。反过来说，在 8000 ~ 7000 年以前，黄河流域主要种植粟、黍类农作物，证明那时的气候应该是半干旱的季风气候，并且是以黄土为母质的土壤。同现在的情况差别不大。

不过在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情况还有所不同。同是在新石器时代中

* 参加中国工程院全新世环境课题组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2001 年 12 月 13 日。

期，华北平原分布着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这两个文化的聚落遗址比白家文化的大得多，文化堆积也更加丰富。石器的制作比较精致，其中的舌形石铲、齿刃石镰和有乳状足的石磨盘的制作都很考究，形制规范，是当时最先进的农具。特别是在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发现有数百座储藏粮食的窖穴，其中 80 多个窖穴中还有剩余的粮食朽灰，如果换算成新鲜粮食至少在 10 万斤以上^①。可见那里的农业生产已经越出了起源时期的初级阶段。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有一万年左右的石磨盘、石磨棒等磨谷器，同出的还有许多猪骨和一些陶片，可能已经有农业的萌芽。可见华北平原的旱地农业发展水平远比黄土高原南部农业的发展水平要高。说明华北平原的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比黄土高原更加适合于旱地农业的发展。何况这时黄土高原仅仅在南部的渭河流域才有不甚发达的旱地农业，真正的高原上还完全没有农业，居民稀少。值得注意的是，在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中，除了少量农具和家猪骨骼遗存外，还有比较多的水牛骨骼，占可以鉴定骨骼标本的 22% 强^②。水牛喜气候温暖和水草丰富的环境，既然白家村有比较多的水牛骨骼出土，证明当时渭河流域至少有部分地区适合于水牛生存的环境。

距今 7000 ~ 5000 年的黄土高原，是仰韶文化发生和发展的时期。这时已经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地史上进入了全新世的大暖期。气候条件进一步的好转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仰韶文化主要是在白家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分布范围比白家文化大得多，农业生产和整个文化也比白家文化发达得多。仰韶文化本身又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或者分为早中晚三期。

仰韶文化早期又称为半坡期，主要是向北发展，最北到达内蒙古自治区的大青山南麓，而西边仅到甘肃的天水。此时黄土高原的绝大部分都有聚落遗址的分布，尤以黄河和汾河谷地为多，山西和陕西北部则十分稀少。这时的农业仍然是以种植粟、黍等旱地作物为主，规模较白家文化时期有所扩大。西安半坡遗址的孢粉分析，“说明当时气候和环境属半干旱性气候，与今日该处之气候相仿”^③。遗址中的动物骨骼多数属于华北动物群，同时有属于南方动物群的獐和竹鼠，表明温暖湿润气候也能够波及这个地区。在内蒙古凉城县的石虎山遗址中发现有不少水牛遗骨，说明那里也有水牛生活的条件。

仰韶文化中期又称为庙底沟期，是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文化遗址多，堆积丰厚，规

① 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农业遗存及相关问题》，《农业考古》1984 年 1 期。

② 周本雄：《白家村遗址动物遗骸鉴定报告》，《临潼白家村》123 ~ 126 页附录二，巴蜀书社，1994 年。

③ 周昆叔：《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孢粉分析》，《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附录三 272 页，文物出版社，1963 年。

模也较大。例如陕西华阴西关堡和华县泉护村都是百万平方米左右的大型遗址。为了开辟新的农田,不少人向外迁移,迁移的方向主要朝西,前锋直达青海省的边界。仅据 20 世纪 50 年代的调查,单是甘肃境内的遗址就有 152 处之多。同时也有不少人向北迁移,个别的甚至到达大青山东端以北现在已经沦为沙漠的地区。在黄土高原中心地区的山西和陕西北部的聚落遗址虽然比早期多了几倍,但是相对于南部地区来说仍然很少,规模也比较小。这时农具数量大增,储藏粮食的窖穴容积增大,数量增加,说明这时的农业已有比较大的发展。种植的作物仍然以粟和黍为主,但是在渭河流域已经有个别地方种植水稻。例如华县泉护村、户县丈八寺等处就都发现有稻谷遗存。这时的房屋多是木骨泥墙,用大量木料做柱子和椽子。泉护村一所大房子周围有数十根大柱子,柱洞的直径达 40 ~ 50 厘米。西关堡和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也多有类似的大房子,说明那时河谷和山坡地带还是有较多森林的。总之,在我们研究的时段内,仰韶文化中期的气候条件可能是最好的,只是各地的情况有所不同。

仰韶文化晚期在分布范围上基本上稳定下来,只有西部继续向河西走廊扩展。与此同时地方特性突显出来,其中分布于陕西关中地区的称为半坡晚期类型,山西南部称为西王类型,中部称为义井类型,内蒙古中南部称为海生不浪类型,宁夏南部称为菜园类型,而甘肃、青海因为变化更大则称为马家窑文化。在发展水平上,山西和陕西同仰韶文化中后期相比似乎没有多大进展,而边缘地带的内蒙古中南部和甘肃东部则有相当大的变化。例如甘肃东部的秦安大地湾遗址有将近 100 万平方米,有成百座房屋,其中 901 号房子面积达 290 平方米,地面用三合土建造,分前堂、后室和东西两厢,其规模在仰韶文化中是仅见的,表明那里是一处重要的中心聚落遗址。这可能不完全是自然环境变化的原因而是人文因素的作用所致。

仰韶文化之后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年代大约为距今 5000 ~ 4000 年。这时手工业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小型铜器、漆器和玉器等高档手工业品。社会已经明显地分化,战争日益频繁和激烈。为了组织有效的防御,一些重要的聚落开始建筑防护的城墙。这个时代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在山西、陕西南部为庙底沟二期文化,甘肃东部为常山下层文化,再往西便是半山—马厂文化。这时期文化的发展似乎出现了一个低潮,各地发现的聚落遗址相对较少,规模也不太大。一些地方出现了窑洞,这是人们对黄土特性认识的一个飞跃。窑洞居室冬暖夏凉,又可以节约建筑材料,的确是一项重大的发明。不过从环境的角度来看,窑洞恰巧在这个时候出现,也许与气候变凉和树木减少不无关系。一些遗址中出现了过去在长城以北才有的细石器,表明狩猎小动物成了人们关注的事情,这也可能是树木变得比较稀少的一种反映。

铜石并用时代后期在考古学上相当于龙山时代,在山西有陶寺类型,在陕西有客省庄文化,在内蒙古中南部有老虎山文化,在甘肃和青海东北部有齐家文化。这时在

黄土高原普遍出现窑洞，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和甘肃的许多地方都有发现。有些窑洞的聚落规模很大，例如内蒙古凉城县园子沟遗址就发现有 132 座之多，并且明确分成相邻的三区，分别有 40、45 和 47 座窑洞^①。多数窑洞有前后两室，后室为卧室，用白灰涂抹地面和墙壁，颇为讲究。这时普遍出现了石头建筑的围墙，即所谓石城，且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的北部边缘，与后来的长城相近的一带。很可能这时游牧人已经初步分化出来，这些石城是为了防止游牧人的袭扰而建筑起来的。可能与这种防御性设施发挥了效能有关的是，过去一向不甚发达的陕北等地方现在也发展起来了，那里聚落遗址的总数一下子增加到 1000 处以上，只是多数规模不大。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较大的中心聚落遗址，例如陕西神木县的石峁和新华遗址不但面积较大，遗物丰富，而且出土了不少玉器，应该是当地的中心聚落遗址。而最大的中心聚落遗址在山西南部的陶寺^②。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经过多年发掘和勘探，发现有一座巨大的夯土城墙，城内面积达 280 万平方米以上，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数十座史前城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城内有夯土台基多处，应该是高等级的房屋建筑所在。从发现的一些建筑残块来看，可知墙壁抹白灰，上面有彩画或刻画的花纹，显得富丽堂皇。遗址中的墓地大约有 1 万多座墓葬，也是我国史前墓地中规模最大的一处，由此可见城里居民必定有相当多。墓葬中大、中、小墓呈金字塔式结构，反映当时的社会大约也已经分化为贵族与平民的金字塔结构。大墓中随葬龙纹盘、鼉鼓和特磬等可能是王者用器，陶寺这座城就可能是一个早期国家的都城。支持这样的都城需要有发达的农业作为基础，可见当时的农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提供剩余的粮食给城里人享用了。蔡莲珍和仇士华用碳-13 方法测定古代人们的食谱，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半坡、北首岭等处食谱中约有 48% 的 C₄ 植物，龙山时期的浒西庄也大略相等，而陶寺则占 70% 左右^③。小米是 C₄ 植物，这个数据说明从仰韶到龙山，黄土高原的居民一直以小米为重要食物，同时还要通过狩猎和采集获取其他食物。而像陶寺这种都城里的居民则更多地以小米为食，说明他们的生活质量比乡村的居民为高，而整个农业生产水平自然也比以前有所提高。

要根据经济文化的发展来估计龙山时代的气候和整个自然环境的状况是困难的。因为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人类已经具备比以前更高的能力来进行生产，例如经验的积累，生产工具的改进，都会提高农业生产率。特别是这个时期已学会打井，可以离开天

①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10~198 页，科学出版社，2000 年。

② 何弩、严志斌：《黄河流域史前最大城址进一步探明》，《中国文物报》2002 年 2 月 8 日第一版。

③ 蔡莲珍、仇士华：《碳十三测定与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 年 10 期。

然水源生活,拓展了生存空间,自然也会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不过这时人们似乎更加注意自然环境的特点来安排生产。例如窑洞多是建筑在山坡上,平地还是用木骨泥墙。一般地方主要种植粟和黍,并且养猪,而在黄土高原的北部和西部雨量较少的地方则多养羊,遗址中多细石器,说明畜牧和狩猎的比重较大。从各个方面来考察,整个黄土高原在龙山时代仍然是半干旱的气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直到目前,在黄土高原进行史前文化演变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系统研究还很缺乏,只有内蒙古中南部的岱海地区和甘肃东部的葫芦河流域做了一些工作。两地都在边缘地带,似乎难以概括整个高原的情况。岱海地区的史前文化,最早是仰韶文化的半坡期,只有个别遗址;其次是庙底沟期,遗址略有增加;到仰韶文化晚期的海生不浪类型,遗址大为增加。其后出现一个断档,到龙山时代的老虎山文化又有很大的发展。在相应时段内,从附近的几个地质剖面观察,气候有几次波动,总趋势是由暖湿变为凉干。岱海的水面也大幅度下降,平均深度从 8000 年前的 22.34 米降到 5000 年前的 9.22 米和 4000 年前的 9.64 米。湖水面积则从 8000 年前的 391.2 平方公里缩小为 5000 年前的 189.6 平方公里和 4000 年前的 216.3 平方公里^①,到现在只剩了 150 平方公里。在这里,仰韶文化以后的断档显然与气候的急剧变化有关,而龙山时代的发展则与气候的平稳并略有好转以及人类对于不良气候的适应能力加强有关。

葫芦河发源于宁夏南部的西吉县,南流入甘肃东部至天水汇入渭河。那里分布着一系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中大地湾一期文化(白家文化)3处,仰韶文化早期23处、中期49处、晚期67处,常山下层文化(龙山早期)80处,齐家文化(龙山晚期)376处,呈现出递增的趋势。不过各文化遗址分布的北界稍有不同,仰韶晚期和常山下层文化最北,齐家文化又向南退缩。遗址距离河面的高度则是逐渐增加的。根据几处地质剖面和采集标本的分析,当地气候的变化大致如下:距今7800~5900年,相当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和仰韶文化早期,气温与降水量匀速上升,农业的北界由35°移到了35°30',温度上升了1.4℃,降水量增加了50毫米。距今5900~5100年,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期和晚期的前半段,这时气温与降水量快速上升,农业北界由35°30'移到了36°30',气温上升了2.8℃,降水量增加了100毫米。距今5100~4200年,从仰韶文化晚期后半到齐家文化前半期,是高温高湿稳定时期,农业北界稳定在36°30'左右。距今4200~4000年,相当于齐家文化后半期,气温与降水量均快速下降,农业北界回归到

^① 刘清泗、李华章:《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岱海—黄旗海地区)全新世环境演变》,《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全新世环境演变及预测》,地质出版社,1992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4~5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35°30′，气温下降了2.8℃，降水量减少了100毫米^①。这个结果大致与岱海地区气候变化的趋势相仿佛，只是葫芦河流域气候变干冷的时间稍晚一些。

如果将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情况相比，可以看出黄土高原农业文化发展稍晚，发展程度也稍低。石器制作技术稍差，陶器类型比较简单。除山西南部以外，聚落遗址的分化稍晚，进展也稍慢。这些都表明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稍逊于华北平原。同现在的情况差不多，只是在几千年中有所波动而已。

^① 李非、李水城、水涛：《葫芦河流域的古文化与古环境》，《考古》1993年9期。

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

《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是200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项目。千禧年伊始，国家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环境背景研究，主要工作由中国工程院担当，下分若干课题组。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课题指南中也列入了西北古代文化与自然环境演变关系的项目。韩建业申请的课题正好与课题指南相合，他本人又是最有条件完成这一课题的，申请被顺利通过。

这事跟我也有一点关系。记得2001年秋，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研究刚刚启动。担任其中重要项目的刘东生先生亲临寒舍，邀请我参与部分工作，具体任务是研究全新世以来西北地区的文化发展与自然环境演变的关系。刘先生是第四纪地学的泰斗，对考古学十分关注，对我本人也多有教益，如此盛情实在难以推却。12月13日课题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我作了“从史前文化的演变看8000~4000年前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的报告，得到了积极的评价，同时要求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内容要更加深化。我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于是找了我的两个博士生韩建业和陈洪海帮忙。原因是韩建业曾经参与内蒙古岱海地区的考古工作和《岱海考古》报告的编写，又曾经对冀北、晋北、陕北等地做过广泛的考古调查，与地学界也多有接触，对北方地区史前时期的人地关系颇有研究。陈洪海多年在陕西、甘肃和青海做考古工作，对那里的情况也比较了解。经过多次会议和研究，最后完成了《黄土高原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环境变迁的考古学观察》，收入钱正英主编的《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共10卷中的《自然历史卷》（刘东生主编）中。不但如此，韩建业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将博士论文修改与充实，于2003年出版专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其中除详细讨论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谱系、聚落形态演变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以外，还特别注意文化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几乎可以看做是本书的预演。当时没有涉及新疆，所以后来又专程到新疆进行考古调查，于2007年出版了专著《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在这期间还发表了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从而为本课题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将西北地区划分为三区，即半干旱半湿润的黄土高原区，贺兰山以东的内蒙古

半干旱草原区和贺兰山以西直到新疆的西北内陆干旱区。首先考察了每一区的自然环境及其在全新世期间演变的情况，接着考察各区考古学文化的演变发展，最后讨论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的关系，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某些对策性意见。所以本书既是一部环境考古的综合性著作，又对当前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根据本书的研究，无论是黄土高原区、内蒙古半干旱草原区还是西北内陆干旱区，都经历了早全新世回暖期、中全新世适宜期和晚全新世降温干早期，每个时期中又还有一些较小的波动。由于各区所处地理位置和地貌、水文特征等情况不同，对气候的敏感程度不同，因而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也大不相同。

黄土高原尽管也是半干旱半湿润地区，但是在三区中毕竟所处纬度较低，又处于黄河中游地带，水热条件相对较好。从史前文化分布的态势来看又最接近中原文化区，有些甚至可视为中原文化区的组成部分。所以从新石器时代中期起，在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等的影响下，逐渐发展了以粟和黍为主要作物的旱地农业。开始仅限于渭河盆地，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前期，正值气候最适宜期，旱作农业几乎遍及整个黄土高原的河谷地带，部分甚至到达内蒙古半干旱草原的边缘。不过黄土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毕竟比较脆弱，一遇较大的气候波动，农业文化就会萎缩。例如距今 5500 年左右，整个欧亚大陆北部气候趋于冷湿；距今 5000 年左右更趋寒冷，黄土高原北部的岱海—黄旗海一带原有的农业文化突然中断或纷纷南移，或者增加狩猎与养畜业的比重以补农业生产之不足。到青铜时代，文化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地文化的分化加剧，中原的商文明进入黄土高原南部的渭河流域，促进了先周和周文化的发展，使其率先进入文明社会。其他地区的社会发展则相对滞后，这还是与各地的自然环境有关。因为黄土极易侵蚀，高原地区历来水土流失严重。地形破碎，到处是沟谷梁峁，难得形成较大的经济政治中心。与此同时，远在中亚的青铜文化通过新疆、甘肃带来了羊、马和北方式青铜器，促进了高原地区畜牧业和半农半牧文化的发展，对商周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

黄土高原腹地的文化是在仰韶文化后期才真正发展起来的。在庙底沟期文化大发展之后，人口随之大幅度增长，需要开辟新的生活空间。最近的地方就是黄土高原腹地。例如陕北一带以前很少居址，从仰韶后期到龙山时期就出现了大批遗址。这时恰遇气候转向干冷，人们只可能在沟沟坎坎的狭窄地带种植有限的粟、黍等耐旱作物，兼营养畜、狩猎和采集。这样的经济虽然难以发展扩大，却足以维持生计。这里缺乏森林资源，不大可能像在渭河盆地那样用大量木料来建造房屋。人们注意到无所不在的黄土坡，开始在坡上打主意。黄土质地比较均匀而松软，很容易掏挖；又具有垂直节理，挖出的窑洞不会垮塌，完全不用木质建材也能够保证安全。这里气候干燥，不用担心洞内过于潮湿，而且冬暖夏凉，防沙避风。窑洞可说是黄土高原居民的天才发明，是人类适应和利用环境以发展自己的极好例证，直到近代仍然是当地人民重要的居住场所。

内蒙古半干旱草原区对气候最为敏感。气候最适宜期南部有些地方会有少量农业，气候干冷期则基本上只有狩猎或游牧经济。人口流动性大。一方面有利于某些文化因素的远地传播，如较早从西北传来羊、马和草原风格的青铜器等；另一方面又时常对南方农业区造成冲击。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早在距今 5000 年左右，在南部与农业区交界的地方就先后出现了几条大致呈东西向的石城带，可说是后来长城的原型。战国以来多次修筑长城，位置南北时有变动，一方面反映南北力量的消长，而主要还是由于因气候的变化而形成的农牧交界的变化。

西北内陆干旱区面积最大，又深处内陆，高山、盆地相间分布。降水稀少，气候严酷。尽管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但人烟稀少，发展缓慢，整个新石器时代基本还处在狩猎采集经济的阶段。不过在这广阔的内陆区还有许多由高山雪水浇灌而形成的绿洲，新疆北部和柴达木等地还有很大的草原，有发展农牧业的潜力。大约从距今 5000 年开始，农业文化首先进入东部的河西走廊等地，进而影响到新疆的部分地区。大约从距今 4000 年或稍晚，中亚等地的青铜文化传入新疆乃至甘肃等地，从而在本区出现了一系列兼营农牧业的青铜文化。之后又再次受到中亚的影响而较早地进入铁器时代。

由于降水稀少，这里的农牧业和生活用水要靠高山雪水，受气候波动的影响反而较小，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绿洲文化。由于每个绿洲的面积都不很大，难得形成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中心。但各绿洲多分布在山前地带，跟着山脉的走势便形成联珠状的排列，成为东西交通的重要渠道。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就是走的这个渠道。而在丝绸之路形成以前，东西方实际上已经有许多来往。从东往西，最早有彩陶和粟、黍等旱地作物；从西往东则有小麦、羊、马、铜器和铁器等。而新疆本身的特产和田玉等也成为远地交往的重要物品。由此可见，由于本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自然环境，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曾经长期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而在绿洲的开发方面，也曾发生过度开发的惨重教训，对当前进行西部大开发也是一种警示。

总起来说，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支持了旱作农业的发展，气候的波动虽然有一些影响但不严重，经济文化还是得到了稳步的发展而较早地步入文明社会。由于资源有限，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向环境更加优越的东南部发展，这就是从西周到东周和秦代统一所走过的道路。内蒙古半干旱草原区对气候的敏感度最高，人口流动性大，时常对南部农业区造成冲击，但在传播文化上还是起过不少积极的作用。西北内陆干旱区虽然环境比较严酷，却有许多天然的绿洲，东西方文化相继传入后就可以得到比较稳定而缓慢的发展。而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则为东西方文化之间长距离的交流提供了契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里几乎是东方与西方两大古文明之间唯一的交通渠道，对于促进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作者在结语中还对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归纳出五条显著的

特征，每一条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以上就是本书的基本内容。

本书收集的资料既全面又十分丰富，而且差不多对每项资料都进行了认真的鉴别与分析。同时又非常注意前人和当代学者研究的成果。扎扎实实，既不追求标新立异，又勇于提出自己的创见。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我在上面简单的概括不一定准确，但大致可以看出本书的基本内容和作者研究的着力点之所在。要了解详细的内容，还是请看全书吧！

（原为韩建业著《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序，文物出版社，2008年）

三 聚落演变与文明起源

中国史前聚落的考古研究

中国史前聚落的考古研究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此以前的史前考古，大多着重于文化特征的描述和文化关系与年代的推断，基本上不涉及聚落形态的研究。到50年代，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得到迅速的发展，调查发现和发掘了一大批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从而为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客观的基础。当时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的宣传和学习，也激励考古学者通过聚落形态的揭示来研究原始社会的组织结构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件工作就是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

半坡遗址是1953年春发现的，1954年秋至1957年春在石兴邦先生主持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约1万平方米，发现房屋遗迹40多座，土坑墓和瓮棺葬等共200多座，还有大围沟和烧陶窑址等遗迹，第一次获知仰韶文化村落的大致轮廓，揭开了通过考古发掘来探讨氏族社会制度的序幕。这个遗址位于浐河东岸，居住区、墓葬区和陶窑区划分清楚。发掘报告书认为：“从物质文化遗存的特点来观察，半坡原始氏族部落是处在发达的新石器时代阶段，即恩格斯所论述的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从社会发展的阶段来说，相当于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①。书中有不少关于半坡氏族或半坡氏族部落的提法，并且就这个氏族部落的发展阶段、人口数目、生产水平和经济特点、生活状况乃至精神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推测，反映了力图全面复原社会历史的急切愿望。在组织发掘半坡遗址时，由于缺乏经验，特地介绍了前苏联考古学家30年代全面发掘乌克兰特里波列文化居址的方法与经验^②。可是特里波列基本上是一个时期的居址，几乎没有遗迹相互叠压打破的情况，发掘时主要考虑平面布局的问题。而半坡遗址有好几个时期的堆积，叠压打破关系非常复杂，发掘时虽然作了一些努力，最终还是主要从平面考虑问题而忽视了不同时期聚落的变化^③。

①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西安半坡》226页，文物出版社，1963年。

② T. C. 帕谢克：《特黎波里居址的田野考查方法》，《考古通讯》1956年3期。

③ 严文明：《半坡仰韶文化的分期与类型问题》，《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如果最初就严格掌握地层，从地层关系出发，注意不同时期聚落布局的变化，情况可能会好一些。不过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做这样的工作，参加的人又特别多，出现一些不足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50年代发掘的另一处重要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北首岭。这个遗址虽然也有不同时期的堆积，但主要是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所以聚落布局比半坡遗址看得清楚一些^①，只是发掘报告没有正确地处理分期问题，以致在聚落布局的研究方面也发生差错^②。遗址在金陵河西岸，居住区和墓葬区同样划分清楚。居住区的房屋明显分成三组，北组的房屋朝南，南组的房屋朝北偏西，西组的房屋朝东。据说东边也有房屋，后来被河水冲刷塌毁了。而中间是一个广场。由此可见这个村落既是凝聚和内向式的，内部又是有区划的，当初应该存在着至少两级社会组织。

半坡和北首岭都有很大的墓地。50年代发掘的同属于半坡类型的墓地还有华阴横阵村和华县元君庙。这些墓地都是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墓地的研究来探讨仰韶文化的社会制度，成为当时新石器时代考古最受关注的研究课题。当时关于墓地的研究，有不少是引用民族志资料来加以说明的，其中大多数学者主张仰韶文化母系说，只有个别人主张父系说。主张母系说的有人主张处在群婚阶段，有人主张处在对偶婚阶段，有人认为既有群婚也有对偶婚。这些研究往往是从概念到概念，显得空泛而没有说服力。也有不少文章是对考古资料进行分析的，这些文章既注意到墓葬的分片分排，更注意了单个墓葬的差别，特别是不同性别、年龄死者随葬品的差别，以及合葬墓中不同性别年龄的配伍关系，借以研究当时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性质，这个思路是很好的。但是在对发掘资料按照同一思路来进行研究时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从而引起了非常热烈的争论。例如有的学者主张所有仰韶文化的墓地都是氏族墓地，有的则认为是部落墓地；有的认为像元君庙那样成排的墓葬或像横阵村那样的复式合葬大墓是以氏族为单位的，有的则主张属于母系大家族。有的认为单个的合葬墓代表母系家族，有的则认为属于对偶家庭^③。其所以有如此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发掘资料还没有经过详细整理，更没有发表正式发掘报告，仅仅根据考古简报或参观得来的初步印象来写文章。掌握的资料不全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② 严文明：《北首岭史前遗存剖析》，《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③ 这一类讨论文章甚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吴汝祚：《从墓葬发掘来看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考古》1961年12期；

2) 方扬：《仰韶文化合葬习俗的几点补充解释》，《考古》1962年3期；

3) 张忠培：《关于根据半坡类型的埋葬制度探讨仰韶文化社会制度的商榷》，《考古》1962年7期；

4) 邵望平：《横阵仰韶文化墓地的性质与葬俗》，《考古》1976年3期；

5) 李文杰：《华阴横阵母系氏族墓地剖析》，《考古》1976年3期。

面又不准确，得出的结论就难免不发生差错，张忠培就曾经尖锐地指出这一缺点^①。事实上任何墓地都不是一次形成的，往往经过了较长的一段时期，因此首先要了解墓葬的早晚关系，看看是不是可以进行分期。假如有明确的早晚关系而错误地当作同一时期来研究社会组织结构，自然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例如横阵的三座复式合葬墓明显是有先后关系的，假如一座复式合葬墓代表一个氏族，三座复式合葬墓就应该是同一氏族在不同时期的埋葬，而不是代表三个氏族^②。这个道理是容易明白的。

在上述四个墓地中，只有元君庙是经过仔细研究的^③。张忠培在1964年写成而在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上宣读的论文中，将整个墓地分成三期，结合墓葬排列位置观察，发现整个墓地分成两个墓区，墓穴安葬的顺序都是从北向南，再从东往西。由此他得出结论：“元君庙墓地是两个氏族墓区组成的部落墓地。”^④接着他着重分析了在墓地中大量存在的合葬墓，鉴于绝大多数合葬墓中的死者是属于不同性别和年龄等级的，他（她）们应该是按照血缘关系组成的亲族集团在一定时期内死亡的，这个亲族集团应该是小于氏族的家族。元君庙的家族一氏族一部落究竟处在哪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作者通过详细的分析后，认为“元君庙的母系氏族制，早已脱离了它的前期形态，而迈入发达的母系氏族制了，即母权制时代”^⑤。后来关于渭南史家墓地的分析，也是按照这种思路进行的^⑥。

70年代在聚落考古方面有几项重要的发现。首先是半坡博物馆等单位于1972～1979年对临潼姜寨的大规模发掘，揭露面积达17084平方米，发现了一个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村落遗址^⑦。发掘规模之大和村落布局保存之完好，在中国史前聚落遗址中是首屈一指的。姜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可分五期，其中保存最好的是属于半坡类型前段的第一期遗存，其次是属于半坡类型后段或被称为史家类型的第二期遗存。姜寨一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居住区，其中发现的房屋有120座，零星的灶坑有181个，如果一个灶坑代表一所房子，就应该有301座房子。发掘报告认为这些房子是分成三批建造的，属于同一时期的大约只有100多座。这些房屋分成五组，大致上围成一个圆圈，组与组间有一定的间隔。每组各有一所大房子、一两所中等大小的房子和一二十座小房子，门道

① 张忠培：《关于根据半坡类型的埋葬制度探讨仰韶文化社会制度的商榷》，《考古》1962年7期。

② 严文明：《横阵墓地试析》，载《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③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④ 张忠培：《元君庙墓地反映的社会组织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23～31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⑤ 张忠培：《元君庙墓地反映的社会组织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31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⑥ 张忠培：《史家村墓地的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2期。

⑦ 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都无例外地朝向中央，而中央是一片墓地。应当说明的是，我在没有看到正式发掘报告的时候，根据不充分的资料以为中间的墓葬全部属于姜寨二期，在姜寨一期中间没有什么遗迹，推测可能是广场^①，这一点应予纠正。根据《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我们看到被划归姜寨二期的 M74、M84、M195、M197、M236、M241、M243、M244、M250、M253、M257 等墓葬实际上都是属于姜寨一期的，而这些墓葬全部在一期居住区的中央，因此中央应该是墓地而不是广场^②。同半坡一样，姜寨一期村落周围也设有围壕，并且在寨门和沿壕的地方设了几处哨所，可见对村落的安全防御是十分关注的。在围壕之外的东部、东北和东南各有一片墓地，据说北部在现代村落所在的位置也有一片墓地，加上聚落中心的墓地共有 5 片，正好与 5 组房屋相对应。这似乎不是偶然的现象，半坡和北首岭的墓地也是分片的，也可能与房屋的分组相关。姜寨一期既有集中的烧陶窑场，也有与某一组房屋相联系的陶窑，说明陶器的生产是分别在两级社会组织中进行的，由此也可以推知当时至少存在着两级所有制，即以整个聚落为代表的社群所有制和以某一组房屋为代表的较小社群的所有制，甚至还有更小一级的所有制，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姜寨遗址发掘之后不久，在甘肃秦安大地湾甲址又发现了一个从半坡期后段到庙底沟期的聚落遗址，其布局同姜寨十分相似，只是保存得没有姜寨那么完整。由于有姜寨的发掘，使我们有可能对那些保存状况稍差的半坡、北首岭和大地湾甲址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几个分布于渭河流域的大体上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村落有许多共同的特征：

(1) 居住区、生产区（主要指窑场）和墓葬区有明显的划分，同时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 居住区依据地形的特点一般规划为圆形或椭圆形，房屋也往往围成圆圈，门朝中央，外有围壕，是一种凝聚式和内向式的聚落，反映整个社群具有强烈的集体意识和组织观念。各聚落的经济大致是以旱地粟作农业为主，结合养猪、渔猎、采集和各种手工业在一起的，是一种综合性的自给自足性经济，聚落之间在经济上的交换并不显著，从而也加强了聚落的凝聚性。另一方面，聚落之间在文化上的交往还是比较密切的，因而在相当大的范围内的文化面貌十分相似或相同。

(3) 各聚落的规模差别不大，还没有形成高于一般聚落的中心聚落。一个聚落的房屋有数十座到百座左右，其中少数大房子可能是公共活动的场所，绝大多数小房子则

① 巩启明、严文明：《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考古与文物》1981 年 1 期。

② 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文物》1990 年 12 期。

是日常的住所。以此匡算，居民当有数百人之多。每个聚落内部的房屋又明确地分成若干组，而墓地也往往分成若干片，说明存在着比聚落要小的社会单位。换句话说，一个聚落内的居民至少存在着两级社会组织。

(4) 当时的家庭形态，可以从日常居住的小房子中看出端倪。有些房子中有土床，有些房子虽然没有土床，但其中相当于土床的位置没有摆放任何器物，可以判断是睡卧的地方，其面积一般只有2米多长、1米半宽，只可能睡两三个人。这种房子内都有灶，有储藏罐而没有粮食窖穴，只能是一个半消费单位。两三个人的半消费单位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家庭而应该是对偶家庭，几个对偶家庭才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家庭。这是一项重大的发现。

(5) 聚落有统一的规划和拥有不属于某一组房屋的公共烧陶窑场的事实，说明当时存在着以聚落为单位的所有制；同时存在着有些陶窑和牲畜圈栏明确与某一组房屋相联系的事实则说明还有小于聚落的所有制，即是以一组房屋的居民为单位的所有制。至少存在着两级所有制的情况为原始氏族公社埋藏了走向分化的种子。不过从总体情况来看，聚落的房屋虽然有大小之分而没有质量上的差别。墓葬的随葬品虽然有多少的差别，但是并不显著，质量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说明这时的公社制还很巩固，社会基本上是平等的，没有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分化。

以上便是仰韶文化前期聚落的基本情况。仰韶文化后期的聚落形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主要是通过大河村和大地湾乙址等处的发掘而得知的。

大河村遗址位于郑州市郊区，面积约3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从仰韶文化早期到中原龙山文化可以分成许多期，其中以三、四期遗存最为丰富，可以大致看出聚落的形态^①。这个遗址的中间有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古河道，把遗址分成东西两个部分。河东的聚落居住区在南边，墓葬区在北边。在居住区发现有三排房子，北边一排与中间一排相距20米，中间一排与南边一排相距只有5米。其中有单间的也有套间的。房子之间虽然有叠压打破关系，但是后来的房子总是建在原先的排列中，可见这种排列是预先规划好的。由于发掘规模有限，原先究竟有几排房子，每排究竟有多长，有几座房子，都还无法确定。河西的聚落居住区在北边，墓葬区在南边，与河东区正好相反。更加有意思的是河东的墓葬头朝西南，而河西的墓葬头朝东方，两两相向，说明二者有特殊亲密的关系而丧葬习俗有所不同。因此大河村三、四期应该是两个聚落而不是一个。这两个聚落有相同的房子，有类似的聚落布局；在埋葬习俗方面，成年人用土坑墓和婴儿用瓮棺葬都是相同的，葬式也差不多，只是与居住区的相对位置相反，头向也不相同。从这些情况来看，它们应该是两个相邻而居并且有亲密

^①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3期。

关系的聚落。与仰韶文化前期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凝聚内向式聚落格局的打破、分间房屋的出现与集体合葬墓的消失，说明这时的家庭形态发生了变化。至于社会的变化，从大地湾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大地湾位于甘肃省秦安县五营乡，适当渭河上游的支流葫芦河的分支五营河的南岸。遗址总面积有 110 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可分为五大期，即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晚三期和常山下层文化，其中以仰韶文化早期和晚期的遗存最为丰富。仰韶文化早期的聚落位于河岸阶地上，我们称之为大地湾甲址，其大致情况已于前述。仰韶文化晚期的聚落基本上在山坡上，最高处超过河面 200 米以上，范围与甲址明显不同，我们称之为大地湾乙址。乙址本身大致呈扇形分布，扇柄部分最低，地势也比较平，就在那里建造了一所大型的中心殿堂，编号为 F901^①。它是一所多间式房屋建筑，有前堂、后室和东西两间厢房。前堂的建筑标准最高，它的中间有两根直径约 90 厘米的大圆柱，柱间有直径达 250 厘米的大灶台，地面经过多层处理，上面用石灰、细沙掺人工烧制的陶质轻骨料混合铺垫，表面用类似水泥的物质抹平并加以打磨光滑，看起来很像现代的水泥。柱子表面、墙壁和房顶也都用类似水泥的泥浆抹平。整个房屋占地约 290 平方米，房前还有广场，有两排柱子洞，洞前还有一排青石板。这些设施的具体用意虽然难以揣摩，但是把它们同房子联系起来，就显得非常特别。房子里面的出土遗物个体大，形态特别，也不像是日常生活用品。因此 F901 决不是一般的住房，而是一所全聚落的中心建筑，发掘者称之为原始殿堂，是有道理的。

大地湾乙址并没有经过全面发掘，详细情况不得而知，但大致可以看出有几个小区。每个小区也有一所标准比较高的大型建筑，例如 F405 和 F901 前堂的风格几乎是一样的，只是规模较小而已^②。小型房屋也不完全是居室，有的房屋地面抹白灰，并且用黑颜色作画。画面上有一个长方形物体上放着两个动物，似乎是牺牲；后面有两个人，姿势完全一样，都是左手抚头，右手持棒，双腿交叉，似舞蹈状，或是像巫师作法的样子。这显然是一幅宗教画，如果是单纯的艺术作品，画在墙上的效果会更好些，其所以特别画在地上一定有某种特别的需要，很可能这是一所为巫师专用的宗教性建筑。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大地湾乙址明显不同于仰韶文化晚期的一般聚落，而是一个规模很大又非常特殊的中心聚落。

在仰韶文化晚期，类似大地湾乙址的中心聚落还有甘肃庆阳南佐疙瘩等处。总括这个时期聚落形态的变化，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 聚落的大小差别显著，功能也有所不同，少数聚落得到特别的发展而成为中

①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 901 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 年 2 期。

②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秦安大地湾 405 号新石器时代房屋遗址》，《文物》1983 年 11 期。

心聚落，意味着在聚落之间已经发生明显的分化。

(2) 在中心聚落内部不但有明显的分区，而且有统一的中心建筑，说明各区之间不是完全平等的关系而可能是统属关系，而一般聚落则没有这种情况。

(3) 住所除单间以外还出现有套间房，说明家庭形态和生活内容都发生了变化。结合墓葬中集体合葬习俗的消失，也许暗示着基于血缘关系的集体观念与平等意识有所改变。

仰韶文化聚落形态演变的研究，到 80 年代已有相当的进展，聚落演变的轨迹已经比较清楚，为此我曾试图梳理出某些带规律性的认识^①。现在看来这些认识还是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的。

从 70 年代到 80 年代，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有了重要的发展。首先是由于一系列较早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以及由于龙山文化及同时代诸文化中铜器的发现而划分出一个铜石并用时代，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总分期得以初步确立；其次是黄河流域以外一些重要文化区的初步识别，从而为建立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谱系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广泛开展的聚落考古，则把史前社会历史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②。

新石器时代早期大约相当于公元前 10000 年 ~ 前 7000 年，北方的年代可能比较晚些。这是发明农业的时期，也是定居聚落初步建立的时期。但是由于考古工作比较薄弱，对于这个时期的聚落形态了解甚少。

北方属于这个时期的遗址有河北徐水南庄头、北京门头沟东胡林和怀柔转年等处。南庄头遗址位于沼泽边，有许多泥炭堆积。出土遗物中有不少磨谷用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动物骨骼以猪骨和鹿骨为最多，还有少量陶片，推测已经有农业的萌芽^③。而东胡林和转年则还看不出农业的痕迹。

南方新石器时代早期多属洞穴和贝丘遗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江西万年仙人洞，二者都是洞穴遗址，并且都有烧火堆等遗迹。玉蟾岩的出土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原始古稻和尖圜底陶釜^④，说明当时已经有农业的萌芽，但狩猎—采集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仙人洞虽然没有发现稻谷，但是发现了水稻的植物硅酸体，其他情况都

① 严文明：《仰韶房屋和聚落形态研究》，《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 年。

② 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

③ 郭瑞海、李珺：《从南庄头遗址看华北地区农业和陶器的起源》，《稻作 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 年。

④ 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一万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稻作 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 年。

和玉蟾岩相似。由于农业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难于形成较大的定居聚落，所以这个时期的聚落都很小。

新石器时代中期大约为公元前7000~前5000年，有些地方可能稍晚。这时农业已经有较大的发展。在华北和东北南部主要是种植粟和黍的旱地农业，有成套的农具，饲养猪、狗和鸡。住房为地穴式或半地穴式，面积较大。例如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住房一般为40~60平方米，山东章丘西河遗址的住房多为30~40平方米。聚落的面积也比较大，例如经过全面揭露的兴隆洼早期聚落平面呈不甚规则的椭圆形，长、短径分别为183和166米，面积约23000平方米，周围有壕沟环绕。壕沟内房屋整齐地成排排列，中间有两座各约140平方米的大房子，显然是一种凝聚式的向心结构^①。同属于兴隆洼文化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林西县的白音长汗和辽宁阜新查海等遗址的聚落结构都和兴隆洼相似，也是凝聚式的向心结构；文化面貌十分相似的沈阳新乐下层也是如此。兴隆沟虽然还没有全面发掘，但从地表也大致可以看出聚落的全貌，规模甚至比兴隆洼还大。这大概是本期北方聚落的一个特点。

这时期黄河流域的聚落至今还没有一个是经过全面揭露的，具体形态不甚清楚，但是多少还可以看出一些迹象。例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有8万平方米，发现有大量的农具，包括石铲、石镰、石磨盘和石磨棒等；还有数百个储藏粮食的长方形窖穴，其中不少遗留有粮食朽壳^②。这既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同时也说明磁山是一个很大聚落的遗址。河南新郑裴李岗^③、密县莪沟北岗、郟县水泉和舞阳贾湖等这些裴李岗文化的遗址都有比较大的墓地，并且与居住区紧密相连。墓地内往往可以比较清楚地区分为若干片。例如裴李岗、莪沟北岗和水泉的墓地都有相邻的三片，贾湖早期墓地有两片，中晚期墓地有六片^④。说明每个聚落都有相当的规模，其中的居民至少有两级社会组织。

在南方的长江流域，由于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同样也出现了许多定居的聚落，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的湖南北部和湖北西南部。现在在湖南北部的一般被称为彭头山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⑤，在湖北西南部的被称为城背溪文化，也有统称为彭头山文化或城背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10期。

②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3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1期。

④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⑤ 何介钧：《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再论》，《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

溪文化的^①。这些聚落都已经从事稻作农业的生产，许多陶器的泥胎中用稻壳和稻草末做掺和料，一些墙壁的表面也用掺稻壳的泥土抹平。在湖南澧县八十垱更发现了成万粒的稻谷和稻米^②。这个遗址有3万平方米，是南方同时期遗址中最大的一个。一般的遗址多在1万平方米以下，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平方米。这可能与稻作农业的特点有关。因为稻田需要水平，完全水平的地方毕竟很少，当时又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造田活动。既然在一定范围内的稻田数量有限，人们的聚落自然就不可能很大。直到今天，南方的农村仍然比北方农村小得多，这是由于水田农业生产和旱地农业生产的特点所造成的。

浙江东北部的河姆渡文化，年代虽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之初，但是基本的文化特征实应划归新石器时代中期之末^③。这个文化的典型遗址为余姚河姆渡，它依山面水，在滨海的沼泽边缘，经过发掘知道有四期文化遗存，其中第一期和第二期属于河姆渡文化，尤以第一期文化最为丰富，是一个以干栏式长屋组成的聚落遗址。这种房屋的营建方式是先在地上打桩，承重的地方用方桩或圆桩，作为维护或区隔者用板桩。桩上用大圆木架地龙骨，上面铺地板，使地板离地面约1米高，然后在地板上面立柱、架梁、盖屋顶。所有这些木构件在遗址中发现有数千根，有的桩木至今还成排地立在地中。在一些木构件上发现有榫头和卯眼，地板用企口板，还有直棂栏杆和刻花的构件，可见这些房屋还是很讲究的。根据桩木的走向和间距，可知有的房屋进深约7米，还有1.3米宽的走廊。房屋的长度因受发掘范围的限制难以确定，据第一次发掘的情况看至少超过23米。第二次发掘的房屋有与第一次发掘的房屋连成一线的，其总长度将近100米，只是中间没有挖开，不知道是不是真正连在一起。不论怎样，这种房屋是很长的。在比较炎热和潮湿的南方采用干栏式建筑，可以较好地解决通风和防潮的问题，也比地面建筑容易保持卫生，所以直到近代还广泛流行于华南和东南亚地区。想不到这种干栏式长屋的源头可以上溯到7000年以前的河姆渡，实在令人惊叹不已。

河姆渡遗址有4万平方米，现在仅仅发掘了很小的一部分。在这一部分地方大约有六七栋干栏式长屋，如果全部发掘自然会发现更多的长屋，可见这是一个不小的聚落。其所以能够维持如此大的聚落，应当与它所在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比较发达的多种经济成分有很大的关系。遗址近旁有丘陵、平原、沼泽与河流，距离海岸也不远，自然资源十分丰富。遗址中发现了大面积的稻谷和稻草堆积，其数当以万斤计算。种稻需要整治田

① 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14~53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② 裴安平：《八十垱遗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1949~1999），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③ 刘军、姚仲源：《中国河姆渡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块，挖泥整田用的骨锹就发现有 170 多件，说明稻作农业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家畜主要有猪、牛和狗。有的陶器上刻划有黄熟的稻子低垂着稻穗，旁边有猪在觅食的画面，生动地表现出农家乐的图景。遗址中还有许多兽类、鸟类和水生动物的骨骼，还有成坑的橡子、菱角和芡实等，说明渔猎和采集经济也很发达。这一切使得河姆渡文化有条件得到充分的发展。

在这个时期，华南的经济仍然以渔猎和采集为主，广西南宁地区的顶蛳山文化是研究较好的，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个文化的聚落多数是分布在西江及其支流沿岸的贝丘遗址，其典型遗址为邕宁县的顶蛳山第二、三期。遗址位于八尺河和清水泉的交汇处，东部临水为住地，中西部为墓地，共发现有 149 座墓葬，以各种形式的屈肢葬和肢解葬为主，还有华南特有的蹲踞葬，是同类聚落遗址中较大的一处^①。遗址上堆满各种螺蛳等水生贝类的介壳，还有许多陆生动物的骨骼，可见其经济是以渔猎和采集为主，没有发现农业的痕迹。华南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只是还有不少洞穴遗址。

总之，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由于农业的初步发展，出现了有一定规模的定居聚落，其结构多是凝聚式和向心式的，有些聚落内部也是有分划的。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在黄河流域和东北南部多以旱地农业为主的聚落，规模一般较大，房屋多采用地穴式或半地穴式；长江流域多以水田农业为主的聚落，规模较小，房屋多采用地面式或干栏式建筑。而华南多以渔猎、采集为主要经济的聚落，规模更小。其他地区的情况现时还不大清楚。

新石器时代晚期大约为公元前 5000 年~前 3500 年。这时在黄河流域除仰韶文化前期遗存外，还有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前期，东北南部的红山文化前期，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等。仰韶文化前期的情况已于前述。大汶口文化前期的聚落以山东长岛县的北庄遗址保存较好，并且进行过比较全面的发掘^②。这个遗址位于大黑山岛的东部海岸边，发现的房屋约有 100 座，分为南北两群，西边是墓地，其中有 2 座较大的合葬墓，均被较晚的灰坑打破，残剩人骨分别有 39 具和 54 具，如果不被破坏，原先的人数还要多些。除了房屋没有围成圆圈，其他方面包括房屋建筑的样式和埋葬习俗等都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聚落形态相似，反映的社会形态也应当相似。大汶口文化前期的其他聚落遗址虽然没有进行大面积发掘，但从其规模和出土遗物来看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有个别遗址出现了初步的分化现象。例如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等：《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 年 11 期。

^②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山东长岛北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 年 5 期。

泰安大汶口遗址便是如此。在这个遗址的第二、三次发掘时发现有大汶口文化前期的墓葬 46 座，分为 4 组，其中有的墓规模较大^①。例如 M2005 葬一成年男性，随葬器物 104 件，还有猪颌骨和牛头骨等；M2009 为成年男性，随葬器物 80 件；M2019 为成年男性，随葬器物 96 件；M2007 为一 6 岁左右的小孩，随葬器物也有 39 件，另外还有猪骨和猪蹄等。另外一些墓则只有很少的器物，表明聚落内部已经发生贫富分化。而且在整个大汶口文化前期的遗址中，像大汶口遗址的只有一处，其他都是比较小的墓葬，说明这时聚落之间也已发生初步的分化，中心聚落已经初步形成。但是大汶口同时存在着几座同性合葬墓，这又和仰韶文化前期的情况基本相同，而有别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情况。

关于大溪文化的聚落目前还研究得很不够。湖北境内的枝城红花套、枝江关庙山、京山屈家岭和江陵朱家台等遗址都发现了大面积的被火烧毁的房屋遗迹。其中关庙山曾经发掘出十多座房子，一般为地面建筑，平面为方形或长方形，面积从 30 到 60 平方米不等。湖南澧县城头山更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城址^②。该城基本上呈圆形，内部直径约 300 多米，面积约 8 万平方米。始建于大溪文化早期，中晚期又加高加厚一次。环城有壕沟，直通外河。壕沟内曾经发现船桨、船艄和大量有机物遗存，其中包括竹席、苇席、稻谷、豆荚、瓜类、菱角和许多种类的植物种子。城内有房屋、墓葬、椭圆形祭坛和制陶作坊等。这个制陶作坊有 8 座陶窑、多条取土坑道，还有许多储水坑和泥坑等，是这个时期所见最大的制陶作坊。墓葬中有个别较大的，随葬玉器和 30 多件陶器，明显不同于一般墓葬。可见这个聚落内部已有分化，而它本身又是地方性的中心聚落。

这个时期其他地方的居住址发掘较少，墓葬发现较多，其所反映的情况大致与仰韶文化前期、大汶口文化前期和大溪文化相似，这里就不多说了。

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大约相当于公元前 3500 ~ 前 2600 年。这时在一些遗址中发现有极少量的小铜器或冶炼铜器的迹象，与典型的新石器时代已经有所不同，所以划入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属于这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在中原为仰韶文化后期已于前述，在黄河上游为马家窑文化，黄河下游为大汶口文化后期，东北南部为红山文化后期和小河沿文化，长江中游为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早期，长江下游为良渚文化前期，广东有石峡文化等。前一时期表现于个别聚落的微弱的分化现象，这时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事了，

^①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 年。

^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 1997 ~ 1998 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 年 6 期。

其突出表现是中心聚落和古城的出现。

大汶口文化后期的居住遗址至今知道得很少，安徽蒙城县尉迟寺是唯一经过较大面积发掘的遗址^①。这个聚落平面呈椭圆形，南北约 240 米，东西约 220 米，周围有壕沟环绕。房屋大多集中在北部，全部是分间式的，每座有二间、四间、五间或六间不等，大致构成两大排或两个大的单元。西边只有几座两间一套的房子，南边也有五间的长房。整体布局是有主体、有区划而又基本保持凝聚式的结构，与仰韶文化前期的聚落有所不同。类似的多间式房屋多见于中国南方和北方之间的过渡地带，位于汉水流域的河南淅川黄楝树和下王岗、邓州八里岗、湖北襄樊雕龙碑等都有相似的建筑，其所以如此，可能是受到南方干栏式长屋的影响。

墓地发现较多，整体情况还比较清楚。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等级，最高等级就是第一次发掘的大汶口墓地^②。已经发掘的 133 座墓葬可以明显地分为大中小三类，少数大墓有较大墓坑，有木椁和较多的随葬品。例如 M10 的墓坑有 13.5 平方米，有棺有椁，随葬器物 180 多件，其中有玉钺、玉镯、玉指环、象牙梳、象牙雕筒、绿松石项饰、鳄鱼鳞板、猪头和大量精致的白陶、黑陶和彩陶器皿，单是陶瓶就有 38 件之多。鳄鱼鳞板一堆有 84 片，可能是蒙鼓的鳄鱼皮的残余物。这种鼓古时称为鼉鼓，《诗·大雅·灵台》：“鼉鼓逢逢，矇瞍奏公。”这鼉鼓是周文王所造灵台上使用的乐器，是高级贵族享用的物品。中等墓占绝大多数，随葬 20~40 件器物不等。小墓也很少，有的随葬一、二件质量很差的器物，有的一件器物也没有。可见大汶口聚落内部的分化是很明显的，而作为整体，它在大汶口文化中是最突出的，是整个文化的中心聚落的墓地。第二等级的墓地有曲阜西夏侯、莒县陵阳河与大朱村、诸城前寨等处，其中每个墓地内部都有明显的分化，少数为较大的墓葬，而多数为小型墓。大墓中随葬物品相当丰富，但是缺乏像大汶口大墓中那些高档的物品，在级别上只相当于大汶口的中等墓，应该是次中心聚落的墓地。其余大多数墓地中基本上都是小型墓，内部分化不明显，应该是一般聚落的墓地。由此可见，大汶口文化后期的聚落形态已经形成为金字塔形，表明这时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目前关于红山文化的居住遗址也不甚清楚，但是从墓葬等资料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金字塔式的结构。那里最高等级的中心遗址是位于凌源、建平两县交界的牛河梁，它是由祭坛、庙宇和积石冢等将近 20 个地点组成的宗教圣地和贵族坟山^③。其中第二地点中间为直径 22 米的圆形祭坛，东西两边各有两个长方形积石冢，坛和冢都砌成三级台

① 王吉怀：《尉迟寺聚落遗址的初步探讨》，《考古与文物》2001 年 4 期。

②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 年。

③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7 年。

阶，周围都竖立成百件彩陶筒形器。每个积石冢中间有一座大墓，有的在大墓埋好后又埋若干石砌的小墓，工程浩大，蔚为壮观。牛河梁最引人注意的是在接近梁顶的“女神庙”，包括庙北的巨大平台和周围的窖穴。庙址尚未发掘完毕，仅表面清理就发现有大约属于6个个体的女神塑像。其中小的有真人大小，大的还要大两三倍。这样以“坛庙冢”相结合的巨大遗迹群，在中国史前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当时的社会没有产生掌握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和宗教大权的贵族阶层，营建这样巨大的工程是无法想象的。在红山文化中，类似牛河梁的积石冢在辽宁阜新、朝阳、北票、喀左及河北平泉、内蒙古敖汉旗等有多处，但多只一个石冢而没有坛庙，应该是一些次中心的地方贵族的坟墓。在它们的下面是大量的普通聚落，仅敖汉旗就有500多处。

这个时期社会的变化在长江流域的文化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已经普遍地出现了土城遗址，其中湖北有天门石家河、荆门马家垸、江陵阴湘城、石首走马岭等，湖南有澧县鸡叫城和城头山，后者是在大溪文化古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各个土城的规模差别较大，小的7万~8万平方米，中等的约20万平方米，最大的石家河有120万平方米^①。后者不但规模巨大，而且发现有多处宗教性遗迹，出土数百件大陶缸或白、成万件可能是做法事用的红陶杯、上万件陶塑动物和陶偶。陶缸上刻划着像是图画文字的各种符号。这些在别的遗址都是从来没有见到的，足以证明它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中是地位最高的中心聚落，而其他城址和某些规模较大的遗址如京山屈家岭等当为次中心聚落。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因为出土数量极多的精美玉器而闻名于世，但是它的发达程度绝不仅仅表现于玉器一个方面。这个文化的中心聚落在浙江余杭的良渚遗址群^②，它是以莫角山城址和礼制性建筑基址为中心，兼有反山、瑶山和汇观山等祭坛和贵族墓地连同100多处遗址在内的巨大遗址群。其规模之大和等级之高，在同时期诸遗址群中无出其右。至于上海福泉山、江苏吴县草鞋山、昆山赵陵山、江阴高城墩和武进寺墩等处也都有人工筑成的大型土台和贵族大墓，并且出土不少玉器等高档物品，应该是属于次中心聚落的。普通聚落的墓地，如最近在浙江桐乡新地里所见者，当是良渚社会最基层的遗留。

这个时期社会分层的情况甚至在岭南也能够看得出来。例如广东曲江县的石峡遗址就应该是一个中心聚落遗址，内部也有明显的分层现象^③。在发掘区的北面、西面和南

① 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② 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徐湖平主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③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7期。

面都有房子，基本上围成一个方框，中间是一个大型墓地。北面的房子有9米进深，长45米还不到头，不像是一般的居室而可能是某种礼制性建筑。墓地里面明显有大墓和小墓，有的大墓出土玉钺、石钺和100多个石箭头，还有许多陶器，可能是军事领袖。目前在华南这种规格的遗址还只有石峡一处。

总之，铜石并用时代早期是聚落形态普遍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也是普遍走向文明化进程的时期，只是各地表现的形式不同，文明化的具体内容也有差别。同时各地文化发展的水平也不尽一致。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就还看不出明显分化的迹象，至于西南、新疆和东北北部基本上还是狩猎—采集经济，更谈不上聚落的分化与社会变化了。

如果说在铜石并用时代早期聚落的变化和文明化的进程是比较普遍的大范围的，那么到铜石并用时代晚期似乎发生了一种战略性的转变。前一时期比较发达的长江流域和东北南部此时似乎走入低谷，而黄河流域则比较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个时期的城址和特大型遗址多发现在黄河流域，例如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有300万平方米，其墓地估计有1万座墓葬，是全国史前墓地中规模最大的一处^①。在已经发掘的1000多座墓葬中，将近90%的小墓几乎没有任何随葬品，不到1%的大墓不但有木椁，还有鼍鼓、特磬和龙纹盘等高级贵族才能拥有的物品随葬，连同其他物品在内一座墓可以随葬一二百件。处在二者之间的中等墓大约占10%。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金字塔结构，表明陶寺聚落的阶级对立已经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这是在山西南部情况，在河南似乎没有那么突出。赵春青曾经专门研究作为中原核心的伊洛—郑州地区史前聚落演变的情况^②，在铜石并用时代的主要变化是：1) 城址数量显著增加，有的城址建设的比较讲究。例如淮阳平粮台有门卫房和用陶水管铺设的地下水道。新密古城寨的城垣夯筑技术是同时期最高的，至今耸立于地上的墙体还有15米高。但这些城址的规模都远不如陶寺那么大，看不出有哪一个超出其他城址的唯一中心；2) 由于发明了水井，在离开天然水源较远的地方也可以建立聚落，于是人们大举向平原迁移，聚落数目也大为增加。聚落的分布形成大小不同的、似乎有主从之分的群体；3) 墓葬至今发现很少，而乱葬坑随处可见，还有用人同牲畜一起奠基或用作祭祀的情况。这些同样反映了阶级的对立和社会的重大变化，只是表现形式和山西南部有所不同罢了。这时在山东也发现了许多城址，规模同河南差不多，只是建筑技术略逊一筹。山东发现了不少墓地，其中临朐朱封的3座大墓墓坑各有27平方米左右，有棺有椁，有的是两椁一棺，还有置放器物的边箱和脚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

② 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箱，其规格又远远超出陶寺大墓，也许可以算是王者之墓了。

这时在长江流域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中游的石家河文化晚期虽然没有从前那种恢弘的气势，但也不是没有进步。例如肖家屋脊一座瓮棺中就随葬了56件玉器，其中有雕刻十分精致的人头像和虎头、飞鹰与蝉等^①，这种情况在黄河流域也是少见的，只有山东龙山文化的大墓差可比拟。下游的良渚文化到晚期似乎衰落了，但是最近在浙江西南部遂昌县的好川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墓地，其中的大墓规格仍不很低。至于长江上游的四川，最近也发现了以新津宝墩为代表的一系列古城址，说明这时四川盆地文化的发展基本上赶上了长江中游前一时期的水平。

以上就是中国史前聚落发展演变轨迹的基本轮廓，同14年前勾画的轮廓相比已经清晰得多了^②。它说明农业和某些特殊手工业的发展如何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聚落的演进。从新石器时代早期数量稀少的很小而又不甚稳定的聚落，演进到中期较多较大而又相对稳定的聚落；从中期凝聚式和向心式聚落演进到晚期的凝聚式和内部有区划的内向式聚落；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个别中心聚落的出现到铜石并用时代早期一大批中心聚落和城址的涌现，再进一步某些级别较高的城址就向都城转变，它是夏商周大型都城级聚落的前奏，从而为中国早期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聚落的具体形态也不相同。首先是南北的差别，其次是各大文化区的差别，加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同程度的文化交流与碰撞，造成了非常复杂的情况，但是基本的演变轨迹还是相似的。

中国史前聚落考古虽然有不小的进展，但是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近年来一些地方注意了小区的聚落考古研究，例如内蒙古中南部的岱海周边的聚落考古，揭示了从仰韶到龙山各个时期的聚落形态及其演变的轨迹，并且与小区的环境考古研究结合起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③。事实上现在有不少遗址的发掘都是在聚落考古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有些还是以小区为单位的聚落考古研究，例如石家河遗址群和良渚遗址群的考古规划与研究，湖南澧阳平原史前遗址的考古研究和安徽尉迟寺及其周边遗址的考古研究等都是如此。要深入开展聚落考古研究，还需要多种学科的有效合作，在这方面现在也有不少进展，但今后还需要作更大的努力。一些聚落考古的著作已经陆续出版，除了前举赵春青的著作外，还有钱耀鹏关于史前城址的研究^④，许宏关于先秦

① 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296~298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② 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③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④ 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城址的研究^①等多种。关于聚落考古方法论的研究也有一些^②，毕竟还是凤毛麟角，今后应该大力加强。相信随着整个考古学科的发展，中国史前聚落考古的研究会有新的更大的发展。

（原载《二十世纪的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①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② 严文明：《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年；张忠培：《聚落考古初论》，《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1999年。

聚落演变与中国早期文明

2000年7月，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成立。按照规定，中心的学术委员必须有三分之二的校外学者参加，研究人员也必须由校内外学者共同组成。研究课题应能反映学科发展的前沿状况和当前备受关注的话题。我们经过研究，确定把“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作为中心开展研究的第一个课题。之所以选择这个课题，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越来越成为考古界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不少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或视角进行了研究，但多是从某个重要发现或某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探索，认识颇不一致，从全局进行的综合性研究不多也不够深入。作为一个号称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的机构，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课题。二是现在的研究多是由个人分散进行，在资料 and 认识上不免受到一些局限。研究中心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特别提倡吸收其他单位的相关学者共同进行研究。而本课题恰好是最适合用这种方式来进行研究的。

本课题由我和赵辉主持，先后邀请了郭大顺、田广金、栾丰实、杨建华、张弛、孙华、韩建业、魏峻和秦岭等学者参加。他们之中有的是在考古学领域颇有建树的知名学者和领导者，有的是十分优秀的年轻学者，对聚落考古和文明起源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2000年7月16日，课题组在研究中心召开第一次会议，初步讨论和研究了本课题的设想、基本思路和大致结构，并且做了初步的分工。2001年10月15~23日，课题组成员赴山东考察了城子崖、西朱封、桐林、陵阳河、大朱村、丹土村、两城镇、东海峪等一系列史前聚落和早期城址，顺便对课题进行的情况交换了意见。接着又于2001年12月11~13日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到会的除本课题成员外，还有来自日本、韩国、美国、以色列和国内对本课题有兴趣并有所研究的学者。这次研讨对本课题的推进提供了不少启示和帮助。2002年11月25~27日，课题组在北京陶然宾馆召开讨论会，各人汇报了初稿完成的情况和主要内容，并且进行了认真而比较深入的讨论。我把课题的基本要求再次作了说明，并且把下一步的工作做了部署。2003年虽然基本结项了，但还有一些部分需要进行加工和修改。大家都很忙，只能断断续续挤时间来做，这样一拖就是几年。现在终于可以付梓了。在课题进行的过程中，因为田广金生

病，他负责的项目只好全部由韩建业承担。更不幸的是他竟然抗不过病魔的折磨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让同仁们感到十分悲痛。

从考古遗址分析出各种形态的聚落，又从各种形态的聚落分析出各种形态的社会单元和社会结构，再从聚落形态的演变探索社会形态的演变，就是聚落考古的研究方法，也是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分支之一的社会考古学的首要任务。1928~1935年安阳殷墟的发掘便开启了聚落考古的先河，但那时还没有自觉进行聚落考古的理念。1954~1957年西安半坡的发掘明确提出从聚落形态分析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形态，但田野考古方法不过关，分析不得要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先是苏秉琦先生提出划分文化区系类型的理论并得到广泛的响应，使中国史前考古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史前文化是多元的，各个地方的文化都有自己的起源和自己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同时各个地方之间又是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从而逐步形成一种多元一体的格局，为之后中华文明的发展和特色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这种研究基本上还是属于文化历史范畴的，如果要进行社会历史范畴的研究，还得有新的理论和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聚落考古。这一点现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了。不过用聚落考古的方法研究社会历史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前提或基础，那就是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梳理。如果连文化历史发展的脉络都没有弄清楚，又如何研究社会历史的演变呢？很明显，只有在文化历史的研究取得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才有条件进行社会历史层面的研究。这正好说明为什么聚落考古理念的产生虽然很早，却要等到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情况下才得以较快地推行起来。

按照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梳理出来的时空框架和文化谱系来考察聚落形态的演变情况，很容易看出聚落由小到大，由差别不大到等次分明，由最初中心聚落的出现到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它反映一般社会发展的前进性和阶段性。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聚落演变和文化的发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有时文化上是延续的，聚落形态却发生了变化；有时文化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而聚落形态并没有随之发生变化。如果从较大的范围来进行分析，就会看出各地聚落的特点和演变轨迹都有明显的差别。这里有自然环境和经济类型等方面的原因，有历史文化传统的作用，有来自不同文化的影响，还有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等等，情形是很复杂的。这只有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并且在广泛比较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某种带规律性的结论。

在20世纪50年代之末到80年代，学术界通过对墓地和墓葬埋葬制度的研究来探讨社会性质和社会组织结构做了许多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也走了一些弯路。从80年代开始才把注意力集中到对整个聚落的研究，包括房屋形态和功能的研究，单个聚落形态结构的研究，墓地与聚落关系的研究，聚落分布与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聚落

形态演变的研究等等。由于这类研究的开展，便把从 80 年代开始的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热潮迅速地纳入一条全新的正确轨道。由于各地考古工作很不平衡，这类研究的内容和认识的深度自然会有较大的差别。无论如何，这样的研究方法比起那种从概念出发，先问什么是文明，再找一些文明的标志来对号入座的方法会更加切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本收的研究方法是首先对全国的几个主要文化区分别进行文化区系和聚落形态演变的研究，然后对各区文化进行比较和必要的概括，以期得到一些基本的认识。还特地与西亚地区做了初步的比较。因为那里的聚落考古和文明起源的研究是做得比较好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了保持各人研究的特点，在某些概念和表述方式上不强求一律。这样每一篇都可以看作独立的论文，全书又基本是一个整体。我们深知自己的工作还很有限，认识也难免有些肤浅。因此本书的出版自然不是为了提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主要还是想探索一条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正确的道路。希望以此得到学术界同仁们的指教。

（本文为《聚落演变与中国早期文明》所写的序言，该书即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长江中下游史前聚落的考古研究

在我国史前考古研究中，长江流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影响东方世界大部分人口食物构成的稻作农业就是首先在这里发生和发展的；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物质文化产品，诸如丝绸、漆器等也是首先在这里发生和发展的。近年的考古发现证明这里还是陶器起源的重要地区，至少是最早发明陶器的地区之一。玉器的发生也许不是最早，然而一开始就自成体系，发展到良渚文化时期，其水平在全国已经遥遥领先，并且对夏商周时期的玉文化有十分深刻的影响。至于稍后发展起来的四川广汉三星堆、湖南宁乡黄材和江西新赣大洋洲等青铜文化以及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的许多重要发现，在学术界更是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以至于不得不把长江流域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来加以审视，甚至重新考虑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态势的传统认识。

要了解长江流域文明的起源，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从新石器时代聚落演变及其所反映的社会与经济形态的变化入手。而要弄清楚聚落演变的情况，又必须首先弄清楚文化发展的谱系或区域性发展系统。在本书写作时，长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还十分有限，即使到现在也还是很不充分，所以暂时以中下游为限。

现在知道长江中下游大致有两个比较稳定的文化区系和三个中间地带或亚区系。以两湖区为主体的长江中游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有城背溪—彭头山文化，继之而起的依次是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后者已然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而在城背溪—彭头山文化之前，还有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仙人洞一类遗存和湖南道县玉蟾岩一类遗存。现在还很难说它们就是城背溪—彭头山文化的直接前身，但至少是后者的源头之一。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分布范围已经很大，对周围文化发生了强烈的影响，是一个仅次于中原文化区系的强势文化区系。以环太湖区为主体的长江下游区，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马家浜文化，其后依次发展为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谱系清楚，发展水平高，对周围文化也有强烈影响。只是在当地没有发现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渊源至今还不清楚。比马家浜文化同时或略早的河姆渡文化和跨湖桥遗存似乎不属于同一系统。在这两大区系之间，就是本书所讲的赣鄱区和苏皖区，在某些时段的新石器文化也比较发达，但受到周围文化的影响较

大，至今还看不出一个清晰而稳定的自身发展的谱系，其地位大约只相当于两大区系之间的中间地带或文化亚区。至于长江中游偏北的南阳盆地、襄樊谷地和随枣走廊，新石器文化也相当发达。因为紧邻中原文化区，南北影响不时发生此消彼长的情况，没有一个稳定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谱系，因而难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而只不过是两大区系之间的中间地带。现在看来，长江中下游各区系文化的发展虽然有不平衡的现象，但大致是同步的。按照本书的划分方法，可以分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前段、晚期后段和末期五个连续发展的时期，只是有些地方暂时还没有发现早期和中期的遗存罢了。

与文化区系的研究相比，聚落考古研究的难度要大得多。加以起步较晚，取得的成果自然有限，但绝不是无足轻重，而聚落考古的重要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说聚落考古研究的难度比较大，这在任何地方都是适用的，但长江中下游的难度也许更大一些。因为长江中下游是我国河流和湖沼最密集的地方，加上从第四纪以来的新构造运动的影响，使一些新石器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洞庭湖在更新世晚期即逐渐抬升，到全新世早期已经变成河湖交错的大平原，成为新石器时代居民开发稻作农业的首选地带，留下了许多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聚落遗址。可是后来这里又下沉为汪洋大湖，号称八百里洞庭，其中尤以东洞庭湖下沉最快。如果不是围湖造田，那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就很难发现。又如江汉平原湖泊极多，以至它所在的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的美誉。其中有些湖也是下沉的，加以江河不时泛滥，不少河湖边的遗址就被淤积到很深的地层中，不是疏浚河道就难以发现。同样太湖及其周围的湖泊水网地带也有这种情况。江苏澄湖里面发现大量良渚文化及较晚时期的水井即是一例。即使聚落遗址没有被淹没或淤积，一些较低的遗址后来很可能被辟为水田，那也就难以发现了。所以在长江中下游的许多地方，即使经过仔细调查，可能发现的聚落遗址也会比实际存在的遗址要少，有的地方可能要少得多。这为聚落考古的研究造成了不小的困难。不过话又说回来，地面的下沉或被晚期沉积物覆盖也有利于遗址的保护。特别是一些沉入水下或潜水面以下的遗址，由于隔绝了空气，许多有机物得以保存下来。例如浙江的河姆渡、罗家角，江苏的圩墩，湖南的八十垱、城头山和湖北的阴湘城等处都有这种情况。河姆渡和八十垱有些七八千年以前的稻谷还呈现金黄色，城头山的豆荚和小葫芦瓜等还能保持完好的外形和内部结构，河姆渡有保存极好的干栏式建筑的木构件，数量达几千根之多。这样就为聚落内部各方面的设施和生活状况提供了远比一般遗址要清晰得多的信息，这在别的地区是非常罕见的。毕竟几十年来在长江中下游进行的大量考古工作，还是积累了不少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研究的资料。对于少数聚落的结构和性质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有些聚落虽然没有全面勘察，但对其某些功能区还是作过比较详细的发掘和研究；再加上更多聚落遗址的局部或片段的资料，便可以大致勾画出新石器时代

聚落演变的轨迹和区域性特征，进而探讨聚落演变的动因，以及在演变过程中各区域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种种关系，揭示出长江中下游走向文明的曲折进程。本书正是在这些方面做了相当深入而透彻的研究。

本书作者张弛是国内较早注意聚落考古方法的学者。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整理青海民和阳山半山—马厂期墓葬^①和撰写关于半山式文化遗存分析的硕士学位论文^②，就已经运用了聚落考古的某些分析方法。后来与赵辉合作对湖北天门石家河聚落遗址群和城址进行的全面考察^③，更是运用聚落考古方法的成功范例。他还参加了中美合作的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的发掘，对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有实际的了解。之后又多年参加和主持了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的发掘和周围地区的调查，对当地仰韶文化的聚落形态又获得了不少新的认识。最近他还应邀参加了湖北宜都（现属枝城市）红花套大溪文化时期石器制造场资料的整理。同时他历来比较注意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钻研，对国外有关方面的研究情况也比较熟悉，是最有条件对长江中下游聚落演变进行综合研究的。因此在攻读在职博士生期间，很自然地便选择了这方面的内容作为学位论文的主题。论文答辩时获得了好评，后来又被推荐为优秀博士论文并准备正式出版。为了使内容更充实一些，论述更扎实一些，作者在出版前又做了较大的修改，于是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 尽量详细地占有资料，而且对所有资料都进行认真的鉴别与分析。论述力求实事求是。绝不作没有根据的臆测或纯主观的所谓复原。

(2) 充分尊重已有的研究成果和他人的意见，文化的分期命名等一些看似分歧很大的意见，首先注重实质内容的分析，名称上尽量采用比较通行的说法或保留几种说法，决不标新立异，以至于徒增混乱。

(3) 微观与宏观研究紧密结合。微观分析力求其深，宏观把握力求其准和适度。微观研究时不忘宏观把握，宏观研究时又充分利用微观研究的成果，这样处理问题就能够做到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既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地钻牛角尖，又不是粗浅一瞥就大胆地创造体系。

以上三点其实是任何学术著作都应该做到的，只是在当前学术界充满浮躁空气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这样就显得特别可贵。

(4) 书中对墓地和居址的分析，既注意二者有联系和相同的一面，又注意二者之

①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民和阳山》，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② 张弛：《半山式文化遗存分析》，《考古学研究（二）》，文物出版社，1994 年。

③ 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年。

间的区别。因为前者是现实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反映，后者既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又是观念形态的产物，在社会关系上比较强调家族—氏族的血亲关系。作者从房屋的大小、结构和内部设施（在某些偶然情况下保存下来的）以及房屋与房屋之间的关系推断各个时期的家庭形态和社会组织状况，再同墓地的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对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各个时期的社会组织状况及其演变的轨迹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考察。

(5) 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也许是对区域经济的分析以及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的分析。作者把经济区分为以采食经济为主的生业经济和手工业与贸易经济两大门类，而两者的发展又是互相关联的。大致说来，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了农业，但生业经济的主要成分还是来自于狩猎、采集。新石器时代中期以稻作为主的农业有显著的发展，以至在两湖区出现了众多的比较稳定的聚落。狩猎、采集经济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是主要的地位。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在整个长江中下游都有很大的发展，各地的环境和资源不同，因而经济发展的重心也有所不同。除了峡江地区以外，各地区的生业经济中农业大概都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尤以两大文化区系中心的两湖地区和环太湖地区最为突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对于新型石器的需求显著增加，而恰巧在两湖区和环太湖区比较缺乏制造石器的原料。与此相反，在峡江区土地狭窄难以发展农业，主要生业经济是捕鱼和狩猎，季节性强，不能满足全年的需要。而石器原料特别丰富，于是出现了大批石器制作场，用石器成品与两湖区进行互惠贸易。苏皖区也有比较丰富的石器和玉器原料，那里也有农业但不十分发达，所以较大规模地发展了制造石器和玉器的工业，除本地消费外，还与太湖和其他地区进行互惠贸易。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在两湖和太湖地区出现了较大的贵族集团和权力中心，他们打破了资源和技术分布的自然状态而实行强力控制，使当地的经济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专门为贵族消费的玉器、漆器、丝绸、精致陶器等高档物品的产业和大规模的土建工程。峡江的石器工业和苏皖地区的石器、玉器工业都陷于萧条。这时期互惠式贸易还会存在，而贵族消费品的流通则可能采取再分配的形式，产品流通的路线也跟以前大不相同，流通范围也有所扩大。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复杂化，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一样露出了文明的曙光。但在此后的一个时期，黄河中下游加快了文明化的步伐并且大举向南扩张，长江中下游则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原因，其中可能包括有对环境变化的不适应和北方势力南下带来的巨大冲击，或快（下游）或慢（中游）地走向衰落。不过时间并不很长，到商代就逐渐发展起来，接着出现了高度发达的楚文化、吴越文化和上游的巴蜀文化，与黄河中下游一起成为中华古代文明的主体和最发达的地区。书中引用了大量数据来说明这一跌宕起伏的历史过程，分析入丝入扣，有很强的说服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聚落考古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已成为大家关注的重

要内容。而究竟怎样进行聚落考古，田野工作应该怎样做，有关资料应该怎样分析，并不是大家都熟悉的，需要有一些比较成功的范例作为参考。石家河遗址群的调查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但只限于一个遗址群。由张弛的博士论文修改、充实而成的这本书，将是对大范围的聚落演变进行综合研究的重要著作，对于我国聚落考古研究的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003年3月30日于北京阜外医院

(原为张弛著《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序，文物出版社，2003年)

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演变的研究

近年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地的考古学研究中，位于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同时在海岱地区、两湖地区、川西平原乃至陇东山地也都有十分重要的发现而为大家所瞩目。相比之下，一向被人们所特别关注的中原，特别是作为中原核心的伊洛—郑州地区，反而显得不那么突出。这种情况使得许多人对于中国文明究竟是不是从中原发源的产生了怀疑，觉得有必要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于是多元论或多元一体说应运而生。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由此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发生发展进程的复杂性开始有了崭新的认识，因而也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但如果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为中原在中国文明发生期仅仅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那也绝不符合事实。中原不但有特殊优越的地理位置，而且有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远的不说，至少从七八千年以前的裴李岗文化起，这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就一直是比较发达的，在与周邻文化的关系上从来不是处在消极的一方。在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期还曾经对周围地区的文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此后社会即发生明显的分化。直到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当燕辽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史前文化相继走入低谷，而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也进展迟缓的时候，黄河中下游的史前文化则继续快速向前发展。接着位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在与东方夷人的长期斗争中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奠定了夏商周文明的基础，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要探讨夏商周文明的始原，固然不能局限于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有必要拓宽视野，看看周边文化发生过什么影响，起过什么样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要看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究竟是如何在与周边文化发生这样那样关系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时代，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中原核心的伊洛—郑州地区是我国考古工作开展得最早的地区，历年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甚多。当一些人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关系的认识还很模糊的时候，1954年洛阳孙旗屯的发掘，首次提出了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问题。1959~1960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在洛阳地区进行田野考古基础实习，大规模地发掘了王湾遗址，同时在伊河和洛河两岸开展了广泛的调查和试掘。之后又进行过两次专题实习，对个别重点遗址进行了复查和试掘。几次实习的资料极为丰富。当仰韶文化被划分为半坡

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为时不久，对两个类型孰早孰晚还争论不休的时候，我们却在进行更加细密的文化分期和研究发展谱系的工作。经过初步整理，我们认识到那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自成体系，从仰韶到龙山至少可以分为八个时期；如果细致划分甚至可以分到十期以上，发展脉络十分清楚。可惜这批资料至今没有整理发表，以至于学术界难以充分利用。不过从探索文明起源的要求来说，仅仅是文化分期和谱系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它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而更重要的还是要弄清楚直接反映社会发展状态的聚落形态的演变。这方面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也还是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从大河村、裴李岗和王城岗等遗址发掘以来有了明显的进展，同时也发表了一些聚落形态研究的文章。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没有发现像大汶口、牛河梁、良渚或陶寺那样高规格的中心聚落遗址，因而在估量某些较晚阶段的文化发展水平时难以做到准确的把握。二是缺乏全面而系统的综合研究，更缺乏在这种研究基础上进行的理论性探索。第一点需要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考古工作来验证，这不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其结果可能发现高规格的中心聚落遗址，也可能没有发现或根本就没有那样的遗址，从而表明其社会形态有其特殊的性质。究竟是哪一种情况，鉴于目前的田野考古水平，似乎还不足以作出肯定的判断。第二点是现在就可以做的，也正是我们想着手进行的，而赵春青则是最适合于担当这一任务的人选之一。所以在考虑他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时，很自然地选择了郑州—洛阳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演变与文明起源这样一个主题。

春青在大学毕业后曾经在洛阳地区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多年，对那个地区的情况十分了解。在北大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对于聚落考古的概念和作业方法也有所了解。他有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又有相当的研究能力，在学习期间就发表过多篇论文，其中有的与聚落考古相关。因此我们就把这个题目定下来了。在实际的操作中，第一步是收集资料，包括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前者主要是已经发表的田野考古资料和研究论著，后者则主要是分散在省、地、县各级文物考古机构和博物馆的藏品中。感谢这些兄弟单位和同行的无私帮助，使得这一任务得以顺利完成。第二步对现有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发现有些遗址的资料不够翔实，需要进行实地勘察。而聚落遗址的分布与演进，除了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以外，还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可是过去很少注意环境考古的研究，这次一定要补上一课。我们决定请第四纪地质与地貌专家夏正楷教授参加并进行指导。第三步是进行实地勘察。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与支持下，先后复查和勘探了100多个遗址，对一些重点遗址做了地形测量和详细的记录，有不少新的收获。春青曾经因为车祸受过伤，健康状况不算很好。可是他一到田野就像个拼命三郎，总想多调查一些遗址，多掌握一些实际情况。个别特别重要的遗址他还想发掘一下。我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但考虑到时间有限，目标不能定得太高，能够做出一个较好的阶段性成果就可以了。调查回来就进行第四步，就是研究资料，拟出提纲。可以有多种方法

来安排论文提纲，但既然是要讲聚落的演变，自然是以聚落形态的阶段性变化为主轴来安排较为适宜。我们发现如果按照裴李岗期、仰韶前期、仰韶后期和龙山时期四大阶段来划分，最能体现当地史前聚落的发展阶段和演变轨迹，又与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相一致，不啻为一种比较好的方案。考虑到伊洛—郑州地区至今还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缺乏一个农业聚落的萌芽时期。这是今后考古调查时应特别注意弥补的。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成套的农具已然出现，大体上已初步进入人们所说的锄耕或耜耕农业阶段，或者说是从刀耕火种农业向锄耕农业转变的阶段。当时已经有定居的村落，只是规模还不很大，且分布多在嵩山周围的山前地带。从一些墓地既集中又分片的情况来看，当时似乎存在着以氏族为基本单位的两级社会组织。

仰韶文化前期的农业有所发展。聚落数目显著增加，规模扩大。为着开辟新的农地，分布范围几乎扩及所有河旁阶地。尽管这时出现了一些较大的聚落，但房屋和墓葬都还没有明显的差别，有些地方还流行大规模合葬的习俗。从这些情况来看，当时的社会似乎还没有发生明显的分化。

如果说仰韶文化前期对周邻文化的影响是主导方面，而且十分显著的话，那么仰韶文化后期则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变，文化影响的主导方面倒过来了。郑州—伊洛地区也不例外。到处都可以看到从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和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传来的器物，一些房屋建筑的形式也受到南方多间式房屋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积极方面大致有二：一是造成了文化的复杂化和丰富多彩；二是外部的压力引起了内部的反弹，从而加强了自身的进取精神。个别城址和某些乱葬坑的出现等可以看做是这种反弹的表现。这时的工具和武器有了明显的改进，生产发展了，中心聚落更为突出，墓葬的大小差别显著。在多数小墓几乎没有随葬品的情况下，少数大墓用玉器和象牙制品随葬，数量尽管不多，毕竟显得有些特殊。这些大墓的主人应当是新生的氏族权贵，说明这时的社会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已经走上了文明化的道路。

龙山时期在郑州—伊洛地区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由于发明了水井，在离开天然水源较远的地方也可以建立聚落，于是人们大批地向平原迁移。聚落的数目大为增加，聚落的分布出现了大小不同的群体，而且似乎有主从之分。城址的数量明显增加，功能也发生了改变，有的似乎像个小小的都城，说明这时可能已是邦国林立。这时期的墓葬发现得很少，而乱葬坑随处可见，用人奠基或作为祭祀人牲的情况也时有发现。说明社会在剧烈分化，阶层或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尖锐化起来了。再进一步，便将发展到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早期青铜文明了。

以上便是从郑州—伊洛地区史前聚落形态演变的研究中得出的基本结论，也就是赵春青博士学位论文的主旨。论文在答辩中获得好评，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之后作者又做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并作为专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就是本书产生的

经过。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通过聚落形态的演变来研究中原地区文明的起源是一项关系重大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有许多人的长期努力。本书只是将已有的阶段性成果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加以综合和系统化，就此提出了一些看法。有些看法也不能认为是很成熟的，有些议论则显得套话过多而缺少新意。不过总起来说还是一次有益而成功的尝试，希望它既是过去研究的一个小结，又能够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作者本人也很清楚本书并不是任务的完成而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是一个既有抱负又不怕艰苦肯于脚踏实地工作的人。毕业后立即就读北大的博士后，全力投入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的发掘与资料整理。在那里除发现有许多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遗存外，还获得了一大批由龙山向二里头过渡的被称为新砦期的遗存，从而把中原地区文明起源以及夏文化的探索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希望春青继续努力，在这块大有希望的园地上做出更大的成绩。

（原为赵春青著《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垣曲盆地的聚落考古研究

通过考古调查来了解一定区域一定时期聚落遗址的分布及相互联系的情况，进而探讨它所反映的社会状况的工作，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渭水流域仰韶文化的调查，尤其是对西安附近渭水支流泾河和灞河流域的调查做得较为详细。但当时并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所以工作比较粗疏，用那样的资料研究聚落分布的状况及其演变轨迹，进而研究它所反映的社会实无可能，而且那些资料至今没有正式发表，无从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美国 G. R. 威利等人在维鲁河谷及其他地方进行聚落考古的方法被介绍进来，聚落考古的研究日益成为一些考古学者的自觉行为。不少学者通过实际的工作，从不同角度探索如何进行聚落考古的方法。例如北京大学、湖北省文物考古所和荆州地区博物馆在荆门石家河的考古工作，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岱海周围的考古工作，山东大学参加的中美考古队在日照两城镇一带的考古工作，吉林大学等参加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在赤峰地区的考古工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良渚遗址群的勘察研究工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河南洛阳等地的考古工作等，都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垣曲的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是这一系列工作的继续，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垣曲是山西南部的一个小盆地，也是黄河中游谷地的一部分。她像一个人的手掌，几条从中条山发源的小河就像手指汇聚到掌心，其中以亳清河和沇河较大，河谷两旁和盆地中央的遗址较多。通过多年的调查和本课题实施期间的扎实工作，共发现 85 处遗址，时间跨度从前仰韶的裴李岗文化到商代前期，可以划分为 10 个或 11 个文化期。不少遗址包含有几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单纯为一个文化期的遗址很少。各个文化期遗址的数目和规模差别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发展过程中起伏曲折的状况。据统计，属于裴李岗文化的聚落有 3 处，均在黄河南岸，规模都很小。相当于枣园文化的东关一期文化的聚落有 9 处，主要分布于盆地中。其中东关聚落最大，有 12 万平方米，1 万~4 万平方米的聚落也有几个，说明这时期文化比较发达，从文化面貌和分布区域看似不是裴李岗文化的继承者。仰韶文化半坡期的聚落只有 5 处，而且都很小，没有一个超过 1 万平方米的。这期文化不大像是直接继承东关一期发展而来，而更像是从陕西关中的

半坡类型迁移而来，或是在半坡类型的强烈影响下发生的。由于资料甚少，对其文化的全貌难以做出确切的判断，跟东关一期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不管怎样，这时垣曲盆地内文化的发展明显处于低谷的状态。可是到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期，文化的发展几乎呈现一种爆发式的状态。这时期的聚落多达39处，而且规模也大，9万平方米以上的聚落就有6个，最大的北堡头聚落竟达30万平方米。这种状况应该与整个仰韶文化的发展有关，不但垣曲盆地如此，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也是如此。到仰韶文化晚期的西王村类型，发展势头又有所减弱。聚落缩回到盆地中自然环境较好的地方，总数仅有26处，规模也有所缩小，最大的东关聚落只有14万平方米。到庙底沟二期文化则有所复兴，聚落增加到34处，规模也略有回升，最大的东关聚落有20万平方米。到中原龙山文化进一步发展，聚落多达38处，规模也更大了，最大的丰村聚落达30万平方米，龙王崖和东关聚落也都在15万平方米以上。到二里头文化早期又进入一个新的低谷，只有聚落6处，其中西关聚落还不到5万平方米。而到二里头文化晚期又有一个爆发式的发展，聚落多达41处，规模也略大，最大的丰村聚落有20万平方米，在古城南关建立了有围壕的核心聚落。到商代的二里岗文化又明显回落，下层时期只有12处聚落，上层时期只有10处聚落。不过商人在占领垣曲盆地后不久，就在夏人核心聚落的南关筑城。该城的面积有13万平方米，有考究的防卫和道路设施，有建立在夯土台基上的贵族官邸，成为商王朝控制下的一个重要的资源输送地和军事据点。总之，通过对垣曲盆地商代及其以前聚落遗址的全面考察，不但可以了解到当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及与周邻地区的文化关系，而且对各个时期聚落变迁及社会演进的状态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这正是聚落考古所应追求的目标。

垣曲盆地范围狭小，但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三点乃是观察当地文化发展与聚落演变的基本出发点。因为范围狭小，区域内的人口有限，自始至终就没有构成一个单独的文化区，而只是某个更大的考古学文化中的一个小区。因此文化的变迁不仅受区内自然环境和社群关系的制约，主要还受到更大范围文化变迁的影响。因为资源丰富，既适于旱地农作，也适于渔猎、采集，还有采之不尽的石材和木材，谁都觊觎这块沃土，所以常常表现为文化的更替而不仅仅是自身的发展与承袭。这种情况越到后来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就越发明显。因为中条山有丰富的铜矿，它是制造青铜礼器、兵器和工具等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这地方离夏商王朝的腹心地区又近，中央王朝必然会设法加以控制。同时垣曲盆地又是从豫西的郑洛地区通往晋南运城盆地和临汾盆地的交通要道，军事上也特别重要。所以盆地内二里头文化替代中原龙山文化，二里岗文化又替代二里头文化，其背后都反映了夏商王朝政治与军事势力的角逐与消长，目的在于争夺资源、控制军事重地和交通要津。

垣曲盆地聚落考古研究是已故好友俞伟超创导的。在他光辉的学术生涯中，总是不

忘考古学的目标乃是尽可能真实地探知人类社会的历史。为此他对于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国外同行有关的研究也十分关注，聚落考古的方法也是他关注的一个方面。他知道任何理论和方法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即使正确的方法也要在实际的考古工作中加以充实和提高。他培养了一支很好的队伍，既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又有锲而不舍的实干精神。从发掘垣曲古城和澠池班村到垣曲盆地的聚落考古研究，前后达20年之久，都是贯彻着这种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精神，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

垣曲盆地聚落考古研究历时四年，工作做得很细。首先有一个预设的目标和实施的计划，在工作中又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诸如垣曲盆地的特点是什么？如何根据这些特点来设定聚落考古的目标？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标？各种方法在运用中的效果如何等等，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在聚落考古开展之前，垣曲盆地已做过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年代序列。但因不是从聚落考古的要求进行的工作，所获资料有很大的局限。所以实施计划中首先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料，并且从新的视角重新整理这些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的调查和重点遗址的试掘。鉴于盆地及周边的地形复杂，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部进行小区调查中常用的拉网式方法。但对重点遗址不但进行拉网式调查，还结合钻探和断崖上暴露的地层与遗迹、遗物进行适当清理和采样，力求获得比较详细的资料。同时还请有关专家对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进行了考察，以了解不同时期的生态环境及人与自然的的关系。

报告在综合所有信息的基础上，考察每个时期聚落的内部结构，考察不同结构可能代表的社会组织的性质。同时考察聚落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现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聚落群，每个聚落群有一个中心聚落，此外还有少量不聚群的分散聚落。在行将进入文明社会的阶段，社会的组织化明显加强，出现了整个盆地的核心或大中心聚落，最后更出现了控制整个盆地的城堡。这种分析环环相扣，从聚落演变探索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有相当的说服力。不过历史留下的实物遗存毕竟是有限的，通过聚落考古的方法所能获得的信息更加有限。不管我们怎样优化理论设置和改进工作方法，都不免有疏漏和不准确的地方。正如报告所指出的，有的遗址调查了多少遍，都只发现了一两个时期的遗存，经过发掘却发现更多时期的遗存。所以仅仅根据调查而勾画出的聚落演变的蓝图，跟真实的情况还是有距离的。我们只有不断地提高理论水平和改进田野工作方法，才能不断地接近预期的目标。垣曲盆地聚落考古正是本着这一理念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工作中的探索精神和取得的成果都是弥足珍贵的，希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希望今后有更多聚落考古的新成果问世。

（原为《垣曲盆地聚落考古研究》序，科学出版社，2007年）

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的起源

近 20 年来一大批史前城址的发现与确认，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成就之一。由于这些前所未有的城址的发现，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向被视为原始氏族社会的这段历史，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研究与探索。这种研究与探索无论是对于考古学本身，还是对于城市史、文化史乃至社会发展理论的完善与发展，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史前城址已经有 50 多处，范围遍及黄河流域中下游和长江流域，所属年代有先有后。初步排比大约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即萌芽期和发展期。

萌芽期大约从公元前 4000 多年或更早一些时候开始，直至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其中最早的首推湖南澧县城头山第一期城址，年代属于大溪文化早期。稍晚一些则有湖北江陵阴湘城一期城址、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和山东大汶口文化的个别城址。这个时期的城址数量少、规模小，分布范围限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和长江流域中游，也就是在当时最发达的文化区中。其渊源可能追溯到此前已经比较发达的环壕聚落，而发生的原因自然还是社会内部的演变。

发展期大约从公元前 3000 年至前 2000 年，绝大多数史前城址都属于这一时期。由于数量多，分布面广，明显地形成了一些地方特色，具体年代也有先后，从而可以将其划分为若干组群，诸如湘鄂组群、江浙组群、四川组群、中原组群、海岱组群和内蒙古组群等。大致说来，长江中下游城址的年代比较早，最发达的时期在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早中期以及良渚文化早中期。一般有较大的环壕，水道常与外河相通，以利给排水与运输。城垣筑造技术比较原始，坡度较缓。各个城址的规模相差甚大，说明可能有等级上的区分。值得注意的是，当长江流域中下游的城址发展到公元前 2600 年左右时就相继衰败了，而黄河流域中下游城址则进入大发展的时期。一些城址的建筑技术明显比长江流域的城址为高，尤以中原地区最为突出。例如河南新密市（原密县）古城寨的版夯技术就十分先进，淮阳平粮台的城门两边有建筑得很好的门卫房和向城外排水的陶制地下管道等。有些城墙或城内的夯土基址用人牲奠基，说明这时的社会发生了更加

深刻的变化。而中原地区的突出发展便直接为以后夏商周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们一般认为城市的出现乃是文明和国家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所以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乃是中国历史走向文明化过程的重要时代，有的学者甚至主张当时便已进入初级文明社会。本书相当详细地探讨了这一问题。

本书的作者钱耀鹏在西北大学任教时即已关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为此他特别研究了尧舜禅让等传说史料，并且广泛收集了史前城址的资料，研究了城市起源与文明起源的关系。在准备博士论文时，我本来建议他写关于客省庄文化的内容，当我了解到上述情况后，随即同意以史前城址的综合研究为主题，从而顺利地完成了写作并且通过了论文的答辩。本书就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的修改与补充而完成的。它是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我国史前城址以探索文明起源的综合性著作，相信会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好评。

(原为钱耀鹏著《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序，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关于聚落考古的方法问题*

这次以新砦遗址考古发掘 30 周年为契机，举行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到会的学者 90 多人，来自全国的 30 多个学术单位及国外的学术单位，是聚落考古的一次盛会。以前关于聚落考古虽然也开过几次会，但规模都比较小。前不久在山东大学开了一次聚落考古与环境考古的国际研讨会，有不少中国和国外的学者参加。会议开得不错，特别在聚落考古与环境考古的配合和中外学者的交流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从国内学者参加人数之多和讨论问题之广泛来说，这次却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性会议。会议上的报告与发言，可以说是对我国聚落考古研究的一次全面性检阅，有些发言还对今后聚落考古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或设想，在我们国家如此大规模地讨论聚落考古还是第一次。会议开得很紧凑，气氛热烈，内容丰富，取得了圆满成功。

聚落考古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差不多是同中国考古学的发生同步，至少是前后脚的。20 世纪 30 年代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全面揭露了商代晚期都城的宫殿区和王陵区，还有 H127 那样大型的甲骨档案库和大批青铜礼器等极其丰富的文化遗存，本身就是聚落考古的一次大规模实践。那时对于安阳后岗三叠层的发掘和山东历城（今属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的发掘，也都是聚落考古的早期尝试。因为三叠层不仅是区分了小屯（殷代）、龙山与仰韶三个时期，还注意了各个时期文化遗存分布的不同范围，梁思永先生画的三个圈就说明那里至少存在着三个不同的聚落。城子崖挖的面积不大，却发现了城墙，根据调查又把城圈画出来了，那不是聚落考古的思维和实践吗？50 年代对陕西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华县元君庙和华阴横阵村等一系列仰韶文化村落遗址和墓地的发掘，以及对郑州商城的大规模勘探与发掘，也都是聚落考古的早期实践。半坡考古报告的标题就是《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已经注意通过聚落考察来复原社会组织。可惜没有注意考古遗址和聚落遗存的差别，分期工作没有做好，把不同时期不同聚落的遗存揉在一起，自然难以正确地复原不同时期的社会形态。70 年代以

* 本文为 2009 年 12 月 29 日在河南省新密市举行的“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暨纪念新砦遗址发掘 30 周年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会后做了修改。

来陆续发掘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和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首先注意了遗址的文化分期和不同时期聚落形态的全面揭示，获得了较好的效果。之后由于甘肃大地湾和辽宁牛河梁等遗址的发掘，发现其规模和规格明显高于同时期的其他聚落，于是提出了中心聚落的概念。随之龙山时代又发现了一些城址，我国主体地区聚落演变的轨迹便逐渐明朗起来，聚落考古又进了一步。回顾起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的几十年中，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只是没有从聚落考古的理念和方法上进行必要的分析和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聚落考古的理念和方法陆续被介绍进来。国内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也越来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而聚落考古对于研究社会形态及其演变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手段，于是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这次会议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二十多年来聚落考古的成果。会上的报告和发言有单个聚落的考古研究和不同类型聚落的比较研究，有聚落形态演变的研究；有发掘方法和调查方法的研究；涉及的聚落有北方温带半干旱区的，也有南方亚热带湿润区的，有平原地区的，也有山地的，还有海岛上的。经济形态上有以渔猎为主的，也有以农业为主的，后者又有旱地农业与水田农业之分。有一般村落遗址的研究，也有城址乃至都城级聚落的研究，还有区域性的研究，涵盖面非常广泛，只缺一项游牧聚落研究的案例。实际上西北大学以王建新教授为首的团队近年在新疆东天山一带做了不少工作，目的就是研究游牧民族的聚落状况。而游牧文化的考古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课题，又是一个难以突破和把握的课题，现在做出了初步的成绩，当然十分难能可贵。我们国家有将近400万平方公里的海疆，有五千多个岛屿，在辽宁、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和香港等地的一些海岛上都做过一些工作，但是没有很好的总结，今后要大力加强海洋文化的研究。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开展探索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项目，也就是所谓“探源工程”，聚落考古必然有更加广阔的用武之地。而要继续发展聚落考古，必须在理念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方法上要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下面我想就聚落考古的方法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所谓聚落考古，就是以聚落为对象，研究其具体形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形态，进而研究聚落形态的演变所反映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轨迹，所以聚落考古可以归入社会考古学的范畴。为什么选择聚落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而不只是对遗迹、遗物乃至整个遗址进行深入的研究呢？要知道聚落就包含在遗址之中，遗迹、遗物也包含在遗址和聚落之中。我想这无非是强调聚落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因为人总是要组成社会的，而在物质遗存中能够观察到的有形的社会单元就是聚落。考古学的任务既然是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自然应当把注意的焦点放在体现基本社会单元的聚落形态上。另外，聚落形态也与它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河口咸水与淡水交接区适于贝类生长，旁边往往可以发现贝丘遗址，海湾沙岗上有时会有沙岗遗址，河边的聚落多呈长条形分布，

平原地带的聚落则多呈团块式分布，诸如此类。通过聚落形态的研究，可以揭示人类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如何依赖自然环境，设法寻找最适于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又要在适应自然环境的情况下适当地改造自然环境。所以聚落考古往往要与环境考古相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关于聚落考古的方法，应该是根据所研究的对象和所要达到的目的来确定，不可能是一个模式。不过也有一些共同要注意的问题。我想首先要研究什么是共时性和如何解决共时性的问题。我们讲的聚落形态不是遗址形态。任何聚落都不是由单体居址而是由多个居址和相关建筑相聚而成的。相聚的这些居址和相关建筑的布局有的事先就有一定的规划，大型聚落和各种级别的城市以至于都城往往如此。有的聚落事先没有规划，自然成长，到一定时期也往往会做一些调整，从而形成一定的格局。聚落的基本格局形成以后多半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只要基本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动，也就是聚落形态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就应当视为一个聚落。比方说，我们通常讲“明清北京城”，从来不说“明北京城”或“清北京城”。因为清代对明代的北京城没有进行根本的改造，二者没有太大的区别。虽然在几百年的过程中也有许多局部的改造或新建，只要没有改变它的基本格局，你就没有法子把它当做两个聚落。早先的唐长安城、汉长安城、郑州商城乃至史前的某些古城，差不多都有百年或几百年以上的历史，期间总有一些兴废之事，只要基本格局没有改变，都只能看成是一个聚落。相反，虽然明清北京城就坐落在元大都的旧址上，但明代的北京却基本上是新建的，具体形态跟元大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应该看成是两个聚落。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聚落形态来研究它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在聚落形态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它所反映的社会面貌或社会组织结构也应当没有本质的改变。明确这一点对于田野考古的实际操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只是追求那些不断发生的局部的变化，反而忽视了一个聚落的基本特点，那将是一个极大的失误。考察一个聚落如此，考察一个聚落群中各聚落的关系也是如此。

是不是只注意聚落的基本形态就够了呢？当然不是。有些聚落中的遗迹保存得比较好，不但可以进行功能区的划分，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各功能区乃至单体建筑之间的联系，借以复原当时的社会。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据地层关系和文化分期就难以达到目的，还需要引入地面的概念，要设法揭示完整的地面。过去我们很注意划分地层，这是任何考古工作者都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但有时候不恰当地把地层和时期画等号，比如下层是仰韶，中层是龙山，上层是小屯，也就是商代晚期。还有二里岗上层和二里岗下层，等等。后来一般不这样做了，只根据土质、土色的变化来划分地层，再根据地层中的出土器物来进行分期。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器物的分期要进行类型学研究，不可能在田野发掘阶段解决。于是一些人提出在发掘过程中要统一地层。这在实际操作中是有困

难的，尤其是在大面积发掘的时候。做过田野考古发掘的人都会知道，强行统一势必会出问题。因为地层堆积总是有范围的，除了表土层以外，几乎没有一个地层是覆盖整个遗址的。但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个地面，地面是不会有缺口的，不管高高低低总可以连接起来，而地面上的遗迹和某些遗物总是同时可以看见的。不过我们要注意地面上同时存在的东西不一定在文化分期上也是同时的，这两个概念不能画等号。我举一个不大恰当的例子，我们住的这个宾馆有好几栋楼，这些楼并不是同时盖的，从地层上观察一定有叠压或打破关系，但现在同时在使用，当然也可以同时看得见。不过这些楼盖起来的时间相差不远，在文化分期上不会有什么意义。假如旁边有一座庙或者别的什么古建筑，跟现代建筑同在一个地面，可以同时看见，但在文化分期上就不一定是同时期的了。进行聚落考古，一定要把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相互关系弄清楚。

为了揭示地面，发掘时不必机械地按照事先划定的探方格子进行。开不开探方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开探方，一定要注意各个探方发掘的进度，到一定阶段要打掉隔梁，把地面连接起来。不开探方，一定要严格控制坐标，并且把地面的揭示同地层观察结合起来，否则出了错还不知道错在哪里。

进行考古调查也要解决共时性的问题。你调查了一大堆遗址，如果不首先区分出不同的时期，如何去判断各个遗址所体现的聚落之间的关系呢？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以降的遗址中，最普遍存在又最能反映文化特征和所属时期的就是陶片，所以调查的时候一定要捡陶片，当然也要注意别的具有特征的东西。捡到陶片要能够正确地辨识，这要有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不能只是红陶、黑陶、灰陶，也不能只是仰韶、龙山。单是一个仰韶文化就可以分成好多时期和好多地方类型。如果你不掌握这些知识，就很难正确判断聚落的范围和不同聚落之间的关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山西垣曲盆地的调查，采用了全覆盖式和传统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又充分吸取了以往考古研究中文化分期的成果，才能做出不同时期的聚落分布图，进而研究各时期聚落分布的特点和同时期各个聚落之间的关系，再研究从早到晚聚落演变的过程及原因，是做得比较好的例子。

近年来我们有些单位同外国学者合作，引进了一些新的调查方法。其中比较流行的是全覆盖的拉网式调查，按照事先划定的方格采集陶片，规定几块陶片以上就是遗址。有些学者对这种方法提出质疑。我觉得之所以采取这种方法，第一是怕漏掉可能存在的遗址，第二是便于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它所提供的信息是一种可能性而不完全是真实的。这种方法可适用的范围有限。在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可能用处较大。在华北等地的农村习惯取土垫圈，如果取了遗址上的土，再把沤成的圈肥抛洒在别的田地里，便会造成许多假象。如果还用这种方法来圈定遗址，就会真假混杂，使可信度降低。至于在南方水田地区，很难捡到陶片，这种方法就更不好用了。水田地区的调查是一道难题，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最近中美合作在成都平原的郫县古城一带用拉网式钻探的方法，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具体到一个地方用什么方法，要做试验，要具体分析。在调查报告上要把采用的方法讲清楚。我们过去有些调查方法是很有有效的。例如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杨虎等在内蒙古敖汉旗进行调查。他们只有两三个人，开始调查了几个遗址，捡了一些陶片。然后把当地的小学老师和放羊娃召集起来，跟他们简单地讲解什么是古代的遗址，什么时代的陶片各有什么特点，诸如此类，同时把他们带到遗址上去考察。不是捡几块陶片就叫遗址，要看地形地貌，冲沟边或地坎上有没有文化层或某种遗迹现象。期间还拜访了一些老人，他们对自己的乡土十分熟悉，纷纷告诉考古队哪里有遗址，考古队再去验证。出乎意料的是有不少遗址在山顶上，那多半是防御性城堡或是祭祀性遗迹；有些遗址跟我们平常想的背风向阳的规律不合。于是把初步调查到的遗址全部画在地形图上，不断地总结规律，再依据新的规律去调查。结果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仅仅跑了半个旗的地方，就发现了10多处西河文化遗址、60多处兴隆洼文化遗址、60多处赵宝沟文化遗址、500多处红山文化遗址和3000多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当时杨虎把这个结果告诉我的时候，我简直惊讶和兴奋得无以形容。可惜这个调查报告至今没有发表，更没有一篇总结调查方法的文章，杨虎也不幸早逝。其实我们过去也还有一些比较成功的例子，只是不注意调查方法的研究和交流，调查报告也写得过于简单，这种情况应当改变。

调查的目的不仅是要了解有没有遗址，也不仅仅是了解遗址中有哪几个时期的东西。从聚落考古的要求来说，至少要了解遗址中是单一文化期的聚落，还是有几个时期不同范围的聚落。北大师生在河南南阳盆地的调查就注意了这个问题。他们根据在邓州八里岗发掘中观察到的不同时期聚落形态的特点，在调查中规定要了解哪里是居住区或别的功能区，哪里是遗址的边沿，各时期聚落的真实面积究竟有多大等，这样的调查自然要花较多的功夫，有的还要配合钻探或试掘。在这种情况下来讨论聚落的规模——等级才有基础。可惜我们的一些调查过于草率，遗址的面积（注意不是聚落的面积）用南北最长和东西最宽的距离相乘，结果显然比实际面积要大许多。用这样的资料去讨论聚落的规模——等级，进而讨论有几级社会组织，是不是已经进入复杂社会等等，有的还进一步估算人口的规模，不是太离谱了吗？

近年来在聚落考古的理念指引下，许多地方开展了区域系统调查。有成功的，也有不那么成功的，应该认真总结经验。在这次会上有好多学者注意了方法的研究，注意了不同方法的灵活运用，是很好的。我希望一些调查的结果能够以比较详细的方式公布。为什么我要提出后面这么一条呢？过去我们有不少的调查报告，《考古》、《文物》等杂志上，一篇几千字万把字，几十个遗址就交代了，那样的调查报告拿到有多少用啊？无非就是知道了那些地点。所以我一直讲，调查报告应该写得详细些，还要把调查方法讲清楚。现在的一些发掘报告开始注意资料的完整性，注意每个地层单位中出土器物的组

合关系，这是好的。但是有的报告走了另一个极端，一个坑一个坑的写，一个墓一个墓的写，太烦琐了。一定要看具体情况，有的坑、有的墓重要，那是需要写；有的太一般了，坑里面就出两块陶片，坑也不像个样子，有些坑不是有意地挖成的，也许只是为了取土挖了两锹，形成了一个坑，后来有一点垃圾倒进去了，有两块陶片，你也单独写？你列一个表不就完了吗？有时候，过犹不及。一本很厚的报告里面内容不多，这也不是个好现象。

整体来讲，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研究它的有效性：调查要有它的有效性，发掘也要有它的有效性。有效性的决定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对象，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同的遗址有不同的调查方法和不同的发掘方法；一个是目标，我究竟要完成什么？我究竟要做到什么？还有是你的能力，你的人力、财力，你的时间，你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那种广谱式的调查得到的信息必然是比较粗放的，但是是需要的，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个遗址都进行非常仔细的调查，特别是不能每一个都发掘。所以广谱性的调查需要，精细性的调查也需要；试掘性的工作要做，精细的发掘也要做。

不论是哪项工作，都有一个方法的钻研问题，没有那么多现成的方法摆在那里。我觉得过分强调所谓某种模式不一定是好事。有些东西是有规律的，我们要琢磨这些规律，但都拿这个模式去套，不一定是好事。所以一方面要注意规律性的总结和掌握，另一方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任何一件事，发掘任何一个遗址都是一个研究过程，不是挖完以后拿到室内整理才是研究。希望大家要有这样一个概念。这样，我们今后的聚落考古工作会做得越来越好。而由聚落考古所引申的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演变的研究以及各种各样的研究，都会更加深入，做得更好。

（原载《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辑）——纪念新砦遗址发掘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

四 黄河与长江

重温苏秉琦关于王湾二期文化的谈话

最近翻检旧时笔记，发现有一篇苏秉琦先生于1961年12月22日所作的关于王湾二期文化谈话的记录。谈话的内容在苏先生发表过的文章中还从来没有发现过，现在披露出来，一以纪念老师的恩泽，同时也为学术史增加一点新的资料。

1959~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师生在洛阳王湾进行田野考古实习，邹衡、夏超雄、李仰松和我几位教师曾经先后参加发掘和指导。通过两个季度的考古发掘，发现了非常丰富的新石器时代、西周、春秋—战国和北朝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尤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最为重要。当时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田野发掘的规模空前扩大，新的资料不断涌现。如何认识这些资料的文化性质和相对年代，进行正确的分期并给予恰当的名称，成为首先要解决的急迫问题。王湾遗址有非常复杂的地层叠压打破关系，不同地层中的陶器有明显的差别，可以区分为许多文化期。我们当时根据各期器物变化的幅度和前后发展演变的情况，初步将其分为三大期，分别称之为王湾一期文化、王湾二期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每一大期又分为若干小期，发展脉络非常清楚。很明显，从王湾一期之初到三期之末基本上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即使有缺环也不会很大；同时这种发展又是有阶段的，有大阶段还有小阶段，符合一般事物发展的辩证逻辑。这样王湾考古不啻为豫西地区谱写了一部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①，进而对周围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与相互关系的研究也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王湾的发掘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发掘资料几经沧桑，完全整理出来有一定难度，但一般性错误应该避免。感谢编写者和有关同仁的努力，现在王湾发掘报告终于出版了^②，书中关于从王湾一期到三期各段演变的表述基本上是清楚的，只是对王湾一期未做进一步的划分，对王湾二期文化性质的提法又有些模糊，认为“即本地区仰韶文化向

^① 严文明：《从王湾看仰韶村》，《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王湾——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龙山文化过渡阶段”^①。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早就解决了的。记得在王湾发掘期间我们就进行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王湾一期文化是仰韶文化，王湾三期文化是当地的龙山文化。至于王湾二期文化，有的认为是过渡文化，有的主张干脆取一个新名称，叫做王湾文化。有的则认为王湾二期虽然具有过渡性质，但过渡文化的提法不大妥当。这类遗存不是新的发现，过去就称为仰韶文化，现在从地层上证明它比王湾一期那样的仰韶文化要晚，那就称为仰韶文化晚期行了。当时的讨论没有结论。1961年秋，曾经参加发掘的五七级毕业班的杨虎和郭大顺等五名同学，在教师指导下对王湾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并写出了报告初稿，认为王湾二期是从仰韶文化发展为龙山文化的中间环节，是一种过渡文化，这在当时的年轻人中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但也有不同的意见。我当时正在修改新石器时代考古讲义，觉得王湾二期确实具有过渡性质，但似乎不宜称为过渡文化。王湾一期到三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实在仰韶村早有发现，只是当时没有进行分期，以至后来对它的文化性质、年代和同其他文化的关系都有许多不同的认识和争论。王湾的发掘应该说把这个问题比较彻底地解决了。王湾二期其实跟仰韶村的许多因素相像，跟荥阳秦王寨的陶器更像。这些大家都称为仰韶文化，没有别的说法。似乎应该把王湾二期文化还叫做仰韶文化，只是比第一期的仰韶文化晚一些就是了。有一次我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办事，夏鼐先生专门把我叫到他的书房去，问我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讲义写得怎么样了，洛阳王湾二期文化怎么看待等，我如实做了回答。夏先生明确表示王湾二期就是仰韶文化，可能是豫西仰韶文化的晚期。他也谈了仰韶文化发现和研究的历史，叮嘱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要慎重，不要叫什么过渡文化或王湾文化。过些日子我又去请教苏秉琦先生，先生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谈一下，于是特地请先生给考古专业的师生作个报告。这就是事情的原委。

苏先生拿着讲课提纲，一条一条地讲，这在他讲课的历史中是很少有的，足证他对这次讲话很重视。他讲的内容虽然不是很长，但是该谈的方面都涉及了，又很有针对性，我们听了都觉得茅塞顿开。可惜当时没有正式记录，我的笔记只是提纲挈领地记下大意。因为我很重视苏先生的意见，所以笔记内容的忠实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为了让读者看起来比较方便，我在谈话中加了一些注释。

看了苏先生这段谈话，再回想当时学术界对仰韶文化的认识，主要在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关系上打圈子，缺乏历史眼光，更缺乏对各处有代表性的遗存进行实事求是地深入分析，对比是何等的强烈！苏先生首先从仰韶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历史中探索对王湾二期文化一类遗存的认知过程，接着又同其他地方的仰韶文化遗存进行比较，从时空关系上全面把握仰韶文化，在这个基础上来认识王湾二期文化的性质和地位。话语不

^①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王湾——田野考古发掘报告》9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多，却是高屋建瓴，慧眼独具。在我的印象里，苏先生虽然把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看成是仰韶文化的主要类型，却从来没有把它们看成是仰韶文化的全部。他看到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那么大，经历时间那么长，应该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地方文化相，而且跟周围的文化发生非常复杂的关系^①。在对仰韶文化总体把握之下，他很自然地得出结论：王湾二期文化是仰韶文化后期的中原类型在豫西地区的一个文化相^②。

四十多年过去了，仰韶文化的研究又有了巨大的进展。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关于仰韶文化的论述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被淘汰或遗忘，苏先生的观点却为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我想从这件事情中首先应该学习的是先生观察和分析考古资料的方法，而不仅仅是对王湾二期文化的具体看法。研究任何问题都要有正确的方法，只有方法对头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方法不对，研究问题就会南辕北辙，越离越远。先生治学特别讲求方法论，这差不多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也是留给我们后学的最宝贵的财富。

为纪念苏秉琦先生逝世 10 周年而作

2003 年 5 月 10 日于蓝旗营蜗居

(原载《中国文物报》2009 年 9 月 4 日)

附：

关于王湾二期文化

苏秉琦

1961 年 12 月 22 日

关于王湾二期文化的性质问题，大家有不同看法。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我们可以追溯一下历史：

(1) 首先，当安特生发现仰韶村遗址时，以为彩陶和鼎、鬲是共存的，合在一起叫做仰韶文化^③。

① 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 年 1 期。

② 苏先生曾经考虑把仰韶文化晚期划分出一个中原类型，后来没有这么做，而称为“中原地区后期仰韶文化”，见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 年 1 期。

③ 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 5 号，1923 年。

1926年李济发掘西阴村，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比较单纯，有彩陶，没有鼎、鬲，也叫仰韶文化^①。

1937年尹达发表《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②，认为仰韶村既有仰韶文化，又有龙山文化，应该加以区分。

抗战时期夏鼐在甘肃做考古工作，首先提出马家窑文化的命名以区别于仰韶文化^③。1951年他到仰韶村调查和试掘，发现红陶和黑陶共存，认为仰韶村确实存在一种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混合文化^④。考古所1954年发掘洛阳涧滨的H5时^⑤，也提出过不同文化因素共存的问题。

(2) 我们在1954年发掘洛阳中州路，提出T101，T103，T2C和H4的彩陶有所不同，可能代表早晚不同的阶段^⑥。

(3) 1957和1958年洛阳西干沟的发掘，把仰韶文化一分为二，龙山文化也一分为二。在相当于王湾二期和三期之间还有一些东西，当时与方酉生等一起曾经提出过渡问题。而蒋若是1954年发掘了孙旗屯^⑦，我看过他写的发掘报告初稿，里面从仰韶到龙山分了四期，也不太明显地提出了过渡的问题。

王湾的考古工作，就是在以上考古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问题也是在以上探索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从1921年到1961年，整整40年了，问题的发展过程便是如此。

怎么看待王湾二期文化呢？

(1) 不同意把王湾二期文化称为混合文化的看法。它显然不是两个文化接触的中间地带，而是占了很长的一个文化时期。

(2) 不同意称为过渡文化。因为跨越的时间太长，又不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自己有很大的特色。

(3) 也不宜于取名为王湾文化。它不是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外的一个第三者。它与王湾一期的关系比较亲近，可以看做是王湾一期文化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王湾

①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

② 尹达：《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中国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③ 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1949年。在这篇考古报告中首先提出了马家窑文化的命名。甘肃仰韶文化是安特生首先提出来的，见所著《甘肃考古记》，《地质专报》甲种第5号，1925年。

④ 夏鼐：《河南渑池的史前遗存》，《科学通报》2卷9期，1951年。

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古文化遗址及汉墓》，《考古学报》1956年1期。

⑥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12~18、137~138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⑦ 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二队孙旗屯清理小组：《洛阳涧西孙旗屯古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9期。

三期的关系好像比较远，不大好说是王湾三期文化的直接前身。

因此，我认为王湾二期文化还是仰韶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后期。同时王湾二期文化又要与其他地区的后期仰韶文化相区别。它基本上没有小口尖底瓶而有比较发达的彩陶。山西南部的西王村晚期^①和陕县以西的渭河流域，则有许多小口尖底瓶而基本上没有彩陶。但是如果同郑州^②、荥阳^③等地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存相比好像是差不多的。一过黄河又不同了，豫北、冀南的像大司空村^④和百家村^⑤那样的遗存就不大一样。因此它应该是仰韶文化后期中原类型的一个文化相。

——严文明记录并加注释

-
-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1期。
 - ②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西郊仰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2期。
 - ③ 阿尔纳：《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二册，1925年。
 - ④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
 - ⑤ 罗平：《河北邯郸百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5年4期。

纪念西阴遗址发掘八十周年*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纪念西阴村遗址发掘 80 周年，是很有意义的。80 年的时间不短，几乎代表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整个历程。今天中国考古学的状况同 80 年以前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认为西阴村的考古对于往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具有方向性的奠基作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下面我想讲两个问题。

一 关于西阴村遗址发掘的历史意义

(1) 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西阴村遗址是 1926 年发掘的，在此之前的仰韶村遗址发掘虽然也是中国的学术机构地质调查所进行的，但主持者是当时政府聘请的外籍专家，中国学者只做了些辅助的工作。西阴村遗址的发掘则完全由中国学者李济主持，袁复礼等参加。从此中国考古学才逐渐走上了自己发展的道路。

(2) 第一次有计划地用探方法进行考古发掘，并且详细地记录了地层的变化。仰韶村的发掘是试探性的，东挖一坑，西挖一沟，只有第 12 地点的墓地挖的稍微大些。地层只有深度记录，没有文化层变化的记录，更没有一张像样的地层剖面图。西阴村虽然也是按水平深度发掘的，但是注意了土质土色的变化，并且有清晰的地层剖面图，在图上可以看到不同层次土质土色的变化。这是很不容易的，至今西方仍然有不少考古学者采用这种方法。

(3) 第一次按照三维坐标记录和采集小件遗物，按照层位采集陶片，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科学基础。直到现在，我们绝大部分工地仍然采用这种记录和采集遗物的方法。

(4) 西阴村的发掘是 1926 年 12 月结束的，1927 年 8 月就及时地发表了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①，向学术界通报发掘成果。这一点我们现在还往往做不到。

(5) 报告中谈到西阴村的彩陶时，认为应与共存的其他陶器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 在纪念西阴村遗址发掘 80 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06 年 10 月 15 日。

①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 年。

不要单独抽出来谈它的来源，第一次对彩陶西来说提出质疑。

(6) 发掘结束后及时让梁思永整理陶片。梁思永是第一次对第四探方的全部陶片进行形态分类统计和描述的学者，是探索如何进行类型学研究的先驱。

(7) 历史的际遇往往有想不到的巧合。两位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奠基人在这里初试身手，就获得了不同凡响的成果，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了。

(8) 西阴村的考古发掘当然也有局限，主要是地层关系并没有真正弄清楚。报告中虽然注意到坑穴一类的遗迹现象，并且讨论是否是居穴的可能性。从袁复礼测绘的发掘后的地形图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几个灰坑的遗迹，但发掘中却没有单独编号，没有把灰坑中的堆积作为单独的地层单位对待，更没有注意到是否有遗迹与地层或遗迹与遗迹之间的打破关系（例如位于第2、3、5、6探方之交深2.59米的灰坑与它南边那个最大的灰坑就可能有打破关系）。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分期研究的准确性。这在早期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是难以避免的。这个问题直到后来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时才逐渐解决。

二 关于西阴村文化遗存的性质及相关问题

(1) 西阴村遗址的文化遗存比仰韶村单纯得多。按照现在的认识，它只有仰韶文化的遗存，而且主要是庙底沟类型的遗存，根本没有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等到1994年秋第二次发掘时才发现有庙底沟二期和更晚的遗存）。仰韶村遗址则从仰韶文化早期直到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存都有。如果西阴村的发掘在仰韶村发掘之前进行，很可能就叫西阴文化而没有仰韶文化的名称，在20世纪30年代探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关系时也不至于弄得那么复杂。事实是那时主要强调了安阳后岗等地龙山文化叠压仰韶文化的地层关系，同时关注两个文化的分布状况，在这个基础上做文章，没有充分利用西阴村的资料。如果利用西阴村和不召寨比较单纯的资料去甄别仰韶村的资料，不但可以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应该叫中原龙山文化）清楚地区别开来，也会进一步看到西阴与后岗的区别。所谓混合文化的概念也不会提出来。但历史不能假设。学术研究总是走着曲折的道路。

(2) 20世纪50~60年代之交，由于西安半坡、陕县庙底沟、华县元君庙和泉护村以及洛阳王湾等遗址的发掘，对于仰韶文化以及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关系的认识逐渐深化。1962年杨建芳首次全面提出仰韶文化的类型和分期，1965年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更把仰韶文化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考虑到一些典型遗址的资料发表得不够理想，进而影响到研究的深入。我花了比较多的精力对典型遗址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各个自然区的仰韶文化遗存进行比较细致的分期研究，进而对整个文化进行分期和划分类型的研究。最后探讨整个文化发生、发展与走向衰亡的过程与内部机制，探讨周围文化在仰韶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力求从发展演变和相互关系上辩证地处理

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避免了静态的研究方法，也避免了外因论和孤立发展论。

(3) 大约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有关仰韶文化的遗存发现得越来越多，仰韶文化的内涵显得非常复杂，一些学者提出将其中的某些文化期或文化类型独立为考古学文化的意见，但究竟如何划分，划分出的文化又如何命名，各人的意见并不一致。一些学者仍然坚持仰韶文化的概念，只是在仰韶文化下面划分出不同的文化期和文化类型，对整个仰韶文化的时空范围也有多少不同的认识。有不同意见是很自然的，学术研究往往是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前进的方向的。我赞成保留仰韶文化的名称，也不反对在仰韶文化之下再划分为若干文化。按照柴尔德和夏鼐提出的划分考古学文化的原则，再小的范围也可以称为考古学文化。只是我们要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层次分析，有大文化，有小文化或者说亚文化，不能一锅煮。仰韶文化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第一个被发现和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当时认为它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代，是以彩陶为特征的，并且很可能是汉民族祖先的文化；现在看来这些看法还基本上是正确的。仰韶文化是一个大文化。马家窑文化过去曾经被称为甘肃仰韶文化，其地位即相当于仰韶文化之下的亚文化。后来改称为马家窑文化，或再分为马家窑文化和半山—马厂文化，实质上也只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特化了的地方类型，或者说是一个亚文化，不能与仰韶文化平起平坐。同样在内蒙古发现的海生不浪文化也是仰韶文化晚期特化了的地方类型，也是一个亚文化。以此类推还可以划出一些亚文化。

(4) 仰韶文化能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自身特征的考古学文化而存在，要看它是不是具有基本的共同特征以区别于其前后和周邻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最富特征的陶器是小口尖底瓶，它是仰韶文化各个时期和各个地方类型的主要器物之一，别的文化是没有的。仰韶文化基本的器物组合是瓶、钵、盆、罐、瓮，它形成于仰韶文化早期即半坡期，也是其他各期最主要的器物。这既区别于以前的白家文化（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和以后的中原龙山文化，也区别于大致同时而相邻的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和大溪文化。仰韶文化是以彩陶著称的，这很明显区别于比它更早和更晚的文化。但具有彩陶的文化不止一个，仰韶文化的彩陶有什么特点呢？仰韶文化的彩陶非常复杂，要归纳出共同的特点是很难的。但只要与周围的文化相比，还是可以看出某些规律性的差别。仰韶文化的彩陶主要是在红陶地上画黑彩，早期多以直线和直边块体构图，中期多以曲线和曲边块体构图，晚期多以直线和曲线构图，这一演变规律不同于红山文化，也不同于大汶口文化和大溪文化。仰韶文化的鱼、鸟、蛙、鹿等动物花纹也不见于其他文化。仰韶文化是一个强势文化，它对周围文化有明显的影晌，同时也接受周围文化的某些影晌，因而有某些彩陶花纹相同或相似是不奇怪的，但毕竟各有特点。从这些方面来看，仰韶文化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5) 仰韶文化的研究涉及许多方面，不只是文化特征、分布范围、文化分期、地

方类型、具体年代及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也不只是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具体过程以及引发这种变化的内部机制和外部原因等问题。还有这个文化的经济诸如农业、养畜业、采集、捕鱼、狩猎等生业经济，还有建筑业和石器、陶器、骨角蚌器等制造业以及纺织、编织等手工业生产经济，还有为实现这些生产的技术，产品的分配与交换等，其中有一些有专门的研究但不深入，有一些还没有进行研究。至于当时的家庭形态、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性质、风俗习惯以及艺术、宗教等精神文化的研究也是如此。其中有些关键性问题，我在纪念仰韶文化 65 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意见。20 年过去了，似乎没有太大的进展，我也没有太多新的想法，就不耽搁大家的时间了。

（原载《鹿鸣集——李济先生发掘西阴遗址八十周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 年）

大司空类型彩陶之分析

一 大司空类型遗存的发现

1929年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进行第三次殷墟发掘时，在小屯的殷文化层一大堆带刻字的甲骨片中发现了一块敛口陶钵的残片。这钵的口部有白衣，上面画红黑相间的竖条纹、同心圆纹和网格纹。这是在河南北部第一次发现仰韶文化的遗物，只是并非出于原生地层而是混杂在殷文化层中^①。

1931~1934年，梁思永等主持发掘了河南安阳高楼庄后岗遗址，不但证实河南北部确实有仰韶文化遗址，而且发现了小屯（殷）、龙山与仰韶三种文化遗存依次叠压的地层关系^②。

1932年4月，吴金鼎发掘安阳侯家庄高井台子，也发现了与后岗相同的地层关系^③。同年刘燿（尹达）发掘河南浚县大赉店遗址，发现有龙山叠压仰韶的地层关系^④。在其后的几年中，历史语言研究所还先后发现了安阳秋口同乐寨、大正集老磨冈和浚县刘庄等仰韶文化遗址^⑤。检查这几处仰韶文化遗存，不难发现其面貌有相当的差别。例如后岗多红陶，彩陶很少。彩纹多紫红色，间或有黑色的，但在同一器物上只使用一种颜色。纹样主要有三种：宽带、成组竖条和交错的成组斜条。而同乐寨多灰陶，彩陶稍多。彩纹多红色，间或用黑色或用红黑两种颜色。纹样稍复杂，有细腰纹、豆荚纹、蝶须纹、成组竖波线和斜波线等。两者彩陶的器形也有所不同。高井台子和大正集两种彩陶都有，其余遗址则都与后岗相同。吴金鼎关于高井台子的两篇文章中发表的仰韶器物都属于第一种，但他所著《中国史前陶器》一书中说明是出于高井台子的第11、

① 李济：《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二册，1930年。

② 梁思永：《后岗发掘小记》，《安阳发掘报告》第四册，1933年；《小屯、龙山与仰韶》，《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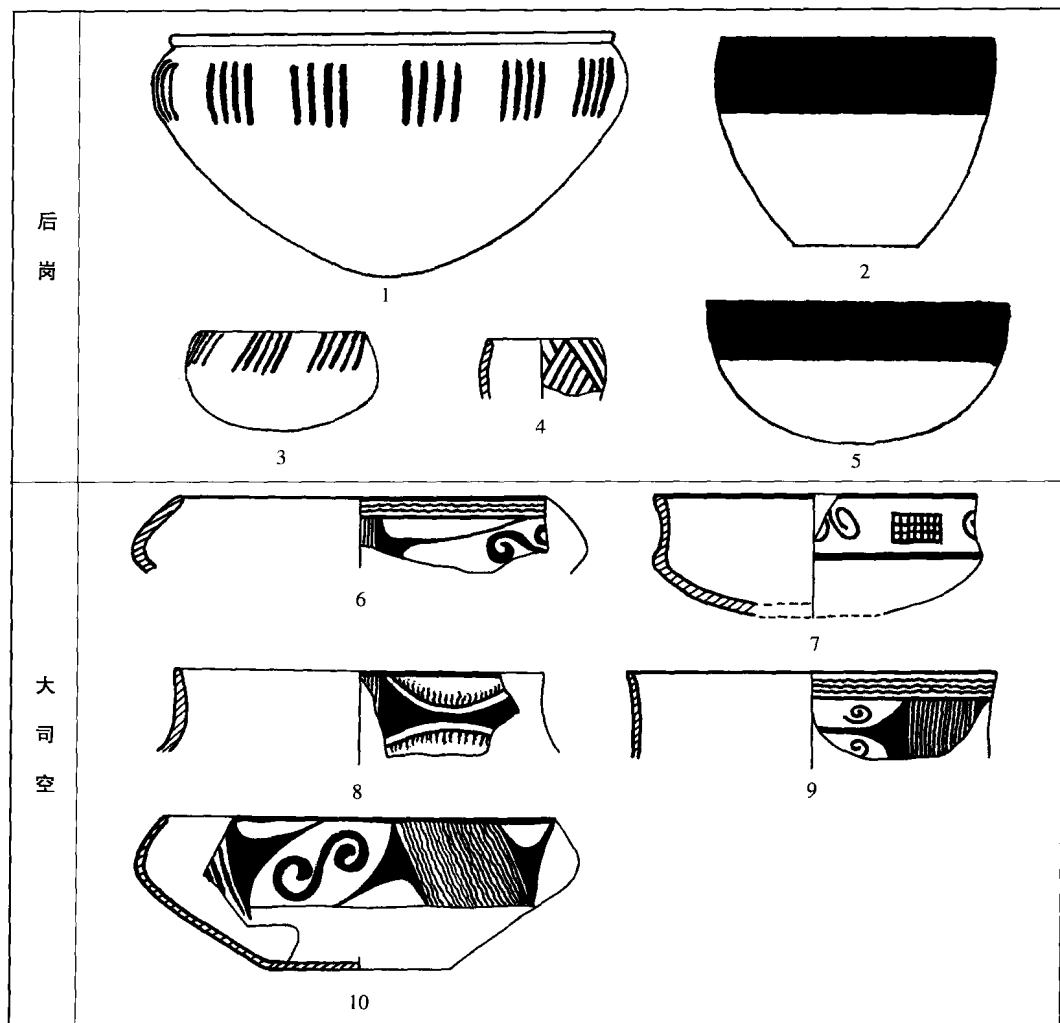
③ 吴金鼎：《摘记小屯迤西之三处小发掘》，《安阳发掘报告》第四册，1933年；《高井台子三种陶业概论》，《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1936年。

④ 刘燿：《河南浚县大赉店史前遗址》，《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1936年。

⑤ 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24、8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14 和 15 三个器物插图则都属于后一种^①。不过当时首先是要正确地区分仰韶与龙山，对仰韶文化遗存本身的进一步区分则未遑顾及。

1957 年，作者在河北邯郸实习期间试掘的百家村遗址与安阳同乐寨相同，在平山调查发现的韩庄与尚庄则与后岗相同。1958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北郊大司空村东南的豫北纱厂内清理了一处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一座残窑和一个灰坑。出土陶片不多，其特点与同乐寨和百家村相同，而与隔河相对的后岗判然有别（图一）。



图一 安阳后岗和大司空村的彩陶

1. 圜底盆 2. 平底钵 (H5:3) 3. 5. 圜底钵 (TA2③:2、H5:22) 4. 孟 (TC4④:9)
6、10. 敛口钵 (T507 火门下、65T301:01) 7~9. 折腹盆 (?、T407④、T507 火门下)

^① G. D. Wu, 1938, *Prehistory Pottery in China*, London.

发掘者认为二者应属于不同的类型，并且代表不同的发展阶段^①。从此在仰韶文化的研究中才有了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这样的名称。有些学者称大司空类型为百家村类型^②，因为百家村遗址比大司空村发现得早，遗物比较丰富，识别得也比较早，只不过名称提得稍晚而已。

1962、1963 和 1965 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曾经先后到安阳地区进行田野考古实习，调查发现了许多仰韶文化遗址，其中包括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两种遗存。并且对安阳大正集锅炉（老磨冈）、大寒南岗、鲍家堂、汤阴程岗和浚县草店等多处遗址进行了发掘，从而对当地仰韶文化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对大司空类型则有更加深切的了解。

现知大司空类型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尤以漳河和卫河流域为多。河南新乡洛丝潭只有少量大司空类型的因素，应该是这个类型分布的南部边缘。在河北历年发现的大司空类型遗址还有磁县下潘汪、界段营，邯郸义西，永年洛关，武安城二庄，邢台柴庄和西黄村等处。邢台大概已经接近这个类型的北部边缘，再往北就是以平山田兴和中贾壁为代表的一类遗存的分布区了。至于正定南杨庄第五期和容城午方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存则又是另一类型的东西，与大司空类型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大司空类型分布的范围是比较明确的，大致呈长椭圆形，南北长径约 250 公里，东西仅约 50 公里。基本上处在太行山东麓的冲积扇和冲积平原上（图二）。

关于大司空类型的年代过去多有争论^③，但大多只注意到它与后岗类型孰早孰晚的问题。实际上在冀南豫北的仰韶文化至少可以分为四期，即后岗期、钓鱼台期、大司空期和台口期，大司空类型属第三期，与河南中西部的秦王寨类型基本上属于同一时期^④，其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 3500 年～前 3000 年。如果与后岗类型相比，不但年代要晚得多，在文化内容上也看不出明确的因袭继承关系。

二 主要遗址彩陶的初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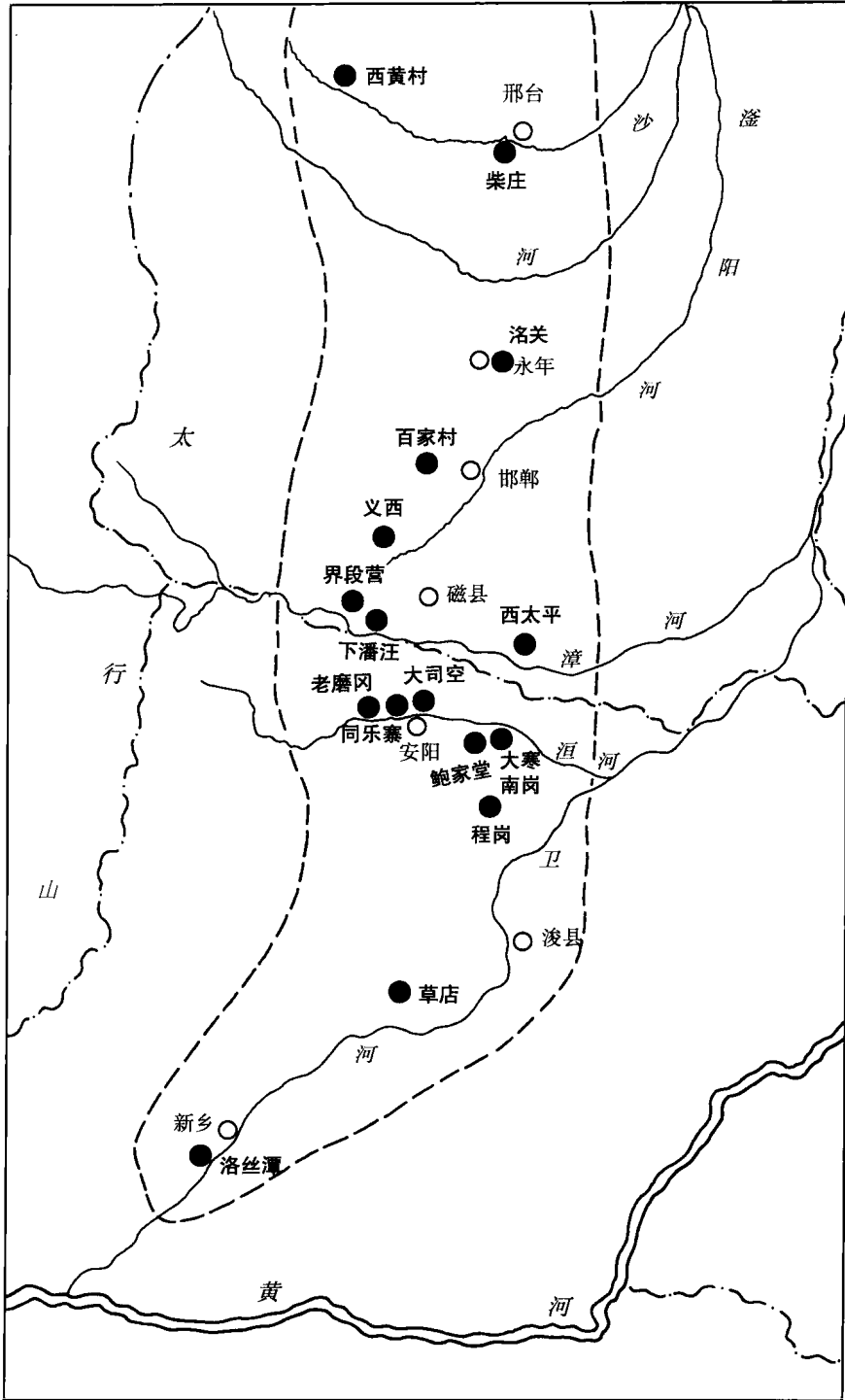
大司空类型中出土彩陶较多的遗址有河北的百家村、下潘汪、界段营、洛关以及河南安阳的大正集老磨冈、大寒南岗、鲍家堂和浚县草店等处。兹将各处出土彩陶的情况作一介绍和初步的分析。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 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 年 2 期 64 页。

② 唐云明：《试谈有关河北仰韶文化中的一些问题》，《考古》1964 年 9 期。

③ 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2 年 1 期；唐云明：《试论豫北冀南仰韶文化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77 年 4 期；杨锡璋：《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的相对年代》，《考古》1977 年 4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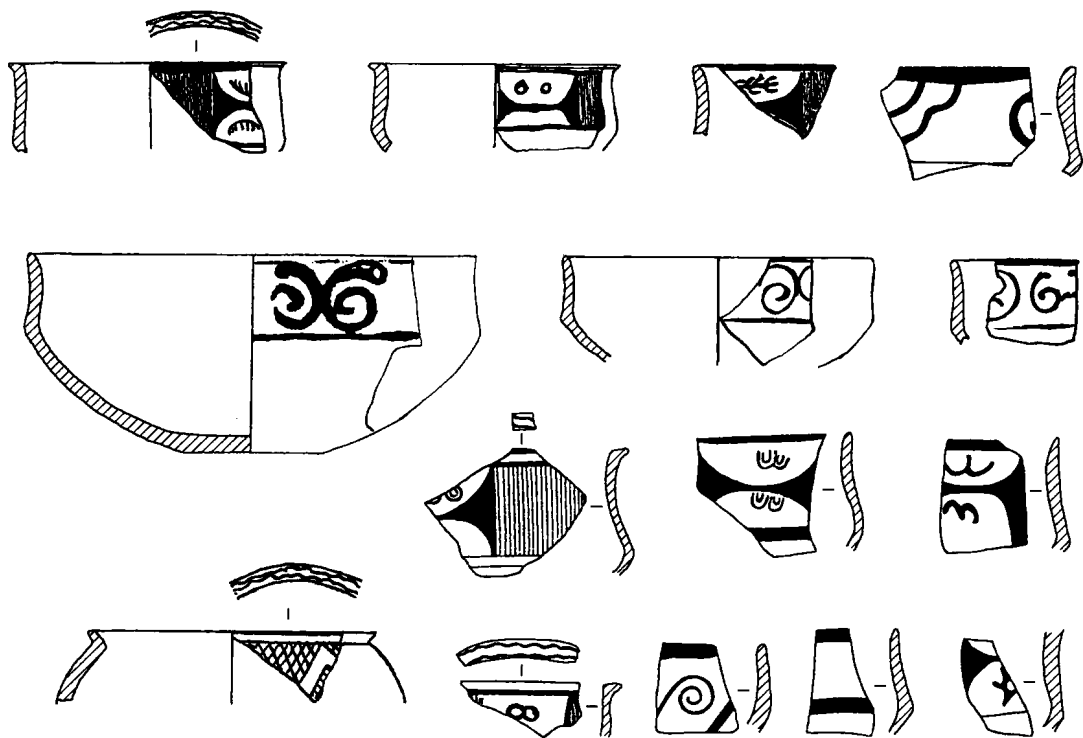
④ 严文明：《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 年。



图二 大司空类型遗址的分布
 (虚线表示大司空类型分布的范围, “●”表示遗址)

(1) 百家村

遗址位于邯郸市西约4公里的百家村西边，它的西南两边紧临沁河。在河边的断崖上可以见到白灰面的房屋遗迹和许多灰坑，文化层厚约2米。遗址的范围东靠元甲寺，往西距离约400米；南北将近500米，近椭圆形，保存甚好。1957年11月，北京大学和河北省文化局合组邯郸考古队调查发现了这一遗址，12月初进行了试掘，之后省文化局的罗平又进行了一次调查^①。发现的遗物基本上都是仰韶文化的。出土陶片多灰色，少量为红色和黑色。可识辨的器形有彩陶盆、彩陶钵、彩陶罐、素面罐、篮纹罐、绳纹罐和素陶杯等。彩纹多红色，主要有细腰纹、豆荚纹、成组竖波纹和蝶须纹等。细腰纹上下的半月形地子上有各种式样的小纹饰（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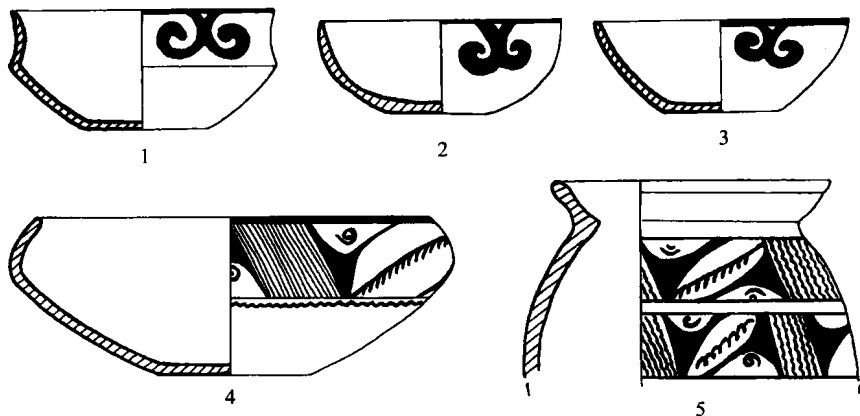
图三 邯郸百家村遗址的彩陶

(2) 界段营

遗址位于磁县西20公里的界段营村西约1公里处，南临漳河，面积约1万平方米。1959年秋发现，1960年春发掘，发现有大司空类型和后岗类型两种仰韶文化遗存，但

^① 罗平：《河北邯郸百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5年4期。

未见相互叠压或打破的地层关系^①。根据9个大司空类型灰坑出土陶片的统计，泥质灰陶占30%，夹砂灰陶占35%，泥质红陶占25%，其余为夹砂红陶和泥质黑陶。素面和磨光的陶片约占80%，篮纹占9%，彩陶占5%，绳纹和划纹共占4%，其余尚有极少的附加堆纹、锯齿纹和剔刺纹。彩纹以红色为主，少数为赭色，没有发现黑彩（图四）。



图四 磁县界段营遗址的彩陶

1. 盆 (H10:1) 2、3. 碗 (H35:5、H21:1) 4. 钵 (H35:4) 5. 罐 (H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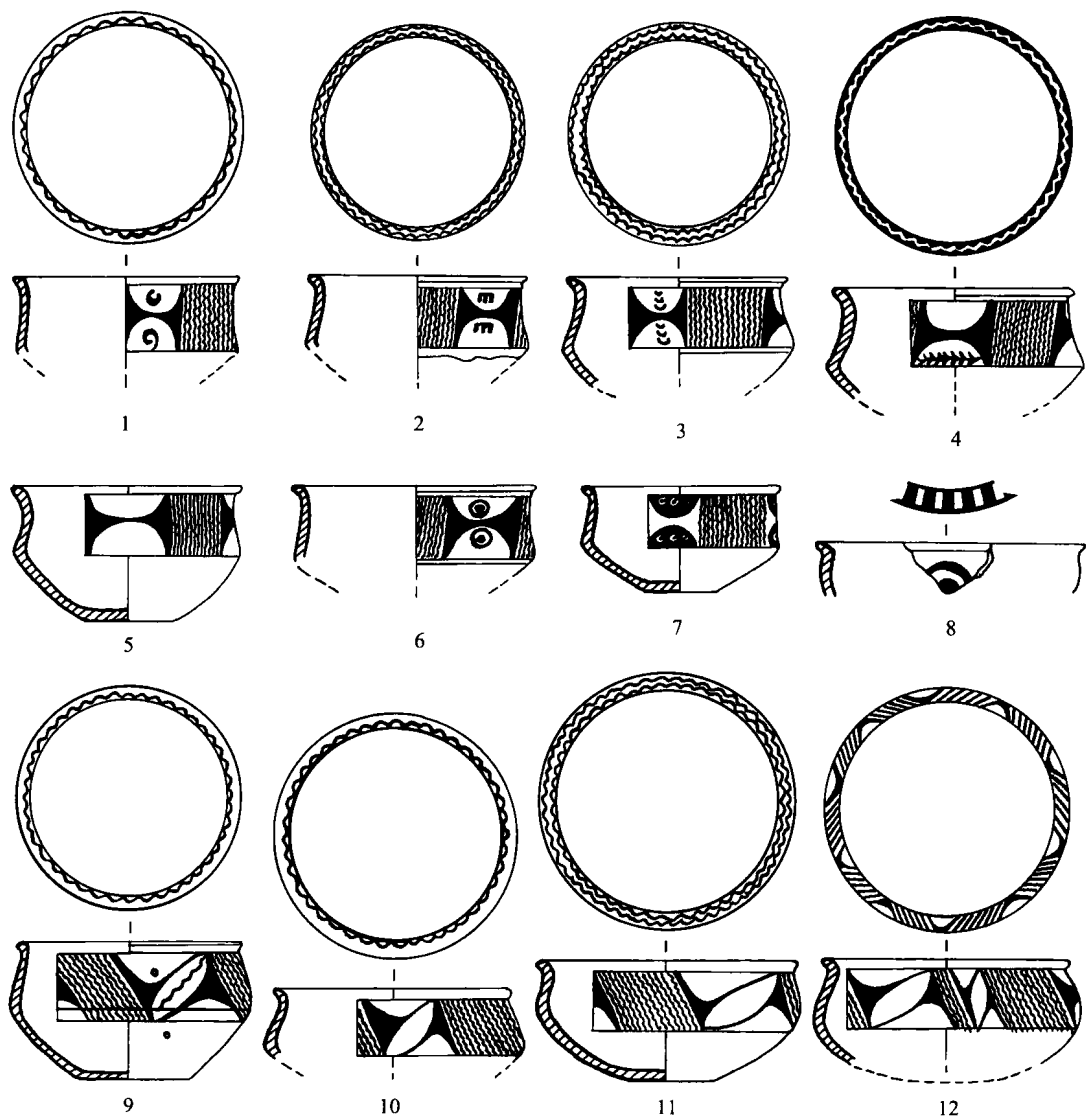
(3) 下潘汪

遗址位于磁县西南18公里的下潘汪村东南，南临漳河。1959年10~12月发掘，发现有仰韶、龙山和商周等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仰韶文化即包含有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两种遗存^②。两者在地层上虽然没有叠压打破关系，但是在大司空类型的H70和H99中分别出后岗类型的弦纹罐和红顶碗，而后岗类型的灰坑中完全不见大司空类型的遗物，即可以证明大司空类型确实晚于后岗类型。发掘报告却认为第一类即大司空类型的遗存早于第二类即后岗类型的依次是不正确的。这里大司空类型仅发现7个灰坑，出土陶片以灰陶为主，红陶不足三分之一，彩陶却占24%，是本类型遗址中比例最高的。这些彩陶几乎都是泥质红陶，仅有个别是泥质灰陶。器形主要是盆、钵、碗三种，还有少量罐。彩纹几乎全部饰于器身上腹部和盆的缘面，个别罐的缘面和耳部也有彩纹。绝大部分彩纹为比地色稍深和比较鲜艳的红色，只有个别是黑色的，没有发现同时施用两种颜色的。在不同的器物上往往有不同的纹饰。盆上最常见的纹饰是由两个凹腰三角形顶部对接形成的细腰纹与多道并列的曲线纹交错排列，细腰纹上下的两个

^①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界段营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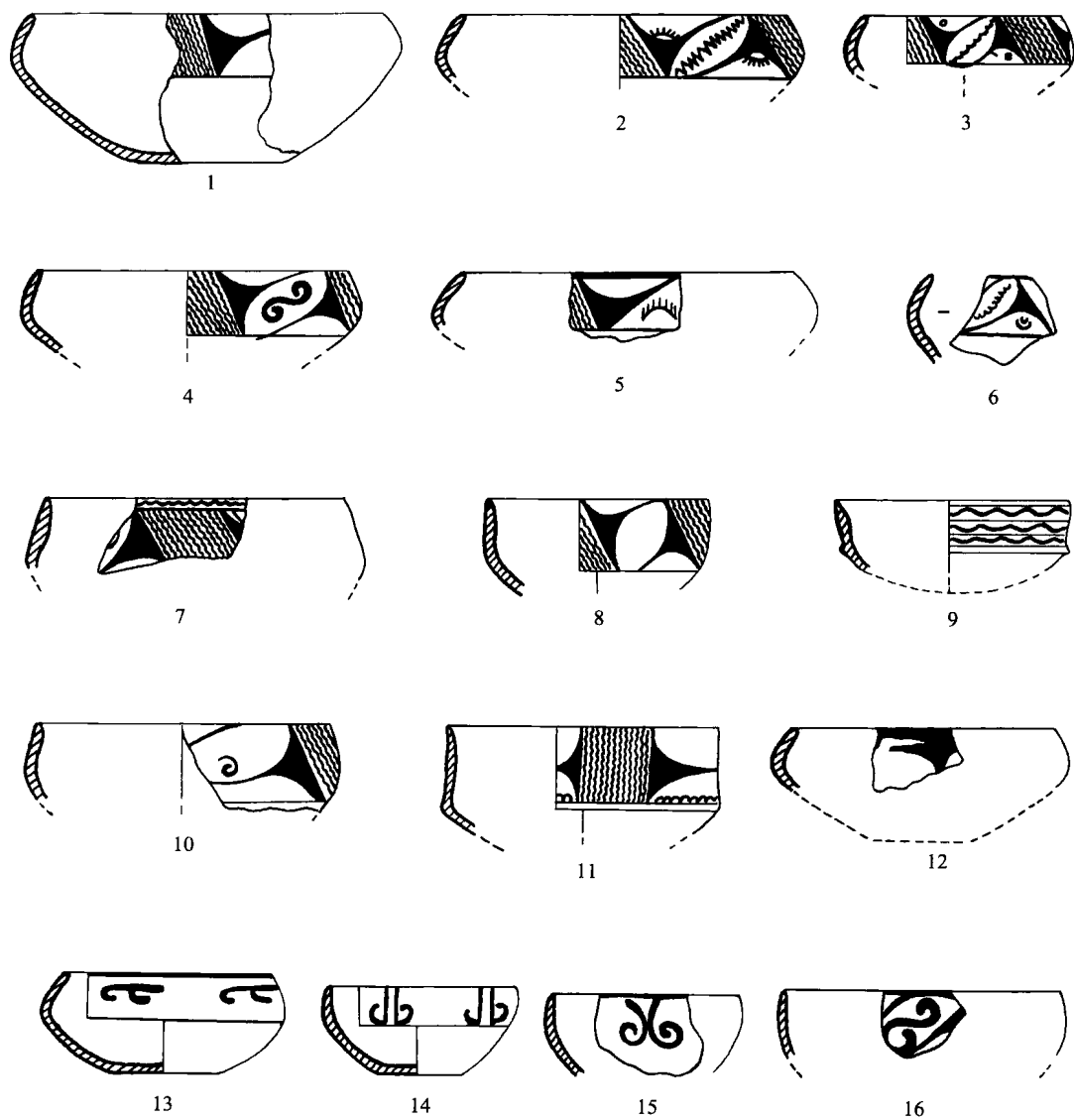
^②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潘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1期。

半月形空间则饰以各种式样的小品。盆的缘面则多为曲线纹，也有由若干组斜线纹交错排列的。钵上最常见的纹饰是由两个不对称的凹边三角形相错连接，中间形成的豆荚形空间也饰以各种式样的小品。这样形成的一个单元再与多道并列的波线纹交错排列。碗上则以蝶须纹为主，还有反“S”纹等。罐上的纹饰不多，但是变化比较大，缺少规范（图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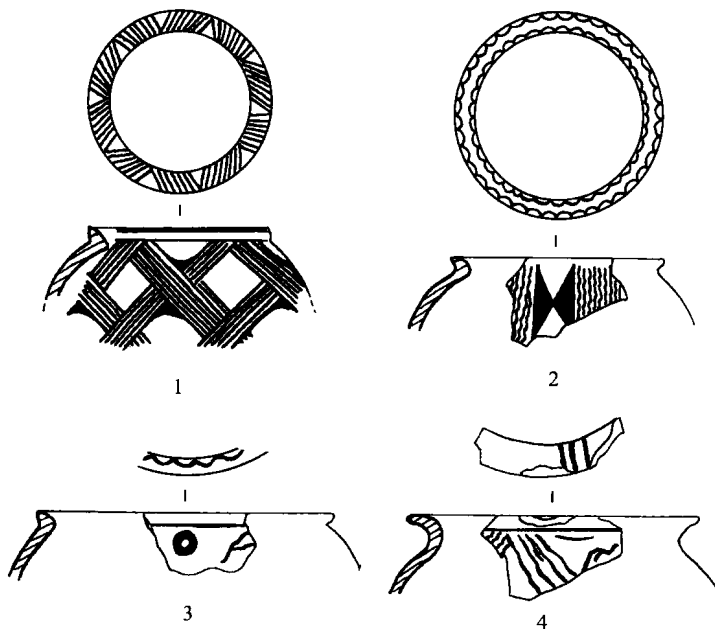
图五 磁县下潘汪遗址的彩陶盆

1. T39③:12 2. H99:3 3. T50④a:42 4. H20:3 5. T50④a:14 6. T44④:201 7. T42③a:70 8. H46:1
9. H99:2 10. T33④a:69 11. H15:5 12. H74:102



图六 磁县下潘汪遗址的彩陶

1~7、10、12、13. 钵 (T50④a:5、H20:2、T33④a:20、T50④a:262、H183:194、T7④:25、H96:275、H96:274、H99:4、T33④a:17) 8、9、14~16. 碗 (H74:5、T22④a:4、H99:1、H74:102、T45④a:229) 11. 盆 (H99:5)



图七 磁县下潘汪遗址的彩陶罐口部残片

1. T32④:36 2. T30③:16 3. T32④:37 4. T11④:21

现将 7 个灰坑的陶片统计如下：

表一 磁县下潘汪大司空类型 7 个灰坑陶片统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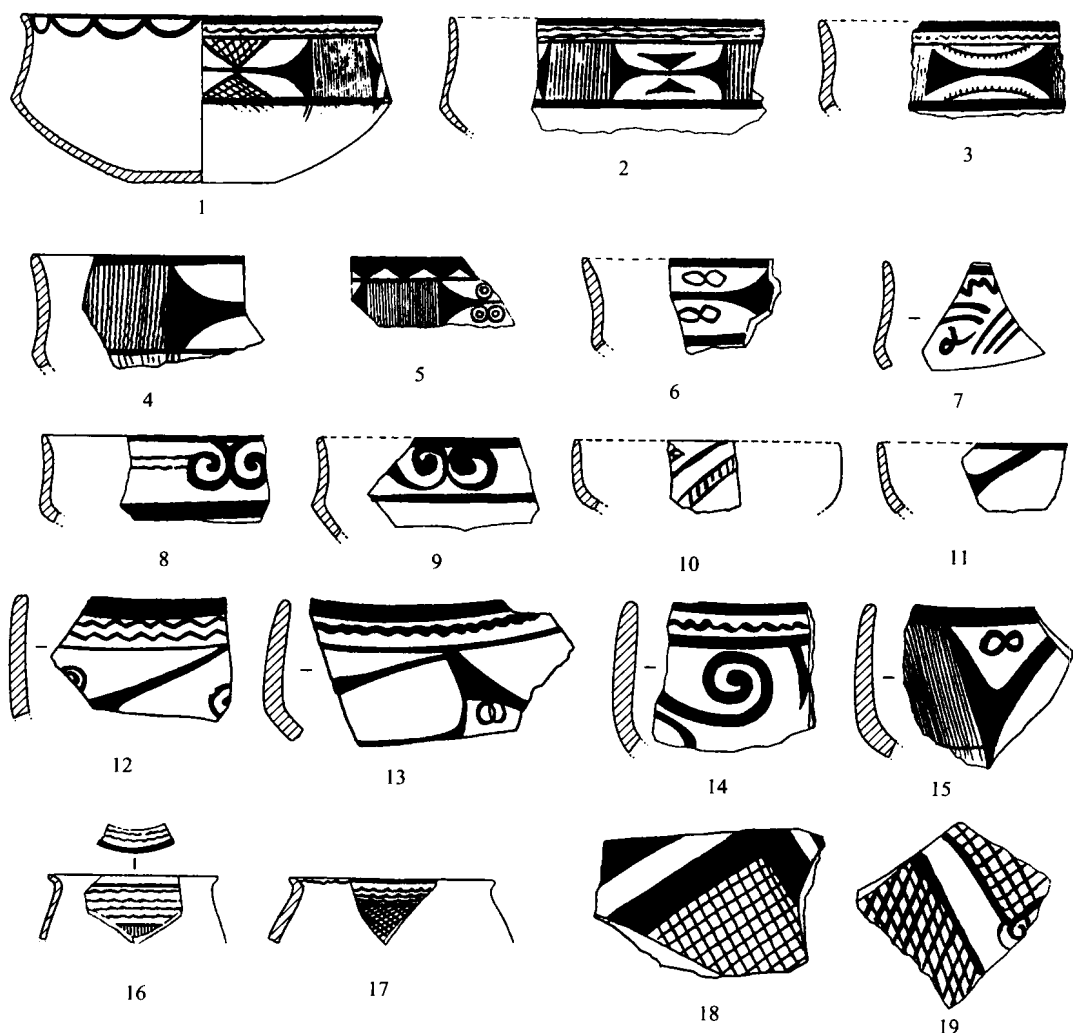
陶质陶色	素面	彩纹	篮纹	划纹	堆纹	线纹	剔刺纹	麻纹	小计	百分比 (%)
泥质灰陶	160	3	75	1	2	19			260	43.4
泥质红陶	24	141	6			6			177	29.5
夹砂灰陶	119				4	3	6	5	137	22.9
夹砂红陶	9		5				1		15	2.5
泥质黑陶	10								10	1.7
小计	322	144	86	1	6	28	7	5	599	100
百分比 (%)	53.7	24.0	14.3	0.2	1.0	4.7	1.2	0.9	100	100

(4) 洺关

遗址位于永年县城东侧，1986 年 3 月发掘 50 平方米。发掘简报注意到遗址中大部分为大司空类型的遗物，而第二层出土有龙山文化的遗物，于是认为这个遗址属于大司空类型晚期，并具有向龙山文化发展的过渡性质^①。实际上根据发表的资料来看，只有

①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永年县洺关遗址试掘简报》，《文物春秋》1990 年 4 期。

第3层和H3是属于大司空类型的，第2层和H1则是属于龙山文化的。属于大司空类型的陶器以灰陶为主，红陶次之，黑陶最少。彩陶多为泥质红陶，个别为泥质灰陶。彩纹主要为红色或紫红色，黑彩较少。施彩的器物主要为盆、钵、碗、罐四类。彩纹大致与下潘汪相似，盆上多由细腰纹和多道并列的曲线纹交错排列，钵上多由凹腰三角纹拼接的豆荚纹和多道并列的曲线纹交错排列，罐上多菱形网格纹。碗上的花纹比较自由，其中有两例斜梯格纹，是别的遗址所未见的（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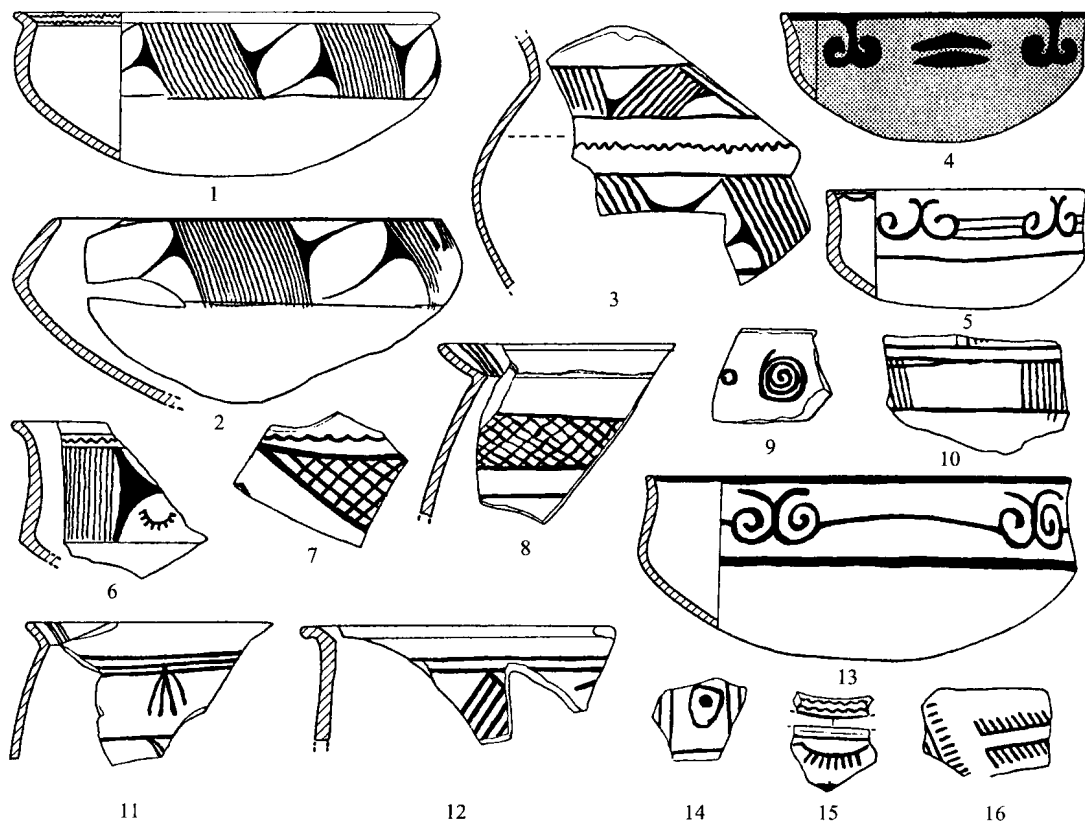


图八 永年洺关遗址的彩陶

1~9. 盆 (T3③:26、T1③:30、T2③:9、T3③:24、T1③:31、T3③:23、T1③:29、T1③:28、T3③:25) 10、11. 碗 (T3③:22、T3③:40) 16、17. 罐 (T1③:33、T1③:32) 12~15、18、19. 彩陶片 (T1③:27、T3②:22、T1③:41、T1③:26、T3②:24、T1③:35)

(5) 大正集老磨冈

遗址位于安阳以西约 15 公里，西南紧临洹河，面积约 3 万多平方米。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即已发现，1962 年调查时发现仰韶文化的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两种遗存，1963 年 11 月进行了发掘，发现的 8 个灰坑全部属于大司空类型^①。出土陶器以灰陶为主，红陶次之，还有少量的黑陶和白陶。绝大多数陶器为素面或打磨光滑，次为篮纹陶，约占 17%，彩陶约占 9%。彩纹绝大多数为红色或赭红色，少数为黑色。一般饰于泥质红陶上，也有饰于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上的。彩陶的器形主要为盆、钵、碗三种，还有一些大口罐（或曰深腹盆），与秦王寨类型的同类器十分相似。彩纹在盆上有细腰纹和蝶须纹，在钵上有由凹腰三角错接而形成的豆荚纹，但豆荚中没有装饰小品。大口罐上饰带状网格纹，也是秦王寨类型所常见的（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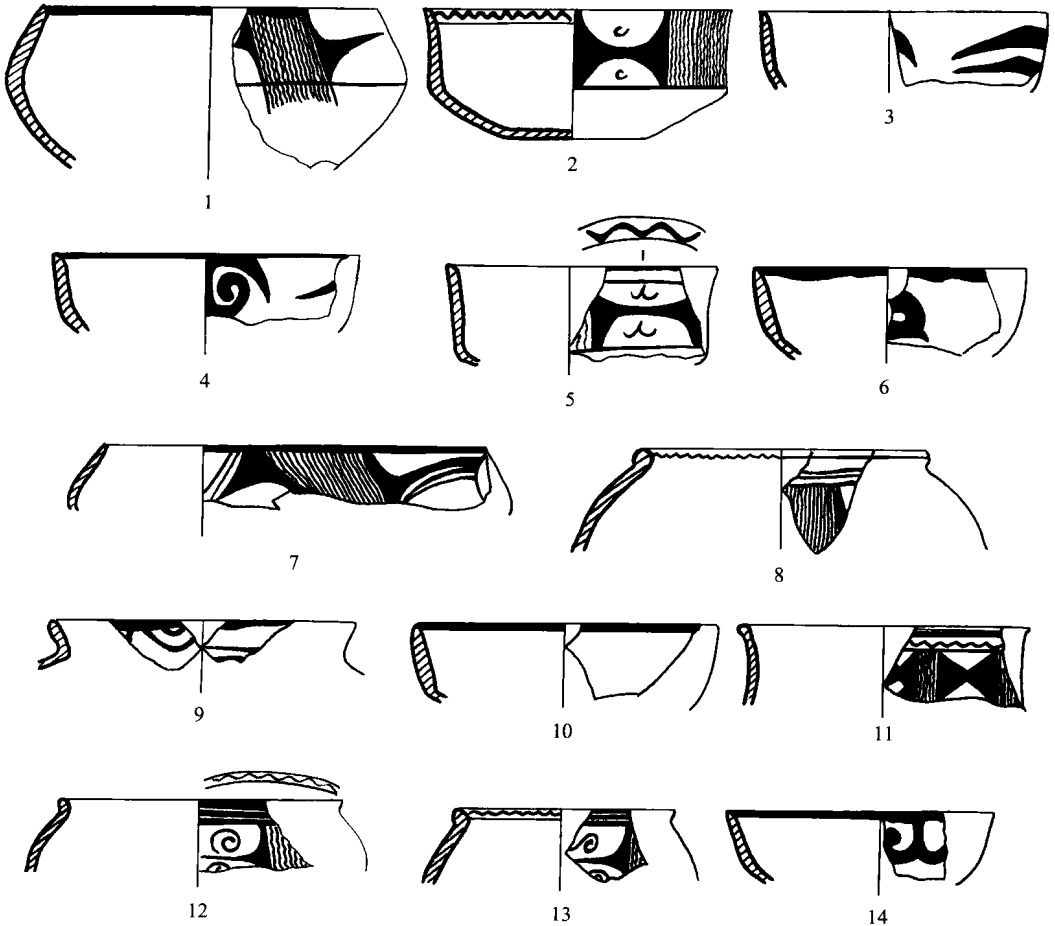
图九 安阳大正集老磨冈遗址的彩陶

- 1、6、13. 盆 (H7:32、H3:279、H1:42) 2. 钵 (H5:1) 3、8、11、12. 罐 (H2:4、T2:34、H3:78、H6:25)
4、5. 碗 (H6:69、T2:57) 7、9、10、14~16. 彩陶片 (H5:52、H1:17、H5:21、H5:158、H1:29、H3:88)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洹河流域几个遗址的试掘》，《考古》1965 年 7 期。

(6) 大寒南岗

大寒又名大韩，在安阳东约 15 公里。遗址在村南约 500 米的慢岗上，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主要为龙山文化的遗存，仅北部边缘有小面积的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的遗存。1962 年试掘曾经发现一座残房基和一个残灰坑^①。出土陶器几乎完全相同。与老磨冈相比虽然也比较接近，但还是有一些差别。主要是泥质红陶和彩陶的比例较高，彩陶花纹略显复杂，没有饰带状网格纹的大口罐等。彩陶器形只有盆、钵、碗、罐四种。盆上多饰细腰纹，罐上也饰细腰纹，则是别的遗址中所不见的。细腰上下的半月形空地上多有螺旋形和“C”形等小品纹样。碗上则有竹叶纹和螺旋纹等（图一〇）。兹将大寒南岗 H1 出土的陶片统计如下：



图一〇 安阳大寒南岗遗址的彩陶

1、7. 钵 (F1:1、H1:1) 2、5、11. 盆 (F1:2、H1:5、采:1) 3、4、6、10、14. 碗 (F1:4、F1:3、H1:2、H1:3、采:2) 8、9、12、13. 罐 (H1:9、H1:4、采:3、采:4)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洹河流域几个遗址的试掘》，《考古》1965年7期。

表二 安阳大寒南岗 H1 陶片统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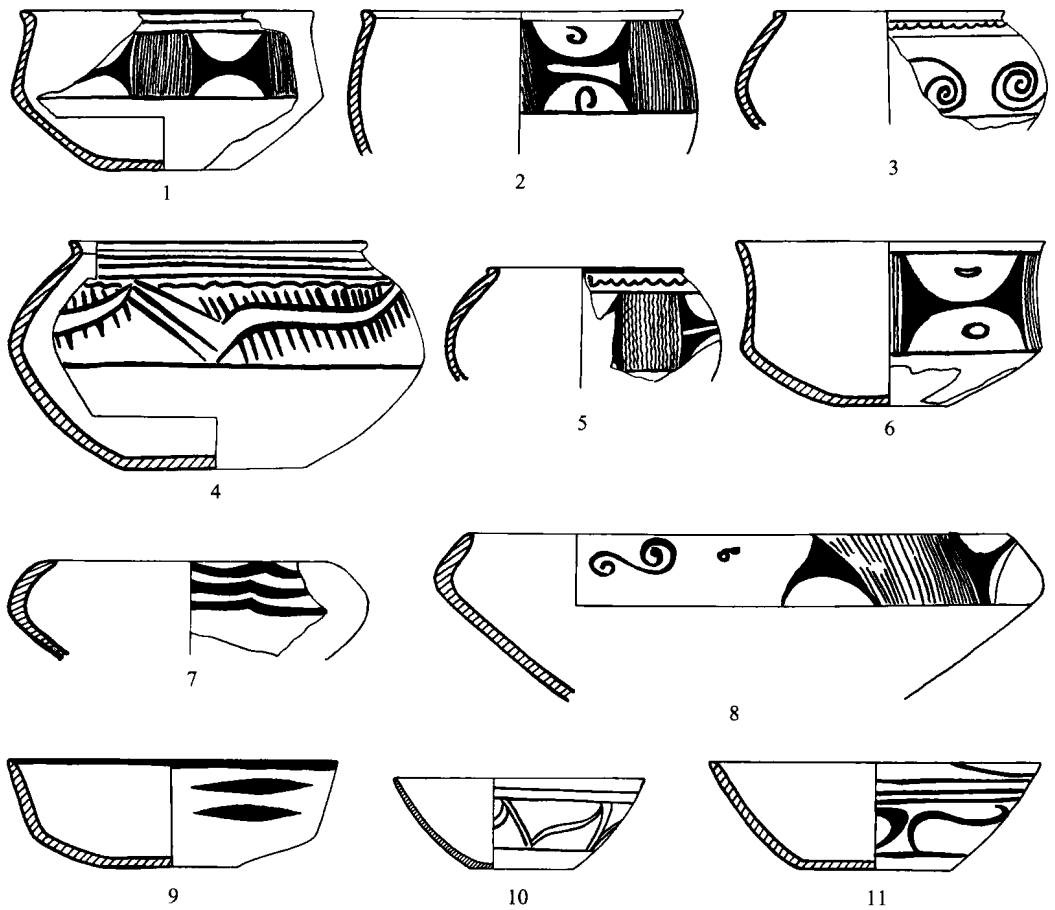
陶色陶质	彩陶	磨光	素面	堆纹	弦纹	线纹	篮纹	剔刺纹	小计	百分比 (%)
泥质红陶	37	18	47	1					103	33.9
泥质灰陶	14	39	28	1	2	1	3		88	28.9
泥质黑陶	5	5	1						11	3.6
夹砂灰陶			77	10	3		5	2	97	31.9
夹砂黑陶			5						5	1.6
小计	56	62	158	12	5	1	8	2	304	
百分比 (%)	18.4	20.4	52.0	3.9	1.6	0.3	2.6	0.7	100	100

(7) 鲍家堂

遗址位于安阳东偏南约 15 公里，东北距大寒南岗约 1 公里，是一处单纯的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的遗址，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文化遗存十分丰富。1962 年 11 月，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在安阳实习时调查发现了这个遗址并进行了试掘^①，1965 年北大师生又进行了较大面积的发掘，发掘面积 262 平方米，发现有两座陶窑和许多灰坑。其中 1 号窑旁的 H25 掩埋有 10 只完整的猪骨架；2 号陶窑旁边的 H5 掩埋有 1 只完整的猪骨架，H7 掩埋有 2 只完整的猪骨架。陶窑旁边还发现有和泥坑等，都是与烧制陶器相关的遗迹^②。鲍家堂的仰韶遗存明显有早晚之别，实习报告曾经分为两期，但正式报告发表时却完全没有提及。鲍家堂的大部分遗存跟大寒南岗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在西区与两座陶窑相关的 H5、H7、H22、H23 以及 H21、H25 和 H27 等出土的高领罐和纹饰散漫的彩陶罐、类似朱绘的罐、彩陶杯、类似大汶口文化的白陶罐和青灰陶杯等残片，不但在其他单位不见，就是在前述各遗址中也是不见的，而与下述的草店遗址所出十分相似。依据发掘报告，鲍家堂彩陶总计约占 6%，而我们统计的 62H1 为 9.4%，是较早的；晚期单位的陶片中彩陶不足 2%，它们应该大司空类型中最晚的遗存。鲍家堂彩陶花纹的种类比较丰富，其中瓣形纹、卷曲纹和逗点纹等是它处所未见的。就是同一种花纹的变化也比较多，例如 S 纹就有单线、双线（H7:112）和多线（H5:4）者，有正向（极少）和反向者，有两端卷曲为螺旋纹或仅略有弯曲者（H7:112）。圆圈纹有单圈、单圈加点、双圈和双圈加点等多种（图一一至一三）。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洹河流域几个遗址的试掘》，《考古》1965 年 7 期。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安阳鲍家堂仰韶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8 年 2 期。但是在这篇报告中没有关于 H7 掩埋猪骨架与和泥坑的记载。



图一一 安阳鲍家堂遗址的彩陶

1~6、9. 盆 (H4:5、H114:2、T1④:2、H7:6、T2001③:?, T2004③:6、T2001③:5) 7、8. 钵 (H1:7、H4:9)
10、11. 碗 (H7:7、H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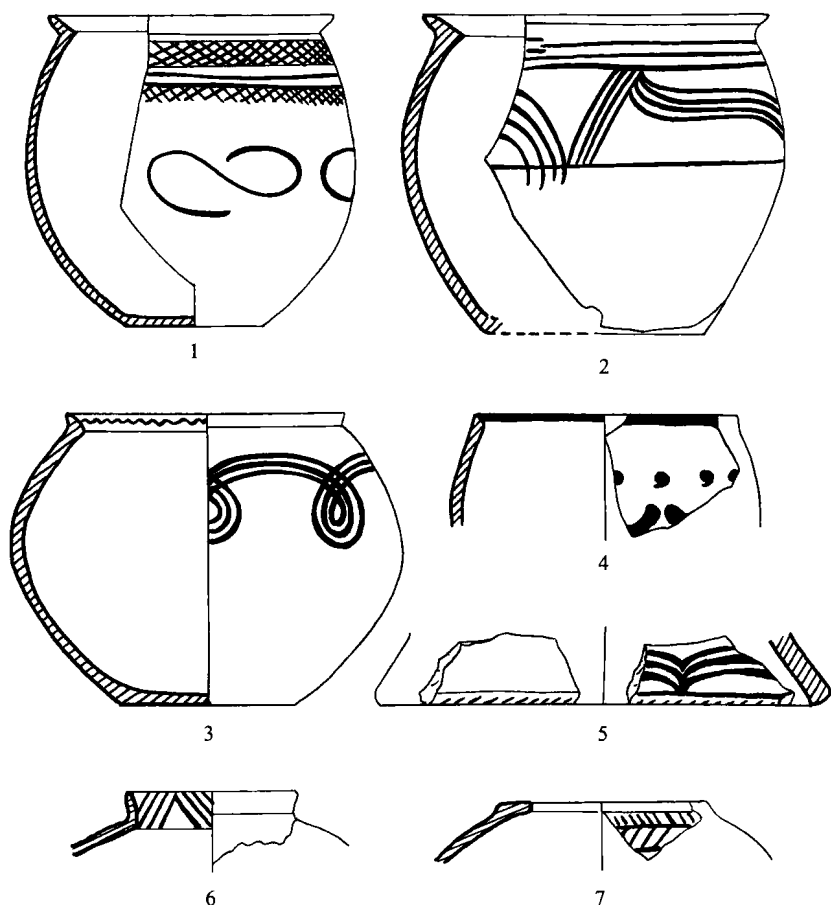
(8) 草店

浚县草店遗址是1965年北大师生考古调查时发现和试掘的，其彩陶也有盆、钵、碗和罐四种。彩纹画得比较草率，细腰纹和豆荚纹都有点变态，空地也没有加饰小品（图一四）。

(9) 柴庄

遗址在邢台市南约3.5公里，北临七里河并与柴庄隔河相对，面积约4.6万平方米^①。调查时发现东部和西部的彩陶有所不同，东部的与百家村基本一致，而西部的比

① 唐云明：《河北邢台柴庄遗址调查》，《考古》1964年6期。



图一二 安阳鲍家堂遗址的彩陶

1~4、6. 罐 (H108④:3、H5:4、H5:7、T3⑤:1、T1③:56) 5. 器盖 (T1④:3)
7. 敛口罐 (T1⑤: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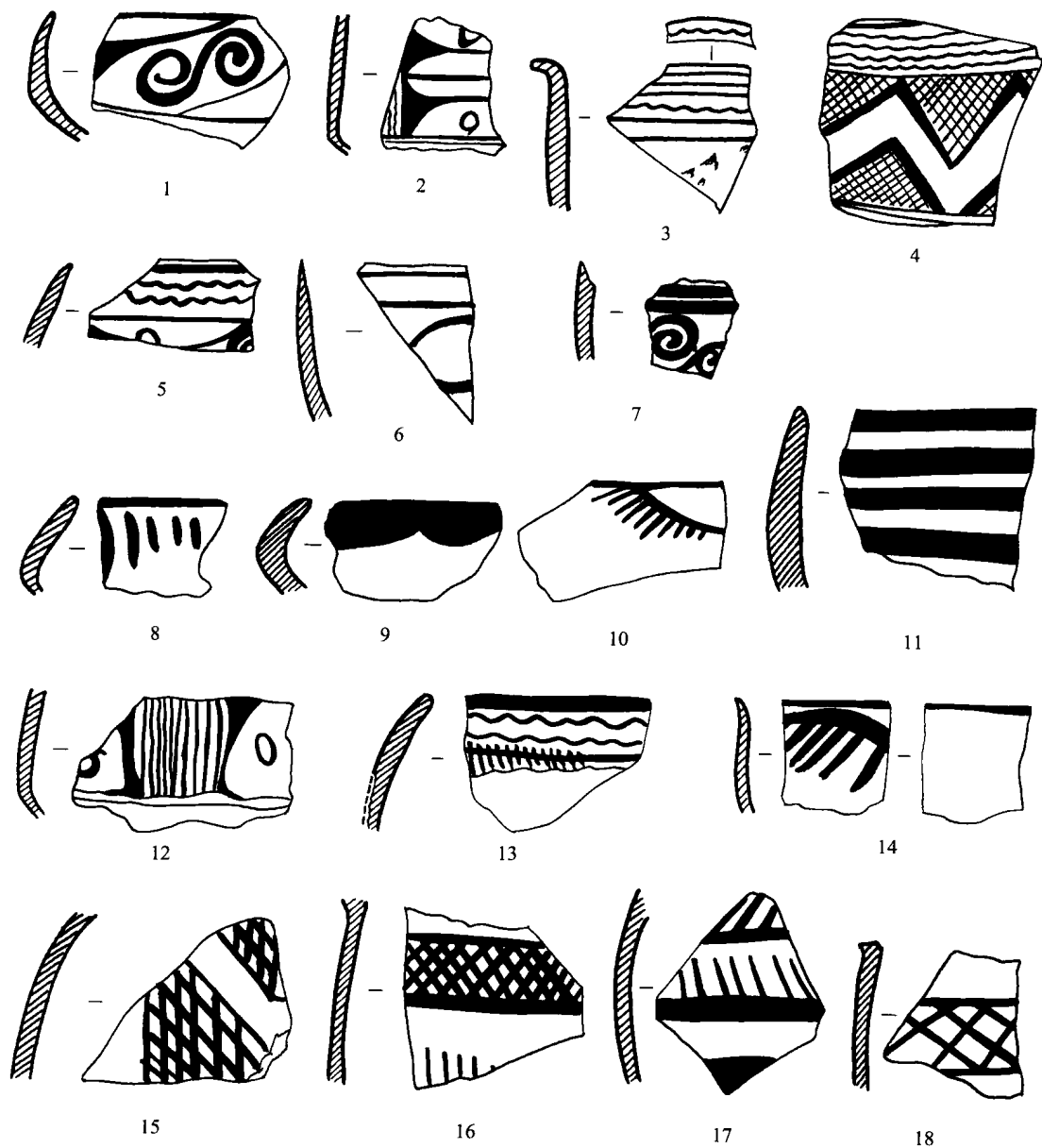
较特殊，难以确定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不同时期还是属于不同类型。不过西部的彩陶同鲍家堂晚期的比较接近，看来还是同一类型的不同时期的遗存（图一五）。

以上9个遗址的彩陶基本上包含了大司空类型所有彩陶的类别与构图方式，其余出彩陶的遗址还有以下几处：

邢台西黄村：1989年调查，面积约6000平方米，出土有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和大司空类型的彩陶片若干^①，后者与柴庄东部的彩陶片基本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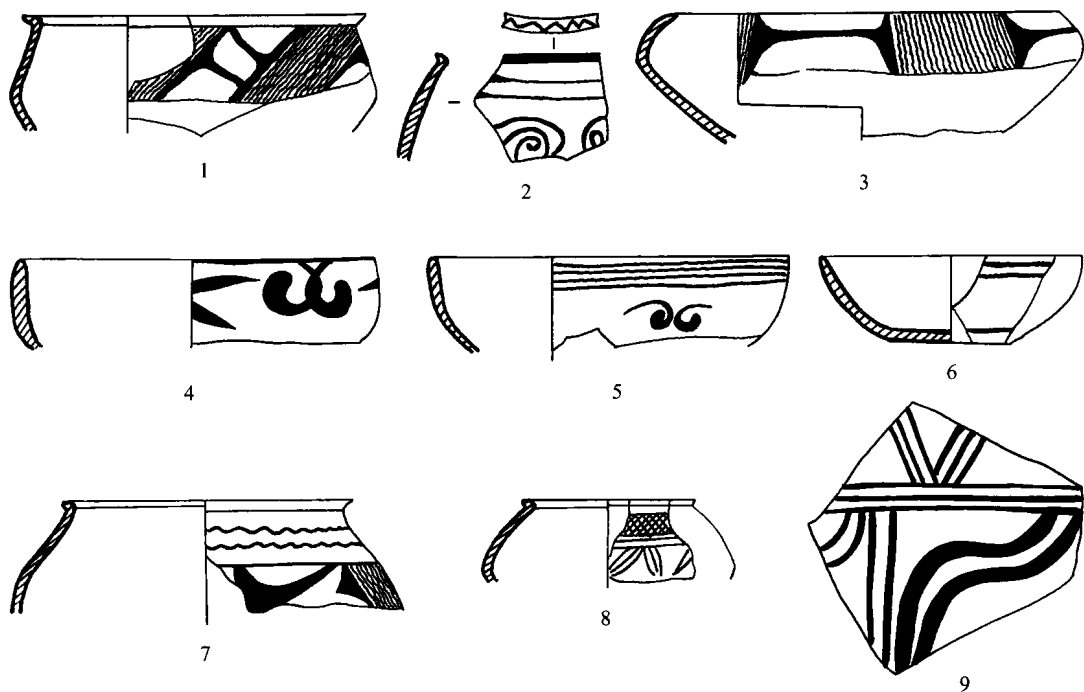
邯郸义西：遗址在邯郸市峰峰矿区义井镇义西村，1996年发掘1600平方米，发现

^① 河北省文物复查队邢台分队：《河北邢台县考古调查简报》，《文物春秋》1995年1期。



图一三 安阳鲍家堂遗址的彩陶片

4. T2⑤:24 10. H3 (余均采集)



图一四 浚县草店遗址的彩陶

1. 盆 (H4:1) 2、9. 彩陶片 (H2:4、T2②:2) 3. 钵 (H4:2) 4~6. 碗 (T2②:1、H2:1、H4:3) 7、8. 罐 (H101:1、H101:2)

有仰韶文化的后岗类型、大司空类型和先商文化的遗存^①，其中大司空类型的彩陶与百家村基本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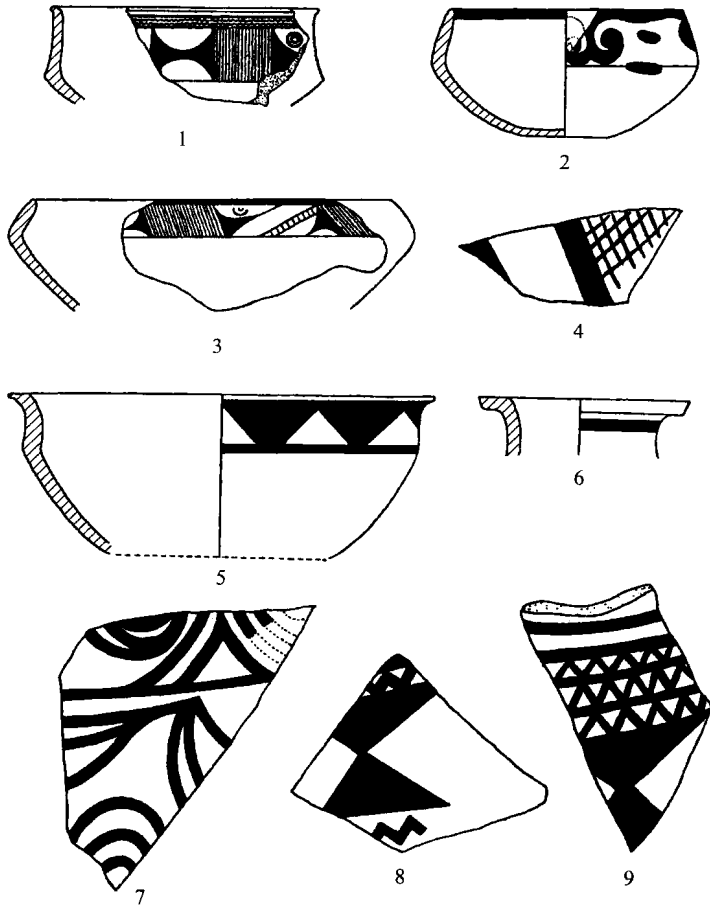
武安城二庄：遗址在县城西南约 10 公里，面积约 4 万平方米，1979 年调查和试掘，仅在遗址东部发现有大司空类型的遗存^②，其特征与界段营所出基本相同。

以上几处遗址的彩陶均不超出前述各主要遗址的彩陶的范围，只不过增加了若干分布点而已。至于新乡洛丝潭的彩陶则比较特别。该遗址位于新乡市西南约 5 公里，大部分已经被破坏，只剩下西部约 1 万平方米。1982 年试掘时出土了不少陶器^③。其中彩陶有盆、钵、碗、罐四种，后者还有大口罐、敛口罐和小口高领罐（或壶）三种。彩纹多为红色，也有黑色，个别有用红黑两种颜色的。在盆、钵上有类似凹腰三角相错接并与多道并列斜线纹交错排列的纹饰，但没有见到细腰纹。碗上有蝶须纹、钩纹和平行线

①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邯郸市峰峰电厂义西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2001 年 1 期。

②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洛河流域几处遗址的试掘》，《考古》1984 年 1 期。

③ 新乡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新乡县洛丝潭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5 年 2 期。



图一五 邢台柴庄遗址的彩陶

(据《考古》1964年6期317页图二、三，均为采集)

纹等。罐上则以带状网格纹最为发达，这和秦王寨类型有相似之处。有些碗上的纹饰也和秦王寨类型相似。不过秦王寨类型多鼎，这里只发现两个鼎足，两者的差别是明显的。要之洛丝潭还应该归属于大司空类型，只是因为处在南部边缘，文化面貌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同时又受到秦王寨类型的强烈影响。

除此以外，据说在汤阴程岗、武陟东石寺、永年西阳城和临漳西太平等处也发现过大司空类型的彩陶，但是未见发表资料。即使把这些遗址都算在一起，再加上前已述及的安阳同乐寨、高井台子和大司空村，总数也不过20处。而且一般遗址仅有几千或几万平方米，最大的鲍家堂遗址只有15万平方米。整个类型的分布范围也不过一万多平方公里，可见其发达程度远不如西南边的秦王寨类型和东边的大汶口文化花厅类型（大司空类型的年代大约与花厅类型相当），可谓是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袖珍型的地

方类型。

三 彩陶花纹的类别与构图方式

大司空类型的彩陶片，在下潘汪占全部陶片的24%，在大寒南岗占18.4%，两处的彩陶都属于该类型的较早时期。须知一件彩陶器物上画彩的部位只占全器表面的一半多一点。下潘汪遗址复原的器物稍多，所以统计出的比例稍高。如果都能复原，彩陶器将占三分之一以上。在我国众多有彩陶的史前文化类型中，除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外，大司空类型早期的彩陶应该是最发达的，到晚期则显著减少。

大司空类型彩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高度统一。一是全部为几何形花纹，不见任何动物纹或其他象生性花纹。二是以红彩为主，大约占90%以上。这在全国有彩陶的史前文化类型中也是最突出的。而且不用陶衣，也不见内彩。三是大量使用细线纹，线体宽度不到半毫米，这也是其他彩陶文化类型中所仅见的。四是花纹母题和构图方式的高度统一，用一对曲腰三角纹拼成的豆荚纹和一对凹腰三角纹联结成的细腰纹配以成组的细波线几乎占了所有彩陶花纹的80%以上。同时在大的统一性中又有许多细小的变化以避免千篇一律。特别是在豆荚形和细腰纹上下的半月形空地中常常配以各种各样的用细线描画的小品，非常雅致。下面按彩陶花纹的基本元素、主要母题和构图方式作一分析。

1. 构成花纹的基本元素

构成大司空类型彩陶花纹的基本元素主要有线体和块体，还有少量条带纹。所有花纹都由这三种元素构成（图一六）。

A. **线体**：在大司空类型的彩陶中特别发达，一般线宽不到半毫米，绝大多数为各种连续曲线或波线，直线和其他种类细线很少。分列如下：

A1. **直线**：未见垂直者，有横线、左斜和右斜三种，数量较少，是构成网格纹的基本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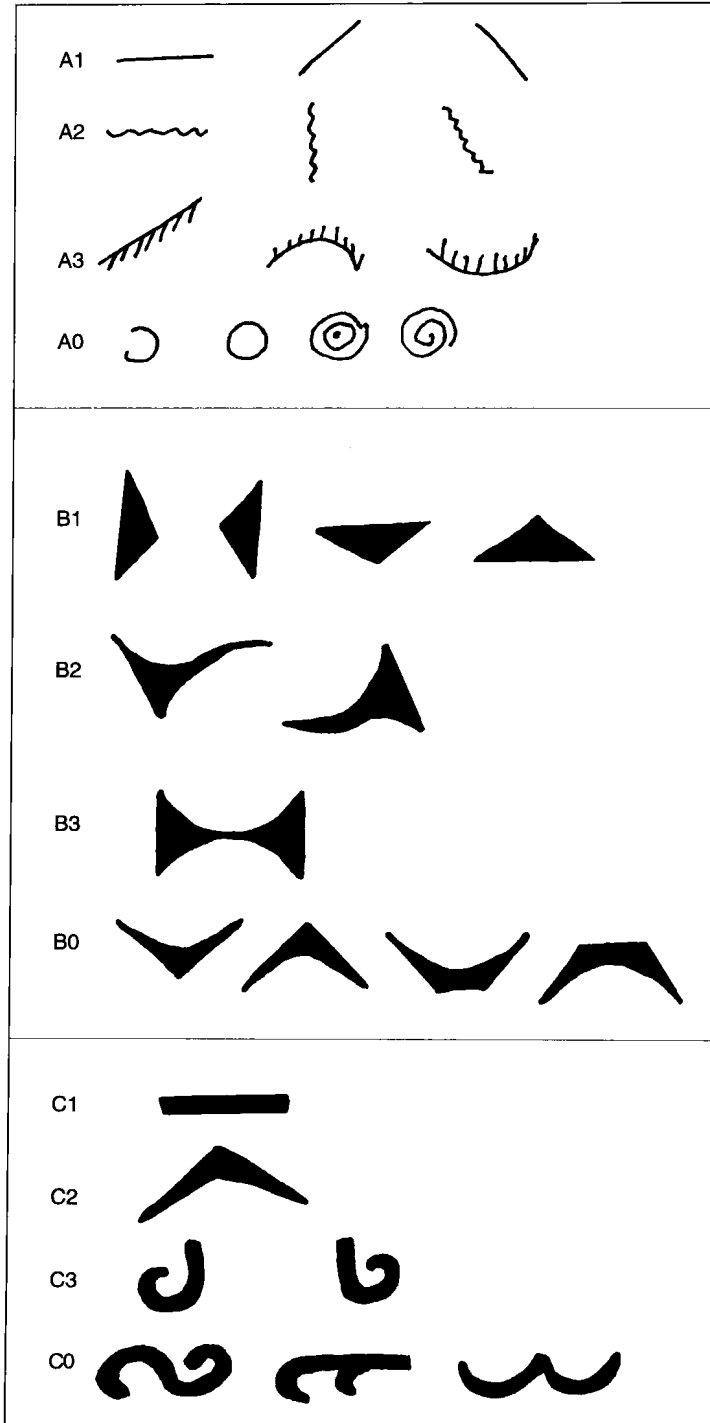
A2. **波线**：为波纹状的连续小曲线，有竖行、横行、斜行等各种，数量极多，往往有许多条紧密排列成组。

A3. **带刺线**：有弧形、斜形等各种。

此外还有弧形、螺旋形和圆圈等，多为填空的小品，而且有不少变体。

B. **块体**：除个别例外，绝大多数是三角形的变体，可以大致分为7种，就中以凹腰三角形和细腰形为最多。

B1. **等腰三角形**：有顶点向上、向下、向左和向右四种，为数极少。



图一六 大司空类型彩陶花纹的基本元素

A. 线体元素 B. 块体元素 C. 条带元素

B2. 曲腰三角形：两腰凹曲且不对称，底边有向左下和向右上两种，数量极多，是构成豆荚纹的基本元素。

B3. 细腰形：由两个凹腰三角形的顶点相连接而成，有如横置的细腰，数量极多。其他还有凹斜边三角形、元宝形和小长方块等。

C. 条带：一般宽2毫米以上，多饰于碗、罐上，形态变化较多，可分为以下几种：

C1. 横条形：见于碗的口沿，少数见于罐或杯上。

C2. 人字形：末端为尖叶形。

C3. 弯钩形：有左钩和右钩。

此外还有钩爪纹和反“S”纹等。

2. 主体纹饰的基本母题

主体纹饰，即饰于器物上腹部最醒目位置的纹饰。往往由几种元素拼合而成各种母题，再由一种或两种母题交错排列为整个主体纹饰。最常见的母题有以下几种（图一七）：

1) 豆荚纹：由两个凹腰三角形错向对接，中间形成豆荚形空地。在空地中填充像豆子一样的圆点或圆圈、曲线纹、折线纹、“S”纹等小品，变化甚多。有时在豆荚上下的空地也填充小品纹饰，形成一个完整的母题。

2) 细腰与半月纹：细腰横置，形成上下两个半月形空地，然后在空地中填充圆圈、梳子、半圆弧等小品纹饰，变化甚多，与细腰纹共同构成完整的母题。

3) 成组波线纹。

4) 叠“人”字纹：由两个“人”字形上下相叠，仅见于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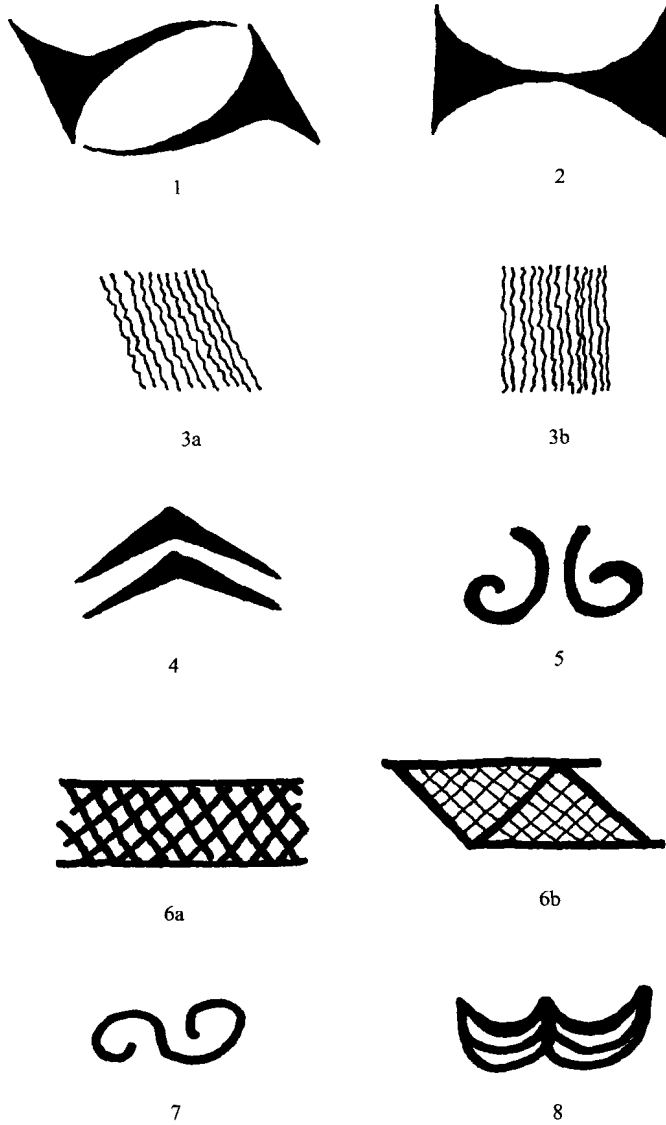
5) 蝶须纹：由一对反向的弯钩组成，形如蝶须。

6) 网格纹：有带状、菱形和三角形等多种。

此外还有反“S”纹、垂弧纹等。

3. 镶边的纹饰

镶边纹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镶在主体纹饰的上边或上下两边，另一种是画在盆或罐的口沿面上。镶在主体纹饰上边的（也就是盆、钵类紧贴口沿外边的）多为两道横线夹一至三道细波线，或仅画一至三道横线。主体纹饰的下边多只画一道横线。画在盆或个别罐的口沿面上的花纹大致与主体纹饰上边的花纹相同，也多是两道横线之间夹一两道细波线。从顶面看则是几个圆圈。也有个别成组相错排列的斜线纹，如下潘汪的一件罐口沿的纹饰便是（图七，1）。还有画整个一圈小长方块的，如下潘汪一件盆的口沿上的纹饰便是这样（图五，8）。



图一七 大司空类型彩陶花纹的基本母题

1. 豆荚纹 2. 细腰纹 3. 成组波线纹 4. 叠“人”字纹 5. 蝶须纹 6. 网格纹
7. 反“S”纹 8. 垂弧纹

4. 构图方式

大司空类型彩陶的构图一般由主体纹饰加镶边纹饰组成。不同的主体纹饰可以有

相同的镶边纹饰。而主体纹饰则可以是一种母题的重复，也可以是两种母题的交替排列。大致的情况是，盆类的主体纹饰多是由细腰纹与成组竖细波纹两种母题交替排列。每种母题各出现三次，个别的出现四次。钵类的主体纹饰则多由豆荚纹与成组斜细波纹交替排列，每种母题也是各重复三次，个别的重复四次。为避免豆荚中或细腰纹上下形成的半月形地子显得过于空旷，便在其中加入各式各样的小品纹饰，形成一种特殊的风格。

碗上的主体花纹有的只有一种母题，如蝶须纹或竹叶纹等多次重复排列。有的则用两种母题交错排列，如老磨冈的 H6:69 便是（图九，4）。个别蝶须纹还用一道或三道横线相连（图九，5）。罐上的主体花纹有的是同一母题的重复，有的是两种母题交替布局。晚期的大口罐上多饰带状网格纹，在网格纹下常常有三个左右的“~”形纹等。

四 彩陶纹饰与器形的关系

大司空类型的彩陶器形比较简单，主要是盆、钵、碗、罐四种，另有极少数杯和陶环。一般的说，不同的器形有不同的纹饰，只有少量的交叉现象。

盆上最常见的主体纹饰是细腰纹加成组竖细波纹。也有个别的豆荚纹加成组斜细波纹或蝶须纹。

钵上最常见的主体纹饰是豆荚纹加成组斜细波纹。也有个别的蝶须纹和重叠垂弧纹。

碗上最常见的主体纹饰是竹叶纹和蝶须纹。也有个别的横线纹和变体“S”纹。

罐上的纹饰变化较多，主要有网格纹，也有成组相错的斜线纹、豆荚纹和细腰纹等。

以上情况说明大司空类型彩陶规范化的程度是特别高的。若从发展来看，早期最为规范，晚期则有较大变化，这在下一节还要讨论。

五 花纹的演变与地域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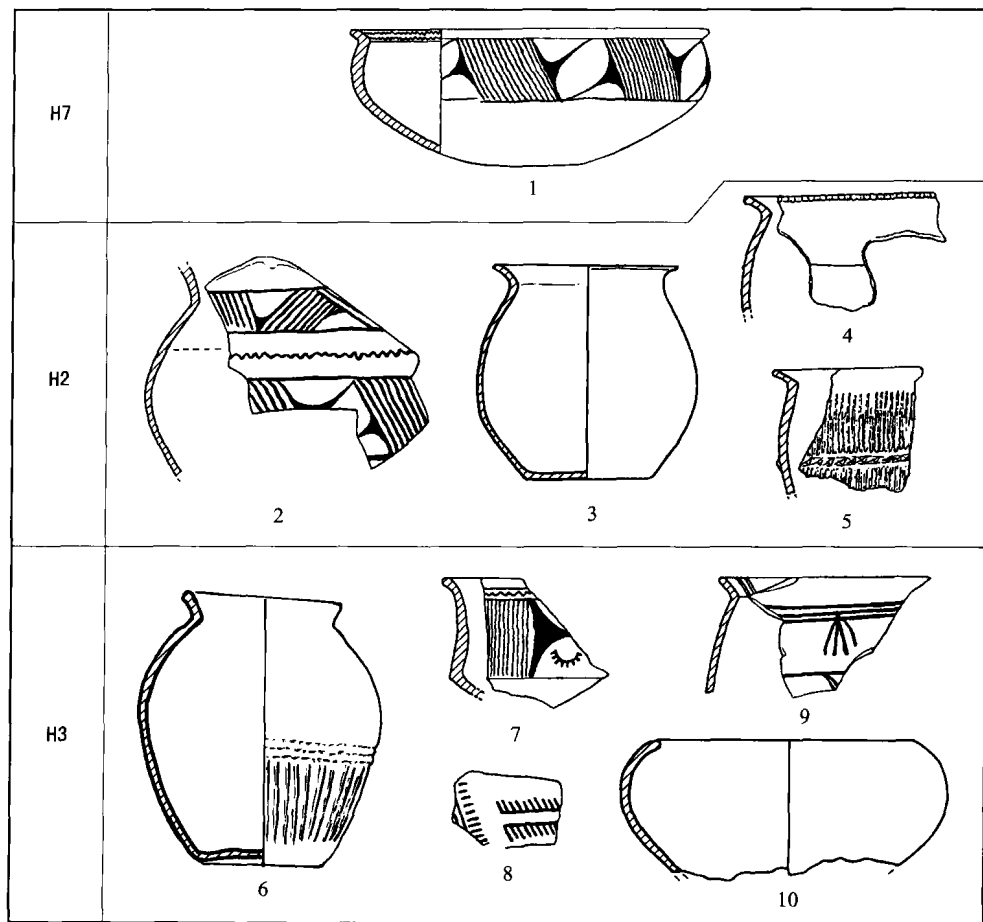
若要理清彩陶花纹本身演变发展的轨迹，首先要对大司空类型的文化遗存进行分期。有的学者曾经进行过分期的尝试^①，但发展脉络并没有完全理清，所分各期特征也不甚明确。问题是仅仅根据已经发表的资料以进行细致的分期是困难的，倘若仅划分为早晚两期还是不难的。这不妨碍个别遗址可以划分得更细一点。

我们首先注意有明确地层关系同时在相关地层中出有易于把握其特征的器物的遗址。可惜发表过这种资料的遗址不多，仅有安阳大正集老磨冈和鲍家堂两处。

根据老磨冈 T1、T2 的平面遗迹分布图和发表的器物图，可知有两组地层关系是符

^① 吴东风：《大司空文化陶器分期研究》，《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6年；陈冰白：《略论“大司空类型”》，《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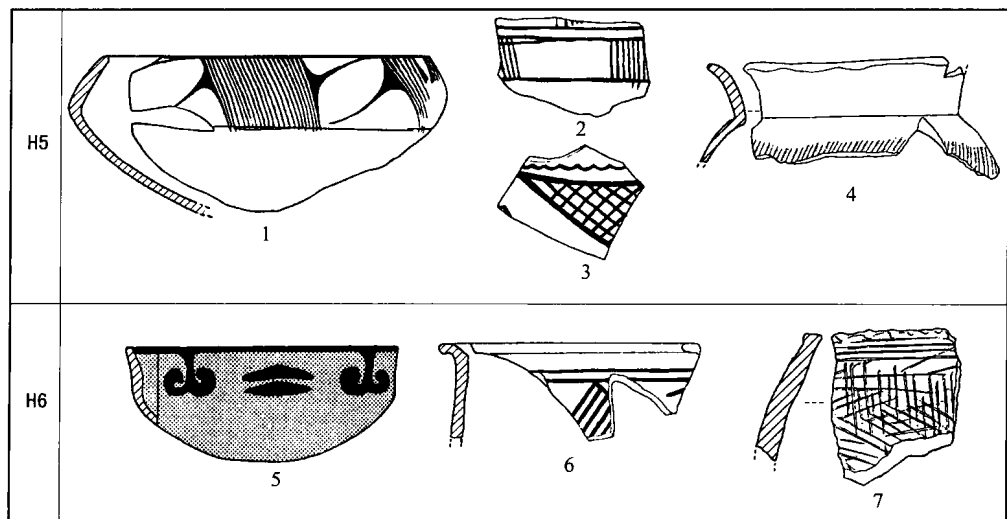
合上述条件的。第一组是 H3 打破 H2, H2 又打破 H7, 第二组是 H6 打破 H5。在第一组地层中, H7 只发表一件彩陶盆, 该盆折沿, 腹壁圆曲, 饰豆类纹加成组斜细波纹。其造型有点接近早先的钓鱼台类型的曲腹盆, 只是花纹已完全是大司空类型所特有的。说明它是大司空类型中较早的代表性器物。H2 出彩陶罐, 其纹饰一如 H7 那件彩陶盆, 只是分为上下两层。同出有一件素面罐和两件素面罐的残片, 还有绳纹罐残片等。H3 出土器物有折腹彩陶盆残片、饰平行横线的彩陶罐残片、篮纹罐、敛口钵以及素面和绳纹罐残片等(图一八)。其中除折腹彩陶盆外, 基本上与王湾二期第二段的陶器相同或相似, 应该是属于同一个时期的东西。在第二组地层关系中, H5 出土彩陶钵、网格纹彩陶和绳纹罐等, 其中彩陶钵与 H7 的彩陶盆腹壁弧度相近, 花纹则完全相同, 当是同



图一八 安阳大正集老磨冈陶器的演变(一)

1. H7:32 2. H2:4 3. H2:87 4. H2:41 5. H2:31 6. H3:169 7. H3:279 8. H3:88
9. H3:78 10. H3:1

一时期的器物。H6 出土蝶须纹和叠人字纹碗、饰平行横线的彩陶罐残片等，其风格与 H3 所出器物相似，应该是同一时期的器物（图一九）。这样老磨冈的大司空类型遗存就至少可分为两期。早期以 H7、H2 和 H5 为代表，晚期以 H3 和 H6 为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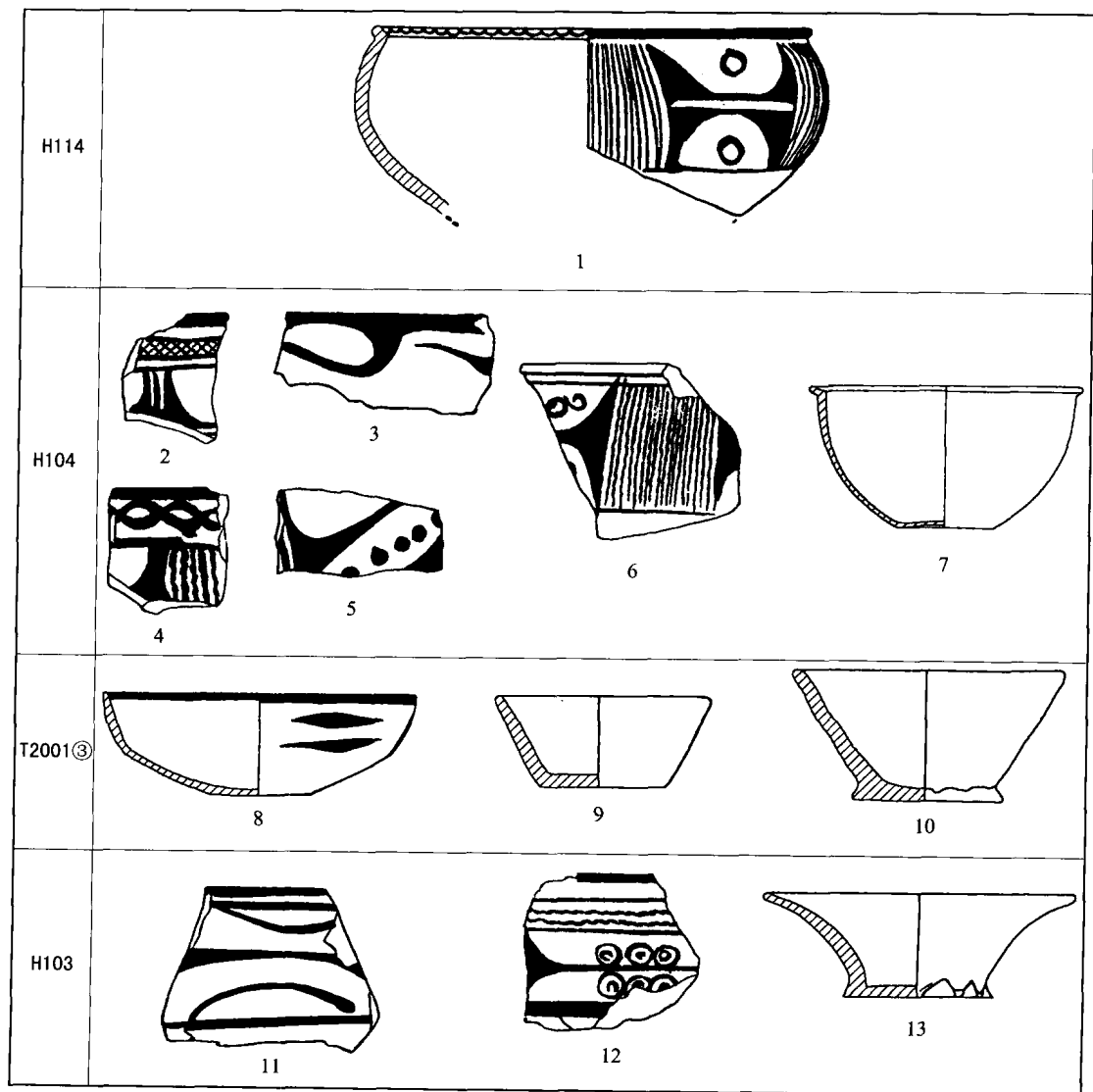


图一九 安阳大正集老磨冈陶器的演变（二）

1. H5:1 2. H5:21 3. H5:52 4. H5:9 5. H6:69 6. H6:25 7. H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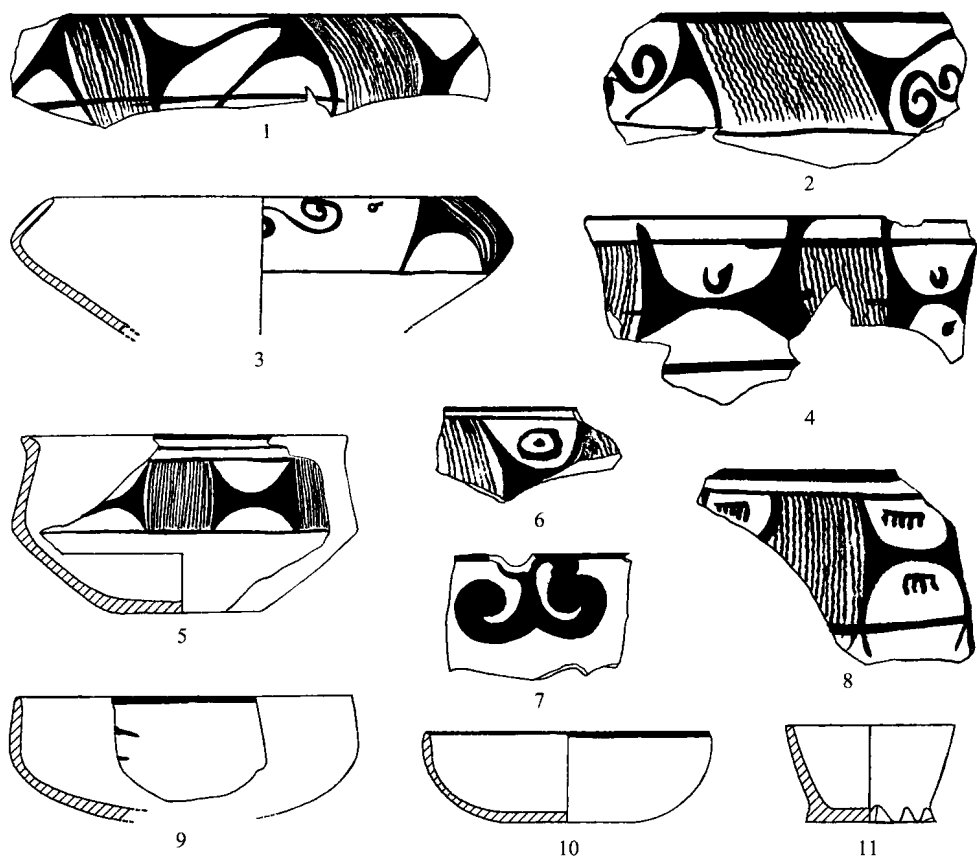
鲍家堂发掘面积比较大，地层关系比较复杂，有多组叠压打破关系，但符合上述条件的仅有一组，即 H103 打破 T2001③，后者叠压 H104，H104 又打破 H114。H114 出土一件彩陶盆，折沿，腹壁圆曲，形制与老磨冈 H7 所出彩陶盆相似，只是花纹不同。这件彩陶盆的花纹是细腰纹与竖细波纹依次排列，是大司空类型彩陶盆上常见的花纹。H104 出土若干彩陶片和一件素面陶盆，后者腹壁圆曲，形制与 H114:2 相近。有三件彩陶片饰细腰纹和竖细波纹，其中两件近口沿处有附加纹饰。还有一件饰豆荚纹，当是钵的残片；一件饰弯钩纹，可能是碗的残片。本单位全部遗物都表现为早期特征，只是比 H114 略晚。T2001③发表一件彩陶碗和两件素面碗，前者饰叠“人”字纹，纹样已经拉平几无折角，与老磨冈 H6:69 相似，二者应基本同时。素面碗一为平底，一在平底上捏成高低不平的边沿，似为器盖的捉手，则此碗实为器盖或碗、盖两用，此种盖也是晚期特征之一。H103 发表两片彩陶和一件碗盖，彩陶之一在平行横线间随意画两道曲线，风格与 H7 的两个碗接近。这件碗盖口比 T2001③:5 更敞，腹壁内凹，年代应该更晚。鲍家堂这组地层关系大体上反映了该遗址从早到晚的发展过程（图二〇）：与 H104 相近的有 H4（图二一），与 H103 相近的有 H5 和 H7（图二二）。因此鲍家堂大司空类型的遗存即可分为两期四段：早期一段有 H114，二段有 H104 和 H4，晚期一段有 T2001③，二段有 H103、H5 和 H7。

将老磨冈和鲍家堂的分期与其他遗址出土的陶器相比照，可以大致得出整个大司空类型的分期，但只能有较粗线条的分期而难以做到更细的分段。大体上属于早期的遗存有大司空、百家村、界段营、下潘汪、大寒南岗、大正集老磨冈的 H7、H2、H5，鲍家堂的 H4、H104 和 H114 以及柴庄的大部分彩陶。晚期主要有大正集老磨冈的 H3 和 H6，鲍家堂的 H7、H103 和 T2001③，以及草店的大部分遗存。从这个分期可以看出，大司



图二〇 安阳鲍家堂遗址的一组地层关系

1. H114:2 2~6. H104 (未编号) 7. H104:2 8. T2001③:5 9. T2001③:23 10. T2001③:15 11、12. H103 (未编号) 13. H10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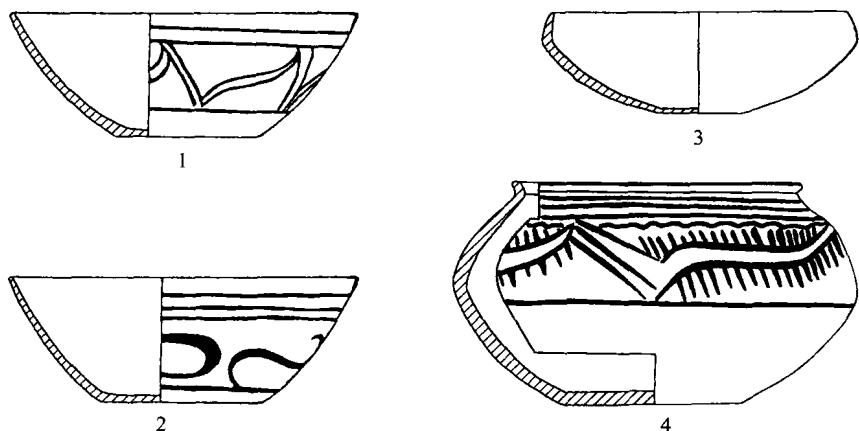


图二一 安阳鲍家堂遗址 H4 出土陶器

3. H4:9 5. H4:5 9. H4:8 10. H4:1 11. H4:4 (余未编号)

空类型早期的彩陶是比较发达的，特点也比较突出。尤其是饰豆荚纹和成组斜波纹的钵、细腰纹和成组竖波纹的折腹盆和蝶须纹与叠“人”字纹的碗最为突出。到晚期遗址显著减少，几种在早期流行的花纹都只剩下少量遗存，形态上也变得草率而不规范。与此同时却出现了较多的带状网格纹和与之相关的纹饰，这些纹饰不是早期典型花纹的发展，而是受到西南方的秦王寨类型影响的结果。至此大司空类型已经明显地衰落了（图二三）。

由于大司空类型分布的范围很小，其中心区仅限于邯郸—安阳一带，看不出多少地方差异。只是在北部的扩散区受到其北边以平山田兴和正定南阳庄第五期为代表的一类遗存的影响，南部的扩散区受到其西南边的秦王寨类型的影响，因而产生了一些地方性差异，而且早晚的变化也有所不同。



图二二 安阳鲍家堂遗址 H7 出土陶器

1. H7:7 2. H7:8 3. H7:4 4. H7:6

六 来龙去脉与文化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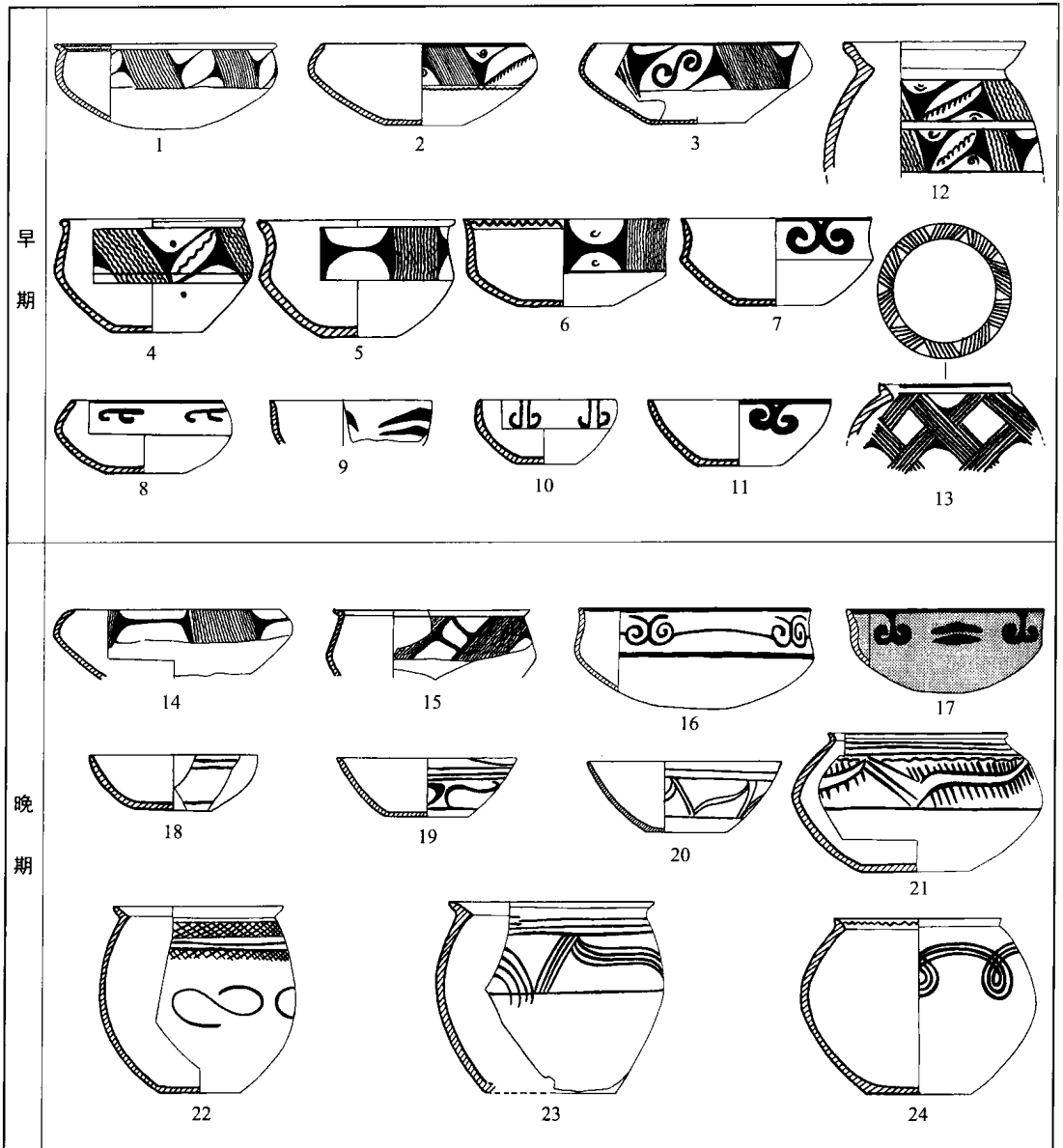
前面谈到，豫北冀南的仰韶文化可以分为后岗、钓鱼台、大司空和台口四个类型，分别代表四个发展时期。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的资料较多，特征鲜明，相对年代也比较清楚。问题在于钓鱼台类型和台口类型是否能够成立，它们的相对年代是否清楚，文化特征是否明确，这涉及大司空类型的来龙去脉问题。关于钓鱼台类型，我在《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一文中已有所论述^①，但语焉不详。现知在河北正定南阳庄^②、平山石疤沟^③、邢台西黄村西^④均有类似钓鱼台的陶器或陶片，包括双唇口尖底瓶、敛口钵、卷缘曲腹盆及饰回旋勾连纹的残片等。从整个仰韶文化来看，应该属于庙底沟期的范畴。正定南阳庄有明确的地层关系说明这类遗存晚于后岗类型。同样在南阳庄存在着类似大司空类型的遗存晚于钓鱼台类型的地层关系。发掘报告中所划分的第四期实际上属于钓鱼台类型，而第五期中有不少叠“人”字纹和网格纹的陶片，与大司空类型的彩陶无异，但更多的彩陶则具有自己的特色。因此南阳庄第五期应当是与大司空类型基本同时并且紧邻大司空类型北边的另一地方类型，并且也是钓鱼台类型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如此说来，大司空类型不过是钓鱼台类型之后继续分化出

① 严文明：《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仰韶文化研究》增订本 146 页，文物出版社，2009 年。

②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正定南阳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 年。

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平山县考古调查简报》，《文物春秋》1990 年 3 期。

④ 河北省文物复查队邢台分队：《河北邢台县考古调查简报》，《文物春秋》1995 年 1 期。



图二三 大司空类型彩陶分期图

1. 老磨冈 H7:32 2、7、11、12. 界段营 H35:4、H10:1、H21:1、H10:8 3. 大司空 T301:01 4、5、8、10、13. 下潘汪 H99:2、T50④a:14、T33④a:17、H99:1、T32④:36 6、9. 大寒南岗 F1:2、F1:4 14、15、18. 草店 H4:2、H4:1、H4:3 16、17. 老磨冈 H1:42、H6:69 19~24. 鲍家堂 H7:8、H7:7、H7:6、H108④:3、H5:4、H5:7

来的一个小小的地方类型而已。至于大司空类型与台口类型的关系，由于后者至今发现很少，难以作出详细的分析。只能大致推测是大司空类型进一步衰落的产物。再往后就

是后岗二期文化了。

在大司空类型的彩陶中，可以看出不少秦王寨类型的影响，尤其到晚期更加明显。那就是以带状网格纹为代表的花纹的普遍化。这种花纹在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的花厅期也颇流行。这是一种较大范围出现的趋势，即几乎所有彩陶花纹都趋向线条化，带状网格纹广泛流行而块体花纹基本消失。再往后彩陶更急剧减少以至消失，从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龙山时代。这种情况在大司空类型的南北两翼，因为相邻的文化类型不同，相互影响的内容虽有差别，而总体发展的趋势还是基本相同的。

1989年初稿，2009年9月修改

山东 20 世纪的考古发现和 research

无论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格局来说，还是从中国考古学本身的发展历史来说，山东地区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年蒙文通提出的三民族说和徐旭生的三集团说，都把山东视为中国文明启蒙时期的三大鼎足之一。夷夏关系也是我国上古史的重要篇章，山东则属于东夷的一方。周代初年大封建时，齐、鲁是最被看重的两大诸侯国。秦汉以后山东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在中国考古学初起时，第一被看重的地方是中原的河南，特别是已经出土大量甲骨文的安阳殷墟；而第二重点就是山东。

山东的考古大约经历了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大约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1928 年，当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考古学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成立伊始，时任教于齐鲁大学的吴金鼎便调查了历城县汉平陵故城和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开启了山东考古的先河。不久中央研究院便与山东省政府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考察了益都苏埠屯、济南大辛庄和著名的齐国临淄故城等商周遗址，并且正式发掘城子崖遗址，首次发现了一个以黑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龙山文化，1934 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城子崖》^①。当时河南安阳殷墟刚开始发掘不久，便已经知道那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有很发达的青铜文明。跟着的一个问题自然是要了解她的来源，进而追溯中华文明的始原。正如李济在《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报告的序言中所说：“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但替殷墟一部分文化的来源找到一个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了一个新阶段”。因此他希望由此开始，能够“渐渐的上溯中国文化的原始，下释商周历史的形成”^②。1936 年日照两城镇的发掘又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在山东东南、西南多处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以及在邻近山东的河南北部和安徽北部的一

① 傅斯年、李济等：《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 年。

② 傅斯年、李济等：《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XIV 和 XVI 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 年。

系列考古调查与发掘，大大推进了对于龙山文化的认识。1939年梁思永发表《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①的论文，对这个时期考古工作的成果做了很好的总结。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取得这些成绩是不容易的，可惜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不久就被日本的侵华战争所打断。

第二阶段大约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间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从整个时期来看，还可以说是全面打基础和快速发展的时期。50年代初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山东省博物馆相继成立，随即配合基本建设对全省考古遗址进行调查，选择重点遗址进行了发掘。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山东队，主动地或与省方合作进行考古工作。1972年山东大学建立考古专业，成为在山东境内开展考古工作的又一支生力军。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也不止一次地在临淄等地进行田野考古实习。这个时期山东省的考古工作，从地域来讲几乎遍及全省，从时代来讲涉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汉唐乃至元明的各个时期，其中尤以新石器时代和商周考古成绩最为突出。

此前山东的新石器时代只知道有龙山文化。1959年泰安大汶口墓地的发掘^②，揭示了一种崭新的文化，此后又有多处重要发现并被命名为大汶口文化。从地层关系和文化内涵的比较来看，可以确定大汶口文化早于龙山文化，并且是龙山文化的直接前身，解决了龙山文化的渊源问题，连带也廓清了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这一长期未能正确认识的问题。

这个时期山东的商周考古主要由省博物馆承担。商代考古最重要的收获是益都（今青州）苏埠屯两座大墓的发掘。其中1号大墓有四个墓道，殉葬48人，出土一批精美铜器，这种高规格的商代墓葬至今还是殷墟商代王陵之外所仅见的。两周考古的重点则是临淄齐国故城和曲阜鲁国故城的勘探与发掘^③，通过多年的工作，对两座故城的形制、布局结构和年代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基本上弄清了齐鲁文化不同时期的特点，为故城的保护和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这个时期的秦汉考古也颇多收获，其最重要的成果，当数曲阜九龙山四座可能是鲁王的墓葬的发掘和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近5000支竹简的发现。

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之末，是山东考古向全面和纵深大发展的时期，其势头至今方兴未艾。其标志是198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成立。我们看到

① 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梁思永考古论文集》145～152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②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

③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

这个所一成立就着手全面规划和开展全省的考古工作。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和北京大学考古系等单位也加强了在山东地区的考古工作，特别是加强了各单位之间的协作，从而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首先是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文化谱系。过去山东没有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就是新石器时代的较早遗存也不清楚。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这些缺环已逐步填补起来。80 年代初发现的沂源猿人化石及相关的文化遗存，使一向寂寞的山东旧石器时代考古正式揭幕。接着在沂沭流域和汶泗流域发现了近百处细石器地点，出土了大批的细石器。在此前后，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省也发现了许多细石器地点。尽管正式发掘的材料不多，地层关系大多不明，确切年代难以匡定，但从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来看，这些细石器遗存当是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变的中间环节，意义重大。

新石器时代考古先是在大汶口文化之前发现了北辛文化，接着又发现了年代更早的后李文化，从此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基本面貌得以揭示出来。从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的一个相当完整的发展谱系已经建立起来，只剩下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还不大清楚。

至于龙山文化的后继者是什么，在很长时间是不清楚的。正是在探索龙山文化去向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早期青铜文化——岳石文化。有趣的是，在认识岳石文化的基本特征之后，重新审视 30 年代初发掘的城子崖遗址的资料时，发现它的下层以黑陶为特征的文化遗存并不单纯属于龙山文化，其中还包含有岳石文化的因素。对城子崖遗址的重新发掘，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个结论，并且在龙山文化的城址之上发现了十分先进的岳石文化的版筑城墙。而岳石文化则已被证明为夏代至早商时期的东夷族系的文化^①。

到了商周时期，中原的华夏文化逐步向东扩展，形成非常复杂的情况。起初在鲁西出现一些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时期的据点，以后商文化逐渐向东推进，直抵胶莱河流域，与当地夷人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从华夷杂处到华夷交融，出现了不少可能是由商人控制或者是吸收了商文化的夷人的国家。只有胶东和鲁东南地区还基本上是夷人的天下，表现为长岛等地的珍珠门文化和乳山等地的南黄庄遗存等^②。即使在这些文化遗存中也可以看到商周文化的影响。周代初年在山东建立了许多诸侯国，其中除齐、鲁外还有不少诸侯国的都城已经过勘探或试掘而得到确定，其中包括滕州滕国故城和薛国故城、寿光纪国故城、郯城郯国故城、莒县莒国故城和邹县邾国故城等。有些诸侯国的遗存则是由出土青铜器的铭文而确知的。

① 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 年 9 期。

②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胶东考古》244～268 页，文物出版社，2000 年。

这个时期秦汉及以后历史时期的考古则以墓葬发掘为主。单是1985年在齐鲁石化区就发掘了1700座汉墓。而1995~1996年在长清发掘的济北王墓则是规格最高、随葬器物最为丰富的一座。与此同时对汉画像的研究也有重大的进展。至于1996年青州龙兴寺大批彩绘佛教造像的发现与发掘，对于研究我国东部地区佛教的流传及其造型艺术的特点，更是一种突破性的进展。关于瓷窑遗址的研究也有不少收获。

与第二阶段相比，这个阶段的课题意识明显地加强了，考古方法也有许多改进。在新石器时代和商周考古方面，区系类型理论的贯彻相当明显，聚落演进和文明起源的研究也卓有成效。与此同时还特别注意聚落群和聚落等级的研究，注意大遗址的勘探和保护。在建设田野考古基地和苏秉琦先生提倡的考古实验站或考古资料中心方面也做了积极的探索。这些工作对于考古学本身的发展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从上面简单的叙述中，可以看出20世纪的山东考古已经由初探到全面发展而进入成熟的阶段了，其成果不但对研究山东乃至中国古代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考古学本身的发展也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本书（《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山东考古的主要成就，是山东考古的一个综合性的总结。取得这些成就是不容易的，其中包含了几代学人的辛勤努力。全书系统分明，重点突出，读者可以从中获得许多知识和重要的启示。

山东省文物考古界有一个勇于开拓和重视开放与协作的好传统，对高等学校的科研与教学实习也一贯给予大力支持。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的主要教师，包括邹衡、俞伟超、吕遵谔、李仰松、高明、张江凯、赵朝洪、高崇文和赵辉等，都曾经先后带领学生到山东有关地区进行田野考古实习。我个人从1978年带领学生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发掘的兖州王因的墓葬资料起，接着就在胶东地区、潍坊地区和济南郊区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对一些重要遗址进行了发掘，从而对山东考古有了一些实际的感受。在持续多年的工作中，绝大部分是跟省、地文物考古部门合作进行的，也有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合作的。我每次到山东，总是先拜访当时的省文物处长刘谷和文物考古所历任所长杨子范、张学海和李传荣等负责同志，向他们汇报和商谈具体的目标和计划安排，每次总是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地县的有关单位和同仁也无不积极配合协助。我有幸在考古工地上直接同郑笑梅、韩榕、吴诗池、何德亮、李步青、李前亭、王锡平、杜在忠等许多同学、同事和年轻朋友共事，共同研究考古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共同享受每一项新发现的乐趣，至今回想起来犹历历在目。张江凯本来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为了支持北大的考古实习，首先是借调，然后是调进北大考古学系，成为北大的主力教师之一，山东的考古实习许多是在他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大概就

是因为我与山东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本书的主编才要我在前面写几句话，要求我除了谈谈感受，还要提一些期望。我只好奉命再谈一些个人的肤浅之见。

前面讲了，山东考古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经过 20 世纪走过的非常不平坦的道路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学科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必然会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前进。展望山东考古的未来，需要开拓或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山东旧石器时代遗存至今发现不多，明显是考古工作做得不够。因为无论从自然环境和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发达的程度来看，还是从山东周围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山东旧石器时代文化理应比较发达，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潜力是很大的，应该纳入规划并切实开展工作。山东的细石器遗存发现甚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是探索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变的关键所在。而这一课题乃是中国考古学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学术界长期关注而苦于找不到突破的着力点。如果适当选择若干细石器遗址进行发掘，从地层关系、环境演变、文化分期及与前后文化的关系等各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是有可能弄清楚的。

从新石器时代起，山东就以一个相对独立而稳定的文化区呈现在人们面前。现在知道的山东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主要分布于鲁北地区的后李文化，稍后是主要分布于鲁中南的北辛文化。这两个文化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而后李文化只不过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仍然是一个未知数，这也是今后需要探索的一个重点。相对而言，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考古工作是做得比较多的，研究也是比较深入的。但大汶口文化的资料多出于墓葬，聚落遗址的工作做得比较少；龙山文化除墓葬以外虽然也发现过一些城址，但仅有大致的轮廓，城址的布局结构和功能等方面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研究。这关系到中国文明起源的具体途径问题，一定要作为学科的重点来加以推进。

岳石文化的发现是对东夷文化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但至今发现的遗址远远不及龙山文化。除城子崖城址有超过龙山文化的夯筑技术以及在尹家城等处发现有少量青铜器以外，其他方面似乎还不如龙山文化那么发达。这究竟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情况，还只是因为考古工作做得不够，或者两者都有，目前还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毕竟岳石文化的确认还是比较晚近的事。商周时期在山东是东夷与华夏从争斗走向融合并最终被华夏化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时期。其具体过程究竟怎样，现在虽然多少有些了解，但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多的发现与研究。至于秦汉及以后各时期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关于墓葬和一些专题的研究方面有比较多的成绩，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今后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以上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大目标上提出的一些思考。而要达到这些目标，还必须在田野考古的方法上有所改进，必须把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体现在田野考古的规划上并切实推

行，必须大力推进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加强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应用，使考古工作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为提高山东考古的整体水平，进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

（原为《山东 20 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序，科学出版社，2005 年）

江淮地区的文明化进程

——在“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主题是江淮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做文章要切题，我想就这个题目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先谈一下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基本情况，因为研究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的问题，固然要分析江淮地区的有关资料，但是要把问题说清楚，还是要放到全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认识和讨论。

中国文明研究的热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我记得在1985年，夏鼐先生把在日本发表的几篇演讲编成了一本书，题目就叫《中国文明的起源》。夏先生是一个很严谨的学者，他不到一定的时候不会提出什么新的看法。他在书里面是从殷墟的发掘开始讲起的，说在殷墟经过发掘以后证明商代晚期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然后向前追溯，到50年代，郑州商城的发现证明商代的前期也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再往前追溯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遗址的那些遗迹和遗物表明那个时候也应该进入文明时代了，至少二里头文化的晚期是这样。然后，他又讲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的形成不是一回事，文明的起源还应该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去追寻。他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是没有一点根据，因为在这之前有大汶口文化和陶寺文化的发现，两者从墓葬看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分化已经非常明显，跟一般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看到的人人平等、物质文化非常简单的情況有点不一样。80年代初，又有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十分壮观的“坛、庙、冢”和甘肃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的所谓“原始殿堂”的发现，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所以夏先生很明确地讲中国文明起源应该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去追寻。从那以后，中国一些地方有关文明化时期的遗存不断发现。1986、1987年在良渚文化遗址群里的反山、瑶山贵族坟山中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和漆器等的发现，引起学术界普遍的关注，甚至是很大的震动，没有想到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中会有那样高规格的墓葬和随葬物品。人们纷纷议论：到底良渚文化是走近了文明时代的门口，还是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了呢？这时期

* 2006年11月15日于安徽合肥。

另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各地不断发现史前的城址。在湖北天门石家河发现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址，面积达120万平方米，里面有很明确的功能划分，说明长江中游也正迅速走向文明化的进程。所以，1989年在长沙召开的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苏秉琦先生做总结发言时就明确提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中国考古学界的任务之一就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当成一个头等重要的任务。苏先生很早就关心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和文章。他的观点集中反映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这本书是苏先生口述、由郭大顺先生记录整理的。书中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三条：第一，中国文明是多元起源而不是由某一个中心起源然后向周围扩散。第二，既然是多元，在各地文明化进程的内容和方式是不一样的，各有特点，所以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时既要有宏观的把握，又应该研究各个文化区系的具体情况。第三，以中国之大，各个地方文明化的时间有先有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比较靠前，在那里首先产生了夏商周文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后来也陆续建立了自己的文明。这些文明从来不是彼此孤立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组成一种多元一体的结构，这种结构乃是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中国的基础。我觉得，苏先生以上的观点对于今天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应该具有重要的参照和指导意义。

现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热潮正方兴未艾。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想用更大的力度来支持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启动了“探源工程”。可以看出，我们现在的工作是有相当基础的，也是有理论指导的，不是从头开始，不是前人没做过工作，现在突然来个工程让大家去做。

探源工程之前，有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原有班子曾经做过一些探源工程的预研究，而且当时就打算基本上由这个班子把探源工程继续下去。我们当时觉得夏商周断代工程只是一个断代的研究，内容比较单纯，过去的研究也有比较好的基础。而所谓探源，就是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性质完全不一样，研究的内容复杂得多，年代更久远，地理范围也广阔得多，又没有多少古文献或古文字的资料可作参照。所以，像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组织形式恐怕不合适，也不利于发挥全国各单位和各位学者的积极性。因此，我们当时提议这个项目要吸收各有关方面的力量参加，各个单位、各位学者，只要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都可以申报。当然，还要组织专家来审查你的申报，如果合适的，就应该支持。为了保持公平和公正，专家组的成员虽然可以有自己的研究，但不得申报项目。现在基本上是采取这种方式在运作。鉴于文明起源的问题非常复杂，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短时期内不可能完成，甚至也很难说在某一个时期内取得某种明确的阶段性成果。探源应该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而不是一个可以一蹴而就的，只有某些具体课题才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完成。用工程的方式来操作不见得好，我一直不赞成叫什么工程。不过叫什么名称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国家支持，大家努力，至少可以

加速这一课题的进行。

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乃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组成部分。江淮地区不限于安徽，但主要在安徽。讲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主要是研究安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会上提供了很多资料，说明安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有不少新的发现，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但是，说实在话，比起周围的山东、江苏、浙江、河南等考古强省来，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也许我了解的还不够，但愿这个说法不很确切。

安徽比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如小山口、石山子、双墩和侯家寨一期等这样的遗存，究竟是一个考古学文化，还是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它们之间的早晚关系和文化关系如何，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晚一点的遗存有三块：一个是皖北，以尉迟寺遗址为中心的一类遗存，应该是大汶口文化在皖北地区的一个地方类型，现在做了不少工作。之后是一些相当于龙山文化的遗存，面貌比较接近王油坊类型，但工作做得并不太多。第二个就是江淮地区的西边，以薛家岗遗址为代表的薛家岗文化这类遗存，也做了不少工作。尉迟寺出了一本考古报告，薛家岗也出了一本报告。第三个就是江淮地区东部，以凌家滩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现在《凌家滩》报告也出来了。这三类文化遗存之间是什么关系？好像薛家岗文化和凌家滩文化比较接近，应该是江淮地区的主体文化。尉迟寺一类遗存则是另一个文化系统，其发展水平远不如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中心地区，文明化的迹象也并不显著。

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从薛家岗文化和凌家滩文化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薛家岗文化主要分布在安徽西部的长江北岸，长江南岸和湖北东部也有少量遗址。其中心遗址薛家岗面积不过10万平方米。从墓地情况看，早期（第一至第三期）都是小墓，看不出有分化的迹象。中期（第四、五期）出现较大变化，晚期没有发现墓葬。其中第四期个别墓随葬较多石器和少量玉器。第五期才出现几座较大的墓葬。如M44随葬陶器3件、石器9件和玉器33件，石器中有多孔石刀和画花果纹的石钺，玉器中有钺、镞、璜和管珠等，超出一般墓葬的规格。应该说这个时候已经迈开了走向文明脚步。但薛家岗遗址的中期无论从器物特征还是从碳-14年代来说，都已经相当于良渚文化的时期，而文明化的程度却远远不如良渚文化。相比之下，凌家滩文化就发达得多了。

关于凌家滩文化，这次会上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玉器，包括玉器的质地、产地、种类、形制、纹饰的解读及与文明起源的关系等各个方面都谈到了。我还是谈谈本行，想从遗址本身做一些观察，看看凌家滩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这也就是我在《凌家滩》报告序言中谈的内容。凌家滩是一个大的遗址，是一个100多万平方米的遗址，在安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对这个遗址基本上没有做全面的勘探和发掘，只做了些试掘，发现有大面积的火烧土堆积，估计是大型房屋的遗迹。其他情况并不清楚。墓地有两个，其中一个做了全面揭露，这提供了我们分析的基础。墓地有不同的层位，墓葬

之间有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但是要分期却很困难。一则是随葬的陶器较少，有些陶器又难以修复，不大好进行全面的类型学研究；二则也说明前后经历的时间并不很长，从陶器和其他器物上看不出明显的规律性变化。如果从平面来看，好像能够比较明确地分成几组。这种情况到底只是表面现象，还是反映一定的社会内容，则需要做具体的分析。我注意到，每一墓组中早晚墓葬的性质都差不多，说明墓组的划分不是随意的，从早到晚是比较稳定的。具体而言，墓地的南区是大墓的集中区，从早到晚都是如此，一些重器也出于此处。很明显，这个地方在墓地中占有很特殊的位置。西南、东南、西北的墓葬规模稍小，是第二等级的。但是，西南、东南的墓组，好像宗教性质比较浓，西北墓组从早到晚好像都是石匠、玉匠，墓中出了许多石器、玉器以及石料、玉料。东区的墓，陶器出土比较多一些，其他东西不太多。中区的墓则比较穷，而最穷的是北区的墓葬，规模小，随葬东西也最少。每一个墓组的墓葬数目不多，应该只有一个家族的规模，是一个家族在一定时期死亡者的墓葬。整个墓地的规模也不是很大，最多是一个氏族的规模，是一个氏族在一定时期内死亡人员埋葬的墓地。如果这个估计不至于大错，就说明在凌家滩时期氏族内部发生了分化。有比较富的家庭，代表社会的上层；也有比较穷的家庭，他们是社会的平民。在职能上也有分工，有的是宗教人士，有的是军人，有的是工匠。这种分化正是社会文明化过程中的重要表现。

凌家滩墓地的年代大致相当于薛家岗文化的早期，而发展水平远高于薛家岗文化。可见江淮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文明化的进程在东西两边有很大的差别。不但如此，即使在全中国的文明化进程中，凌家滩也是起步比较早的，在同时期文化中是发展水平比较高的。但是，为什么以后在安徽看不到其更进一步的发展？我想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考古工作还没有做到，一个是文明中心的转移。

中国史前文化有不同的区系，几个大的区系文化的发展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像山东及其左近的海岱文化区，从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直到岳石文化，都是前后相继、稳步发展的，还不时对邻境文化有所影响或冲击。到商代华夏势力才大举东进，到周代建立了齐、鲁等诸侯国，也还保持当地文化的许多特点。中原地区从裴李岗文化（以及白家文化）、仰韶文化到中原龙山文化，一直是强势文化，也是前后相继、稳步发展的。以后便成为夏商周三代的重要舞台。长江中游的两湖文化区，从彭头山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也是前后相继、稳步发展的，之后发生一些曲折，但深厚的文化底蕴并没有消失，所以到周代又出现了强大的楚国。江浙地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文化底蕴厚了，不是随便就会消失的，中间或许有一些变化起伏，但是在一定的时期还是会起作用的。

在几个大的文化区系之间还有比较小的区系或亚区系，江淮地区特别是安徽应该属于这种情况。亚区系或小区系的稳定性较差，容易受大区系强势文化的冲击，往往变化

比较大。凌家滩文化中心的转移，或许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

关于江淮地区特别是安徽的文明化进程，我们现在的认识仅止于此。至于如何开展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想提几点意见，不见得合适，仅供参考。

第一，要优先抓紧弄清楚江淮地区的文化区系。现在文化分区多少有些眉目，但是各个小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多不清楚或不完善，在文化分期基础上的谱系更做得不够。只有薛家岗文化的研究算是开了个头，也还没有完全解决。因此，首先要开展普遍而深入的考古调查，并适当地进行一些试掘，把各地文化分期搞清楚。这并不是很难的，但要定下心来认真去做。

第二，在基本上弄清楚文化谱系的基础上要找一些重点遗址进行发掘，包括在基本建设工程中发现的重要遗址。要改进发掘方法，严格按照经过修改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办事。要有聚落考古的意识，通过聚落形态演变的研究来扎扎实实探索江淮地区特别是安徽的文明化进程。

第三，要加强科技考古的投入，开展多学科合作，以便尽可能多地提取文明化过程中的各种信息，使研究的结果有血有肉，有立体感，而不只是干巴巴的几条。还可以经得起科学的检验。

第四，要加强与各个地方和各个考古单位的联系。因为邻近几个省相关问题的考古工作和研究都有不少值得安徽的同仁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当然安徽做得好的地方人家也要学习，相互交流沟通总有好处。如果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努力，我想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将会有更大的进展。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7年1月）

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个实例——凌家滩

安徽含山凌家滩是以出土玉器出名的，许多人发表了研究文章，并且专门出版了玉器图录。但玉器是从墓葬中出土的，那些墓葬又与祭坛处在同一个地点。而墓地与祭坛所依托的，乃是一个约 160 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通过 1987 年 6 月、11 月和 1998 年秋季三次考古发掘，墓地和祭坛已发掘约 2150 平方米。本报告（《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即是这三次发掘的总结。据说本墓地以北隔沟相对还有一片墓地没有发掘。至于遗址部分的调查和发掘情况，将等到工作告一段落后再整理出版。

凌家滩墓地位于一条从太湖山脚下伸向裕溪河边阶地的长土岗的尽头，像一个天然的坟岗。所以从清代到近现代都不断有人埋墓，考古发掘前还是一个乱坟岗子。墓地的发现就是因为 1985 年有人挖墓坑时发现了许多玉器和石器，由当地文物干部收缴上报，然后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张敬国等调查试掘才得以确定的。据此推测，那么多近现代墓挖坑时还不知破坏了多少新石器时代的墓葬，现在发掘的 44 座墓葬应该不是原有的数目。换句话说，当我们依据现有墓葬的情况来做出种种历史的或社会的结论时，应该适当地留有余地。

这里所谓祭坛，是指在原有土岗上筑成的中间平坦并略向周围倾斜的可能是长方形的台子。因为后期的破坏，原有形状已经难以确定。祭坛的底层是黄斑土，比较硬，似为夯筑。中间一层系用灰白色胶泥掺和石英碎块、大粒黄沙和小石子搅拌夯筑而成，非常坚硬。上面一层则是用灰黄色黏土掺和小鹅卵石、石英碎块和黑色玛瑙颗粒等铺垫而成，中间掺杂有红烧土碎块和碎陶片，表面平整。祭坛上面有三个“祭祀坑”和四个积石圈。单凭这些情况尚难以对它的性质和功能做出确切的判断，姑且以祭坛视之。

墓葬大约都打破祭坛或叠压在祭坛之上。祭坛是否叠压墓葬，因为没有发掘不得而知。但是墓葬本身也是有早晚关系的。根据报告提供的资料有以下几种情况：

被第一层叠压而打破第二层的墓葬有 87M2、87M3、87M6、87M7、98M3、98M4、98M7、98M17，共 8 座墓。

被第二层叠压而打破第三层的墓葬有 87M1、87M8 ~ 87M14、98M5、98M6、98M8、98M9、98M13 ~ 98M15、98M18 ~ 98M30，共 28 座墓。

被第三层叠压而打破第四层的墓葬有 87M4、87M17、98M16、98M31、98M32，共 5 座墓。

被第四层叠压的只有 87M15 一座。

我不知道各个探方的地层是不是统一划分的，比如 T1207 的第二、三层是不是相当于 T1214 的第二、三层。所以以上述划分来作为分期的依据只可能作为参考。报告认为被第四层叠压的是一期墓；开口第二层或三层下，打破第三层或第四层的是二期墓；开口一层下，打破第二层的是三期墓；这是大致的情況。在局部的地方也许还可能划得更细。

墓葬相互之间有打破关系的有以下几组：

- 1) 87M1→87M4
- 2) 87M7→87M8→87M15
- 3) 98M9→98M15
- 4) 98M9→98M18
- 5) 98M24→98M18
- 6) 98M13→98M8
- 7) 98M25→98M26→98M30
- 8) 98M25→98M27

这些打破关系可以对上述地层关系作补充和校正。

由于有些墓葬已被破坏，整个墓地的布局难以准确把握，但也不是毫无章法可循。初步看来，大致可以分为南、中、北、西南、西北和东六个墓区，有的墓区之间还有一些零星的墓葬难以归入某一区。

南区位于整个墓地南侧的正中央，顶级的大墓都在这一墓区。这里共有 5 座墓葬，有两组打破关系。估计东边还有几座大墓被现代坟丘破坏掉了。本区最早的墓当是 87M15，因为它是唯一被第四层叠压的，后来又被 87M8 打破。这墓出土玉器 94 件，石器 17 件，陶器也有 17 件，合计 128 件，数目仅次于较晚的 87M4。这墓出土的玉璜达 30 件，除 87M15:48 一件为宽体外，其余全部是窄体的。后者又有半环形和中间平直、两端上翘的倒桥形两类。在倒桥形的玉璜中，有的是分两段对接，末端有虎头或鸟头装饰，这种装饰乃是凌家滩大墓所特有的。这墓随葬的石器主要有钺（7 件）和镞（8 件）。钺均为圆弧刃，大孔；镞多扁薄，仅有一件大镞厚宽比近于 2/3。陶器有壶、罐、豆、盘等。豆盘外有凸棱，豆把为喇叭形，有圆形镂孔。

紧靠 87M15 正南面是 87M4，它被第三层叠压，打破第四层，年代上比 87M15 略晚。这墓出土玉器 103 件，石器 30 件，陶器 12 件，合计 145 件，是整个墓地中随葬器物最多的一座。最引人注意的是出土一副玉龟，在背甲和腹甲之间夹一块玉板。玉板中

央的小圆中刻八角星纹。小圆外刻一大圆，两圆之间等分为八格，每格中刻一圭形纹指向八方。大圆外刻四个圭形纹指向玉板的四角。玉板的三边有牙口并有若干穿孔，可能是连缀在某种有机物上的。这套奇特的玉器吸引了许多人的兴趣，均试图给予适当的解读。论者多以为是占卜用的原始栳盘。果如是，则 87M4 的墓主人当是一位有权势而又富有的宗教领袖。

87M4 的玉璜也有 19 件之多，器体较 87M15 者略宽，多为半环形，仅 3 件为倒桥形，且未见两件对接或末端刻鸟兽头者。石钺仍多圆弧刃，也有个别为梯形弧刃者。石铤、石凿厚宽比从 1/2 到 1.2 不等，明显厚于 87M15 者。最大石铤长 34 厘米，最大石钺也长 34 厘米，当非实用器而是最高权力的象征。

打破 87M15 的 87M8 被第二层叠压而打破第三层，年代上比 87M4 要晚。它的北部被 87M7 打破，只剩了半截墓，仍然出土了 64 件器物，其中有玉器 43 件，石器 18 件，陶器 3 件。如果不被破坏，原来器物一定更多，也是一个大墓的规格。这墓出土半环形宽体玉璜，其中两件的两端为虎首，一件外弧有细齿，这都是晚期的特点。玉镯和玉环甚多，还有玉玦和圆玉片，后者可能是镶嵌在漆木器上的。有 3 件梯形弧刃玉钺，也是晚期墓才出现的。同出石钺有圆弧刃和梯形弧刃两种，石铤则有薄体和厚体两种。

位于 87M15 和 87M4 之间的 87M1 是最早发现和发掘的，没有找到墓边。在层位上跟 87M8 相当，都是被第二层叠压而打破第三层，它本身又打破 87M4，因此是比 87M4 更晚的墓葬。这墓的出土物不多，但很特别。主要有三个形状几乎完全相同的玉人。每人头戴介形帽，双耳似戴玉玦，嘴上有稀疏的胡须，显为男性。双臂各佩 5~6 个玉镯，并且上屈开掌紧贴胸部。腰系宽带，双腿直立，赤脚。人体扁薄，后背有一对隧孔，当是穿缀在某种有机物上的，是巫师作法的器具，墓主人可能是专职的巫师，也许是 87M8 墓主人的副手。

从 87M15 经 87M4 到 87M8，前后三座最大的墓都处在墓地南侧正中的位置，这绝不是偶然的，而应该是一种精心的安排。可是再往后到 87M7 就发生变化了。87M7 打破第二层又打破 87M8，是墓地中最晚的墓。前面的三座大墓全是南北向，而 87M7 却是东西向，说明那时有一个大的变化。

87M7 有玉器 28 件，石器 11 件，陶器 5 件，合计 44 件，在 4 座东西向的墓中还算是最多的。主要有玉璜、小玉璧和玉玦等装饰品和石斧、石铤、石凿等工具，没有明确的宗教性器具。

总之，凌家滩顶级的大墓都在南区，尽管前后有些变化，南区的中心地位并没有多大动摇，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南区之北偏东为中区。有 4 座墓。因为南北两边都被现代坟丘破坏，估计原来会有更多的墓葬。这 4 座墓相互打破，其中 98M30 最早，98M26 和 98M27 次之，98M25 最

晚。98M30 出土玉器 5 件，石器 41 件，仅石铤就有 39 件之多。这墓被 98M26 和一座汉墓打破，出土器物可能不全。其规模至少是一座中等墓，墓主人也许是石匠或木匠。

98M26 和 98M27 都是穷人墓，前者仅出 1 件陶钵，后者也只有 4 件小玉环和 2 件残陶豆。98M25 同时打破 98M26 和 98M27，是中区墓中年代最晚的。出土器物有玉钺、玉环、玉璧、石钺和陶鬻等，合计 24 件，是一座普通的中小型墓葬。由此可见，中区在整个墓地中的地位是并不显著的。

北区有 8 座墓葬，即 98M3、98M4、98M5、98M6、98M8、98M11、98M13 和 98M17。其中 98M13 打破 98M8。98M12 在北区和中区之间，不知道该划分到哪一区。这些墓都很小，例如 98M3 仅 1 件玉镯和 1 件陶鼎，98M4 仅 1 件鼎足和 1 个罐底，98M5 只有几件石铤，98M6 只有 1 件玉钺、1 件石铤和一件陶钵，98M13 只有 1 件石铤和几件陶器，98M17 只有 1 件玉璜、2 件残石钺和 1 件陶鼎足。98M8 和 98M11 出土器物稍微多些，也都只有 13~14 件，没有任何特殊物品。所以北区是一个穷人的墓区。

西南区只有三座墓，其中以 98M31 最早，98M29 次之，87M6 最晚。98M31 是一座小墓，仅随葬 2 件玉璜、1 件石钺和几件残陶器。墓主人身份不是很高。

98M29 是比较大的墓，层位上和 87M1 一样，也是被第二层叠压而打破第三层。出土玉器 52 件，石器 18 件，陶器 16 件，合计 86 件。特别有趣的是墓中也出土三个玉人，而且整个身条、穿戴和手臂贴胸的姿势等细节都和 87M1 的玉人一模一样，只是不见上腿，应为正面的坐姿。玉人的背后有隧孔，应该是穿缀在有机物上用以作法的道具。这座墓中还有一件特殊的器物是玉鹰。它头部侧向，双翅展开，翅端雕刻成猪头形，身体部位旋出两个同心圆，两圆之间刻划八角星纹。这样奇特的造型可能具有宗教的寓意在内。可见这墓的主人也是一位颇为富有的巫师。

87M6 被第一层叠压，打破第二层。出土器物以石器最为突出，仅石钺就有 32 件，石铤 22 件，另有玉器 11 件，陶器 5 件，合计 70 件，也是一座较大的墓。石钺绝大多数为圆弧刃，只有两三件为梯形弧刃。石铤多薄体，个别最厚的也只相当于宽度的一半。有几件石铤甚大，最大的一件长达 42.6 厘米，可算是巨铤了。从随葬品来看，墓主人好像是一个专职的石匠。

西北区有两组墓，一组包括 98M9、98M15、98M18、98M22、98M24 和 98M28，旁边一组包括 98M19~98M21 和 98M23，一共 10 座墓葬。本区中有几座墓的主人明显是玉石匠，其中最突出的是 98M20。该墓随葬玉器 12 件，石器 45 件，陶器 4 件。玉器中有玉钺、宽体细齿玉璜和玉镯等，石器中有大量钺和铤。另外还有 111 个玉芯和 4 块磨刀石，看来墓主人是一个颇为富有的专职玉匠。据说墓中的玉芯没有一个可以与凌家滩出土玉器的穿孔吻合，说明所制玉器都已外销，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98M18 被 98M9 和 98M24 打破，出土器物不全。其中有 9 个玉芯和两块玉料，墓主

人也应该是玉匠。98M9 和 98M15 除出土玉器和石钺外，还有若干玉芯、玉料和石料。98M23 更出土石钻和石芯。

本区 10 座墓就有 5 座的墓主人可以确定为玉匠或玉石匠，其余 5 座墓都只随葬少量一般性物品。98M20 留存的大量玉芯不仅说明其生产规模很大，而且是为外销的目的而生产的。本区死者生前应是一个以玉石制作为主要职业的家族。

东区只有 4 座墓葬，即 98M7、98M14、98M16 和 98M32。其中以 98M16 为最早，也是本区较大的一座墓葬。该墓被三座近代墓打破，出土器物仍然有 42 件。其中比较特殊的有一件玉龙，身体蜷曲成圆形，近尾部穿一孔，当是坠饰。还有加工极精致的玉耳珰和喇叭形器。此外还有玉坠、玉管和玉玦等。石器仅石钺 1 件，陶器则有鼎、壶、盆、钵、杯、豆等共 22 件，是整个墓地中随葬陶器最多的一墓。其余三座墓则很一般。98M7 出土玉璜、玉玦、玉环、玉斧等，也有陶器 21 件。98M14 出土玉器和陶器不多，均破碎难以复原。98M32 是东西向墓，只有 9 件陶器，多可复原。总之东区的特点似乎是比较重视陶器。墓葬的规格略低于西边两区，而比中区和北区为胜。

以上便是墓地的基本情况。假如它是以氏族为单位的墓地，则每个墓区可能代表一个家族。既然各个墓区的情况有比较大的差别，说明各个家族的社会地位、从事职业和财富状况都有差别。其中西北区的家族明显是以制造玉石器为主要职业的。其产品除供应本氏族中的各家族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外销，用以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品，所以一些墓主人表现得比较富裕。西南区的家族中有的人是巫师，其社会地位和财富状况也比较优越。东区的墓葬随葬陶器较多，不知道是不是与该家族从事陶器生产有关。不过凌家滩墓葬随葬的陶器质量并不很好，好多是专门为随葬用的明器，难以反映当时的制陶水平。中区的墓葬缺少特点，它所代表的家族似乎只是一般的平民。而北区墓所代表的家族则是一些穷人。这些家族的死者既然合葬在同一个墓地，说明相互之间存在着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很可能属于同一个氏族。而统治整个氏族的则是以南区顶级墓葬为代表的家族。

这种分析自然只可能是极粗略的，不一定完全符合真实的情况。因为凌家滩还有一些墓葬被后期破坏，墓地本身就不是很完整的。又因为酸性土壤的关系，所有人骨一点痕迹都没有保存下来，以至于墓主人的性别、年龄等这种对判别身份和相互关系极为重要的资料都无法获取，甚至连头向都无法判断，这完全是不得已的。由于有机物全部腐烂，无法知道葬具的情况。随葬物品中只知道有玉器、石器和陶器，其实许多玉器是穿缀件，有少量是镶嵌件，结合良渚文化中一些漆器镶嵌玉片和玉粒的情况来看，凌家滩很可能有漆器，似乎也应该有骨器和象牙器。在这些物件全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对判断各个墓主人的地位、身份和财产状况自然会产生影响。

不过仅就现有资料而言，凌家滩还是一颗耀眼的明星。从各种器物特征来看，它的

文化性质最接近于南京北阴阳营的墓地，二者甚至可能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这个文化的中心自然在凌家滩而不在北阴阳营。凌家滩也受到薛家岗文化的一些影响，或者反过来说是影响了薛家岗文化。但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了北阴阳营和薛家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长江下游，凌家滩人是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虽然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后继者是一个什么情况，是不是曾经拿过接力棒进一步奔向文明社会。但从各种情况分析，在凌家滩之后，文化发展的重心可能有所转移。至少玉石工业的重心转到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那里去了。因为良渚文化前身的崧泽文化玉器很少，加工技术也不高。良渚文化的玉器工业则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果没有技术上的传承，这样突然爆发式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良渚文化玉器制造的各种技术，除了微雕式的线刻不见于凌家滩外，其他技术在凌家滩都已经采用。今后如果有更多发现，这问题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

要把凌家滩关涉的所有问题都进行适当的解读是不容易的。报告编写者的分析也好，我个人极粗略的分析也好，都可能有很不恰当的地方。好在本报告把所有资料都发表了，读者可据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和考察而不一定拘泥于既有的认识。

要进一步认识凌家滩，还有待于北区墓地和整个遗址的发掘情况，这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的。

2006年7月1日于北大蓝旗营蜗居

(原为《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序，文物出版社，2006年)

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从良渚遗址的发现和被初步认识，至今已将近七十年了，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而被正式命名也已四十六年。在这么长的时期中，良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可说是一浪接着一浪，不断有新的突破。不但对良渚遗址本身的研究已经大大深入，而且发现和发掘了一大批像寺墩、草鞋山、福泉山、庄桥坟等重要的遗址，获得了十分丰富的珍贵资料。在当前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众多著作中，良渚文化已成为首先被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良渚文化文物精品展，向观众展示四五千年以前长江下游先民的伟大成就和走向文明的特殊道路，是很有意义的。

现在知道，良渚文化主要是分布于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主体部分大致可分为太湖以南、以东和以北三个较大的群落。太湖以南的群落以良渚遗址群为中心，还包括杭州地区的老和山、水田畈、辉山、横山，嘉兴地区的荷叶地、雀幕桥、庄桥坟、新地里、普安桥、千金角以及宁绍平原的慈湖、名山后和浦江的阔塘山背等一大批遗址。太湖以东群落的中心不甚明确，以上海福泉山比较突出，吴县草鞋山、张陵山和昆山赵陵山三地相邻，年代互有先后，似乎也是一个中心。其他还有苏州地区的东渚、俞家墩、绰墩、少卿山和上海地区的马桥、松江广富林和金山亭林等一大批遗址。太湖以北的遗址发现较少，可能与考古工作不够有关。不过江阴高城墩和武进寺墩都有规格甚高的贵族墓地，当是本区前后相继的中心遗址，其他遗址有常州和无锡地区的高城墩、城海墩、罗墩、嘉陵荡、仙蠡墩等，镇江磨盘墩和地处太湖西北的江宁胥庙也有良渚文化的遗存。此外，在太湖以西的溧阳洋渚也是一个重要的良渚文化遗址，它南面的小梅岭可能是良渚文化玉料的主要产地之一。由此可见良渚文化的主体部分基本上是环绕太湖而发展的，只是因为西面多山遗址甚少。但良渚文化并不局限于太湖周围，它还不断地向外扩张，主体部分之外的边缘地区可达江苏北部、浙江南部和安徽东部；至于某些文化因素的影响所及，则北达山东，西至江西，南到福建和广东。甚至对山西的陶寺类型和陕北的神木石峁一类遗存也有一定的影响。

良渚文化是以快轮制造的黑陶和雕工精细的玉器而著称的。陶器的种类主要有鼎、

豆、簋、圈足盘、双鼻壶、宽把带流杯和小口高领瓮，还有少量的大口缸、鱼篓形壶和捏流鬻等。在良渚遗址群中还常见长椭圆形的盛鱼盘和带漏斗形过滤器的圈足碗等。圈足器特别发达是其特点。器物表面多打磨光滑，显得素洁高雅。只有在一些特别讲究的陶器上才有朱绘或针刻的花纹，其母题有龙蛇纹、鸟纹和云雷纹等。这些陶器的制作工艺之精湛与造型之优美，在同时代或稍晚的诸考古学文化中，只有山东龙山文化者可以媲美。

良渚文化的玉器特别发达。仅良渚遗址群中的反山墓地就出土了1100余件组。如果按单件计算则多达3200余件。其中有用作仪仗的斧钺，有用于宗教法事的琮、璧等，有用于装饰的璜、玦、项饰、佩饰、手镯等，有餐具匕、勺等，有纺织具纺轮等，有穿着上用的带钩、纽扣和穿缀于衣服上的各种动物形饰品如鸟、龟、鱼、蛙、蝉等。有在漆木器上镶嵌用的各种形状的玉块、玉片和玉珠，还有许多不知用途也难以正确命名的玉器，如三叉形器、锥形器、柱形器、圆形和三角形牌饰以及各种形状的端饰等等，种类繁多。其加工更是十分精细。现代加工玉器的基本方法，如线割、锯切、管钻和抛光等，当时均已采用。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某些高档玉器上还应用了先进的砣具。管钻的直径小的只有一二毫米，大的可达四五厘米，长度可达20厘米以上，而且两头对钻，如果没有稳固的钻架是无法操作的。许多玉器上都有美丽的花纹。例如在一件号称琮王的玉琮上就雕刻了8个神人兽面纹，一件柱形器上更雕刻了12个神人兽面纹，只不过其中的6个稍有简化。有的钺、三叉形器、璜和半圆形牌饰上也雕刻有相同的图形。神人头戴羽冠，身披皮甲，并带一兽面护胸，显得十分威严神圣。整个画面只有三厘米高，却刻得非常细致复杂。有时在一毫米宽度内就有四五道刻纹，看过的人无不叹为观止。人们注意到这种图形仅仅出现在良渚文化中心最高等级墓葬中的高档玉器上，而次一等级的贵族墓中则以各种不同的简化形式出现，其覆盖面遍及整个良渚文化的主要分布区，成为联系整个文化的精神支柱。

良渚文化的漆器也有很高水平。从某些大墓中发现的漆盘、漆壶和漆杯来看，都是黑地朱绘，并且镶嵌了许多玉饰，显得十分珍贵。

良渚文化的木工和建筑水平也是很高的，它继承了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传统而又有新的发展。斧、斨、凿等木工工具比以前制作得更加精良。房屋的梁柱多加工成大型方木，例如在莫角山旁的马金口便发现有40厘米见方、长数米的木构件，在庙岩发现的两座大型房基，其柱洞也都是方形的。用大型方木而不用圆木，可见其房屋建筑比较讲究。许多地方都发现了良渚文化的水井，其中有不少木构井圈。有的是用木板拼成圆筒形，有的是拼成“井”字形，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木工的水平。至于生活用具中的木器，因保存不好只有零星发现，有椭圆形鱼盘和簋等。

历来传说黄帝的妻子嫫祖发明了养蚕缫丝，是否属实无从稽考。现在知道，至少在

良渚文化时期便已经有丝织物了。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就发现有丝带和绢片。后者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各达47根，已经是很细的丝织物了。须知钱山漾并不是一个很高规格的遗址，只不过因为保存条件好而发现了一大批有机物，其中包括丝织品。可以设想在最高等级的墓葬中，如果保存条件好的话，会发现多么精彩的丝绸织物啊！

江浙地区的稻作农业历来是比较发达的。良渚文化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在中国最早实现了犁耕。许多遗址都已发现了石犁，还有破土器、“耘田器”、石镰和石刀等成套的农具。对于石犁是不是真的可以作犁来使用，或者说是不是早在良渚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犁耕农业，人们是有过怀疑的。因为文献记载商周时期还是用耒耜而没有犁。有人根据甲骨文说有“犁”字，但是没有实物的证据。孔子的弟子冉伯牛名耕，有人据此推测春秋时期有了牛耕，牛耕当然是用犁的。北方发现最早的犁是战国时期的铁犁，准确些说是铁犁头即铧，所以战国已经有犁耕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前些年在江西新赣大洋洲发现了两件商代的青铜犁，看来南方的水田确实可以比北方更早用犁耕。良渚文化的石犁既然很像后来的犁铧，当然也可能真是作犁来用的。过去牟永抗和宋兆麟曾经对石犁的用法进行过复原的尝试，最近在平湖庄桥坟发现了安装在木质犁底上的石犁，将有助于这种农具的科学复原。犁耕不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翻地的质量，因而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所以在农业发展史上，总是把犁耕农业的出现看成是高于锄耕农业的新的阶段的重要标志。正是因为良渚文化首先迈出了这决定性的一步，给社会提供了较多的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才能使手工业获得全面的发展，诸如玉器、漆器、丝绸乃至陶器的制造等方面，都超出了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水平。这就使得良渚文化的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比同时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更为彻底。由于大部分手工业的高级产品几乎都为贵族所掌握，使得良渚文化的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分化甚至分裂，这正是文明社会产生的必要前提。

良渚文化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一般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年代在公元前3300至前2000年之间。不过近年来从过去认为是良渚文化晚期的遗存中分离出了一个所谓广富林遗存，其年代相当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因此良渚文化结束的年代应适当提前，也许在公元前2500年比较合适。

良渚文化的早期是继承马家浜文化的崧泽期（也有称崧泽文化的）而发展起来的，因而还保留某些崧泽期的特点，同时又有显著的质的变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贵族坟山和高规格祭坛的出现。例如上海福泉山及江苏的吴县张陵山、昆山赵陵山、常州罗墩等都是在良渚文化早期堆筑起来的人工坟山。有的是在人工土台子上建房埋墓，例如浙江的桐乡普安桥便是这种情况。这些坟山上埋葬的多是较大的有玉器随葬的墓，也就是贵族的墓葬。当然也有一些较小的墓，但比起平地掩埋的墓葬还是有明显的区别。这是社会分化在埋葬制度上的反映。

早期的祭坛有良渚遗址群中的瑶山和汇观山。因为瑶山上有几座早期的墓葬（M1、M4和M5等）打破了祭坛，祭坛的起建年代当不晚于早期墓葬。汇观山出过早期玉器，也有可能是早期起建的。还有卢村的高台则可能是在早期人工建筑的祭坛。前两个祭坛都建在小山顶上，顶面分别用不同土色筑成“回”字形的图案，四边斜坡修成几级台阶并用石头护坡。到良渚文化中期这两个祭坛都成为贵族的墓地，可见当时最高等级的祭祀活动完全是由贵族把持的。

值得注意的是崧泽期主要分布于太湖的东部和北部，东南只到嘉兴地区，杭州地区极为少见，良渚遗址群所在的良渚—瓶窑一带基本不见。可是一到良渚文化早期，这里便建立起高规格的祭坛，也出现了一些等级较低的聚落如庙前和吴家埠等遗址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居民显然是从外地迁来的。这好像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它的背后显然存在着一个拥有很大支配权的权力中心。这一行动应该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因为这里是浙西山地与浙东平原的交接地带，两边的资源都可以很方便地加以利用。从地形上看，这里被西天目山两支余脉南北夹持，形成一个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3~5公里、面积约34平方公里的小盆地，东苕溪从中间穿过，既便于防守，又利于交通，是建立政治中心的理想的处所。这种情况到良渚文化中期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

进入良渚文化中期，良渚—瓶窑一带形成一个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巨大的遗址群和以荀山为中心的规模稍小、规格也较低的遗址亚群，我们统称为良渚遗址群。至今在这里发现的遗址已多达120多处，其中许多地点因限于初步调查而无法准确分期，但从已发现的一些情况来看，似乎主要是属于良渚文化中期的。

莫角山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面积约30万平方米。它的整体高出周围地面数米，像个长方形的土台子，上面又还有三个较小的台子。在小台子的前面曾发现过大面积的夯土基址和数以万计的经火烧过的土坯。这些火烧土坯又被推到大土台的边缘并加以层层夯实以起到加固的作用。这样巨型的建筑当为宫殿或类似礼制性建筑之所在，而整个莫角山可能即是一座台形的城址。这台形城址的始建年代尚不清楚，但至少良渚文化中期是已经存在了。城里面的遗迹也还没有经过全面而仔细的勘查，因而更为具体的布局和功能也还难以推定。不过那里有超过其他任何遗址的大规模高等级建筑，近旁的反山又有良渚文化中最高等级的贵族墓地，因而把它看成是整个良渚遗址群乃至整个良渚文化的最高权力中心，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前面已经谈到，良渚遗址群所代表的人群本来就是由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有组织地从各地移民而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先的基于血缘的社群组织，是重新组织的复合体。在这个复合体中有莫角山那样的政治权力中心，有姚家墩和马金口等处贵族宅第，也有若干平民居址。有塘山等那样的制玉作坊和荀山附近制造高档陶器的作坊，甚至还有水运码头的设施。有贵族专用的祭坛、坟山，也有普通平民的墓地。尽管大多

数遗址点的具体内涵尚不得而知，仅从已知的一些情况来看，这是一个按社会等级和职能划分而不是按血缘组织划分的大聚落群，有远超过一般聚落的人口规模，很像是初级形态的城市。说明良渚文化已经从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转变，从而迈开了向文明社会演进的决定性步伐。

良渚遗址群同各地的联系和控制，可以从贵族阶层的埋葬制度和高等级玉器的雷同等方面进行观察。例如早期的常熟罗墩、吴县张陵山、昆山赵陵山和上海福泉山等墓地都在人工堆筑的土台上，头向基本上都朝南。罗墩出土的龙首纹圆牌饰与良渚遗址群的瑶山和反山所出十分相似。张陵山的镯式琮和作为梳背的所谓冠状饰与瑶山同类器基本相同。中期的江阴高城墩、昆山少卿山、海宁荷叶地等处的琮、璧、钺组合及其用料与制法也跟良渚遗址群相同或相似。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更是与瑶山、反山的简化形态一致。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一些高档玉器可能是统一生产和分配的，而掌控权自然是操之于良渚遗址群的权力中心。

到良渚文化晚期，以莫角山为中心的良渚遗址群是否还是整个文化的中心，抑或文化中心有所转移？是否像有些学者说的向北迁移了？应该说直到目前的考古发现还难以清楚地作出回答，只能从一些相关的线索进行分析和思考。早在1919年，美国人弗利尔从上海购买到一批据传出自浙江的玉器，现存弗利尔博物馆。其中有几件玉璧上有用极细的针刻的图画，画面是一只鸟站立在阶梯形台子上（试与瑶山和汇观山祭坛作比较），或站在台上竖立的柱子上。大家都认为这是良渚文化晚期最高级别的玉器，只是具体出土地点不明。很幸运前几年在安溪百亩山也出土了一件形体和质地都很相像的玉璧，而且也有针刻的阶梯形台子。因此弗利尔博物馆的玉璧很有可能也出自良渚遗址群。

事实上，在良渚遗址群出土玉璧或传说出过玉璧的地点至少有20多处，其中有不少可以明确知道是属于晚期的，如文家山、钵衣山、钟家村、桑树头、庙前等处都是。由于绝大部分地点并未进行发掘，很难说其中没有几个最高规格的祭坛或墓地。甚至莫角山台城也可能一直使用到晚期，至少现在还没有到晚期就停止使用的证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良渚遗址群近旁的横山发掘过两座晚期的高等级墓葬，墓中出土了琮、璧、钺等代表最高等级的玉器组合。M2更出土了132件石钺，数目之多是良渚文化中所仅见的。墓主人也许是一位掌握武器生产和保管的头领。这说明良渚遗址群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部分地控制着最高水平的玉器和武器的生产和分配，证明良渚遗址群的权力中心的地位直到晚期也没有完全改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看，良渚文化晚期毕竟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首先是次级中心遗址的扩大和独立性的加强，这从福泉山和寺墩两个遗址的情况可以得到说明。

福泉山位于上海青浦县重固镇，为一东西长94米、南北宽84米、高7.5米的长方

形土台，在良渚文化早期就在崧泽期的遗址上堆筑起一个土台并埋设墓葬。到良渚文化晚期土台增高，墓地面积扩大，墓葬的规格也显著提高，一般有彩绘的木质葬具。随葬器物比较丰富，不少在百件以上。其中有制作精美的玉璧、玉琮、玉钺和各种装饰用玉器。从材质、制作工艺和纹饰来看，有的应来自良渚遗址群，有的似来自寺墩，但总体规格均略低于良渚遗址群。和良渚遗址群不同的是各墓都随葬较多的陶器，有的陶器上饰有十分繁复而美丽的针刻花纹，与草鞋山所出十分相像，可能是太湖以东的地方特色。有的墓还随葬有长达 25.4 厘米、两面都刻着兽面纹的象牙器。其雕工之精美，实为前所未见。福泉山还出有大汶口文化的背壶和绿松石片等，说明它与远地也有交流关系。福泉山的中心部位有一处阶梯形的祭坛，周边用土坯镶砌，最上一层的西南角埋一口大陶缸。整个祭坛上都撒有介壳末，地面和砌边的土坯都被烧得通红。遗址的北部有一大坑，中间有一个圆形土台，坑中堆满灰烬，推测也是一处祭祀场所。这些与祭祀相关的遗迹与瑶山和汇观山祭坛的结构明显不同。所有这些都说明在良渚文化的晚期，地方中心在继续保持与良渚遗址群一定联系的情况下，大大发展了自己的特点，或者说是独立性明显加强了。

寺墩遗址位于江苏常州市东北约 15 公里，属武进县郑陆乡，面积约 90 万平方米，是良渚文化晚期兴建的大型中心遗址。遗址的中间可能是一个大的圆形祭坛，外面是墓地，两者间有水沟相隔。墓地外围是住地，住地四周也有围沟。墓地的西北部曾因取土破坏了墓葬而发现过一些玉璧和玉琮。墓地的东南部曾经发现了四座大墓，呈东西排列，均有丰富的随葬品。其中仅 M3 便随葬有一百多件器物，包括 24 件玉璧和 33 件玉琮，是良渚文化中随葬玉琮最多的一座墓葬。墓中的玉琮围绕死者摆放一周，这种特殊的葬俗不见于福泉山，也不见于反山、瑶山。M5 被宋代和近代坑打破，仍然残存 80 多件器物，且大多数为玉器。其中有多节玉琮、玉钺、玉璧和带钩等。这些玉器从材质、制作工艺都与良渚遗址群大不相同，推测是本地制造的。所有这些说明寺墩作为太湖以北的地方中心，与良渚遗址群的联系已远不如以前的高城墩。这是地方独立性增强的又一实例。

良渚文化晚期的一般聚落遗址比较小，墓地也很小，以 10~30 座墓者为多。但桐乡新地里有 100 多座，平湖庄桥坟有 236 座，除少量属于中期者外，大部分是晚期的。聚落小可能与水田稻作农业生产的特点有关。水田地区的交通没有旱田地区那么方便，农户要尽量接近自己耕作的水田，只好分成比较小的聚落。与此相适应墓地也比较小，有的墓葬就埋在自家房屋的近旁。大型墓地可能是为了强调血族关系，并不一定对应某个大型聚落，而可能是若干有血缘关系的聚落的公共墓地，因此在墓地中还可以分片分组。在小型墓地中，有些有人工坟山，有较大的墓葬随葬较多的玉器、石器和陶器，有的整个墓地只随葬石器、陶器和少量简陋的玉珠。在大型墓地中，较大的墓葬往往聚成

一片。由此可以看出一般聚落也是有分化的，也有小中心聚落和普通聚落之分。各地葬俗除保持头向朝南等传统习俗外，在器物组合和陶器风格等方面都有不少差别，说明在良渚文化的基层也出现了分化的现象。不过即使普通聚落，墓葬中也随葬不少器物。这一方面说明当时有厚葬的风气，另一方面也说明良渚文化的社会还是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全然没有衰败的迹象。

良渚文化的晚期还是一个势力大扩张的时期。往北直达江苏北部边界与大汶口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这可以从新沂花厅村墓地的埋葬情况清楚地反映出来。那里原有的中小墓葬都是大汶口文化的，后来出现一批大墓，其中随葬许多良渚文化的玉器和部分陶器，也有许多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些大墓中还用妇女、小孩和牲畜一起殉葬。对于这种现象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良渚文化的远征队打败了当地部落，当地部落的男人逃走或战死了，剩下妇女和儿童则被当作牲畜一样殉葬，掳掠来的器物也同自己的器物一起埋葬。另一种解释说这是文化的两合现象。不论怎么解释，良渚文化的势力已经扩张到了江苏北部边缘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良渚文化往南则越过了钱塘江，势力直达浙江南部。近年发现的遂昌好川墓地及相关遗存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性文化，年代大约相当于良渚文化晚期到马桥文化初期，在其早期遗存中就有不少良渚文化因素。例如陶器中的双鼻壶、圈足簋、圈足盘、宽把带流杯、捏流鬻等，玉器中的钺、锥形器和某些镶嵌饰片等都跟良渚文化相同或相似。特别是一些漆器上镶嵌的台阶形玉片，其形状与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刻划符号完全相同。一件石钺上的针刻豹纹，与良渚文化玉璧上的针刻纹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都说明良渚文化的势力已到达浙江南部的好川一带。至于在安徽、江西、广东乃至晋南、陕北发现的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玉琮等遗物，年代都在良渚文化晚期，证明良渚文化晚期不但没有衰落，其势力反而有大面积的扩张，影响所及几乎达到半个中国。

良渚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在上海是所谓广富林遗存，同类遗存在南京等地也有发现。现在考古工作刚刚开始，对于它的分布范围和发展水平还难以作出恰当的估计。不过从已知内容来看，明显是继承良渚文化而同时受到龙山文化和所谓造律台类型的影响。再往后在江浙地区兴起了马桥文化。它同良渚文化并不是直接承袭的关系，加上它继续受到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等的影响，文化面貌与良渚文化差别极大。在广富林一类遗存被确认以前，一般认为马桥文化是紧接良渚文化而出现的，两个文化的巨大差异被看做是良渚文化突然消失而为马桥文化所替代。为此一些学者便想从各方面探讨和论证良渚文化消失的原因。这些研究固然是有价值的，不过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任何考古学文化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良渚文化也不例外。如果今后对广富林一类遗存有更多的发现和研究，良渚文化的消亡也许不会像现在看到的那么突然。它在行将消亡的晚期的势力扩张，一方面造成了中心地区过度的消耗，另一方面又给广大地区播下

了文明的种子。只要看一下良渚文化的许多因素，诸如玉器中的琮、璧，武器中的钺，漆器，丝绸，陶器中鼎、豆、壶的组合，以及纹饰中的饕餮、云雷等母题，都为后来中国的主体文化即夏商周文化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良渚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贡献可谓大矣，它像一只涅槃的凤凰，经过炼狱烈火的考验而得到永生！

2005年6月16日写毕于北大蓝旗营蜗居

(原载《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一部优秀的考古报告——《反山》

浙江余杭县的反山遗址是1986年发掘的，正值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的日子。为此在杭州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学术讨论会，并且在会前组织大家参观了反山遗址。所有参观者莫不为那些极其重要的发现所震撼，纷纷发表感想，觉得过去对良渚文化的认识实在太不够了。会上的许多发言几乎都认为要提高对良渚文化的认识，要与文明起源的问题挂起钩来。有的说良渚文化走近了文明的门槛，有的说已经跨进了文明的门槛。我在会上也作了“良渚文化研究的新阶段”的发言，认为反山的发掘使良渚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今后有关的考古工作也应该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从那以后，人们对良渚附近的考古工作更加关注，瑶山、莫角山、汇观山等重要发现一个接着一个，而整个良渚遗址群的调查也逐步开展起来。这些工作可说是举世瞩目的，可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只能看到简报、图录或讨论文章中提供的不完整的资料，人们以不无急切的心情期待正式发掘报告早日面世。值得庆幸的是，最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推出了良渚遗址群的一系列田野考古报告，包括《良渚遗址群》调查勘探报告和《瑶山》、《反山》、《庙前》等发掘报告，其力度之大前所未见。由于这些报告的出版，使公众对良渚文化核心区的基本情况和文化发展水平，以及在那里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于推进良渚文化和文明起源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无疑将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几本报告的内容不同，编写各有特色，但就其内容之精彩、编写者投入的精力和达到的水平来说，当首推《反山》一书。

反山发掘之前，在江苏吴县草鞋山、张陵山、武进寺墩和上海福泉山等地相继发现了良渚文化随葬玉器的大墓，特别是在福泉山发掘中认识到这些大墓所在的土墩或小山乃是人工营建的坟山，并且被苏秉琦先生比喻为“土筑金字塔”。在这些事例的启发下，考古人员自然会想到在良渚也可能找到类似的坟山。恰巧余杭县长命制动材料厂在反山筹建厂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员考察，看到了人工形成的熟土堆积，只是没有发现可以明确时代和文化性质的陶片。在人们的认识并不统一的情况下，主事者认定那是一处良渚文化高规格的墓地，当即与有关方面交涉停建厂房，而着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考古发掘。这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科学预见的战略性决策。

人们常说做考古工作要有课题意识，反山的发掘就是有明确的课题意识和学术目标。而且在工程建设有可能危及重要的考古遗迹时迅速采取断然措施。这两点在反山的考古发掘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现在知道，反山至少是经过两次人工营建的土台。第一次营建的时间大约在良渚文化中后期偏早，筑成的土台高约5米。上面似有祭坛，然后在祭坛上埋了9座贵族墓葬。过了好几百年，到良渚文化的晚期，人们在原有土台上加高加大，并且又埋了若干墓葬。此后又过了两千多年，到了东汉时期，再次把土台当作墓地，埋了11座砖室墓，把良渚文化晚期的墓葬破坏殆尽，只剩下了2座。这三批墓葬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批9座墓葬。从各墓的分布和相互关系来看，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墓地。它是迄今为止良渚文化中等级最高、保存最为完整的贵族墓地。

在这个墓地中，M12随葬品数量最多，品位最高。单玉器就有647件之多，还有数百粒找不到归属的玉粒和玉片没有统计在内。被称为琮王的大玉琮、大玉钺、玉柱形器和可能是权杖部件的玉瑁、镞上都刻有完整形态的神人兽面纹，还有镶嵌各色玉件的彩绘漆盘和漆杯等，每件都堪称稀世珍品。而这座墓恰巧处在中心的位置，说明墓主人是一位掌握军政大权和宗教法权的首领。这座墓的北端即脚端是M22，也有很多高品位的随葬品，其中有玉璜和玉圆牌而没有玉钺、玉琮，且是唯一在玉璜上刻有完整神人兽面纹的墓葬，发掘报告推测这墓的主人应属女性，很可能是M12墓主人的配偶。M22的左边是M20，随葬品的数量仅次于M12，其中有玉琮4件、石钺26件，说明墓主人生前拥有很大的神权和军权。M12的右边有M17和M14，左边有M16，这几座墓的随葬品也很多，并且都有玉钺，又紧靠M12，显示其地位显赫。M23在M14的北端即脚端，随葬品中有玉璜、玉纺织具、玉圆牌和玉琮而没有玉钺，墓主人可能是M14墓主人的配偶。M15和M18位于墓地西侧稍远处，各随葬有数十件玉器，数量和品位均低于以上各墓，其中也有玉琮和刻有神人纹的“冠状器”等，地位也不算太低，报告推测其墓主人可能属于以M12为中心的上层贵族中的“臣僚”或“巫覡”。由此可见这9座墓的主人生前应该是一个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其地位不但在良渚遗址群中是最高的，就是在整个良渚文化中也是无可攀比的。

从各种角度分析，良渚遗址群的中心遗迹应该是莫角山那巨大的长方形土台，它上面的大片夯土应该是宫殿一类礼制性建筑的遗存。而反山就在莫角山的西北角，二者相距不足100米。在那里营建最高统治者的坟山，一定是经过慎重选址和精心设计的。不过以M12为中心的墓地持续的时间并不很长，根据前面的分析，可能还不到两代人。莫角山的中心地位似乎不会这么短。如果这个估计不致大错，就近还应该有或早或晚的同样规格的墓地。在反山之后发掘的瑶山和汇观山尽管也是高级贵族的墓地，但其地位似乎还无法同反山相比。因此我推想反山尚未发掘的东半部，是否存在另一个或两个规

格相当、只是年代上略有先后的最高贵族的墓地呢？

反山发掘已经过去 20 年了。在这 20 年中，有关良渚文化的重要发现可说是一个接着一个，其中没有一个可以同反山相颉颃的。随着时日的推移，反山和莫角山的中心地位也日益显现出来，这对于估量良渚文化的社会结构和发展水平是至关重要的。

反山的出土遗物中以玉器为最多，也最受学界关注。如果说草鞋山等地的发掘第一次辨识出良渚文化的玉器，并且把过去流散在海内外的一大批所谓周汉玉器而实属良渚文化的玉器得以识别出来的话，那么反山的发掘则极大地提高了良渚文化玉器的研究水平，进而把中国史前玉器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其原因盖在于良渚文化的玉器规格最高，品种繁多，绝大部分并非单体成器，而是由多个部件联系在一起的组装件、穿缀件和镶嵌件。如果在发掘时稍不留意，这些物件的整体形态和功能就无法辨识，成为一堆形状大小各异而乱无章法的零碎物件。例如玉钺在过去多只发现钺体本身，连如何安柄都不大清楚，甚至有错认为是玉铲的。这次发现的几件玉钺虽然除本体外柄部腐烂无存，但是还有柄两端的玉瑁和玉镞，二者相距约 70 厘米，可知钺柄大约有 70 厘米长。不但如此，在钺柄的部位散布有许多玉粒，有些玉粒上还黏有朱漆痕，显然是镶嵌在漆木柄上的饰物。有的柄端还有琮形管，很可能是纓络上的挂件。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不但使已经散开的各个部件得到合理的解释，而且可以清楚地了解玉钺的整体形状和豪华气概。又如穿缀件多是由管、珠、璜或牌饰等穿缀在一起，作为头饰、项饰、胸饰或其他饰物，由于将这些饰物联系在一起的有机物都已腐烂，如果不注意相互的位置和摆放部位，作为一个个单体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至于镶嵌在漆木器上的玉粒、玉条和玉片等，如果不注意摆放的位置，就更是一堆乱麻。有的器物如琮、璧等尽管是单体的，也可以从随葬的具体情况得到新的认识。按照传统的看法琮、璧二者应有配伍关系，但反山的情况证明二者在数量上不成比例，制作的精粗上明显有别，在摆放的位置上也看不出有特别的联系，可以肯定良渚文化的琮、璧是没有特别的配伍关系的。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这可以说是对史前玉器研究的一大贡献。

反山发掘的可贵之处在于事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发掘每一座墓葬时都非常注意所有随葬物品的位置和相互关系，直到弄清楚以后才记录和起取。有的在田野中实在分辨不清，在室内还要细心研究。这本来是任何考古发掘的基本要求，可惜不是每一个发掘都能够做到的。这不完全是考古水平问题，而是有没有责任心和求真务实精神的问题。

反山的漆器也十分引人注目，其中最大的当然是葬具，也就是漆棺。至少 5 座最大的墓都有漆棺，可惜全部腐朽只剩了漆皮，无法窥知其本来的面目。而最华贵的当数 M12 的漆杯和漆盘。二者除造型和花纹讲究外，单是镶嵌的玉粒和玉片等就分别有 141 和 182 件之多，品位之高可想而知。由于胎骨完全腐烂，只剩漆皮和镶嵌的玉件，经过细心的剔剥、翻模、起取和室内研究才得以大致复原，使我们能够欣赏到几千年以前的

工艺精品。略显不足的是漆杯插图正反面大小不一致，不知哪个是正确的。从插图、翻模的照片和文字描述都说明这件漆杯是有把有流，流部上翘，很像那种有针刻纹饰的宽把带流陶杯。可是复原的漆杯却是平口，无把无流，这是不应该有的差错。

总起来说，这部报告有两个特点是比较突出的：

首先，报告全面如实地报道了反山考古调查与发掘的资料，并且经过充分消化，较好地处理了重点与一般的关系。考古报告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全面如实地报道所得资料，但事实上许多报告做不到这一点，这是令人遗憾的。全面报道资料不等于开流水账，照单验收。一定要有研究，看什么是最有代表性的，最重要的或最为突出的，就要把它的代表性、重要性或突出特点表现出来。一般的情况也不能省却，既要面面俱到，又力求有所概括，有所分析，尽量节省篇幅。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进行全面的考察，注意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以获得最佳的解读。反山遗址的重点是良渚文化中后期偏早的贵族墓地，墓地中的重点是处于中心地位的 M12。报告如实地报道了该墓的发掘情况和保存状况，强调了改进发掘方法的重要性。接着以极大的篇幅报道了随葬器物中号称琮王的大玉琮、大玉钺、玉柱形器和可能是权杖的瑁与徽，因为这些器物上都有神人兽面纹，有的还有繁复的地纹或其他纹饰。刻纹的纤细程度有如微雕。报告以多幅放大尺寸的插图（整体的、分幅的和细部的）、拓片和彩版多种方式相配合来表现，并且配以详细的文字说明，使读者对良渚匠人精湛的雕刻技法和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等有真切的认识和感受。这还只是该墓随葬器物的一小部分。如果把全部随葬品联系起来，再同周围的其他墓葬相比，那位墓主人高居于群雄之上的王者的形象和气概便表现得淋漓尽致，埋葬在他周围的显贵自然就是以他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成员。这恰恰是反山发掘所获得的最重要的信息。《反山》报告突出地强调了这一信息，体现了编写者的深刻用心和学术水平。

其次，报告特别注意总结田野工作经验。一份发掘报告不能只写发现了什么，还必须写如何发现的以及为什么要发掘的理由。这里有对遗址基本情况的了解，对它的性质和学术重要性的判断，要有预期的学术目标和为达此目标制定的工作计划。如果发掘过程中遇到了事先没有估计到的新情况，是不是做了相应的调整 and 对策，实行的效果如何，等等。写出这些内容乃是为了读者更好地理解发掘报告所提供的考古资料，以便于做更深入的研究；同时也是为了总结经验，便于相互交流以提高田野考古水平。为此我曾经多次呼吁，可惜大部分发掘报告忽视了这方面的内容。反山报告则非常重视，讲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也讲了工作中的某些失误，毫不隐讳。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总之，《反山》是一部优秀的考古报告，值得提倡，希望对正在编写和将要编写的考古报告有所启迪。

《纪仲庆文集》序

南京博物院的基础是前中央研究院，有多位知名的学者。20世纪50年代初还负责华东地区各省的文物考古工作，后来才专管江苏省的文物考古。由于底子较厚，在省级同类机构中仍然占有比较突出的地位。但一些老专家过去虽然做了不少工作，却很少发表著作。于是院领导决定为他们出个人文集，以褒扬先生们在学术上的贡献，这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我看到的第一本就是老院长的《曾昭燏文集》。现在健在的老专家中自然少不了纪仲庆先生。院方前曾为他举行八十大寿庆典，现在又决定为他出版个人文集，我从心里感到高兴。承蒙仲庆兄的厚谊，要我为他的文集作序，为弟自当义不容辞。

仲庆兄早年就学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是我的同窗好友。论学习成绩在我们班是拔尖的。记得1957年我们在河北邯郸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参加完涧沟遗址的发掘后转到龟台寺遗址。他发掘的探方中有一个龙山文化时期的大灰坑H56，他根据土质土色的变化把灰坑中的堆积分了8层。仔细排比各层出土陶器的形制，发现前后确有些微带规律性的差别，从而将其划分为三个小期或小段。这种认真细致和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受到指导老师的好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一些知名学者连仰韶、龙山都分不开，而一个还在实习的学生却能做到如此精细，实在是难能可贵。

仲庆兄在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不久就转到南京博物院，曾经任该院考古部主任和江苏省考古学会理事长等职，成为江苏省考古学界的领军人物。

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短暂时期，恰遇全国性的三年大饥荒，他却全身心投入丹江水库区的抢救性考古工作中。他和队友们一起先后发掘了均县乱石滩、朱家台和郧县青龙泉、大寺等一系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明确的地层关系，证明50年代初在湖北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原本以为晚于龙山文化，实际上是晚于仰韶而早于龙山，这个结果曾经在考古所引起强烈反响。其实仲庆兄的分析更加细致。在他给我的资料中，对几处遗址逐个进行了分析和排比，发现仰韶和龙山都应再分为两期，总共可以分为五期。第一次给出了汉水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阶段的年表。至今虽然

过去了半个世纪，这个年表仍然适用。这与他重视把地层关系与类型学分析紧密结合的研究路线是分不开的。

在南京博物院，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跟工程建设相关的考古工作中，虽然经常是抢救性发掘，还是尽量按科学发掘的要求办事，从而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例如邳县大墩子的发掘，第一次分出了青莲岗、刘林和花厅三个时期的遗存。邳县刘林的第二次发掘，第一次将刘林分为早晚两期。海安青墩遗址的发掘，第一次在江北过去以为很晚才成陆的滨海地区发现一处重要的史前遗址，从而改写了当地海岸线变迁的历史。这个遗址同样也可以分为三期，而文化面貌则与江南文化区基本相同。我想正是由于这些扎实的工作，才奠定了建立江苏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坚实基础。1973年我在《文物》杂志上看到吴山青《略论青莲岗文化》一文，吴将青莲岗文化分为江南、江北两个类型，每个类型又各分为三期。对江苏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如此明确地进行分区与分期研究，这还是第一次，真是大开眼界。尽管作者用了别人不知道的笔名，我却一下子就明白那肯定是纪仲庆的手笔。文章的资料和论点都是新的，却用了一个原本概念不甚明确的文化名称，用旧瓶装新酒，自有他之所以要这样做的理由。1977年在南京召开“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仲庆兄为了与会议的主题相呼应，提交的论文就叫《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若干问题的探析》一文，进一步申述了《略论青莲岗文化》一文的基本观点。由于涉及问题的核心，自然成为会议上大家关注的焦点。不过讨论中多在考古学文化的名称上做文章，而实际内容跟仲庆兄的观点并没有多大差别，都赞同江南、江北应属于不同的文化区，两区各自的文化分期也大同小异。由此可以看出，仲庆兄关于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本观点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科学结论。

仲庆兄对江苏考古的贡献不限于新石器时代。他在多年中参加或主持发掘的古遗址和古墓葬还有很多，而且多有重要的发现。他写了很多考古报告，并且都以单位的名义发表。几十年劳累奔波，竟没有多少时间撰写学术论文。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没有多少成绩，其实他是做了很多工作的。除新石器时代考古外，在历史时期的考古方面也有许多重要的贡献。例如他在对扬州古城进行调查发掘的基础上所作扬州城变迁历史的研究，对邗江甘泉汉广陵王墓葬的发掘与墓主人身份的考证，都是很见功底的杰作，其中还有一些颇饶兴味的故事。这在他自己写的《考古伴我此生行》中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兹不赘述。

仲庆兄为人正直厚道，乐于助人而淡泊名利，许多成果都不署自己的名字。他治学严谨，从不人云亦云，有自信而决不张扬。兢兢业业，为考古事业奉献一生，可谓考古学者的楷模。他的文笔也非常好。看他最近写的《破解盱眙南窑庄窖藏之谜》，全文条理清晰，逻辑严密，按照所能收集的证据步步推演，引人入胜，看起来简直是一种享

受。很多人感到考古文献难读难懂，除了考古学本身的特点外，作者的水平应该也是一个原因。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回答。我想本文集的出版不但是对考古学的一份贡献，也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2010年5月1日于北大蓝旗营蜗居

五 北方考古

北方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中国的北方地区通常指长城以北的广大草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那里是以出土大量细石器为显著特征的，与本书（《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所指的北方地区不是一个概念。该书所指的北方地区基本上是在北方草原地区以南、中原地区以北，并且受到中原文化强烈影响的地区。苏秉琦先生在谈晋文化考古时曾经对于这一文化区的范围作了明确的概括，他说：“‘北方古文化’一词，这里专指和山西北部古文化密切联系的地区……它的界定范围大致是：西以包头市—东胜（不清晰界线），南以太原—榆次地区（不清晰界线），东以张家口（地区）—锡林郭勒（盟）（不清晰界线）为限，大体与习惯上称作‘三北’中的‘北方’相当（包括内蒙古中南部一部分，晋北、陕北和冀西北一部分）”^①。从自然地理区划的角度来看，它是跨越华北区和内蒙古区之间的过渡地带。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它是处在东部季风区和西北干旱区之间的过渡地带。不过由于阴山山脉耸立于本区的北方，黄河又向北流经阴山脚下，使得内蒙古中南部局部地方的气候与自然环境接近于其南部的晋北和冀西北一带，而与阴山以北的草原地带大不相同。这大概是为什么在两大自然区划之间能够形成一个文化区的缘故吧。

这个地区的考古工作虽然开始较早，但长期限于零星的地面调查或小面积的发掘，对其文化面貌缺乏深入的整体的了解。自从苏秉琦先生提出要按照区系类型的方法来研究考古学文化以来，这个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内蒙古中南部、河北的张家口地区和山西中部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对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和发展阶段有了基本的了解。特别是在内蒙古的岱海地区开展的以聚落考古和环境考古为主要内容的小区考古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把本地区的田野考古水平一下子提高到全国先进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把北方地区的考古成果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不但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条件，而且是非常必要

^① 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2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的了。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田广金和郭素新夫妇长期主持岱海地区的考古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资料。由于整理研究的工作量太大而他们自己又过于繁忙，希望我派一两位得力的研究生协助。本书作者韩建业对长江中游和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素有研究，对北方地区的考古也颇有兴趣。所以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就同他商量并确定以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作为学位论文的主题。为了能够尽可能多地掌握原始资料以便进行深入的研究，首先便去内蒙古凉城县老虎山工作站，在田、郭两位先生的热情支持和指导下整理岱海考古资料。田、郭两位先生和老虎山工作站的人员给予建业极大的方便和尽可能多的帮助。而建业不但业务基础好，更是一位十分认真和不知疲劳的人，所以工作效率极高。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完成了岱海地区老虎山和园子沟等遗址的资料整理工作，并且写出了约70万字的正式报告^①。期间还参加了板城遗址的发掘勘探、资料整理和报告的编写工作^②，以及岱海地区仰韶文化时期若干遗址的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后者将集结为《岱海考古（三）——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样扎实工作的基础上，他又广泛收集了其他地区的考古资料并加以梳理，对发表资料最少因而情况不大明了的陕北地区亲自进行了野外调查。最后撰写的学位论文自然得到了答辩委员的好评。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认真修改而完成的。书中着重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文化分期与发展谱系，二是聚落形态与社会发展。而这两个问题又都跟人地关系的演变息息相关。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发展得比较晚的。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遗存至今只有极个别而难以确定的发现。可以想见，在那样好几千年的漫长时间里，那里的居民一定是非常稀少的。可是到公元前5000年或稍晚一些时候，这里突然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在冀西北蔚县的四十里坡，在内蒙古岱海地区的石虎山，包头地区的阿善和准格尔旗的坟堰等地，都有他们留下的足迹。从所有遗迹和遗物的特征来看，毫无疑问是属于仰韶文化的，证明这些农民是从南边的中原地区及其左近迁移过来的。记得在1997年8月下旬，当中日合作的考古队在岱海地区的石虎山遗址发掘行将结束的时候，我到那里去看了看。在小山头上有两个同属于仰韶文化的聚落遗址，二者相距不过300米，文化面貌却有明显的差别^③。石虎山Ⅱ没有围壕，整

①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 岱海地区考察队：《板城遗址勘查与发掘报告》，《岱海考古（二）——中日岱海地区考察研究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③ 岱海地区考察队：《石虎山遗址发掘报告》，《岱海考古（二）——中日岱海地区考察研究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

个聚落在东南缓坡上，房屋全部朝向东南坡下；出土陶器与仰韶文化的后岗类型十分相似，而后岗类型主要分布在河北中南部和河南北部，它的早期形态或祖源当为北京房山的镇江营一期文化。可见这些农民应该是从华北平原北部沿着永定河及其主要支流桑干河上溯到达岱海地区的。而石虎山 I 有围壕，出土陶器除了与后岗类型相似的部分以外，还有不少绳纹罐，表现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强烈影响。而半坡类型主要分布在陕西渭河流域，在山西也有许多类似的遗存。他们的影响显然是通过黄河和汾河河谷北上而到达岱海地区的。不过在晋中北和黄河前套地区，遗址的数量远多于岱海地区，文化特征又特别接近于半坡类型，可见北上的移民主要来自关中和晋南地区。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有那么多仰韶文化的农民迁移到北方地区呢？这与仰韶文化本身的发展有关，也与全新世的气候演变有关，更与北方地区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有关。

公元前 6500 ~ 前 2000 年大体上相当于全新世中期的气候最适宜期，华北和北方地区的气温和雨量都比现代为高。据崔海亭等学者的研究，内蒙古中东部的年降水量要比现在高 100 毫米，岱海地区的降水量则比现在高 40%。内蒙古中南部一些条件较好的地方已经可以发展旱地农业。但毕竟那里纬度较高，气候和土壤条件都不如关中和华北平原，后者才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温床。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和老官台文化中，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地农业已经有较大的发展。在当时种植技术和经验都还比较低下的情况下，能够开发的地方只限于河旁阶地等比较狭小的地带，难以向大平原拓展。开发出的农田种植几年以后肥力大减以至于不得不抛荒，这样单位面积上的人口载荷量就十分有限。进入仰韶文化时期，我们看到遗址数量大增，每个遗址的规模也有所扩大，说明那时的人口已有显著的增加。农人需要开辟新的耕地，最方便的途径便是沿着河谷北上，一直到达大青山的南麓。其中大部分是沿着黄河和汾河河谷北上的，少部分是从华北平原北部沿永定河和桑干河向西北进发的。不同地方的人相互接触后必然会发生交往，从而使文化面貌发生一定的变化，以至于难以简单地按照原来的文化类型来划分。到仰韶文化的第二期即庙底沟期，气候更加适宜，文化也有更大的发展。于是又有更多的农人北上，北方地区的遗址数量大为增加，单个遗址的规模也有所扩大。到仰韶文化的第三期发生了一个转折，北方地区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发生了很大的差别。这是因为几次移民浪潮使北方地区的居民已经有相当的密度，生活基本稳定下来，外来移民不能说没有，至少已不很显著，这有利于本地特色的发展。其实，从整个仰韶文化来说，这时正是文化内容复杂化、分化趋势和地方色彩加强的时期，北方地区自然也不例外。同时这个时期开始与东北方的红山文化晚期和小河沿文化接触并且受到一定的影响，还受到华北平原较大的影响，这也是与前一个时期很不相同的。到仰韶文化末期即相当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时期，也许是由于气候发生波动的原因，农业文化分布的范围有些向南退缩。岱海地区、晋北和冀西北的人口急剧减少，其余地方则沿着仰韶文化三

期的轨迹继续发展。龙山时代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长期的开发已经使环境面临较大的压力。人们大量地开凿窑洞，固然是因为窑洞具有冬暖夏凉而又节省材料等优点，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因为树木减少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对策。这时候的气候有向凉干转化的趋势，农业生产势必受到一定的影响。已经较大的人口规模使得北方地区不但不能接纳外地的移民，反而需要向南方气候较好的地方迁移一部分居民，这可以从许多原本产自北方的器物向南和向东传播的事实中看出一些端倪。归纳起来说，仰韶文化前期（第一、二期）是南方移民进入北方地区开发的时期，仰韶文化后期（第三、四期）是这些居民稳定发展的时期，龙山时代则是因为气候等原因造成部分居民反向南迁的时期。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北方地区显然是中原文化区的派生区而不是一个自成系统的独立文化区，可以称之为亚文化区或亚文化系统^①。

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演变的情况以岱海地区研究得比较清楚，其他地区的资料比较零散，但是也可以看出一些基本的特点和演变的趋势。在仰韶文化前期，开始聚落数量少，规模也小，后来数量增加，单个聚落的规模也有所扩大。有的聚落有围壕，但不普遍，房屋多为长方形半地穴式，总体面貌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聚落十分相像，只是规模小，也不见像姜寨或泉护那样的大型房屋。迁居地不如本土发达也是很自然的。仰韶文化后期聚落规模略有分化，但还没有形成明显的中心聚落。聚落形态的地方性差异有所增加，首先在晋中出现简单的窑洞，稍后在包头一带出现石砌房屋，有些聚落外也有石砌围墙，说明已开始关心防护问题了。龙山时代许多聚落设置在陡峻的山坡上，并且建设石砌围墙，聚落的安全防御显然成了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时普遍居住窑洞，通常是利用山坡挖一个簸箕形房屋，立柱盖顶并设置火塘，是为起居室；再在高坡一面掏一个窑洞，挖出来的土在外面垫出一个小坪。窑洞地面和墙裙都抹白灰，是为卧室。卧室、起居室和户外活动的地坪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说明这时家庭的独立性有所加强。一个聚落有成百座窑洞，可以居住几百人。这样的聚落在紧靠岱海西北的蛮汗山的东南坡上一字排开有好多座，聚落的大小和内部分化并不十分明显，很难说哪一座是高出于其他聚落的中心聚落。通观北方地区聚落演变的情况，可以看出经济文化有所发展，有些方面跟中原地区也基本是同步的，有些因素对中原地区的文化构成甚至文明化的进程都有明显的影响。但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毕竟不如中原地区，自然资源有限，经济发展速度稍慢，社会变动不大，直到龙山时代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分化，没有形成贵族集团，走向文明的进程显然慢了一步。这大概就是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特

^① 严文明：《东方文明的摇篮》，《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148~174页及157页图二。在这篇文章中划分的雁北区大体相当于本书的北方地区，而雁北区只能是一个亚文化系统。

点吧，本书作者称之为“北方模式”，以区别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文明化进程较快的情况，也是不无道理的。

本书资料新颖而丰富，分析条理清晰，思路开阔。无论是关于文化谱系的研究还是关于聚落形态的研究都是放在整个黄河流域甚至全国的大背景下来展开的，这样问题才看得清，分寸把握得准。由于北方地区大部分处在气候敏感带上，所以人地关系的考察十分重要，这是环境考古的课题，也是作者颇为用心的地方。不论是文化的发展变迁还是聚落形态的演化，都提到人地关系的高度来观察和认识，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2003年4月1日于北京阜外医院

(原为韩建业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序，文物出版社，2003年)

红山文化五十年

——在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让我在这里发言，实在是勉为其难，因为我对红山文化没什么研究。在座的有很多学者对红山文化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做过很多工作。比如说在座的郭大顺先生，主持过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的发掘工作，对红山文化有很深刻的见解。刘国祥先生是后起之秀，也有很多独到的研究。让我发言大概是因为在座的各位中，我是最早到红山遗址做考古发掘的。那是1956年暑期的事，我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跟着著名的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到内蒙古进行考古实习。我的发掘很有限，但是让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红山文化，什么是田野考古。可以说，赤峰是我学习田野考古和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蒙的地方。所以我每次来赤峰，总是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

今天这个会是第三届北方文化学术研讨会。第一届开会时我来了，主持人是苏赫先生，他是我的老朋友，长期负责赤峰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可是今天见不到他了。参加第一次会议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观民先生，他作为内蒙古考古队的负责人在赤峰地区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多年，成就卓著，可惜也已经作古。今天开这个会很自然地想到他们，音容宛在，难以割舍。讲这些不是伤感，而是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已故学者的贡献。学术是有传承的，今天的研究是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今天条件改善了，资料积累多了，方法也改进了，可以研究得更好，水平更高，但毕竟还是以前工作的继续。这次会议来了这么多代表，我没想到，原来通知说是35人的规模，现在是80多人，济济一堂，说明我们的事业兴旺，相信会有很多精彩的高水平的报告。我的讲话就当是一个开场白吧。

红山文化命名的正式提出至今已经整整五十年了，至于红山遗址和红山文化遗存最初发现的时间更长，到现在已将近一个世纪。在这么长的时期里，对红山文化的研究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和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2004年7月24日于内蒙古赤峰学院。

第一个阶段可以叫做探索期或摸索期，大约从赤峰红山遗址的发现到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些零星的调查和发掘，也出了一些报告，但一直没有把它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来理解。日本学者提出了赤峰第一期文化，只是就遗址来讲。他们把红山后遗址分为第一期、第二期，我们现在讲的红山文化相当于第一期。比红山遗址发掘还早的锦西沙锅屯遗址中也有与红山第一期相同的遗存，可是发掘者不恰当地把它划归到仰韶文化的范围了。梁思永在林西西山也发现过同类遗存。有的学者把它划归细石器文化的一期，或者说是细石器文化与仰韶文化的混合文化。总之还没有把它当作一个有自身特征的、有一定分布区域和自身演变过程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对待。人们对这个文化有些接触，有些认识，但是认识不到位，所以把这一阶段叫做红山文化研究的探索期。

第二个阶段是确立期。1954年尹达根据梁思永先生的意见，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此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把这个文化确立下来，对这个文化的基本特征有了比较准确的认识；由于早于红山文化的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以及晚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的发现，还有碳-14年代的测定，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都明确了；多年的调查把分布范围基本上弄清楚了；同周围文化的关系也大体上知道了。这样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一些基本要素都确立起来了。所以把这个阶段叫做红山文化的确立期。

第三个阶段是发展期或转变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个转变可以从东山嘴的发掘开始算起。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喀左东山嘴的一个小山头上发现了成组的祭祀性遗迹。1983年7月，在苏秉琦先生倡导下，在朝阳开了个小型研讨会。郭大顺介绍了东山嘴发掘的情况，并且带我们到遗址上进行了实地考察。大家都感到很惊讶，红山文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祭祀遗址？中原地区做了那么多工作，怎么就没有发现这样的遗址呢？会上大家分析中原地区之所以没有发现，大概是因为人太多了，开发、破坏太厉害，所以保存不了。在内蒙古地区人口不是太多，农田水利等建设工程相对较少，这类遗址就可能保存下来。大家对内蒙古考古的期望值一下子提得很高，觉得有些重要问题在中原难以解决的，也许在内蒙古可以解决。我们还想，既然东山嘴有这样祭祀性的遗址，那么它的主人的住地就不一般，应该好好去找。结果是与东山嘴相应的住地没有找到，却有了更加重要的发现。就在那次会后不久，也就是在同年的10月，辽宁省文物考古所的业务人员在凌源牛河梁遗址发现了包括女神庙、祭坛和多处大型的积石冢等，不但前所未见，而且规模之大和规格之高几乎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随之在考古界兴起了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热潮。其实牛河梁遗址早在1942年佟柱臣先生就调查过，只是不知道有那么大，不知道有那么多重要的内容，也弄不清楚它的文化性质。1981年的调查虽然有所进展，也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由于东山嘴的发掘和朝阳研讨会的召开，才启发对牛河梁遗址的详细考察和重新认识，进而导致对红山文化认识的重大转变和飞跃。从那以后直到现在，可以叫做红山文化研究的发展期。

现在我们认识到，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燕山地区的老哈河中上游和大凌河中上游，即内蒙古的赤峰地区和辽宁的朝阳地区，其边界北过西拉木伦河，东到下辽河西岸，南到渤海之滨，西达河北省的围场，面积约 15 万平方公里。它是继承当地的赵宝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大约也继承了富河文化和西寨文化（它是分布于河北省滦河流域，与赵宝沟文化大略同时并且有密切关系的，或可以视为赵宝沟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的部分因素，在发展过程中又受到了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其年代经过碳-14 测定和适当调整，大约在距今 6500 年至 5000 年之间，一般可分为早晚两期或早中晚三期。

红山文化的陶器明显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夹砂灰褐陶，一类是泥质红陶。还有少量泥质黑陶，那大概是继承赵宝沟文化的泥质黑陶而发展下来的。夹砂灰褐陶多筒形罐，多饰压印之字纹和划纹。而筒形罐和压印之字纹从兴隆洼文化开始，经赵宝沟文化到红山文化，还有富河文化和西寨文化等，都是普遍流行的特征，是燕辽地区史前陶器的传统形式。只不过红山文化的筒形罐多口大底小，腹部较浅，之字纹也稍有变化。其他器形和纹饰则跟赵宝沟文化有较大差别。泥质红陶中多盆、钵、罐，且多饰黑彩，这些器形和某些花纹分别与仰韶文化的半坡期晚段、庙底沟期和内蒙古中南部的海生不浪类型等相似，明显是受到了仰韶文化的影响。但是有些泥质红陶和彩陶上也饰篦点之字纹的情况，仍然反映了本地传统的风格。至于在祭坛和积石冢等处发现的大量彩陶筒形器，则是红山文化独有的最具特色的器物。

红山文化的石器跟赵宝沟文化一样，也可以分为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和细石器三大类，只是磨制石器更为发达，特别是翻地的石耜（过去称为石犁）和磨谷的石磨盘、石磨棒远比赵宝沟文化为多，说明农业有比较大的发展。而细石器的多见则是长城以北新石器文化的普遍现象，说明那时狩猎经济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红山文化中已发现个别小型的铜器，说明至少在它的晚期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红山文化的玉器早有发现，但是长期被误认为是所谓周汉玉器。20 世纪 80 年代初孙守道、郭大顺首先确认红山文化有玉器，并且与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联系起来，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这一论断后来被大量考古发现所证实，从此关于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便成为探索中国早期玉文化的发展乃至中国文明起源的区域性特征等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红山文化时期文化的发展，可以从聚落遗址大幅度增加及其规模的变化窥其端倪。过去在敖汉旗的调查，发现年代最早的是小河西文化，遗址只有少数几处，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遗址各有 60 余处，红山文化遗址一下子增加到 500 多处。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在辽宁朝阳地区一带普查时，也发现红山文化遗址近百处。最近中美合作在赤峰西部展开拉网式的调查，在 765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兴隆洼文化遗址 14 处，赵宝沟文化遗址 29 处，红山文化遗址达 160 处，小河沿文化遗址只有几处。显然红山

文化时期出现了一次飞跃式的发展，到小河沿文化时期就走下坡路了。由于各地考古调查的方法和深入程度不同，发掘的面积又十分有限，没有一个遗址是经过比较全面地发掘的，因而整个红山文化聚落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只知道不少地方的遗址有聚集成群的现象，有的似乎是围绕一个祭祀遗址形成聚落遗址群。一般遗址只有几千平方米，较大的有几万平方米以至几十万平方米。内蒙古巴林右旗的那斯台遗址有150万平方米，有许多房屋基址，有多达七八座陶窑的制陶作坊遗址，地面上还采集到许多石雕人像和成百件玉器，显然是一个中心聚落，可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敖汉旗的西台遗址有两个互相连接的环境聚落，是唯一经过大面积发掘的遗址，详细资料至今没有发表，具体情况不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队发掘的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我去看过，保存得很好，地面上的一个个黑圈都是房子的遗迹，有将近100个，外面有环境，至少是一个中型聚落。赤峰市以东的毡家地遗址有双重环境，地面暴露的房址有200座以上，显然也是一个中心聚落。调查的材料虽然有限，不足以反映红山文化聚落形态的全貌，但至少可以看出与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明显区别，说明红山文化的社会已经有了明显的发展和内部的分化。

红山文化的墓葬虽然时有发现，但都很零散，至今没有发现像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中常见的大型墓地。较早的墓葬见于林西白音长汗和巴林右旗洪格力图等处，都在山坡顶上。前者有7座积石冢，后者也有几座积石冢，其中个别墓有石椁，随葬器物很少。较晚的墓见于阜新胡头沟、喀左东山嘴、敖汉四家子、朝阳市郊、北票和河北平泉等地，也都是积石冢，一个冢子有一座墓或几座墓。把这些墓葬加起来也不过百座左右，同红山文化数以千计的聚落遗址，一个遗址有数十上百座房址的情况相比较，简直太不相称了。推测当时还应该有较大较多的墓地，而埋葬方式也不一定是积石冢，因而比较难于发现。

在红山文化的墓地中最突出的要数凌源和建平交界的牛河梁墓葬群。这个墓葬群分布在牛河梁的各个山梁和山坡上，覆盖面积达50平方公里。单是中心区约1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有12处之多。每一处有一座或多座积石冢，以一座者为多。而第二地点则可能有十多座积石冢。从第二地点和十六地点的情况看，明显有相互叠压和打破的关系，说明是在先后不同时期埋葬的。最早的积石冢应该是第二地点的“筒形器墓”，共有6座，每冢一墓，埋一人。有的墓有石椁，周围砌石头和筒形彩陶器，冢上积土积石，直径约6~7米，规模较小。这种墓仅见于第二地点。晚期的积石冢规模明显扩大，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等各种。按照逻辑应该以圆形冢较早。第二地点的四号冢实际上不止一个冢，可能先后有五个冢相互叠压打破，较早的是位于东北部的圆形冢，其次是西北部的圆形冢，再次是西部的长方形冢，该冢分南北两格；东部有两个长方冢，因为没有发掘，相互关系不明。从这些情况来看也是圆形冢比长方形冢较早。长方形冢有横

长方形的如第二地点的一号冢，有竖长方形的如第二地点四号冢和五号冢。一号冢有两个中心墓东西并列，四号、五号的长方形冢南北分格，也可能是为两个中心墓而设计的，因为没有发掘完毕，情况不明。晚期圆形冢的直径多在17~20米，中间有一个大型石椁墓，有的还附带若干小墓。外围砌石圆圈，紧贴石圆圈有一圈或两圈彩陶筒形器。有的冢有两三层石圈内收成台阶状，上面垫土积石，十分壮观。方形或长方形冢的筑法与圆形冢相同，方形冢约18~20米见方，长方形冢宽约20米，长30~50米不等。除中心大墓外，有的还有若干中小墓葬。例如第二地点一号冢南部就有四排20多座墓葬。

所有积石冢都有中心墓，说明积石冢本身就是为中心墓的死者而建造的。其余中小墓多是在积石冢建成以后陆续埋葬而形成的。中心墓一般随葬玉器，其余中小墓有些也随葬玉器，个别的甚至比中心墓的玉器还多。说明其死者的地位并不很低，也许与中心墓的死者是属于同一家族的成员。但为什么有的家族的死者继续埋在牛河梁，有的家族没有，这个问题暂时还说不清楚。还有那些中小墓的情况也多有不同，如何解释也还是个问题。

我们之所以要特别注意牛河梁，是因为在5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至今没有发现居住遗址，即使在50平方公里范围以外，也没有发现一处大型居住遗址可以与牛河梁墓葬群相匹配。在整个红山文化中有如此高规格的葬地者至今只发现牛河梁一处；从多次调查的情况来看，大概也不大可能发现第二处。因此牛河梁应该是红山文化中各个部落首领及其家族的共同墓地。这里的积石冢有很多一致的地方。比如说，它大体上都有一个中心大墓，周围用石头砌成圆形的或方形的边框，有几个台阶，然后上面垫土铺石头，周围摆放一圈或两圈筒形的彩陶器。每座积石冢的营建都要动员大量人力，还要有专门的石工（砌边框的石头往往经过琢制，砌椁室的石块也经过一定加工，有的中心墓还要开凿基岩）、陶工（做彩陶筒形器），修成后从外观看非常气派，充分显示墓主人的权威。但一般中心墓只随葬不多的玉器，不像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些贵族墓那样随葬大量显示财富的珍贵物品。假如一个积石冢内的各墓属于一个家族，那些中小墓不但没有许多显示财富的随葬品，也没有显示个人威权的特殊冢墓，只是从属于为中心墓主人所建的大积石冢。那么这个家族就很难说是一个人人都很尊贵而富有的家族。当然，玉器和大量彩陶筒形器也可以视为一种财富，不是任何人可以拥有的。但彩陶筒形器是专门为积石冢而造的，是无法同他人交换的。玉器是否可以交换也难以确定。它们同积石冢一起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支配他人的权力，而不是具有交换价值的财富。这似乎说明红山文化还没有显著的而只有非常初步的贫富分化，还没有形成一个拥有大量财富的贵族阶层，却发生了权力的高度分化与集中。这是红山文化社会的一个明显的特点。红山文化的玉器种类较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三样：一样就是叫猪龙或熊龙的器物，造型抽象

而模式化，可能是红山文化人们共同信仰和崇拜的圣物；第二样是箍形器；第三样是勾云形器。但是并不是每个中心大墓都有这三种玉器，有的完全没有。其他玉器多是佩饰，各墓也不大一样，出土位置也不固定。考虑到有些居住遗址也出玉器，特别是北部的遗址出土较多。从这些情况来看，红山文化中谁应该拥有玉器，应该有什么样的玉器，似乎还没有一定的制度，这也反映出红山文化社会特点的一个侧面。

牛河梁除有许多墓葬外，还有所谓女神庙和巨大的祭祀平台等宗教性建筑。女神庙的规模并不很大，但规格甚高，形状奇特。半地穴的房子墙壁上有压印的花纹和紫红色与白色的彩绘。发掘工作只开了个头，只有局部挖到底了，大部分仅是浮面做了清理，就发现有属于七个个体的泥塑“女神像”残块。如果发掘完毕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这些塑像的个体很大，大的有一个人的三倍，小的也和真人差不多大，一般是坐像，背部粘贴在墙壁上。此外还有很大的动物塑像，包括“熊龙”的吻部和鸟翅鸟爪，鸟爪比我的手还大。那么多巨大的个体放在一个庙里面，剩下的空间一定不多，只能有极少的宗教领袖或法师进去参拜祈祷和接受“神谕”。这女神庙便成了牛河梁乃至整个红山文化中最庄严和神秘的处所。而那些法师或宗教领袖便由此获得了无上的权威。

紧靠女神庙的北边有人工修筑的大方台，已经残缺不全，看起来像是东西两个并列，西边一个的北边似乎还有一个，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方台子的边缘都用大石块砌筑，工程量相当大。台上有一些似与祭祀有关的坑穴。方台子的北边发现有红烧土堆积，其中有建筑构件和人形神像的残块，还有不少陶祭器。推测附近应该有另一座庙。两座庙和方台连在一起便构成了一个宗教活动的中心。在这个中心的周围还有一些似乎与祭祀有关的坑穴，里面发现有许多特殊的陶器和兽骨。整个中心的位置居高临下，所有积石冢应该都是围绕它而安排的。前面说过，这些积石冢的死者应该是分布在各个地方的部落首领及其家族的部分成员。可是这种大型的积石冢不光牛河梁有，其他地方也有，不过每个地方多只有一座。胡头沟经过第二次发掘，知道也是一个方形积石冢，规模不次于牛河梁的方形冢。是不是离牛河梁比较近的，而且关系比较密切的部落首领才可以埋在牛河梁，而其他没有这种关系的部落则不可以？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以牛河梁为中心的各部落共同建设了一个巨大的宗教圣地和显贵人物的坟山。他们显然结成了一个更高级别的组织，这组织至少是一个颇大的部落联盟乃至酋邦，即所谓建立于公社基础之上而又高于公社组织的社会结构。至于其他地方以积石冢或大型中心聚落（如那斯台）为代表的各个部落，从其对首领的埋葬方式和所用玉器的样式等方面来看，应该与牛河梁有同样的宗教信仰和崇拜方式，只是没有形成这么大和这么高级的社会组织。即使有较小的部落联盟或酋邦，也没有达到牛河梁的发展水平。这说明红山文化本身的社会发展也是不平衡的。

由此看来，红山文化的社会跟东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或良渚文化的模式显然不同，

仰韶文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结构虽然说不清楚，反正跟红山文化也不一样。过去一般都以为燕辽一带是北方地区，生态环境不如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应该稍微低些或滞后一些，现在看来似乎有点估计不足，所以苏秉琦先生说红山文化是一个建于公社基础上而又高于公社组织的社会结构。有些人接受不了这个观点，认为你说的女神庙不就是母系氏族社会吗，你又说建立在公社基础上，又高于公社，那不就是国家了吗，母系社会怎么会有国家？拿这些老的框子去套，当然是套不上。但是我想，我们研究考古学，依据考古资料来研究古代社会，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不应该拿框子去套。不用说中国的情况跟外国不大相同，就是中国不同地区的情况也有差别。中国文明的起源也不只发生在一个地方，各地在文明起源的进程中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但因各自的文化传统不同，所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不同，总是带有自己的特色。经过相互碰撞、交流与融合，最后才汇总在一个中华文明的大熔炉里，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牛河梁虽然是在红山文化的晚期，距今只有5500~5000年，这年代其实并不很晚。即使从世界范围最早的文明起源这个角度来看，它也是相当于埃及、西亚古文明的前夜，这很不简单。我记得过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了英国剑桥大学的两位教授看了牛河梁遗址以后，就设在人类文明起源阶段，像这样大规模和高规格的遗迹应该算得上是世界级的。因此我们要很好地保护它，研究它，研究它本身的特点和发展演变的机制，研究它对往后中国文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对整个东北和东北亚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从而把对红山文化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原载《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甘肃史前考古的丰碑

学术界期待很久的甘肃大地湾考古报告终于出版了，这对于甘肃史前考古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全国史前考古来说也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时期：辽宁牛河梁发现了红山文化的坛、庙和积石冢群，出土了巨型泥塑和许多造型特别的玉器；甘肃大地湾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礼制性建筑——原始殿堂；浙江良渚发现了反山、瑶山等祭坛和贵族墓地，以及莫角山的大型建筑基址，墓地中出土了比牛河梁多得多也更加精美的玉器；湖北天门发现了石家河文化的大型城址和大批宗教遗迹；山东临朐发现了龙山文化多重棺椁的大型贵族墓葬……这些在以前被视为典型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存中，却发现了如此丰富的闪耀着文明火花的遗迹和遗物，不能不使人在惊叹之余，认真考虑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国文明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是不是需要适当的提前？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中的特殊地位是不是需要重新考虑？到底是中原中心还是多中心，还是多元一体，到底怎样提比较合适？人们纷纷发表意见，一下子出现了一个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热潮。在这个热潮中，大地湾的考古发现乃是被学术界特别关注的亮点之一。

记得在1986年8月初，由苏秉琦先生提议和在甘肃省有关部门的主持下，在兰州市专门召开了一次甘肃原始文化研讨会，集中讨论了大地湾考古的问题。会上郎树德和张朋川全面介绍了大地湾考古发掘的情况和主要收获，接着与会人员全面参观了出土文物，对大地湾考古的丰硕成果有了初步的了解。为了让大家有更加深刻和实际的感受，还特别安排了到大地湾遗址进行实地考察，使我有机会亲眼看看这个著名的遗址。我们首先参观处在五营河南岸阶地的聚落遗址，那里最早有大地湾一期文化或被称为老官台文化的小型聚落，后来在它的废墟上建起了仰韶文化半坡期晚段的环境聚落，到庙底沟期又明显扩大。由于有三个时期的聚落重叠在一起，后两期本身又还有早晚之分，所以房子非常密集。但只要把分期弄清楚，就可以看出每一时期聚落的布局及其逐步扩大和演化的情况。大致的情况是，大地湾一期因为遗迹太少，聚落布局不甚清楚。半坡期是环境聚落，房屋是凝聚式和向心式的。为了保护遗址，发掘过的绝大部分遗迹已经填埋起来了，只留下几座房屋基址让大家参观，那都是保存极好的具有代表性的房子。

这阶地南边紧靠一座黄土山，从坡下往山上望去，陡崖之上耸立着一座极为醒目的大型建筑，那就是号称原始殿堂的901号房子的所在。那建筑自然是为保护901号房子而盖起来的，不过它的体量比901号房子大不了多少。它的位置和样式使我们很容易体会当年的原始殿堂那居高临下的气势。我们爬上山坡，才知道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畚箕形山窝，那便是仰韶文化晚期的聚落所在。其面积有数十万平方米，比山下庙底沟期的聚落又扩大了许多。畚箕柄端最显著的地方便是901号大房址。

我们首先参观901号房址。它由前堂、后室和左右两个厢房组成，前面还有一个广场。单是前堂就有130平方米，地面非常平整光滑，呈灰黑色，看起来就像是水泥抹的。1960年我在洛阳王湾发掘仰韶文化晚期的房址时就见过这样的地面，应该是仰韶晚期的一项重大发明。不过大地湾这座房址比王湾的房址保存得好多了，而且无论从规模和主次分明的格局来看都是前所未见的高规格建筑。我们从中门进去，迎面便是一座比双人床还要高大的巨型火塘，火塘两边各有一根直径达90厘米粗（木柱直径50厘米，外包草泥和灰浆）的顶梁大柱。那火塘显然不像是一般居室中主要用于炊事也兼作取暖的火塘或灶，而可能是举行大型祭典或公众议事会时燃烧圣火的场所。你可以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那在当时该是多么气派、庄严而神圣的处所，称之为原始殿堂应该是很贴切的。

从901号房址往南，开始还比较平缓，接着便逐渐升高，而且越来越陡。现在整个山窝都已经开辟为梯田，无意中造成了许多剖面，从剖面上可以看到地层的变化和某些遗迹现象。老友张学正领着我一个一个地察看，断断续续地发现有许多房址的地坪，有的地方上下叠压三、四层。我们估计整个聚落大概有几百座房址，而且可以分成几片。每一片至少有一座中型房址和若干小房址。在中轴线上还有F405等大型房址，它的形状结构和工艺水平都与F901差不多，只是没有后室和厢房。这样整个聚落就好像是以F901为中心，或者以F901至F405为中轴线的分层次和分等级的有序结构。这种结构在它以前的半坡期和庙底沟期是不曾见过的，而且其规模和某些建筑的规格都远远超出了半坡期和庙底沟期，也超出了周围同时期的聚落，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心聚落。这说明从庙底沟期到仰韶晚期有一个实质性的飞跃，其意义正如前面所述牛河梁、良渚和石家河等处的重大发现一样，是文明起源的重要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也就是整个中国的核心地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发生的，只是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在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时候，既要注意各地的区别，又要注意相互之间的联系，并且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不过深入的区域性研究毕竟是进行整体考察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地湾遗址的发现具有特殊的价值。这是大地湾考古发掘的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我们注意到牛河梁、大汶口、良渚和石家河等大型聚落的文化遗存都比较单纯，经

历的时间都不太长。而大地湾则是从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早期（半坡期）、中期（庙底沟期）、晚期直到常山下层文化五个时期的聚落先后相继，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复杂，反映了从农业发生不久的小型社群一步一步地发展到初步文明化的社会的全过程，这也是大地湾遗址的优势所在。再者，大地湾的每一期文化遗存都相当丰富，特征鲜明，前后的承袭和变化都很清楚，有利于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在陇东地区树立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年代和文化发展谱系的标尺。这是大地湾考古发掘的又一个重要收获。

大地湾位于渭河上游，正当中原文化区和甘青文化区的交接地带，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文化遗存，使其有可能成为贯通中原和西北史前文化关系的一把钥匙。大地湾的前三期文化同关中地区的同期文化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可以划归相同的类型。但到第四期文化就不同了。第四期属于仰韶文化晚期，这时正是仰韶文化大分化的时期。各地的仰韶文化虽然都是继承庙底沟期的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但发展的方向各自不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不同，从而在文化面貌上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差别。例如在山西西南部的西王村三期类型和陕西关中地区的半坡晚期类型的彩陶就十分稀少，有的遗址几乎看不到彩陶，而河南中西部的秦王寨类型、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的大司空类型、内蒙古中南部的海生不浪类型以及甘肃的大地湾四期类型都还有比较多的彩陶，各类型的彩陶花纹又有很大差别。我们更注意到关中和陇东的差别，因为这两个地方都属于渭河流域，只不过一个在渭河的中下游，一个在渭河的上游，这是很有意思的。如果看一看宝鸡福临堡和陇县原子头的材料，就知道从东到西还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大地湾四期不但比福临堡和原子头仰韶文化晚期的彩陶明显增多，而且花纹的样式也基本上与马家窑文化的石岭下类型没有多大差别，就是无彩的其他陶器也没有太大的差别。由此往西，便是马家窑类型的主要分布区，彩陶比大地湾四期明显增多。往后到半山—马厂类型彩陶更多，发展方向则与大地湾五期明显不同。为什么会这样，我过去在资料不很充分的情况下做过一点浮浅的推测，就是认为马家窑类型是从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发展而来，是庙底沟期在甘肃的继续和发展。现在有大地湾和相关遗址的大量资料，这个问题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大地湾考古报告是一个大工程，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认真整理。这是因为大地湾的资料特别丰富，整理起来很不容易；加以发掘的时间较长，人员有所变动，又增加了工作的难度。1993年3月间，我曾经应邀赴兰州协助整理大地湾考古的资料，发现有些房子的陶片找不到了，难以确定所属的文化分期。因此我建议实事求是，能够说清楚的一定尽量说清楚，并且要拿出充分的证据，实在说不清楚的就决不勉强。很高兴整理者克服了许多困难，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而且几经修改，终于完成了任务。读者可以看到报告对大地湾各期文化特征、性质与相互关系的研究，关于房屋建筑与聚落形态演变的

研究，关于生产工具、原始技术与生业发展演变的研究，以及人地关系演变的研究等方面都有比较深入和精彩分析。即使这样，个别资料的分期和解释也难免有不尽恰当之处，读者当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但就整体而言，《秦安大地湾》还是一部较好的考古报告，相信她的出版将成为甘肃史前考古成长的一座丰碑，对于中国史前考古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2004年3月22日于北大蓝旗营

(原为《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序，文物出版社，2006年)

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

新疆古称西域，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公元前 138 ~ 前 126 年前汉张骞通西域时有 36 国，后汉时有 55 国，那多半是依托绿洲建立的城邦小国。自从汉宣帝于公元前 60 年设西域都护，统辖西域，这地方才首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管治之下，同时也便进入了中国正史的记载。至于汉代以前的历史，只有一星半点的传说，不足征信。要把这一段历史逐渐追寻出一个眉目来，就只有依靠考古学家的努力了。

新疆考古虽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之初，那时英、法、俄、德、日等国学者或探险家纷纷造访此地，肆意掠走了大批文物。之后也做了一些研究，但对于汉代以前的历史可以说没有摸到一点皮毛。虽然如此，新疆却因此成了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场所。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在新疆的考古学者做了不少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获得了许多资料。而汉以前考古工作的突破则是在 80 年代以后。以往出土细石器或彩陶的遗址多被定为新石器时代，那是不确实的。80 年代初，长期在新疆从事考古工作的陈戈和王炳华发表文章，分别提出划分新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问题。陈戈后来又明确提出要划分新疆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问题。学术界大多同意他们的说法，只是划分的具体年限和界标还有一些不同的认识。

近些年来，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遗存又有不少新的发现，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一时期各地的文化有所不同。以新疆之大，自然地理环境之复杂，各地考古学文化出现较大差异原本是十分正常的现象。问题在于如何分辨和正确解读这些差异。如果不分年代早晚，笼统地将各地区的文化进行比较，就不容易分辨出哪些是因年代不同而发生的差异，哪些才是同一时期因为某些原因而发生的地方性差异。要把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差异分辨清楚，首先就必须对各个地区的文化遗存进行分期。而各个地区的分期又必须建立在各个遗址或墓地本身分期的基础上。事实上，遗址或墓地本身的分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要有地层根据，二要有标型器物以便进行全面的标型学研究。可惜在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众多遗址和墓地中，这两个条件都不够充分。一是可利用的地层（包括墓葬）叠压打破关系不多，二是作为标型器物的陶器在墓葬中并不很多，而且往往不成组合。而遗址中不同层位的陶器可资对比研究者更是十分有限。

这两个条件不充分，细致而准确的分期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退而求其次，还是从陶器入手，尽量把墓葬进行归类，也就是分组。再参照个别地层关系，大致排出各组的先后次序。然后把各个地区的分组进行对比，以便相互验证或进行个别的调整，还是可以划分出总的分期来的。在这个基础上参照碳-14测年的数据，也可以大致确定各期的绝对年代。韩建业在本书（《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研究中正是采用的这种方法，是在现有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方法。但是这个分期并不是文化的分期而只不过是相对年代的排比。要进行文化分期还必须考虑全部遗迹遗物的变化，全面估价各期之间的关系和前后变化的幅度。本书作者正是在进行了这样的分析后，把五期合并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青铜时代，第二、三阶段是早期铁器时代。

新疆那么大，民族那么复杂，在汉代乃至汉以前已经是小国林立，表现在考古学遗存上必然是多种文化并存。本书开始所作的十个地区的划分和后来进行的三个阶段的划分都不是考古学文化的划分。十个地区主要是根据自然地理单元和考古工作的情况而初步设立的，是研究的出发点而不是研究的结果。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是要在各个地区的分期和相互比照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在一定地区一定时期范围内具有一定文化特征的考古学文化划分原则，反复比较推敲才能够确定的，绝不可以只依据某些个别因素的相似而随意圈定。本书将新疆青铜时代划分为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古墓沟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克尔木齐类遗存等四类遗存。早期铁器时代则划分为焉布拉克文化等四个文化和香宝宝等两类遗存。这里的遗存也可能是一种文化，只是因为有些情况还不大清楚而暂时称为某某遗存罢了。两个时期的文化有继承也有一些变化，即使早期铁器时代两个阶段的文化也有一些局部的变化，书中对这种变化的原因也作了一些分析。有的文化之下还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而在文化之上又可以归纳为不同的系统。在青铜时代，可以划分为东部的带耳罐文化系统和中西部的筒形罐文化系统。如果从经济文化类型来划分，则可以将东北部的克尔木齐类遗存划分为畜牧狩猎经济文化区和其余大部分地区的半农半牧经济文化区。在早期铁器时代，大部分地区可以划分为高颈壶文化系统，而西部则为圜底釜文化系统。这时期经济生活上有区别，北疆可能是游牧经济，而南疆依然是半农半牧经济。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作为交通工具的马和骆驼的利用，加大了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新疆或西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的面貌也日益显现出来。这样就对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多层次的系统分析或比较完整的文化谱系分析，从而对新疆的考古学文化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本书第四章以相当大的篇幅谈到了各考古学文化的来龙去脉和交互关系。尽管许多学者就这类问题发表过各式各样的意见，但多是从某些文化因素出现的早晚和可能的传播路线立论，而不是以新疆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分期和详细的谱系研究为基础，缺乏整体的把握，因而显得单薄而欠说服力。在这种情况下，本书的研究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应当指出的是，讲新疆青铜时代文化的来龙也就是起源问题，自然首先要了解当地青铜时代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情况。可惜直到现在，新疆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究竟是什么样子还不清楚，无从进行比较研究。我相信这不等于新疆没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而是至今还没有发现或发现了而没有认识到。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既然到现在还不清楚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什么样子，那它本来就可能不是很发达。当受到发展水平很高的邻境文化的影响时，必然会发生剧烈的变化。日本的情况也许可以作一参照。那里新石器时代的绳文文化还比较发达，因受大陆青铜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弥生文化不但迅速替代了绳文文化，而且连人的体质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新疆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新疆很大，各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很大的差别，接受外部影响的情况各不相同。从外部情况来看，新疆的东西两边都有很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西边的中亚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就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并迅速影响到南西伯利亚等周边地区。其中安德罗诺沃文化直接发展到新疆西部，南西伯利亚的阿凡那谢沃文化和奥库涅夫文化则从西北影响到新疆，使新疆全境逐渐进入青铜时代，并形成若干具有一定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它们可以概括为筒形罐文化系统。新疆东部的甘肃、青海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马家窑文化以至四坝文化，发展的方向一直是从东往西。当一部分马厂期和四坝文化的人群到达东疆的哈密地区时，与东进的青铜文化发生了遭遇，两者碰撞融合而产生了哈密天山北路文化，从文化特征来看可以称之为带耳罐文化系统。在这个时期，新疆各青铜文化的居民大体都是不同类型的欧罗巴人种，蒙古人种只进到东疆的哈密地区。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就是两大人种和两种文化会聚所产生的一种复合文化。进入早期铁器时代，情况似乎发生了逆转。与带耳罐文化系统有较多联系的高颈壶文化系统占据了全疆的大部分地区，蒙古人种也逐渐向西移动；而与筒形罐文化系统关系密切的圜底釜文化系统则仅见于帕米尔一小块地方。尔后随着匈奴文化和汉文化影响的加强，新疆各地文化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作为东西文化交流通道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早先是西方的青铜文化带着小麦、绵羊和冶金技术，不久又赶着马匹进入新疆，并且继续东进传入甘肃等地；东方甘肃等地的粟和彩陶技术也传入新疆，甚至远播中亚。这种交互传播的情况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丝绸之路。即使在这时，在新疆的广大地域上，具有西域特色的文化仍然鲜明地展现出来而为世人所称道。

读者不难看出，本书不但全面介绍了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而且依据考古学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文化谱系，分析了这个谱系之所以形成、演变、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原因，以及它在早年东西文化交流上所起的特殊作用。这是第一部研究汉代以前新疆历史的考古学著作，很值得一读。

（原为韩建业著《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序一，文物出版社，2007年）

六 华南考古

华南考古的期望

近年来华南地区的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华南考古的特色也日益鲜明地显现出来。为了集中反映华南考古的成就，广东省文物考古部门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备，决定出版《华南考古》不定期刊物，等条件成熟后再考虑改为定期刊物，这是一件等待已久的很有意义的事情。

华南地区一般指广东、广西和海南，而以广东为主。广义的华南还可以包括福建、台湾和云南的南部。这里属亚热带和热带地区，夏长冬暖，四季常绿，雨量丰沛。华南的地形又特别复杂，北部山区重峦叠嶂，山清水秀；南部海岸线漫长而曲折，海岸边有富饶的小平原与河口三角洲。再往南就是广阔的海疆和星罗棋布的岛屿，这样就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态环境，每一种生态环境的生活资源都非常丰富，从而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非常优越的自然条件。

这里很早就有人类居住，有众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包括洞穴遗址和露天遗址，有发达的旧石器文化和不同时期的人类化石。研究人类历史的开篇常常是很吸引人的，而未知数又往往是最大的。研究华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包括人类化石在内，自然不能仅仅以地区的范围来考虑问题，一定要扩大眼界，要从人类起源和在东亚的早期发展这样宏观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和部署我们的工作。从这方面来看，华南地区无疑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发展前途未可限量。

这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形态多种多样。在山区和丘陵地带有大量洞穴遗址和坡地遗址，河边有阶地遗址，海边有贝丘遗址和沙岗遗址，还有许多海岛遗址和水下遗存，这种情况在别的地方是难以见到的。在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华南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早已突破了过去那种沙、软、硬三阶段的简单概括，而进入了文化谱系的探索，同时引进了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的研究方法，从而使研究水平前进了一大步。

关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问题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而又尚未解决的课题。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情况，华南在南亚热带和热带地区应该有相当的代表性。由于纬度低，气候变率小，历史上自然环境的变化也比较小。第四纪几次冰期对华南的影响就远没有长江流域和北方地区那么严重，没有对人类文化造成严重的冲击，文化的发展

就有比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华南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长期继续旧石器时代的传统经济形态——狩猎、采集和捕鱼等，完全是获取天然产品。因为这些资源在华南非常丰富，人们没有感受到生存的压力，没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经济形态并不要求生产工具有革命性的变革，所以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许多石器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差别很小，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特征就特别难以把握。这是华南地区的中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跟东南亚一样，之所以长期难以取得进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里青铜时代的研究已经从史前考古中分离出来，各地青铜文化的面貌和特征已经初步显现出来。过去以为几何形印纹陶是本地新石器文化的基本特征，现在知道基本上是属于青铜时代的。这个时期正是百越民族形成和发展，并且扮演重大历史角色的时期。研究百越文化的起源、发展及其在中国乃至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历史作用，应该是华南青铜时代考古的重要课题。例如在亚太地区的所谓南岛语系民族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就应该与百越民族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

秦汉时代是百越民族发展和融合为汉族的一部分的重要时期。近年来关于南越、闽越和骆越的考古都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其中尤以南越王墓和南越宫署遗址的发掘令人惊叹不已。大量的建筑遗存和出土文物不但显示当时华南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已接近于长江流域并具有浓郁的本地特色，同时表明了当地文化同长江乃至中原地区文化的密切关系和广泛的海外联系。

秦汉以后的考古研究也十分重要，现在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还不够系统，还有许多领域需要开拓。

华南有许多少数民族，关于这些民族的历史，文献记载甚少，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逐步恢复起来。

至于近年开展起来的水下考古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初步的成果就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历史上，华南是中国通向世界的门户，是中国人向海外开拓和吸纳海外优秀文化的重要基地，留下了许多与之相关的遗迹和遗物。这方面的考古工作有着十分广阔的前途，需要有计划地长期坚持下去，而且要热忱地争取必要的国际合作。

总之，华南地区的考古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我们要珍视这些成果，并且要有适当的园地加以发表，以便于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但是就华南考古的重要性和应该开拓的领域而言，已有的成绩又显得很不够，需要有适当的园地来加以提倡和鼓吹。编辑出版《华南考古》就是基于这样一些想法。我们希望《华南考古》能够成为有关学者喜爱的园地，能够在推动华南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甌皮岩遗址与华南地区史前考古*

这次会开得很好，对甌皮岩遗址的分期和各期文化的特征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对华南及东南亚史前考古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讨论。现在会议即将闭幕，我只讲三点意见。

首先讲一点感想，对甌皮岩遗址考古工作的感想。

这个遗址的考古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华南史前考古的一个缩影。华南地区史前考古进行了很多年，做了不少工作，调查和发掘了不少遗址，但是发表的资料很少，发表的形式也不尽如人意，研究难以深入。这种状况直到 20 世纪八十乃至九十年代以后才有所改变。甌皮岩遗址从第一次正式发掘到现在整整有三十个年头，如果从 1965 年的试掘算起就还要长些，有三十八年了。在这么长的时期里，先后进行过多次发掘和清理，大部分文化遗存都已经被揭示出来，可是发掘资料一直没有很好地整理，当然也不可能发表正式发掘报告。1976 年发表了一个简报，仅仅报道了 1973 年发掘的部分资料，就引发了大量的所谓研究和讨论的文章。这说明甌皮岩遗址确实重要，涉及华南史前考古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可是资料没有整理和正式发表就这么讨论来讨论去，能够得出什么结果来呢？一个地区的考古研究，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做好文化遗存的年代分期，理清文化发展的谱系。这是一项打基础的工作，做得好后面的工作就比较顺利，做得不好，进一步的研究就失去了依托。就广西来说，也是因为这项工作没有做好，所以长期进展不大。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傅宪国主持南宁顶蛳山遗址的发掘，才有了明显的转变。那个遗址的史前文化分了四期，基本上代表了南宁地区乃至广西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序列。这项工作以后还应该继续。

广西北部的工作是从桂林地区大岩遗址的发掘以后才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遗址的文化序列比甌皮岩更长、更完整，但是资料不是很丰富。甌皮岩遗址过去去发掘过的资料比较丰富，但是文化的分期和发展的线索不大清楚。记得我看了大岩和甌皮岩遗址过去发掘的资料后，觉得甌皮岩可以参照大岩的地层把资料整理出来。当然最好是把

* 本文为 2003 年 12 月 14 日在甌皮岩遗址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甑皮岩再挖一下，工作尽量做细一些，用重新确定的地层来甄别过去的地层，把资料统一整理通盘发表。这件事做起来很麻烦，比新挖一个遗址要麻烦得多。但是对华南考古来说又确实是一件积功德的事情。我捉摸能够担当此项任务的最合适的人选是傅宪国，但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我把这个意思跟宪国谈，想探探他的口气。他说他已经有这个计划，并且跟地方有关方面谈过了。我听了真是感动。现在这个艰难的工作已经圆满完成，到会的朋友每人都拿到了一本沉甸甸的发掘报告。我注意到这次发掘还充分考虑到遗址的保护，所以发掘面积很小，仅仅挖了十多平方米。目的主要是搞清楚地层关系，而不在于获取更多的遗迹和遗物。他们的发掘工作做得很细致，器物整理也一丝不苟，这样就能提供一个明确的参照系，借以把过去的资料一并整理出来。资料整理好了，再把它与大岩的资料联系起来，便可以对桂林地区乃至广西北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序列有一个基本认识。多少年的迷雾一下子拨开了。因此我想，要把我们的考古学研究和田野考古工作切实提高一步，首先不是要大规模的发掘，不是发掘得越多越好，而是把工作做得越细越好。在我们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致使考古发掘的规模被迫变得非常庞大。在这个过程中，免不了有些工作做得很粗糙，这对我国考古工作水平的提高是不利的。1986年在昆明召开的全国考古工作汇报会上，苏秉琦先生提出来，在同基本建设相关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要树立课题意识，要有重点，要按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办事，不要总是追求面积、追求规模。与工程建设相关的考古工作尚且如此，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就更应该做得认真细致。这样做，无论是对于学科发展来说，还是对于从事这个工作的考古人员的素质培养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点，关于华南史前考古的田野工作方面，要拓宽思路，改进方法。

华南地区史前时代有各种类型的遗址，有洞穴遗址、山坡遗址、河旁阶地遗址、贝丘遗址和沙岗遗址等很多种，形成一个很大的特色。不同类型的遗址在考古方法上会多少有一些不同，我们应该在工作中逐步总结和积累发掘各种遗址的经验。但是，我更注意华南新石器时代之所以出现多种类型遗址的原因，我想主要是两条：一是华南的自然环境复杂，小环境多种多样；二是新石器时代人们认识和利用自然环境能力的提高。不同的环境固然可以居住不同的人群，同一人群也未尝不可以利用不同的环境和自然资源，因此需要进行小区的研究。在一个小区内可能居住同一人群，也可能居住不同的人群。即使是后一种情况，因为比邻而居，相互之间也会发生密切的关系。因此，如果在小区内发现不同类型的遗址，绝对不要分割对待，而要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即使是一个遗址，比如洞穴遗址，人们是不是只住在洞穴里，而不在洞穴外边活动的呢？我说的活动不是指打野兽或采集食物等那一类远离住地的生产性活动，而是生活起居一类的活动。洞穴固然有许多优点，遮风避雨，冬暖夏凉。如果没有风雨，住在外边是不是更开阔舒适一些呢？我注意到近代还有人住在洞穴旁边，只

在洞穴内存放杂物或圈养家畜。洞穴和非洞穴的建筑是连在一起的。新石器时代有没有类似的情况，需要做工作才能证实，至少不要预先就排除这种可能性。第三层意思，如果发掘洞穴遗址，不仅需要分清地层、分清文化的早晚，还必须在分期的基础上对洞穴里面各个部分的功能进行研究。这次甑皮岩发掘重点放在了文化分期的方面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个遗址是国家级保护单位，不能全面的发掘。再说过去已经挖了很多，剩下的遗存已难以进行全面的空间分析。但是我想，今后挖任何洞穴遗址，都应该在分期的基础上进行空间分析，这应该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洞穴有大有小，里面究竟有哪些功能部门，人在哪里居住，在哪里烧火做饭，在哪里存放杂物，在哪里举行宗教活动等。还有石器和陶器等是在哪里制作的，是不是有一部分工序在洞穴里面做，而大部分工序要在洞外完成？有的洞穴里有墓葬，是在住人的同时埋的，还是搬出洞穴以后才埋人的？这些问题都应该研究清楚。因此我建议以后在发掘洞穴遗址的时候，除了要进行文化分期这样的研究以外，还需要努力弄清楚每一期文化遗存的布局，最好能够做出当时的生活面来，分析这个生活面上各个部位的功能，这样才可能对当时人们的生活有比较实际的了解。我想如果从这三个层次来思考和部署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田野考古水平就一定会有很大的提高。

第三点，要注意环境考古研究，充分把握华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特点。

华南地区的自然环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纬度较低，二是地形复杂，这两点对考古学文化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由于纬度比较低，大部分在北回归线以南，加上南岭山脉阻挡了冬季从北方吹来的寒风，所以冬夏的温差比较小，不像北方地区那样冬寒夏热、四季分明。更重要的是历史上气候的变率也比较小，第四纪几次大冰期对华南的影响就很小。从更新世向全新世转变的时候，华北和长江流域都是从异常寒冷而转向暖和，变化非常显著，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极大，正如王幼平先生所说简直是一种突变。华南则一直比较暖和以至炎热，虽然也有一些变化，但很不明显。人们没有感受到重新适应变化了的环境的压力，老的生活方式仍然可以继续维持而只需要缓慢的发展。因而华南地区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比较强，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几乎难以区别。即使到了新石器时代，打制石器延续的时间还特别长，采集—渔猎经济也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而农业的发生就比较晚。这都是连续性比较强的表现。另一个特点就是华南地区地形复杂，不但可以分成多个小区，而且遗址的类型多种多样，因此我们在这个地区做考古工作的时候，会跟在长江流域或黄河流域的做法上有很多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划分也可能有一些特点。我希望在这里工作的学者能够逐步积累起一套在华南地区进行考古工作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研究华南地区文化发展的特点。

华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相邻，气候、地形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考古学文化上自然会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比如这次阮文好先生提供的论文中谈到越南的多笔文化与

广西顶蛳山文化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我们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中国境内。在史前时期并没有国界，我们有必要把华南地区与东南亚地区的考古工作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开展合作。华南有很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岛屿，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在那里生息劳作，开辟海上资源。所以华南的史前文化也是一种海洋文化，同太平洋上所谓南岛语系的考古学文化也是有联系的。出席这次会议的贝尔伍德先生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研究。因此我们要拓宽思路，把华南和东南亚乃至太平洋地区的考古学研究联系起来，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很高兴这次会议的主题就体现了这种精神，并且有许多国外的学者参加，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出发点。作为中国的学者首先要把华南地区的考古工作做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的史前考古学必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原载《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关于石峡遗址发掘报告整理 编写工作的谈话*

石峡遗址的发掘，不仅是在广东，就是在全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最早得知石峡遗址发掘的一些情况，一个是从我的同窗杨式挺那儿，他给了我不少原始资料；一个是从苏秉琦先生那儿，他从广东回到北京，跟我相当详细地讲了石峡的情况。石峡遗址发掘后，他在杨式挺陪同下在当地住了一段时间，仔细揣摩了石峡的资料，写出了《石峡文化初论》，而且提出石峡文化的命名，这是他第一次命名一个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这一方面说明苏先生对广东的工作非常关注，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次工作对形成苏先生的区系类型思想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苏先生重视石峡，因为他认为这里是内地通向南方的一个窗口。由于你们成功的发掘工作，也由于苏先生的影响，石峡遗址和石峡文化在全国也就有很高的知名度了。时间不等人，一晃就是二十多年了，大家还是很惦记着这事，光是看到一个简报不够，希望发掘报告能早点出来。我每次到广东来，差不多都要问这事，跟式挺、非素、运泉都说过这样的意思：要尽早安排来石峡整理，把这个报告写出来。各位这次终于下了决心，两位老同学再加上子文、善德，在这里待了这么长的时间，那么认真地整理资料，我看到了很感动。最近我抓了好几个考古发掘报告，有些还比较好，有些报告的编写者就没有像你们这么认真，没有花这么多功夫，写出来的东西当然就不是很理想。

石峡遗址发掘材料由于搁的时间长了，你们对自己的要求又非常高，这样困难就会多一些。这两天我看了东西以后，觉得比我原来了解的那些知识更清楚了一点。昨天，我特意到遗址转了一次，知道这个遗址有几万平方米，而且发掘面积也不少，有4000多平方米，就是遗址东面的一块。但从遗迹和墓葬的分布来看，它好像自成单元。就是说它在遗址中不是一个随便的杳晃。我特别注意到这种迹象：发掘区的北面是房子，西边也有房子，南面好像也有房子，都是石峡文化时期的房子。而石峡文化时期的墓葬基

* 1999年1月24日于马坝石峡。

本都分布在被房子围成的长方形框子里面，但也有个别的墓挖到房子里来了。墓葬有早有晚，房子好像是一个时期的，究竟是相当于墓葬的哪一期不大清楚。因此，个别墓葬不一定是挖到房子里边，而是被房子叠压或者是打破房子。从发掘区所看到的布局大体是这样：三面有房子，中间是墓地。这太有意思了，原来压根没有想到过！而且这个墓地还是个比较完整的墓地，因为它的周围没有什么墓了，已经是到了墓地的边界了。我们平常研究埋葬制度，墓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发掘的很多墓葬都只是墓地的一部分，比如一个墓地有100座墓，如果只挖了其中的30座或40座，那么这些墓是一个什么单位呢？这就说不清楚了。因为一个墓地之所以成为墓地，它总是有一个人群或社群，虽然不好说是一个什么群体，是部落或是一个氏族我们不知道，反正是有那么一个群体，他们把自己的祖先埋在这个地方，埋葬的时候也不是随便把这儿的人埋这里，那儿的人也埋在这里的。因此，我们可以透过墓地研究它背后的人群。假如挖的墓地不是一个完整的墓地，你怎么去研究它背后的人群呢？所以把遗迹和墓葬两者结合起来看还是很重要的。整个遗址的更大布局我们不清楚，往西边是个什么样？年代上是否跟东边衔接？都不清楚。遗址尽管是那么大，作为一个聚落也不一定跟它一般大。一个聚落，在不同时期的位置可能有些变动，形成的遗址就会比实际的聚落大。了解整个遗址的布局那是更进一步的事情，我们现在的工作还没做到这一步，还没法说。我只是就现在已发掘的这一块来说，我觉得很幸运挖的是一个大体上自成一个单元的地方，这非常难得。

石峡遗址内涵很丰富，有好几期文化。我刚才讲的主要是第二期文化，即现在所说的“石峡文化”。但遗址又不只有石峡文化这一阶段的东西，在式挺摆出整理的遗址材料中看得很清楚，共有四个阶段的遗存。

第一阶段遗存以前也注意到了，但因材料很少，而现在所说的“汤家岗文化”、“石门皂市下层遗存”这些东西都还没出来，你们这儿的的东西则是比较早发现的，当时也没法给他一个正确的评价。现在因为湖南的工作做出来了，我们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第一阶段遗存大体上它相当于“汤家岗文化”或“石门皂市下层遗存”（杨式挺：我们说过“前石峡文化”）。那么提也可以，认真说又不十分恰当，因为第一阶段遗存也在石峡，你怎么叫“前石峡文化”呢？我1985年来粤北的时候，好像就只看过几块陶片，这次看还真有不少东西呢！完全可以够得上一期文化。所以第一阶段遗存，我们说它在年代上，或者说文化性质上相当于湖南的汤家岗一类遗存，湖南有人称为“汤家岗文化”，我们这儿把它叫“石峡第一期文化”，然后说它相当于哪一类遗存。因为第一阶段遗存跟第二阶段遗存不能搁到一个文化里面，两个差别太大了。现在也看不出来石峡文化是不是从它直接发展过来的，这中间还有缺环。这个阶段划出来以后，对珠江三角洲有些类似的遗存也更好理解了，不是跳过去的了。我觉得你们可以叫“石峡第一

期文化”，首先以它来命名，再来谈它的文化性质、文化关系。就是说，你不要说相当于汤家岗遗存的东西就是汤家岗遗存。它跟汤家岗遗存还是有差别的。至于这个差别是怎么来的，那是另外一个层次讨论的问题，报告里不一定要讨论这些问题。

第二阶段遗存就是石峡文化遗存。我看了一下遗址里第二阶段的東西，作为一个阶段，当然跟前后阶段的東西差别很大，也非常明确，但是资料不是很丰富，跟墓葬材料比差得很远。这可能与粘对陶片不够有点关系，如果陶片都尽量拼对起来，也许成形的器物会多一些。但是现在要把那么多探方的陶片一袋袋拿出来拼对，我觉得也不现实。如果你能找到那么几个坑，陶片比较集中，倒是应该用心拼对一下。

在石峡文化这个阶段，我们很幸运地从平面图上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全是房子，而不可能是别的东西。但是，当时发掘是把墙壁的基槽当灰沟挖的。当时没有辨认出房子就不会注意居住面，里面发现的墓葬究竟是打破房子还是被房子压着？这就不好说了。房子的层位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了解房子的层位就是灰沟即基槽的层位，讲清楚灰沟被哪一个压着，或者谁打破它，它又打破哪一个就行了。因为没有居住面，你不好按居住面来处理。现在既然认出了房子，写报告的时候就非得把房子编号，叫做某号房子，它是个什么结构，而不能完全按照原始资料和当时的判断来写了。写报告的时候，就应该根据房屋、墓葬来谈布局，要有一个聚落的布局。至于其他的東西，比如柱子洞，这说不清楚了，有一个平面图就行了。因为这些柱子洞究竟是属于房子还是仓库，还是别的什么建筑，都没法说清楚。这里顺带说一下在写报告的时候，要先说地层，接着进行分期，按刚才说的四个阶段，把遗址分成四大期，先不分小期，小期讲不清楚。四大期不能揉在一起。每一期都要有一个整体的介绍。特别是第二期的整体布局非常重要，要花点篇幅把整体布局说一说。讲完布局以后，后面就得讲遗迹、墓葬。墓葬中属于石峡文化的有多少座？晚于石峡文化的有多少座？（朱非素：有107座是石峡文化的墓葬，包括1985年发掘的4座。其中二次葬57座，一次葬33座；夏商时期墓葬有29座）

遗址部分除了房子外，还有好些灰坑。假如有些灰坑里面器物也还比较集中，那也可以公布几个。在讲灰坑的时候，把成组的器物放在一起说。这一做法，对于早年的发掘工作尤为重要。因为早年的工作往往不如我们现在这种发掘水平，早年工作的资料不可能每一项都做得非常好。但是，有些重点的地方我们是可以把它弄清楚的。所以我强调要抓典型，抓重点。比如涉及石峡文化的遗迹方面的一些遗物，如果能够成组成单位的话，最好有几组公布出来，灰坑等遗迹中的器物比地层出土的器物价值更高。因为当时对地层的判断，不会有现在的水平，但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灰坑来挖的话，一般不会挖错，再低的水平也不会挖错。

关于墓葬，我有下面一些看法。石峡文化的墓葬大体上属于一个墓地。至于遗址的西边还有没有别的墓地我们还不清楚，但这个墓地好像是比较完整的，因为它的四界都

还比较清楚。墓地不仅有布局的问题，而且还有一次葬、二次葬的问题。这里的二次葬跟别处的二次葬很不同。比如仰韶文化的二次葬，里边没有一次葬的东西，只是把一次葬的人骨捡回来，没有把一次葬的随葬器物搬过来，只有二次葬的一套器物。石峡有很多墓是两套器物，就是把一次葬的随葬器物搬过来，在二次葬时再给一套器物，两套器物都能复原，这在别的地方很少见。所以我想在写典型墓例的时候，可以选一些一座墓两套随葬器物的，两套器物都要发表。

墓葬还有一个分期的问题。你们现在正在排队，花这么多时间，就是要把分期搞清楚。这批墓葬有不少打破关系，但真正对分期能起作用的却不太多。尽管如此，有几组打破关系还是不错的。昨天我们排的几个墓，器物都挺多，仔细分辨还是有一些差别，这就构成了我们认识早晚关系的基础。开始入手最好拿整座墓的器物来比，比较容易看出器物变化的趋势。从整座墓的器物排比中看出某些变化趋势以后，再一个一个器物来排。你们做的器物排比，我觉得挺好。就是要抓主要的器物，数量最多的、变化清楚的器物。不一定把每一类器物都分型分式。假如有几十种器物，不一定把这几十种器物都分型分式。我发现很多的发掘报告，只要器形不一样，就把它分一式，哪怕只有两件器物，也要分成Ⅰ式、Ⅱ式。这种划分没有多大意思。我们之所以要分型分式，是想了解这类器物的发展规律，探究它比较早的形态是什么样子，以后变成什么形态，再往后又变成什么形态。一种器物是这样认识，整体器物还有一个组合变化的问题。比较早的时候，它喜欢哪几种器物在一起，过一段时间，它又喜欢哪几种器物在一起。我们进行分期排队，第一步是了解器物演变的规律。了解器物的演变规律以后，就可以把它分成几段，然后再回到墓葬里去，我们就可以把墓葬的分期弄清楚。墓葬的分期弄清楚以后，就可以进一步研究墓地的布局，看看开始从哪儿埋起，以后往哪儿埋，有没有一个规律？这规律反映什么问题？大墓和小墓的排列是不是有所不同？一次葬和二次葬的排列是不是有所不同？一步一步深入。在这个过程中，我建议你们把器物排出一个顺序后，再回到墓地里去看看，比如先分两期或三期，就把墓地的每一座墓都打上上期别记号，然后看看它的分布规律。如果这个规律里面有不顺的地方，就得回过头来看器物排比是不是有问题。如果器物排队没有问题，那就要琢磨，在墓地的布局上为什么会这样不顺，这里头就会琢磨出一些问题来。有时候确实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在排队时就这么排下来了，但回到墓地后一看，不顺，再回过头看那个器物，就可能会发现排队时确实有点问题。所以，我一直是这种主张，即类型学的研究经常是一种反复认识的过程，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就我们对器物的认识来说，总是看了一些东西之后得到一种认识，然后根据这种认识拿来排一排，看顺不顺，能不能都讲得通。如果有的地方讲不通，回过头去再理一遍，理它几次就清楚了。所以，墓地的布局在整个类型学研究中，也是可以帮助考虑的一个方面。

我昨天看了你们的器物排队，大体顺序差不太多。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从早到晚变化不是特别大。作为一个文化的分期，要做到分出期以后给人一看，这就是早期，那就是晚期；拿器物一看，这就是早期的，那就是晚期的，应该比较明确。要是分得连自己都看不太明确的话，就先别那么分，可以在报告的一个适当地方做一些讨论，说明尽管这些遗存都是一期的，根据哪些变化来看，可能还是有些早晚差别。总之石峡有四个文化期，有的文化期还可以分几个小期，或者叫“段”也可以，但不宜分得太多。

谈墓地的布局要涉及一次葬、二次葬的问题。为什么要实行二次葬？二次葬的墓有些什么特点？有些一次葬的墓是不是以后还要迁葬，还是有别的原因？这个问题要琢磨一下。也许琢磨不出什么道理来，但不管是琢磨得出来还是琢磨不出来，都要把这些材料比较充分地发表。因此在选择典型墓例时不妨多选一些，不要只挑几座。石峡文化有100多座墓，挑一二十座典型墓例不为多。现在有好些发掘报告在讲墓葬的时候，讲了墓地、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后面只是举几个墓例，接着就是讲器物。把随葬器物全部都排了，但在墓葬里这些器物究竟是怎么组合的？不能给人一个非常清晰的印象。特别是在一些发掘报告里面，器物型式分得不好，又没有较多的典型墓例，只是在报告后面有一个附表的话，研究者根据附表就很难把它复原起来。

石峡遗址这批墓葬，你们还是琢磨得相当仔细，分型定式标准也把握得比较好。但不管分得怎么精确，还是不如把一些墓的整个器物都端出来给人家的印象更深。把整座墓的器物端出来，过若干年其他资料多了以后，还可以有些新的想法。我这里举一个例子，过去在讨论仰韶文化的分期、早晚关系方面有很多的文章，但可以说没有什么用处。这完全不在于他的文章说对了抑或说错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文章是把整个遗址的东西不分地层也不分早晚地做总括性概括，说这个仰韶文化有些什么特点。但到现在呢，我们从里面往往可以看出一些并不是一个时期的东西，如果是给一个灰坑的材料，把这个灰坑能成形的器物全部发表，图也排在一起的话，现在拿这个灰坑的材料还可以重新排。比如说，以前把仰韶文化只分成“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但这个灰坑既不属于半坡类型，也不属于庙底沟类型，那么可再划出一个“秦王寨类型”或是“王湾二期”。王湾二期还可以分四段，但不管分多少段，这个灰坑都可以归到某一个段里面去。所以成单位地公布资料，对一个考古发掘报告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发掘材料无论怎么概括，都只是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而以后的人再来研究的时候，他是研究你现在的概括水平还是研究发掘资料呢？我认为作为发掘报告，应该提供尽可能接近原始的真实资料给以后的人去研究。如果有些墓地的墓葬不是太多的话，我主张一个个墓全部发表。过去在写元君庙墓地发掘报告的时候，根据苏秉琦先生的意见，在第一稿的时候有《墓葬各论》一章，一个墓一个墓的全部介绍。后来稿子拿到考古所，有的先生不赞成，把报告压了很长时间，出版的时候把它放在《附录》里边了，但还保

留了相当一部分的内容。石峡这个墓地有 100 多座墓，不一定全部都作个案发表，我是主张墓例要多一点。要有大的小的，有一次葬二次葬的，有石箭头特别多的或陶器特别多的等各种各样的典型墓例。这样的发掘报告还是很有特色的。

无论是石峡文化的墓葬还是遗址，出土器物都很特殊，“石峡文化”是叫出去了。不仅陶器，石器也非常特别。石器丰富，制作也好，在别的遗址中，可以稍微与之媲美的只有安徽的薛家岗遗址。薛家岗有些石器虽然比石峡的好，但从整体看还是不如石峡。石峡文化不仅石器做得好，而且有许多特殊的東西，有些石器还可能是玉器。所以在石器上要多花点功夫。石器的质料是否已经鉴定过了？好像以前是做过鉴定（杨式挺：鉴定那些石器都是次要的、残的，真正的石器鉴定还没做）。这些石器的种类、形制很有特点。还有制法、功用等，这些以后可以做专题研究。发掘报告中要做这些研究可能会把时间拖得太长，能做到哪一步就尽量做到哪一步，材料尽量多公布一些。石峡文化的石器如果做一个专题，可以相当深入地进行研究。中国现在对石器的研究还很不够。石峡文化不仅遗址出的石器多，墓葬出的石器也很多。但墓葬出的石器好些可能没怎么使用，如果做使用痕迹的微痕研究，可能没什么用；而遗址出的石器，一般都会有使用痕迹。

石峡遗址的第三期、第四期遗存，原来称作“石峡中层”、“石峡上层”，我看干脆就叫“石峡第三期文化”、“石峡第四期文化”更合适一点。原来说的那个“层”实际上不是一层，它有好多单位和层位呢！发掘报告讲的是整理资料的结论，不是在田野工作划地层时的那种概念。是已经将资料整理以后端出来的东西，就不要讲某某层了。比如在商周考古研究中，用“二里岗上层”、“二里岗下层”这种概念，我觉得很不合适。但已经用开了，没办法。像“二里岗上层”、“二里岗下层”难道只是一层吗？有好多层呢，连“期”都不是一期了！现在有“二里岗上层早期”、“二里岗上层晚期”等等，都乱套了。我的意思是，石峡遗址的四期遗存不是“期”，是“文化”，可以叫“石峡第一期文化”、“石峡第二期文化”、“石峡第三期文化”、“石峡第四期文化”；石峡第二期文化简称“石峡文化”。能不能这样？我只是建议，你们琢磨琢磨。这四期文化如果有联系的话，你可以去讨论。比如开始讲“庙底沟二期文化”，是指庙底沟遗址第二期的那个“文化”，后来是用来指其他所有与庙底沟遗址第二期一样的文化遗存。石峡遗址早晚四期该怎么叫？如果前面的叫“前石峡文化”，前到什么时候？不好界定。“石峡文化”是从石峡这个遗址叫出来的，没有这个遗址的发掘就没有石峡文化，你怎么弄个“前石峡文化”出来了呢？后面的就更不好办，如果叫“层”，更不合适；如果叫“夏商文化”，年代倒是相当于夏商，但它不是夏文化，也不是商文化，这个叫法不好。但又得给它一个名称，所以我觉得还是以这个遗址的名字作为命名的前提，叫“石峡第一期”、“石峡第二期”、“石峡第三期”、“石峡第四期”。然而这四期又不是一般

的分期，不是一个文化的四期，而是四个独立的“文化”。至于以后相当于石峡各期文化的遗存，人家想取别的名字，那得看看有没有更好遗址，那是以后的事情。就目前而言，如果在粤北有一个类似石峡第三期的遗存，叫“石峡第三期文化”就行了。

石峡第三期里面还能不能再分期呢？我粗略地看了一下，估计你那些材料要分期很困难，可以不分。但你可以说在第三期文化里面，根据哪些地层关系有哪些单位比较早，哪些器物可能稍微早一点，在以后材料积累到一定程度也许可以对它进行分期。写报告时要将窑里的东西整体端出来。窑里出的东西挺多，要单独把它发表出来，这样永远可以作为一个共存单位来进行比较研究。以后人家可以把它单独挑出来，说这个窑里的东西是属于第三期文化的第一期或第二期的都可以，可以整体去排队。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全部都是作为第三期的遗物去分型分式，那以后人家只能在第三期的框架内进行研究，不能获得新的认识。而这个第三期是在我们当前的认识水平上确定的。除窑之外还有灰坑，如果有些器物比较集中，最好是全部发表，整个单位地发表。发掘报告就要这么写，第四期文化也是这么写，但遗迹好像没有第三期文化丰富。我觉得第三期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材料比较丰富，还在于它跟广东其他地方的文化遗存可以拉上关系。而在石峡文化那个阶段，跟其他地方，跟珠江三角洲的关系就不十分密切。因为第三期里面有些单位，比如1号窑，器物很多，在比较的时候是个很重要的基点。此外，在第三期里面还有一批墓葬的材料。

根据以上一些很粗浅的认识，我觉得石峡遗址的发掘报告写出来以后，还是一个分量很大、很有特色的重要报告。现在资料整理工作基本可以告一段落了，再适当作些调整就行，不必花太多的功夫去搞排队了。接着就应该着手拟提纲、写报告了。你们打算把遗址和墓葬分开写，我觉得也很好。但是整个报告的大纲还是首先要分文化期，每一期文化写一章。开头当然还是要有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工作经过和地层关系的叙述。叙述地层关系，要落实到分四期文化，不要只找几个典型地层，说某层是什么土，出些什么就算完了。而是要讲这些地层或这些单位出些什么器物，它的特征跟上面的层位有什么不同，跟下面层位又有什么不同；然后把这几个方面综合起来，说四个不同的文化遗存在遗址里的分布情况怎么样，因此把它划分为四个阶段，也就是分成四期文化。写每一期文化的时候，还是分遗址、墓葬两部分来写，第二期、第三期文化都有墓葬。比如第二期即石峡文化那一期，遗址部分负责，他写了房子、灰坑、柱子洞以后，接着写出土的遗物；然后墓葬部分负责，把墓葬的一些情况介绍以后，接着写墓葬的遗物。写两个部分的遗物时，不一定统一型式，也不一定统一分期。我提这个建议你们看合适不合适？因为我想你们如果要把两个部分的东西统一型式、统一分期的话，那太难了。两部分的情况也不一样，遗址的资料不如墓葬的丰富、完整。一般来说，墓葬里的遗物可以分得比较细，遗址的遗物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河南的新石器文化就没有

山东分得那么细，为什么？因为河南发掘的大部分是遗址，山东发掘的大部分是墓葬。所以，你们这样写就容易处理了。否则，两个人老是在讨论，那种器物你这儿分几型几式，我那边好像不能这么分，还应该分些别的。讨论来讨论去，到什么时候也不一定有明确的结果。但是在器物的命名方面，如果同样一种器物，你叫“鼎”，他叫“盘”或别的什么，这不好。所以，器物的命名要尽量取得一致，分型分式则不一定一致。这样处理报告才好写。第三期文化同样也涉及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处理。这样的话，前面的工作由式挺、非素负责的还是一个报告，1985年的工作由子文写的是另外一个报告。你们原来是不是这么安排的？（朱：是这样安排的。李：我是想把1985年的材料单独写成一个报告，标上《1985年东部发掘报告》，放在书的后面）我想这样写也可以，省得揉在一起，操作上会发生很多不好处理的地方。但是也要尽可能在器物命名、文化分期等大的方面取得一致。这样做，你们会比较容易协商。（朱：要这样来写，我统起稿来就好办多了！）对！这样的话，你们这个报告不久就可以着手写了，也得写几个月呢！你们说三月份拿出初稿来，我看没那么容易呀！在写的过程中，你们还要再来看看东西，反复肯定会有有的，谁写报告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另外，报告的图准备得怎么样了？好像器物图以前就画了是吗？（朱非素：图基本可以了，但还没有上墨。）如果这样，那么图方面只是涉及原来没有打算这样写的，但现在想这样写了，可能要补充一些器物图、遗迹图和方位图等。照片是不是都有了？（杨式挺：过去拍了一些，现在好些都已经发霉了）你们这里的照相水平怎么样？（古运泉：前段时间我们想请文物出版社的人来拍照，但邓柄权馆长说省博物馆有专门照相的人，技术没问题，可由他们负责。去年底他们安排了两天时间来这儿照相，只照了一部分，墓葬器物大部分没照）我想这么重要的报告还是可以找文物出版社来拍照的。

我衷心希望石峡这个报告能尽早写出来。你们不要在细节上再费太多的时间了，要抓大的方面，大的方面控制好了，报告的质量就保住了。细的方面尽管会有些弄不清楚的，不清楚的就让它不清楚，不要硬说清楚，这样就好处理了。我就说这些，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你们批评，提意见。

（原载《广东文物》千年特刊，2000年8月）

《石峡遗址——1973~1978年 考古发掘报告》序

学术界期望已久的石峡报告就要出版了，它是石峡考古的一个总结，是华南考古的重要收获。

所谓石峡，是指两座岩石山之间的峡谷地带。这两座岩石山连起来像一头雄狮，所以又称为狮子岩，或者分别称为狮头岩和狮尾岩。在前者的岩壁上有商承祚先生题写的“狮头岩”三个大字。在题壁的旁边有一个石灰岩洞，著名的马坝人就是在这个洞穴里挖出来的。我在多年以前曾经爬到那个洞穴里看过，发现有一些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陶片，说明那时的人也熟悉那个洞穴。但他们不像旧石器时代的人只会狩猎和采集食物，也不会盖房，只好住在山洞里。他们则要从事种田养猪等生业，还要建立村舍，主要活动的地方就移到了狮子岩的腰部，也就是称为石峡的地方，那里有适合建村盖房的小块平地。

石峡这个遗址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都有人居住，东周以后就长期废弃并开辟为农田。年长日久，在耕土层下逐渐形成了一个坚硬的铁锰淋滤层。这一层硬面的作用很大，可以防止水田渗漏，又保护了下面的文化层。

石峡的文化遗存可以分为四大期。第一期文化的陶器多圜底釜罐和圈足盘，釜罐上多施绳纹直至颈部，圈足盘则施镂孔和刻划纹等，未见彩陶，与珠江三角洲的草堂湾等遗址的陶器比较接近，两地之间应该有一定的文化关系。年代估计距今五千多年。

第二期文化即石峡文化，资料丰富，本身又可以分为三小期。陶器的总体特点是多圜底器、圈足器和三足器，形制复杂多样，其中以各种型式的三足盘和圈足盘最富特征。子母口和器盖特别发达。以素面为多，还有绳纹、刻划纹、镂孔和几何形印纹等。石器中最富特征的是弓背形石钁，样子有点像十字镐，是专门挖土的工具。还有大量的石铤（包括有段石铤和有肩石铤）和石镞。这类遗存广泛分布于粤北地区，以北江上游为主，东到东江上游的和平，西到西江流域的封开，都有石峡文化的分布，其中心则是石峡遗址。从文化内容看，跟江西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受到良渚文化的一些影响。跟珠江三角洲虽有一些关系但不甚密切，可能是与两地经济形态

不同有关。石峡文化本身又可以分为三期，前后相互衔接，基本上没有缺环。本期文化的年代，据碳-14测定大约在距今四千三四百年到四千七八百年之间。

本期文化遗存的重要还在于发现了成组的居址和墓葬。三面盖房，中间建墓地的布局，提供了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一种模式。从墓葬的分化还可以看出粤北地区走上文明化的进程很接近长江流域。

第三期文化资料也比较丰富，而且可以划分为若干小期。报告将其分为前后两组，第二组又分为前段墓、居址和后段墓，年代大致相当于夏商时期。

第四期文化遗存较少，夔纹陶发达，有少量原始青瓷器，还有少量青铜器，如钺、矛、镞、锥等。年代大致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

石峡遗址的四期文化及各期文化的分段与分组，第一次给粤北地区建立了一个比较细致的考古学年代标尺，相当于提出了一个颇为详细的年表。各期段之间虽然还有某些缺环，但发展脉络仍然十分清楚。这在华南地区的考古遗址中是少见的。

石峡遗址的文化内容既具有自身的明显特点，又与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如果将各期段的文化遗存同周邻地区的相关文化进行比较，便可发现有一个逐渐接近和趋同的现象。第一期文化仅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草堂湾等少数遗址有一些相似之处。第二期文化即石峡文化不但有较大的分布范围，而且与南岭以北的樊城堆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与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同期文化也有一定的联系。第三期文化同珠江三角洲和东江流域的同期文化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同江西的吴城文化等也多有联系。第四期文化几乎分布于广东全境，应该是南越先民的文化，同古称百越地区的诸多文化也有相当的联系。几千年间，各地文化的联系和交流逐渐加强，甚至逐渐走向融合的过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以上发现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发掘结束之后不久，苏秉琦先生就亲自到工地研究那些资料，发表了《石峡文化初论》，指出石峡遗址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岭南地区从原始社会到秦汉以前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找到了一把重要的钥匙，还为我们探索这一地区社会发展诸阶段与我国其他诸文化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环节。不言而喻，它也是我们进一步探索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人民自古以来相互关系的一个出发点”^①。

石峡资料的整理花费了比较长的时间。这是因为资料都是新的，又很丰富。要正确认识需要有一个逐步消化的过程。还不要忘记发掘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和刚结束的时候，能够进行考古发掘就不容易了，发掘的质量自然会受到影响，整理起来就比较费事。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使整理工作不得不时断时续。现在这些条件都已大

^① 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文物》1978年7期。

为改善，可作比较的资料也多了起来。两位当年参加和主持发掘的业务掌门人杨式挺和朱非素都很热心和执著，虽然年事已高，仍毅然担任了发掘报告的编写任务。两位是我先后的同学，都有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和研究能力。特别是朱非素，在健康欠佳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工作，一人到曲江库房整理那已积满尘垢的资料，报告的大部分任务都落在了她的肩上，令人十分感动。相信石峡报告的出版将是对华南考古的一大贡献。谨书数言，以表示对他们由衷的感谢。

咸头岭遗址与咸头岭文化

深圳咸头岭遗址是1981年发现的，从1985年至2006年起先后进行了五次发掘。前四次由深圳市博物馆负责，第五次由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负责并联合深圳市博物馆共同发掘。从第四次起开始改进发掘方法，第五次则完全按照新的方法进行发掘，解决了沙堤遗址地层容易崩塌的难题，从而获得了足以明确进行文化分期的重要成果。本书《深圳咸头岭——2006年考古发掘报告》的上篇就是2006年进行的第五次发掘的考古报告，下篇则是若干专题研究和相关问题的讨论。

咸头岭遗址位于大鹏湾东北部的迭福湾，那里有三道与海岸平行的沙堤，一级比一级高。其中第三道也是最高的一道沙堤是在七千多年以前全球大暖期形成的。那时海平面比现在高2~3米（一说高3~5米），海浪潮汐和台风把海沙涌到岸上，就形成了沙堤。以后海平面略有下降，又形成了第二道和第一道沙堤。最早的人只能住在第三道沙堤上，等第二道沙堤形成后，大部分人搬到了接近海边的第二道沙堤，一部分人还留在第三道沙堤上，从而在两道沙堤上都留下了丰富的史前文化遗存。

第一至第三次发掘都在第二道沙堤上，第四和第五次发掘移到了第三道沙堤上。由于采取了固沙的办法，地层划分得比较清楚，发现至少有五个时期的堆积，被归纳为三期五段。各层文化堆积之间还有两个间歇层，大概是大台风或海啸把人赶走了，形成了短期的自然堆积层，直到以后的人搬回来居住，才又形成新的文化层。用咸头岭的分期作为标尺，大致可以将整个珠江三角洲同一时期遗址的相对年代划分清楚。

在珠江三角洲和附近岛屿上的史前遗址中，最接近咸头岭的是香港龙鼓洲遗址。那里出土的陶器大致可以分为五组。前四组分别相当于咸头岭的一至四段，第五组不出彩陶，年代应晚于咸头岭第五段，已不属于咸头岭文化的范围。只是这个遗址的地层并没有咸头岭划分得那么清楚，将来或可再度发掘以进行验证。可以对咸头岭地层进行部分验证的是东莞蚝岗，那里的文化遗存可以分为三期，其中第二、三期分别相当于咸头岭的第四、五段，第一期早于咸头岭第四段而晚于咸头岭第三段，正好填补了咸头岭遗址的一个缺环。与蚝岗第一期特征相同的还有珠海后沙湾和中山龙穴等若干遗址。其他大多数遗址的文化层比较单纯，多只相当于咸头岭遗址的某一段或两段。因此咸头岭遗址

乃是整个咸头岭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遗址。把珠江三角洲这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划分为一个考古学文化，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咸头岭文化。关于咸头岭文化的年代，根据大量碳-14测量的年代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大致在距今7000至6000年。

这个文化有些什么特点呢？第一是喜欢居住在海边或海岛上，所以整个珠江三角洲都有分布，也只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口外的岛屿上。这样的自然环境决定了这个文化的居民比较习惯于水上交通，从事捕鱼或采集水生动物。沙堤的后面有瀉湖和小河，可以提供充足的淡水，旁边依偎着有浓密植被的小山岗，可以狩猎和采集植物性食物。离咸头岭不远的大黄沙遗址还发现过粮食标本，说明也有少量的种植业。

第二是在这个文化中没有发现纺轮，却时常发现一种刻槽的石拍。早期的石拍两面都有刻槽，而且较粗；晚期的石拍只有一面刻槽，却比较细密。香港中文大学的邓聪认为这种石拍是制作树皮布用的。树皮布曾经广泛地流行于东南亚和华南地区，海南岛不久以前还有人穿树皮布做的衣服。

第三是普遍使用陶器，而且在造型和花纹上都很有特色。陶器主要有三种，一是炊器，有釜和支脚，以釜为主，支脚有时以石块代替；二是饮食器，有圈足盘、豆和杯等，以圈足盘为主；三是盛储器，盛放食物或水，主要是罐，数量不多。釜多用夹砂陶，夹砂可以加快传热，并可以防止烧裂。釜的外面多饰绳纹，一方面在拍印绳纹时可起一定的加固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加受热面积，加快炊煮的速度。饮食器多用泥质或细泥陶，大多为米黄色，也有少量白陶和黑陶。上面常有美丽的刻划纹和压印纹，米黄陶上还有红色彩纹。

这个文化是怎么起源的，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根据某些陶器的形制和花纹的比较，认为是从湖南西部的高庙文化或洞庭湖滨的汤家岗文化与大溪文化传播过来的，或至少是受到这几个文化的强烈影响；有的学者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彩陶。咸头岭文化的彩陶花纹是红色的，彩带中常有刻划纹。而大溪文化的彩陶花纹是黑色的，彩带中不见刻划纹，花纹的样式也大不相同，因此主张本地起源说。如果是本地起源，在当地至今没有找到更早的文化遗存，只能是一种猜想。如果是湖南西部或洞庭湖滨传来的，中间缺乏合理的路线。汤家岗文化与大溪文化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文化，已经学会纺纱织布，为什么要抛弃本业，不远千里来到海边，成天与海水打交道，以海产为主食，穿树皮布的衣服，过一种完全不熟悉的生活呢？这怎么也说不通。高庙文化尽管是以采集和狩猎经济为主，但所在的自然环境主要是山区的小河旁边。如果有势力向外发展，湖南西部和贵州等地有的是相似的地方，为什么要跑到遥远的海边来寻求发展呢？因此我曾经提出过另一种想法，再次提出来向学界请教。

大家知道在地质时代的更新世有一次大冰期，最冷的时候叫盛冰期，大约发生在15000年以前。那时全世界海平面比现在低130多米。中国的海平面据研究比现在低

154 米甚至更低。那时广东的海岸线要往南推进约 200 公里，珠江可能要流到现在的东沙群岛附近出海。由于天气寒冷，北方的人可能会往南迁移。原来海边的人也会跟着海岸的变迁而南移，现在的大陆架上应该有不少居民。等进入全新世，海面上升，海岸线向北退缩，海边的居民自然也要跟着退缩。所以咸头岭文化的居民，如果不是全部，也应该有相当部分是从南面现在的大陆架上一代一代地逐渐迁移过来的。他们还是喜欢住在海边，过着与内陆居民不一样的生活。只不过在海里无法进行考古工作（水下考古很难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因此也无法得到证实，也是一种猜想，我希望是一个合理的猜想。至于他们的陶器，我相信是受到湖南高庙文化—大溪文化等持续的影响而发生和发展的，但不是简单的模仿，所以还有很多自己的特点，彩陶花纹就是一例。这问题自然还需要有进一步的发现与研究。

咸头岭遗址的第五次发掘规模并不很大而获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受到学术界和公众的普遍关注，被评为 2006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并获得 2006—2007 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二等奖。在发掘工作结束后及时进行资料整理，拼对复原一大批陶器。对陶器的形制、纹饰、制作工艺和陶土来源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石器的类别、形制和使用痕迹也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分析，特别是对石镞等使用—破损—再制作（主要是刃部）过程的研究是很精彩的。由于咸头岭遗址和整个咸头岭文化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所以对当时的生态环境、经济形态和人们谋生方式的研究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下篇的第五章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由此可知本书是一部资料翔实而又有较深入研究的田野考古报告，是对华南史前考古研究的重要贡献。这样的报告能够在发掘后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完成并付梓，实在是值得称道的。

（原为《深圳咸头岭——2006 年考古发掘报告》序，文物出版社，2011 年）

海洋考古的嚆矢

中国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一般认为是一个大陆国家。其实中国也是一个海洋国家，有长达 18000 公里的海岸线，有包括台湾和海南两个省级大岛在内的几千个岛屿和几百万平方公里的海疆，海洋资源非常丰富。远在几千年以前乃至更早一些的年代，我们的祖先就有不少人陆续走向海洋，开发海洋资源。有的移居岛上建设新的生活，有的开辟海上航线，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从而创造了丰富的海洋文化。

我国开发海洋的先驱，首推东方沿海的东夷民族和东南沿海的百越民族及其史前的祖先，古代文献中多有关于他们的活动的记载，只是比较零散，难以了解历史的全貌，只有通过海洋考古工作才能逐步地恢复起来。我国的考古学者曾经先后在辽宁的长山列岛、山东的庙岛群岛、浙江的舟山群岛、福建的平潭岛和金门岛，台湾、澎湖以及南海沿岸包括广东、广西和海南的许多岛屿和近岸遗址都做过了不少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我自己也曾经多年在山东半岛沿海和长岛县的大小岛屿主持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在黑山岛上甚至全面地揭露了一个相当大的村落遗址。不过以往的考古工作虽然在海岸和岛屿上进行，方法却和在陆上没有多少区别，缺乏海洋考古的思路和研究方法。近年来开展的水下考古除了对近岸一系列沉船进行探测外，也曾经远到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等处调查，但年代多限于宋元以后的海上交通与贸易，对于史前和先秦时期的遗存还未遑涉及。在这种情况下，以工作做得最多也最深入的珠江三角洲及附近岛屿的先秦遗迹为基础，从海洋考古的视角来进行综合性研究，就是非常必要的了。肖一亭的《先秦时期的南海岛民——海湾沙丘遗址研究》正是适应这一需要，以海岸沙丘遗址为核心而撰写的第一本称得上是海洋考古的探索性和综合性著作。

该书分析了海岸和近海岛屿上沙丘遗址产生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认为沙丘的形成与地形、海水动力和风力都有关系，所以沙丘多出现于海湾，有些还与近旁的小河小溪有关。而沙丘遗址则还必须具备经常性的淡水来源，否则先民难以在那里居住。作者还注意到历史上气候环境的变迁对于沙丘遗址的影响，着重分析了沙丘遗址中间歇层形成的原因。认为沙丘遗址并非都是季节性聚落的遗留，间歇层也不能作为季节性聚落的充分证据。在一些沙丘遗址中发现有房址、墓葬，有的甚至还有制造石器或陶器的遗

存,倒是可以作为曾经有过常年居址的有力证据。不但如此,作者还进一步从文化内容的分析中发现珠江三角洲在新石器时代有一个自成系统的文化区。这种文化区的形成固然与当地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密切关系,同时也应该与当地早年的文化传统有关。我们可以设想,在更新世晚期的盛冰期,海平面比现在低一百几十米,现在的珠江口乃至更远的大陆架都是陆地,气候温和,天然食物资源丰富,肯定是人类生活的好地方。到全新世海水逐渐上涨,人们会不自觉地向高处迁移。有的迁到现在的海岛上,有的迁到现在的海岸边甚至更远的地方。在这段时间里,文化影响的主导方向应该是自南而北,而不是自北而南。环珠江口先秦文化的古老传统应该从当地或更南一些的海底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到北面的山地去追寻。记得1991年12月初在中山市翠亨村召开的“珠江三角洲古文化学术讨论会”上,我以“华南考古的几个问题”为题做大会发言时特别强调地谈到了这个思想,很高兴肖一亭在本书中也特别清楚地阐发了这一思想。

海洋考古自然应该从近岸地带做起,但不能止于近岸地带。海洋民族的特点既是相对定居的,又有很大的流动性。大家知道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那前后一段时期的所谓地理大发现差不多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可是很多人却并不知道在比哥伦布早得多的年代,许多沿海地区的居民驾着小船或木筏,竟然把浩瀚的太平洋上成千上万的小岛一批一批地发现和开发出来,那是多么值得大书特书的辉煌成就!语言学家们早就指出以东南亚和太平洋三大群岛为主体,东到复活节岛,西抵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存在着一个讲南岛语系的巨大族群,并且推测原始的南岛语系的民族可能是生活在东南亚乃至中国东南沿海的古代居民。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澳大利亚大学的贝尔伍德多年从事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史前考古研究。他认为南岛语系的人民最早是生活在中国东南包括台湾一带,距今5000~4000年到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4000~3000年到达美拉尼西亚,3000~2000年到达密克罗尼西亚,2000~1000年到达波利尼西亚,800年前到复活节岛。他画了一张地图,十分清楚地标明中国东南沿海包括台湾的远古居民是如何一波一波地开发东南亚和太平洋的^①。凌纯声、凌曼立父女和香港中文大学的邓聪根据树皮布打棒的年代和分布情况也得出相似的结论^②。人们还可以根据有段石镞或拔牙习俗的年代和分布情况得出相似的结论。不过这些研究都必须以考古学为基础,再结合语言学、民族学和海洋科学等各方面的研究才能有更强的说服力。由此可见在我国东南沿海开展海洋考古研究的极端重要的意义。本

① Peter Bellwood, *New Perspectives on Indo-Malaysian Prehistory. Bulletin of the Indo 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4, 1983.

② 邓聪:《史前蒙古人种海洋扩散研究——岭南树皮布文化发现及其意义》,《东南文化》2000年11期。

书对先秦时期南海岛民的研究很有力度，应该有基础更进一步向更远的海外拓展，为发展海洋考古学，为更加清楚地阐明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作出自己的贡献。

（原为肖一亭著《先秦时期的南海岛民——海湾沙丘遗址研究》序，文物出版社，2004年）

中国东南地区的民族考古研究

厦门大学的吴春明教授告诉我，说要为吴绵吉老师编一个文集，名曰《中国东南民族考古文选》，命我作序。吴绵吉教授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和知心朋友，为他的书写几句话自是义不容辞。但我对绵吉的研究所知不深，觉得颇难动笔，以至一拖再拖。勉强为之，总是不大满意。如果有说得不妥当的地方，请绵吉不要见笑。

中国东南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始并不算晚，但是除了江浙以外，其发展速度和取得的成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能算是很理想的。这里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在全国考古工作的布局中，长期没有把东南地区放在适当重要的位置，少数人的努力难于从根本上改变相对滞后的局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也许有些人没有注意到，就是由于湿热多雨的气候和特殊的土壤条件，使得相当一部分遗址保存状况不太好，田野考古工作相对比较困难，短期内不容易取得显著的成效。如果说以前的工作筚路蓝缕，有开创之功，毕竟水平有限，没有打下很好的基础。后来情况有了一些变化，逐步掌握了当地遗址的特点，走上了更科学化的道路。就我所知，吴绵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绵吉兄乃科班出身，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数年，受到了很好的田野考古工作的训练。回到厦门大学任教，一直关心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他带领学生到湖北、江西、浙江和福建等省的许多遗址进行考古实习，从来都是以身作则，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后学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正因为有坚实的田野考古基础，绵吉兄的科学研究才扎扎实实，不尚浮词，一步一个脚印。

要把东南地区的考古研究深入开展下去，不能不涉及古代百越民族的研究。在中国历史上，百越民族曾经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汉族实际上是以华夏族为基础，先后融合了东夷、苗蛮和百越而初步形成的。以后虽然还不断地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但基本上还是以华夏、东夷、苗蛮和百越为主体。由于历史久远，东夷、苗蛮和百越在人们的记忆中已逐渐淡忘，只有通过考古学、历史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共同努力才可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而通过多学科的合作来研究百越民族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贡献，进而研究其对东南亚乃至太平洋地区的巨大影响，这条学术道路是由厦门大学已故的著名学者林惠祥先生开辟出来的。厦大的不

少同仁继承林先生的事业做出了许多成绩，只是各人情况不同，有的偏于人类学，有的偏于考古学，有的在海外交通和外销瓷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把考古学和历史民族学等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绵吉是做得比较好的，这在本文选的内容和分组编排上也可以大致反映出来。

本文选分为“百越综论”、“吴越考古”和“闽台文化”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讨论了百越的名称、来源、分布和各种文化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之所以形成的自然和历史条件。其中既有对历史文献的详细考证，又有对考古资料的深刻分析，更有对此前各家说法的客观而公允的评说，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例如历史上生活于长江左岸即今江苏南部的勾吴人是不是属于百越系统的问题，民族史学家多持否定的态度。但是勾吴与其邻近的于越语言相通，断发文身和善于舟楫等许多风俗习惯也相同。特别是都流行几何印纹陶和都有铸剑的盛名，其他许多文化特征也相类似，所以考古学界通常把它们连在一起而称之为吴越文化。划分民族的主要标志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拥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风俗习惯、信仰崇拜等精神文化在内。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勾吴显然应属于百越族系。再如濮、越的辨析也是以文献和考古学资料相结合，逻辑严密，颇有说服力。关于百越的来源问题，过去有所谓“华夏后裔说”和“马来人种说”，都没有可靠的根据。时下多数学者主张土著说，认为百越就是当地原始先民的后裔，但论证多不甚详尽有力。作者在梳理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着力对公认为百越文化的几何印纹陶文化遗存与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令人信服地证明当地起源的可靠性。作者关于百越文化特征的分析更是十分精到。其中物质文化有种植水稻、治葛麻为衣、住干栏式房屋、喜吃蛇蛤等小动物、使用有段石镞和有肩石器、善用舟楫和习于水战、普遍用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器，还有极其精良的铸剑技术等；精神文化则有越人的语言、断发文身、拔牙、鸡卜、崖葬、迷信鬼神、崇拜蛇鸟等许多方面，甚至还从近代惠安女等“不落夫家”的民俗中找到了百越民族的遗风。在作者归纳的这些特征中有些不一定是百越独有的，但却是百越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把这些特征集合在一起，一个特色鲜明的百越民族就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注意到其中有不少特征是从考古学资料中归纳出来的，这是由于作者有比较深厚的考古学功底才可能做到的。

第二部分所收吴越考古的论文，主要是研究江浙地区的青莲岗文化、良渚文化和土墩墓文化遗存，这些都是学术界关心的热点。第三部分闽台文化所收的文章最多，其中关于昙石山文化的论述占有比较大的分量，文中的一些基本观点不但为大家所熟知，而且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关于台湾与内地考古学文化的关系问题，是海峡两岸学者都很关心的重要课题，把闽、台文化编在一起也体现了这方面的用意。记得好友张光直先生在世时多次同我谈到组织两岸考古学家在福建开展田野考古工作，我们两人还做过一些

实际的筹划，可惜至今没有实现。他在1988年写的一篇短文章《新年三梦》（载《考古人类学随笔》143、144页，台北联经出版社，1995年）中，说到他的第一个梦想就是联合有关学者做海峡两岸的考古工作。他说尽管现在对台湾史前考古的来龙去脉摸了一个大概，“但每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时，总是说得等将来看到福建、广东、浙江沿海地区考古资料之后才能进行。等来等去，已等了三十多年。两年以前我等不及时，到福建去参观了许多史前文物，发现其中很多与台湾的相同或相似，更觉得两岸的考古工作应当一起进行。如有三五年大规模积极作业，相信可以解决不少考古老问题，包括整个太平洋区居民文化的起源问题”。他说得多么深切又是多么动情啊！绵吉曾经多次到台湾参加学术考察，对台湾考古和民俗有相当的了解。作为大陆学者，特别是对包括福建在内的东南地区考古有深切研究的学者，因为拥有一个关系极为密切而又非常明确的参照系，对台湾史前文化的特点和与大陆史前文化的关系可能看得更明白和真切些，所以这方面的论述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毕竟不如亲自参加田野考古来得直接，而这在当前的状况下是难以做到的。我想横在海峡两岸的人为障碍终将会被拆除，张光直和包括绵吉在内的我们许多人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一个对学术执著追求的人，是不肯随便写些不疼不痒的文章的。绵吉的所有文章不能说字字珠玑，但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写成的，理应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关心和研究中国东南民族考古的人是不可不读的。

2003年4月5日写于北京阜外医院

（原为吴绵吉著《中国东南民族考古文选》序，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07年）

百越与南岛语族的海洋文化

中国不但有辽阔的陆地面积，还有几百万平方公里的海疆，历来在开发海洋和发展海外交通的事业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最早起步的是先秦的东夷和百越的祖先们。东夷祖先入海的路线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从山东半岛经过渤海与黄海分界线的庙岛群岛到辽东半岛，此后更延伸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对朝鲜和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而百越文化及其历史作用的研究则要复杂和困难得多。

百越一名是战国秦汉时期对今中国东南沿海及中南半岛一带非华夏居民的称呼。这些越人喜欢住干栏式房屋，流行平地葬或悬棺葬，有披发文身、穿树皮布衣服、拔牙、喜吃蛇蛤和崇拜蛇鸟等风俗，特别是善于操舟水行，都是与华夏民族大不相同的。但越人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实体，而是各有种姓，分布地域甚广，地区之间也有许多差别，故谓之百越。

历史上关于百越及其先民的记载几乎都出自华夏民族，资料零散又不甚确切，有时甚至带有偏见。要恢复百越及其先民与后续子孙的历史，需要靠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的努力。在这方面做出最大成绩的，当推厦门大学的林惠祥先生和他的学术继承人。

林先生有很好的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功底，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开始，就曾经在台湾、福建、菲律宾和马来亚等地广泛地从事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调查，伴随有少量的考古发掘，并且把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他视野开阔，不是局限于百越或东南沿海土著文化的研究，而是把东南沿海与东南亚联系起来，首次提出“亚洲东南海洋地带”的概念。之后凌纯声先生主要通过民族学的研究，提出“亚洲地中海文化圈”的概念，与林惠祥先生相呼应。由于当时考古学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有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自然会受到一定的局限。所幸林先生开辟的学术路线在厦门大学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我在学生时代就拜读过林先生一些著作，十分仰慕他的学识。他关于有段石锛的分析曾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时曾经有一位新西兰的年轻学者叫杜夫的访问北大，历史系请他做学术报告。他一开头就说：我到中国来是要寻找毛利人的祖先，因为毛利人普遍使用有段石锛，中国东南史前文化中就有许多有段石锛；毛利人的房屋和衣服上的装饰跟中国商周器物上的花纹也很相似。其实他讲的有段石锛不只是毛利人用，东南亚和太平洋上许多岛屿上的居民也用。那时我就想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古代居民也许真的与太平洋上的岛民存在某种文化上的联系。后来读到一些学者关于南岛语族起源的论述，有的径直把太平洋上岛民文化的起源追溯到中国东南沿海。例如张光直就认为南岛语族的祖先应是分布在台湾与福建沿海的大坵坑文化。我曾经到大坵坑遗址和出土过所谓大坵坑文化遗存的台北圆山和芝山岩等遗址考察过，那都是一些很小的遗址，出土遗物不多，没有一件可以复原的陶器，难以准确把握其文化特征。所以他所画文化分布的范围也不确定，有时把广东沿海也画进去了，同时又强调闽台是第一起源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贝尔伍德也认为南岛语族起源于闽台地区，并且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向东面的太平洋扩张。这些都有一定道理，但总觉得把起源地过分集中到一个很小的地区，证据不够充分。首先依赖语言学的所谓原语言研究来探索民族文化的起源也不甚恰当。本书作者吴春明则别开生面，在继承林惠祥等先生研究的基础上，以考古学研究为出发点，同时注重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等的研究成果，把百越和南岛语族的研究结合起来，提出百越—南岛一体化的主张，是很有见地的。

吴春明教授关于百越和南岛语族的论述甚多，本书将其汇集在一起，分为四编：第一编讨论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第二编研究百越民族的历史与考古，重点在用民族考古的方法进行华南民族史与文化史的重建；第三编是关于百越—南岛海洋文化中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个案的研究；第四编主要是讨论华夏文化的南渐与东南土著文化的变迁，重点在发掘土著文化的基础。全书大致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内容十分丰富。这里不拟进行全面的评述，只想就第一编和第三编讨论的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编首先从万年前后亚洲东南海洋地带文化特征的分析开始，力图弄清楚南岛语族文化的源头。他认为万年前后在华南的洞穴遗址和东南亚和平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介壳堆积里，带穿孔、磨刃并不同程度共出小石片石器的遗存，乃是与当地旧石器时代砾石石器文化的传统一脉相承的，是砾石石器工业发展的新阶段。而且正是这个新阶段孕育了亚洲东南海洋地带新石器时代定居、农耕文化的代表性因素。这就是说，在整个华南和东南海洋地带，从旧石器时代起，经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主要是自身的发展

和演变，而不是传播、征服与替代。他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对以往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出现的“太平洋群岛说”、“东南亚群岛说”、“中南半岛说”和“华南大陆说”等一一作了评述。特别对近年来影响较大的闽台起源说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它“忽视了东南土著文化的统一性”，又“割裂了东南土著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他在本书中除了比较详细地研究了大陆东南包括台湾的史前与历史时期文化的发展，还用专门的章节研究了菲律宾史前文化与华南的关系，研究了越南红河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与东山文化等问题。因此他的结论应该是建立在可信的基础之上的。不过由于这一广大地区的考古工作不很充分也很不平衡，因此并不排除今后会有更加细致和更加明确的分析。至于太平洋三大群岛上的居民，应该是较晚时期逐步迁移过去的。

第三编中对树皮布、边架船、裸体文身和台湾原住民始祖神话等的研究都十分精彩。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衣着主要是丝麻织品，其实这只是华夏民族的情况。北方的少数民族很多是衣皮毛，东北个别民族更有以鱼皮为衣的，历史上称为“鱼皮部”。西北较早有毛织物，而东南沿海则流行树皮布的服饰。后来广泛流行的棉织品只是很晚才从印度传入我国的。所谓树皮布乃是用具有较好韧性纤维的树皮经过拍打等工艺而制成的一种无纺布。中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提到这种树皮布，只是过于简略。民族学家则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其流行范围广布于太平洋上的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群岛等地，在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泰国，中国的台湾、海南岛和云南的西双版纳也多有发现。这些地方正是古百越和南岛语族分布的区域。基于对树皮布制作工艺中广泛使用拍打工具的认识，考古学者陆续在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和海南的台湾、福建、广东等地的新石器时代和早期历史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刻槽的石拍，认为就是制作树皮布的工具。香港中文大学的邓聪教授认为最早的石拍出于环珠江口，距今约6000~5000年；之后向南传播到越南北部的冯源文化，距今约4000~3500年；距今3500年前后到了泰国和马来半岛，之后再到达台湾和菲律宾。太平洋岛上最早的树皮布木拍出自法属社会群岛，距今1100~700年。我相信今后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这个年表一定会有所修正。但它反映的大致趋势应该是符合实际的。正如本书作者所说：“树皮打布石拍的发现与编年研究，不但从考古实物资料的角度再现了华南、东南亚土著树皮布文化的内涵，而且石拍的编年所反映的树皮布文化的华南起源、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传播扩散，还印证了华南百越先民与太平洋南岛语族的民族关系史”。

人们都知道百越先民和南岛语族都善于乘舟水行，在近岸的地方普通舟船甚至竹木筏即可充用；如果远洋航行，在原始技术的条件下，怎样才可能实行呢？人类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太平洋岛民经常使用一种叫做边架艇或边架帆船的交通工具。就

是凿一个独木舟，在其一边或两边做一浮架，使独木舟不易倾覆。如果远航，还必须有风帆以解决动力问题，单靠人力是难以持久的。尽管这样的船在太平洋各岛之间往来非常适用，但最初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由什么人创造发明，又是怎样流传开来的，却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人类学家在调查中发现双边架艇主要分布于印尼群岛和美拉尼西亚及其附近，范围较小；而单边架艇几乎分布于南岛语族的全部领域，太平洋东部的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更只有单边架艇。一般认为单边架艇航海性能优于双边架艇，因而推测印尼—美拉尼西亚一带居民较早使用双边架艇，在向东部的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扩展的过程中才加以改进为单边架艇。这与南岛语族自西向东扩展的假说相一致。但印尼等地发现的双边架艇年代并不早，无法与百越—南岛语族走向海洋的历史相联系。吴春明注意到2001年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的独木舟，旁边还有许多长短和横竖不一的木料，应该是边架的设施，不远处遗留的竹席残片可能就是船帆。如果这个判断不错，它就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带帆边架艇，因为其年代为距今8200~7500年！不但如此，他还注意到在华南各地周汉时期遗存中发现的独木舟，上面的穿孔也可能是安装边架用的，可见跨湖桥的边架独木舟并不是孤立的。他还特别调查了贵州台江施洞的龙舟——子母船，这种船虽然不用帆，功能也和普通边架艇不同，但其形状和结构却和双边架艇十分相似。因此他推测施洞子母船应该是百越先民曾经使用过的边架独木舟的活化石，是“太平洋南岛语族边架艇独木舟的逻辑原型”。这使我想起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上航行的宏船。那是一种挂着双帆的大船，能够乘四五十人，有船篷可以遮风避雨。值得注意的是船的两边各有一个“腰划子”，很窄很长像独木舟但不是独木舟，用横木与大船连接而略高于大船，与大船相距约半米。平时悬空不着水面，但在很多情况下，大船因风向关系是侧身航行的。这时一边的“腰划子”就贴到水面而起到平衡的作用，使大船不致倾覆。因风向的不同，大船会向左侧或向右侧，两边的“腰划子”可以轮流使用，但从不会也不可能同时贴水航行。我想这比施洞龙舟更像双边架艇的形状和结构，而且有帆，功能也是远航，更像是双边架艇的发展形态，是百越先民曾经使用过的边架独木舟的活化石。这样在华南地区就有从8000年前直到现代可能用于航海的边架帆船的实物标本或改进型的活化石，相信以后的考古发现会把这一残缺不全的发展链条逐步连接起来。

吴春明的著作内容十分丰富，这里不可能一一加以评述，仅就部分内容谈了一点个人的看法。最后我想要强调的是，关于古代百越与南岛语族海洋文化历史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性课题，相关部门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而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又需要有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乃至航海知识等方面的修养，充分掌握国内外研究的历史

与现状。吴春明正是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和学术素养，才能写出这部高水平的著作。希望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今后作出更大的贡献！

2010年9月3日于北大蓝旗营

(本文是为吴春明著《从百越到南岛——海洋文化的土著基础》所写的序言，该书待刊)

南中国史前考古的新进展*

南中国主要有两大区块，就是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华中地区和以珠江流域为主的华南地区，两大区块的分界是南岭。还有一个西南地区，情况不大明朗，这里就不涉及了。华中和华南地理位置上紧密相邻，自然环境却有较大的差别。两地的史前文化尽管有很大的差别，发展道路也颇不同，毕竟还有许多联系，放在一起讨论还是很合适也很必要的。

早年华中地区的史前考古在文化谱系、农业起源、聚落演变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都有很大的成绩，近几年又有新的进展。在浙江，由于跨湖桥文化和上山文化的相继发现，把那里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以及当地稻作农业起源的探索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而且从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到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似乎是各有千秋，缺乏明确的继承发展关系，这在别的地方是少见的。湖南西部的高庙文化年代早，基本上没有农业，却是一个强势文化，对洞庭湖滨的农业文化乃至遥远的华南地区都有明显的影响。这两个例子都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聚落演变和文明起源的探索也有不少新的成果。湖南连续出版了《彭头山与八十垱》和《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两部考古报告，为澧阳平原的农业发展、聚落演变到最早城址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安徽刚刚出版《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考古报告不久，又在凌家滩墓地发掘了一座随葬近 300 件玉器，并且上面放置一头重 85 公斤玉猪的大型墓葬。从整个墓地来看，死者不但有职能的分工，而且有显著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差别，表现出走向文明的明显倾向。

如果说凌家滩文化是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中的先驱或发展中心，那么稍后的中心便明显向东南转移。只是这种转移并非文化的迁移而主要表现为各自发展进度的不同，那就是良渚文化的崛起。分布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是以出土大量精美玉器著称的，也是南中国史前文化中文明化程度最高的。它的中心区在杭州的北郊，占地 40 多平方公里，遗址非常密集，中央的莫角山是一个 30 万平方米的长方形土台，上面有几万平方米的

* 本文为 2007 年 12 月 13 日在香港召开的“文物保护与南中国史前考古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高等级建筑的夯土基址，旁边有反山等高等级贵族墓葬。2007年11月在它的周围发现了规模巨大的城墙基址。墙基用大块石头铺砌，宽约50~60米；墙体用从附近山脚下运来的黄褐土筑成。整个城墙基址的平面呈不大规则的长方形，南北长约1800~1900米，东西宽约1500~1600米，工程巨大。这个古城的始建年代暂时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到良渚文化晚期还在使用。从一些迹象来看，整个中心是在良渚文化之初有意规划建设起来的。如果这个判断不至于大错，这个良渚古城可能持续了七八百年！大家知道在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曾经发现了多处从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的古城，最近在湖北又发现了好几座古城，这十几座古城中规模最大又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天门市的石家河古城，也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有120万平方米。城内的遗迹同样反映出当时存在职能的分工和社会地位的分化，也是文明化程度很高的一个中心。至于成都平原过去也曾经发现属于宝墩文化的几座城址，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三星堆青铜文化的起源问题。把这些发现联系在一起，就会对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华中地区在整个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新的认识。

华南地处热带和南亚热带，加上北面有南岭山脉阻拦冬季的寒风，所以气候炎热多雨，夏长冬短或长夏无冬。从更新世到全新世，华中和华北的气候有很大的变化，而华南变化并不显著，即使冰河时期的气候也并不十分严酷。由于生活资源十分丰富，从旧石器时代长期实行的采集—狩猎—捕鱼经济，到新石器时代也仍然持续而没有必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所以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界线很不清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生虽然很早，而发展却相对迟缓。现在我们对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仍然知道得很少。我过去曾经提出过一个假设，就是在最后一次冰河时期，海平面要比现在低130米左右，现在南海的大陆架绝大部分应该是滨海平原，一定有不少人居住在这个地方，他们应该从事采集—狩猎—捕鱼等活动。当全新世海水逐渐上涨时，他们的子孙必定会向陆地方向退缩，从而会产生一个缓慢的可能是不知不觉的移民过程。这些移民是懂得食贝的，即使到了较北的山区，他们也会采集螺、蚌等贝类为食。这可以解释粤北等地许多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很少贝壳，而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则有丰富的贝壳堆积。因此在探索华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来源时，除了首先应该在当地寻求而外，也要考虑大陆架上的可能性，还要考虑华中地区的影响。

鉴于华南地形复杂，海岸线特长，各地的文化差别很大，新石器时代文化应该不止一个源头，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颇不容易。

文化区系的研究不能仅从宏观的角度来加以划分，那样做不可能很确切，难以正确了解当地文化发展演变的过程，也难以正确了解不同区系之间的文化关系。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各个区域寻找有代表性的重要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并且进行准确的而不是大概的分期研究，再同周围的相关遗址进行周密的比较研究，以确立一定区域的文化特征及

其发展演化的历程，再跟相邻区域的文化进行比较，以确认不同的文化系统及其相互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再探讨某些特殊文化因素的传播及其社会作用。只有这样的研究路线才可能建立比较稳固的基础。否则就会失之于远处求同和近处求异，勾画出一幅幅不正确的图景，这在考古学的历史上是并不罕见的。很高兴最近的一些考古工作正是沿着这条路线进行的，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我想举几个例子。

首先谈谈珠江三角洲的史前考古问题。那里有许多沙岗遗址和贝丘遗址，有的在海滨，有的在海岛，有的在河口，有的在平地的小岗子上，后者在史前也应该是贴近水面的。那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应该是最能代表华南特点，并且对往后文化发展具有更大影响的，所以受到学者的特别关注。很早就有人在这里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陆续有一些文章讨论那里的文化性质、特征、年代分期和来龙去脉等问题，却往往不得要领。问题在沙岗遗址的沙层过于疏松，发掘时极易坍塌，难于准确划分地层，更难于分辨相关的文化遗迹。其中深圳咸头岭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遗址，由于其丰富的文化遗存而曾被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代表而提出咸头岭文化的命名。只是过去的四次发掘都没有把地层关系弄清楚，直到2006年春季进行第五次发掘时，因为改进了方法，把沙岗遗址地层关系不好把握的难题基本解决了。在分层采集标本的基础上，通过认真的资料整理和类型学研究，排出了三期五段，早晚发展演变的轨迹十分清楚。将这个结果同相关遗址进行比较，加以充实和可能的校正，整个文化的面貌也就比较清楚了。由于这个文化中有不少彩陶和白陶，与湖南西北的高庙文化等有相似之处，成为许多学者注意的焦点。至于整个文化是本地起源的还是从湖南西北部传播过来的，或者是本地起源而受到湖南西北相关文化的影响，学术界还有不同的认识，这可以在以后的研究中逐渐加以解决。这个文化的遗址多在海滨或海岛上，理应以捕鱼和采集经济为重，而且有一定的航海能力。目前这方面的资料很缺乏，今后应该多加注意。

过去贝丘遗址发掘不少，但是多在贝壳堆积或在贝堆旁边的居址进行发掘，所得信息十分有限。去冬今春高明古椰遗址的发掘转变了思路，着重全面了解遗址的状况。不但揭示了岗顶居址和坡地堆积与石器制造场，还特别发掘了水田下面保水层的堆积。通过浮选等方法获取了极为丰富的动植物等有机物遗存，其中有数十粒野生稻谷，还有许多竹木器残块，从而大大丰富了对同类遗存的认知。其实过去发掘过的南海鱿鱼岗、三水豆边岗等贝丘遗址坡下的水田或水塘中也有木器等有机物遗存，只是没有发掘。今后如果发掘同类遗存时采取古椰的发掘方法，一定会获得更加丰富的成果。古椰的陶器既不同于咸头岭文化，也不同于过去发掘的河宕、灶岗、鱿鱼岗等较晚的文化遗存，而与香港虎地、过路湾上区和珠海草堂湾等遗存相近。代表咸头岭文化之后的一个重要的文化阶段。这时已不见彩陶和白陶，陶器的形制和纹饰也有诸多变化，但二者陶器的基本器类都是圈足盘和圜底釜罐，而且都有树皮布石拍，应该是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的两大

发展阶段。至此珠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才初步建立起来。

由于这两个遗址发掘思路的转变和发掘方法的改进，又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所以都被选入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中，而且都获得2006年考古优秀工地奖。

珠江三角洲另一个重要的史前遗址是珠海宝镜湾，发掘报告已经出版。那是一个海滨的坡地遗址。由于不同时期遗迹的打破关系极为复杂，地层关系的辨识和文化分期工作十分困难，不过最终的分期还基本是可信的。那里的第一期文化比古椰更接近于咸头岭文化，第二期也许比古椰略晚。那里发现了一千多件石网坠，还有停船的石锚，集中反映了一定的航海能力和海洋渔猎经济的发达程度。此外，近年来在香港发掘的沙下等遗址也都有重要的收获。

广东北部经过科学发掘的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当数曲江石峡。遗址规模大，地层关系清楚，可以明确地分为几个时期，代表当地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发展演变轨迹。其中的石峡文化跟江西的樊城堆文化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发展水平也颇相近。苏秉琦先生特别看重那个发现，专门写了文章《石峡文化初论》，认为那是赣鄱地区通向华南的一个窗口或门户^①。很高兴那个报告已经由朱非素和杨式挺先生写出来了，相信不久就会正式出版。

广西南部的史前遗址过去多所发现，只是由于邕宁顶蛸山富有成效的发掘才使那里的文化发展轨迹明朗起来。顶蛸山是一个贝丘遗址，可分四期，其中第二、三期被命名为顶蛸山文化。它有非常特殊的肢解葬，陶器多圜底釜罐，遗址多在河边，常为贝丘，经济主要是采集—狩猎和捕捞水生动物。这个文化在广西南部有广泛的分布，南面直到越南北部。越南考古所的阮文好先生认为，他们那里的多笔文化与顶蛸山文化实际上是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史前没有国界，文化的边界自然不受人为了的限制。

广西北部大体以越城岭为界，南部多洞穴遗址，就中以大岩和甑皮岩的发掘为最重要。后者的五期文化基本上代表了当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发展轨迹。北部的资源晓锦等遗址也有明确的文化发展序列，只是年代偏晚，位置上则应属于华中的长江水系。

福建的闽侯县石山遗址也是很早就发现了的，前后进行了九次发掘，直到第八次才把地层关系完全搞清楚。那里的文化至少可以分为四期，第一期部分内容接近于壳坵头遗址，也许可归入壳坵头文化。第二期遗存最丰富，被确定为县石山文化，年代被推定为距今5000~4000年间。第三期的黄瓜山文化已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第四期是青铜文化^②。这个序列基本上代表了福建北部文化发展的轨迹。福建南部过去发现有金门富国

^① 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文物》1978年7期。

^② 福建博物院：《闽侯县石山——第八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墩遗址，年代可能与平潭壳丘头接近。最近发掘的晋江庵山遗址则代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滨海文化。至于整个闽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则还有待于更多资料的充实才能建立起来。而广东东部和海南岛的情况至今还不是很清楚。

从上面简单的叙述可以看出，华南地区各区域文化的研究虽然还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毕竟有了较大的进展，可以大致勾画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基本面貌和所处范围。这些文化跟后来先秦时期号称百越的古族和古国应该是前后相继的。至于台湾史前文化的谱系，近年也逐渐明朗起来。台湾在更新世晚期跟大陆是连在一起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居民很容易到那里去，因此有左镇人和长滨文化的发现。到全新世海水上涨，中间隔了一个海峡，来往就不那么方便了。所以台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应该是本地起源的，同时不时有大陆文化的影响。其中有些是来自浙江、福建，有些是来自广东。总之还都在百越先民的文化范围以内。

华南史前考古学文化与东南亚乃至环太平洋相关文化的关系是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语言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做过不少努力。语言学家主要是研究古代百越语言与南岛语系的关系问题；文化人类学家关注的是某些特殊风俗如拔牙等的发生与传播问题；考古学家从关注某些物质文化如有段石镞的发生与传播问题开始，逐步通过艰苦的田野考古工作来取得确实的证据，借以深化或修正既有的认识。记得20世纪50年代新西兰的达夫博士（Dr. Roger Duff）到北京大学讲学，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为毛利人到中国来寻找祖先的”。他放映了许多幻灯片，说明新西兰的毛利人至今还使用有段石镞，以及这些有段石镞是如何从中国东南沿海一步一步传播到新西兰的。他还说毛利人房屋上的图案画和某些日用器具如何具有中国风味等等。现在看来，他的说法假设性成分太多，缺乏扎实的考古学基础。中外研究有段石镞的学者很多，比较起来，还是傅宪国的研究比较系统而有说服力。他把有段石镞和有肩石器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注意到有段石镞最早出现于浙江，经福建、台湾传播到菲律宾，再传播到太平洋广大岛域，在时间顺序上似乎是说得通的。而有肩石器最早出现于珠江三角洲，通过中南半岛传播到南亚的孟加拉和印度，在时间顺序上似乎也说得通。但在如此广阔的领域上，实际的情形究竟怎样，自然需要做更加细致的考古工作和深入的研究。在这方面，洪小纯关于台湾与菲律宾石镞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台湾玉器传播到菲律宾的研究是值得称道的。

文化人类学家早就注意到东南亚和环太平洋的许多民族有穿树皮布的风俗，而制作树皮布的工具就是所谓树皮布打棒。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使用打棒来制作树皮布，要靠考古学家的发现与研究。邓聪注意到大湾文化即咸头岭文化中的刻槽石拍应该是制作树皮布的工具，类似的石拍或树皮布打棒在东南亚和环太平洋的南岛语系各民族中有着广泛的分布，而年代以咸头岭文化为最早。其间是否有传承关系也值得研究。

华南的史前文化中不时发现有人工拔牙的标本，说明当时存在着拔牙的风俗。考古资料证明，这种风俗主要流行于古代的东夷、苗蛮和百越地区，年代最早的约在公元前4300年。日本的史前文化中也时有所见。在台湾、东南亚以及环太平洋地区属南岛语系的各民族中，前不久还流行这种风俗。其中是否有某种传承关系，也是许多人所关注的。

除了以上几项以外，还有稻作农业的传播、薯蓣等块根类农业的发生与传播等等，这些都把华南与东南亚乃至环太平洋地区联系在一起。因此华南史前考古的研究是具有国际意义的。但是要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必须有许多扎实的考古工作，同时还要有多种学科的合作，才能逐步有所推进。近年来对分布于大洋洲的拉皮塔文化一系列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提出了许多同过去设想不大相同的问题，特别是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东部都发现有类似拉皮塔文化的因素，为拉皮塔文化起源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希望，是值得注意的。

华南史前考古相对于华中长江流域来说明显滞后。即使在长江流域，各省的发展也颇不平衡。这有历史的原因，无可厚非。可喜的是现在终于有了相当的进展，从而升起了新的希望。华南史前考古有许多特点，只要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些特点，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项田野工作和相关的研究工作，调整思路，拓宽视野，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许多学术上的难题就会逐渐明朗起来。

七 夏商周考古

二里头文化与夏王朝

中国青铜器时代早期最重要的一个考古学文化叫做二里头文化，它是为探索夏文化而进行的考古学考察中被发现的^①。多年来研究的结果证明，它是同夏王朝历史关系最密切的一个考古学文化，有的学者甚至直接把它称为夏文化^②。

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这两个地方正是有关夏代传说最集中的地方。据《史记·殷本纪》引商汤的话说：“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这里讲的是大禹治水，实际反映了夏朝的四至。因为汤刚刚灭夏，对夏王朝的情况应该是很了解的。这个范围大体是指现在的河南省中西部 and 山西南部一带，夏代都城和所封同姓十一国的地望大体也在这个范围或稍稍扩大一些。二里头文化就是分布在这个区域的，其中最重要的中心遗址是河南偃师县的二里头，据认为可能即是夏代都城之一^③。

由于文献不足，夏代的年代难以确指。但是也还可以有各种推求的办法。例如《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幽王末是公元前 770 年，加 257 年为公元前 1027 年，则当是灭商之年。《左传·宣公三年》说：“鼎迁于商，载祀六百”，说明商代前后经历了 600 年。1027 年加 600 年为公元前 1627 年，当为灭夏之年。至于夏代的总年数，古有 471 年或 431 年等几种说法。因此一般认为夏代历年当为公元前 21 世纪初至公元前 17 世纪末。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根据数十个碳-14 测量数据并加以树轮校正，绝大多数落在公元前 2100 ~ 前 1600 之间^④，可以说同推算出来的夏王朝的年代是吻合的。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根据别的推算方法认为夏纪年还要早些，因而把中原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看成是夏文化，而把二里头文化晚期划入商文化的范围。这问题自然还可以进一步研究。

① 徐旭生：《1959 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 年 11 期。

②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年。

③ 郑杰祥：《夏史初探》82 ~ 84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年。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 ~ 1991），文物出版社，1991 年。

二里头遗址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是二里头文化中最大的一处。它的下层即有较大的夯土台基，上层的夯土台基规模更大。例如第一号夯土台基位于遗址中部，略呈正方形，面积达10000平方米，高出周围地面约0.8米^①。它的中部偏北有一座大型殿堂基址，面阔8间，进深3间，外有檐廊，显得庄严肃穆。它的南面是一个广场，相距70米处才是大门。而整个建筑又由一个巨大的回廊所包围着，回廊的范围差不多包括了整个夯土台基。这样规模宏大、布局严谨的建筑群体，绝对不是一般贵族的宅院，而应看做是当时的宫殿。

在第一号夯土台基东北约150米处还发现有第二号夯土台基^②，基址略呈长方形，面积约4200平方米。同样是北面有一个正殿，殿前是广场，南面是大门，周围用回廊环绕，形成一个布局严谨的封闭形建筑群体。只是规模较第一号基址为小。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号台基的正殿之后与后部回廊之间发现有一座大墓，墓坑长5.2米，宽4.25米，面积达22平方米，是二里头文化中最大的一座墓葬，可惜过去被盗而出土器物不多。但它的规模及它所处的位置足以把墓主人看成为头号统治人物。同时也说明这组建筑当为宗庙而非世俗的宫殿。这样同时存在两组大型建筑也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二里头既有宗庙，从那座大墓的特殊位置也可想象那里一定供奉有先君之主。因此把二里头遗址看作为夏代的都城之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二里头遗址的下层即已出现铜器作坊，上层作坊的规模更大，出土有许多炼铜的坩埚残片和铸铜的陶范，这说明当时的青铜制造业是受高层统治集团控制的，并且已经初具规模了。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一般含铜90%以上，含锡5%左右，其余还有少许杂质。所制器物有工具、武器、容器、乐器和装饰品等多种。工具中有镞、凿、锥、钻、小刀等，还有鱼钩；在陶范中发现有钁，可能是一种农具。武器中有戈、钺和镞，此三者商周时期都成为主要的武器。容器中主要是作酒器用的爵，也偶见斝和鼎，此等铜器在商周时期都发展为重要的礼器。乐器只发现有铜铃。装饰品则有镶嵌绿松石的盾形牌饰和圆形泡饰等。传说“禹穴之时以铜为兵”（《越绝书·宝剑篇》），“禹铸鼎于荆山”（《帝王世纪》），说明夏已进入青铜时代，这与二里头文化的发展水平是相同的。

二里头文化中还有不少玉器，主要有戈、钺、牙璋、铲、柄形器、梯形大刀、琮、筒、璜、玦等，多属礼器、仪仗或装饰品。一般出于较大的墓中，是贵族享用的奢侈品。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4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3期。

二里头文化中常见卜骨，一般是用猪或羊的肩胛骨加以烧灼，依据裂纹的样式以卜吉凶。此种风俗在龙山时代便已开始，二里头文化时有所发展，到商代则极为发达，其材料也逐渐由兽肩胛转变为以龟甲为主。

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多呈灰色，少数为黑色，火候甚高。在河南中西部常见的器类有瓦足盆、刻槽盆、豆、觚、爵、斝、甗、大口尊、罐、瓮和鼎等，其中包括了饮食器、酒器、炊器和盛储器等基本的类别，同时也是其文化特征的一种反映，人们把这一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称为二里头类型。在山西南部，除了与二里头类型有很多相同的器物外，还有比较多的鬲、甗、单把罐和蛋形三足瓮等，而很少见瓦足盆、刻槽盆和大口尊等器物，人们把这一类二里头文化遗存称为东下冯类型^①。此外在河南北部到河北南部有下七垣类型，河南东部和南部也有别的类型。这些类型的形成，往往与当地原有文化的传统有关，也应与夏代有许多封国的现实情况有关。那种把夏代的文化看成是清一色，以为只有二里头类型才配称真正的夏文化的观点，其实是可以商榷的。

二里头文化所反映的许多文物制度，如宫殿宗庙制度，青铜器礼器和玉礼器的制度，占卜的制度等等，大多被商文化所继承和发展。许多文化因素如陶器的类别、造型和花纹等也都被商文化所继承和发展。而商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还吸收过别文化因素。至于西周文化同商文化的关系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是从考古学上所看到的情况。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说明历史上夏商周的依次递嬗、彼此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是有损有益，有除旧有创新的，这与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同商、周文化的关系是一样的，从而再次证明了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代的文化。

应当指出的是，现在考古界对二里头文化的研究还只是初步的。就拿工作做得最多的二里头遗址来说，它前后经历了几百年，到底是什么时候作过都城，什么时候不是都城？做都城的时候到底有几座宫殿与宗庙，还有些什么样的房屋建筑？那里有没有城垣？城内的整体布局怎样？与宫殿相称的王族墓地在哪里，埋葬制度究竟怎样？现在都还是不清楚的。至于别的都城在哪里，则更是全然不知。旧说太康居斟鄩，而斟鄩氏故地在河南巩县稍柴一带，考古调查知道稍柴确有大型二里头文化遗址，但至今没有大规模发掘，不知内涵究竟怎样。可见今后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

殷墟之被证实为商代晚期都城，除了有都城级别的宫殿和王陵等大批遗迹遗物以外，还因为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其中关于殷王世系的记录，同《史记·殷本纪》所记基本上是一致的。《史记》同样还有一个《夏本纪》，也有关于夏代世系的记录，推想夏代应该是已有文字，有史官和历史记录的。但二里头文化中至今还没有发现文字，

^① 李伯谦：《东下冯类型的初步分析》，《中原文物》1981年1期。

只是在陶器上发现有各种刻划记号。考虑到商代文字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在商文化之前的二里头文化中，特别是某些像二里头那样的都城级的大型遗址中，是很有可能发现文字资料的。如果今后果真发现了文字并能释读出来，关于二里头文化同夏王朝历史的关系必将更加明朗化，而关于夏代的考古学研究也必将达到新的更高的水平。

（原为徐苹芳、张光直主编的《中国文明的形成》（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中的第六章第二节）

洛阳皂角树的考古工作

洛阳地区在古代号称天下之中。那里有非常发达的新石器文化，自成体系。紧接着出现的二里头文化则是我国早期青铜文化中发展水平最高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个，一般认为它就是夏文化。如果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质而不宜简单地将二者画等号，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满有把握地说，在探索夏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中，首先要研究的就是二里头文化。而要深入地研究二里头文化，就不能仅仅研究二里头这种都城级的中心遗址，也还要研究次级的乃至一般的村落遗址。皂角树就是离二里头不远的一处村落遗址。这个遗址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发现了，只是到90年代初，由于洛阳市要在那里建设经济开发区，才由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进行了详细的勘察和大规模的发掘。记得在1993年10月下旬，在皂角树遗址考古发掘告一段落的时候，我和刘东生、俞伟超等几位先生应邀到洛阳参加了“皂角树遗址考古座谈会”，听取了发掘人员的详细介绍，考察了考古发掘现场和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参观了出土的各类遗物，获得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都认为皂角树遗址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应该及时进行资料整理和编写发掘报告。后来经过一些周折，到现在发掘报告终于可以和读者见面了，毕竟还是值得庆幸的。

我认为皂角树考古有三点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提倡的。首先，这是一项与基本建设工程相关的考古工作。不少文物考古人员认为，凡属与建设工程相关的考古工作，不管遗址的具体情况如何，都属于配合基本建设的项目，考古人员要主动去配合，或者干脆就是“随工清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早在50年代初期，当全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为了有效地保护古代遗址，政府提出了“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方针。按照这个被称为“两重两利”的方针，在进行基本建设之前，首先要进行考古调查。如果是重要遗址，就要视情况改变建设计划，或者首先进行考古发掘，根据发掘的结果再作处理。最明显的例子是偃师商城的保护。那里原来计划建设洛阳首阳山电厂，是国家重点工程项目，规模很大。可是在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并开始动工打基础的时候发现了商代早期的城址。为了有效地保护这座城址，经国务院批准把电厂改建到别的地方。显然这是正确地贯彻两重两利方针的举

措，而不是片面地强调考古要配合基本建设。皂角树遗址也是这样。本来政府部门计划建设的洛阳市经贸开发区包括皂角树遗址，当文物部门详细勘探后，了解到遗址的重要性，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市政府遂决定局部改变开发区的规划设计，而文物部门也及时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从而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假如全国所有与建设工程相关的考古遗址都能够像偃师商城和皂角树遗址那样处理，我们的古代遗存将要避免多少破坏和损失啊！

其次，皂角树遗址的发掘一开始就注意了多学科的合作，注意了科学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应用。邀请了各方面的专家进行了第四纪地质和地貌的研究、环境的研究、不同地层土样的磁化率分析、古土壤微结构分析、地球化学分析、孢粉分析、植硅石分析、果实种子鉴定、脊椎动物鉴定和碳-14年代测定等。这些研究的成果不是像一般的考古报告那样作为附录，而是作为正文编排在有关章节，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为了采集更多的标本，在发掘过程中对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化堆积普遍地进行了浮选，获取了大量谷物和其他植物遗存。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小麦和大豆，还有粟、黍和稻等农作物的种子。看来先秦时期的几种重要农作物这时都已经种植了。关于粟和黍都起源于黄河流域在学术界几乎是没有任何异议的，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流域也已经得到广泛的共识。这些都有众多考古学证据的支持。小麦的主要起源地在西亚，这是大家都承认的。问题在于是不是还有别的起源地，中国是不是也是起源地之一。小麦是多型性作物，主要有一粒小麦、二粒小麦和普通小麦。西亚有前二者的野生种和栽培种，而且从野生种到栽培种的转化过程也已经比较清楚。只有普通小麦至今没有发现直接的野生祖本，一般认为它是经过多次杂交后形成的六倍体小麦。人们发现二粒小麦与广泛分布的小麦草（*Aegilops quarrosa*）杂交，染色体加倍成六倍体，便可以产生与普通小麦十分相似的小麦。西亚具备这些条件，那里多次发现了早至公元前6000~前5500年的普通小麦，比中国栽培小麦的年代要早得多，所以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小麦应该是从西亚传播过来的。不过中国没有一粒小麦和二粒小麦，在可能的传播路线上又缺乏明确的考古学证据，这个问题目前还只是一个悬案。人们注意到中国有许多与小麦有一定亲缘关系的羊草属、黑麦属和鹅冠草属的植物，近年来在西南和西北许多地方又发现有野生和半野生的原始小麦。这种原始小麦颖壳紧包子粒，成熟后会自行分节断落，自行繁殖，并且同普通小麦一样具有多型性。所以一些学者主张中国具有小麦独立起源的条件，应该也是小麦起源地区之一。皂角树遗址小麦的发现虽然难以为本土起源说提供充分证据，却是在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小麦遗存，值得注意。学术界历来认为大豆应该起源于中国，但是至今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只发现过野生大豆，皂角树的大豆是迄今所发现的大豆遗存中年代最早的，所以弥足珍贵。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发现，大豆的起源问题也终将会得到解决。现在多学科的合作已经成为田野考古工作和整个考古学研究的一种潮流，但在具体合作中也还存

在不少问题，应该认真研究加以解决。

第三，皂角树考古最重要的收获也许是对遗址北部长达 100 余米的断崖的观察与利用。这个断崖位于遗址北部的边缘，几乎没有文化堆积，只有少量的灰坑和墓葬。那里的地层从下到上依次是马兰黄土、深褐红色顶层埋藏土、褐色顶层埋藏土、新近黄土和表土。类似的地层在洛阳盆地、三门峡乃至渭河盆地都可以看到，反映了黄河中游地区从更新世晚期经整个全新世直到现在的地质过程和阶段性气候变化的历史，对于了解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人类生活环境的变迁是很有帮助的。不过如果只有这样的地层，对于每一个阶段的绝对年代还是无法确定，同相关考古学文化也无法直接挂钩。皂角树大剖面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村落遗址边缘，既有自然堆积，又有少量文化遗迹打破自然堆积。从剖面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二里头文化的 H18 和 H19 被褐色顶层埋藏土叠压，同时打破了深褐红色顶层埋藏土；东周文化的 H17 和汉代的 H1 则夹在几小层褐色顶层埋藏土之中；唐墓被新近黄土叠压而打破褐色顶层埋藏土。这样几层埋藏土和新近黄土的绝对年代的幅度就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对于判断其他地方的自然层的年代提供了一个可贵的参照系。这是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合作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从以上情况来看，我认为皂角树考古报告是值得推荐的。希望以后凡属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考古项目都能够切实贯彻“两重两利”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在实际考古工作中都能够像皂角树一样切实做好多学科的合作。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田野考古工作水平和研究水平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原为《洛阳皂角树——1992~1993 年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序二，科学出版社，2002 年）

商周时期的手工业生产

在高度发达的青铜工业的推动下，商周时期其他部门的手工业生产也都有显著的发展，尤以王室和各级贵族掌控部门为最，这主要涉及陶瓷、玉石、漆木、丝绸和造车等方面。

商代有以职业为氏的情况。周灭商后，曾经将殷遗民迁到洛邑和分封给某些重要诸侯管辖。《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分鲁公……殷民六族”，其中有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康叔……殷民七族”，其中有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终葵氏，这些都是以职业为氏。周人既然整氏族接收殷遗民，自然也继承了以职业为氏的传统制度。而专门制造陶器的就是陶氏。

这个时期在都城或地方城邑中往往有制造陶器的作坊。例如郑州商城西边的制陶作坊有15座陶窑^①，偃师商城也有15座陶窑^②，西周镐京的制陶作坊也有十多座陶窑集中分布^③。其中郑州商城的制陶作坊颇具规模。它的中部有白灰地面，南部有成堆的陶片，周围散布有大量尚未烧过的陶坯、和好的陶泥、烧坏的陶器废品，还有制造陶器的工具如陶拍、陶垫和陶印模等。印模中有些是仿铜器花纹的，是制造高档陶器用的。这个陶器作坊旁边还有窑工住的许多小型房屋，形成一个制陶业者的小型聚落。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制陶业内部已经专门化。例如河北邢台贾村商代遗址中四座陶窑附近只有陶鬲及其残片，没有发现其他器物的陶片，推测那里是一处专门制造陶鬲的作坊遗址^④。郑州铭功路的制陶作坊中只出土泥质陶如盆、甑、簋、瓮之类，尤以盆、甑为多而缺乏夹砂陶器如鬲、甗之类。安阳殷墟花园庄南地的陶器作坊遗址内，在一处灰层中就发现几十个陶豆，而且式样相同，有正品，也有烧流的残次品^⑤。这样的分工自然不是为了满足陶工自己日常生活器用的需要，而是为官方掌控以进行再分配的目的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384~460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404~405页，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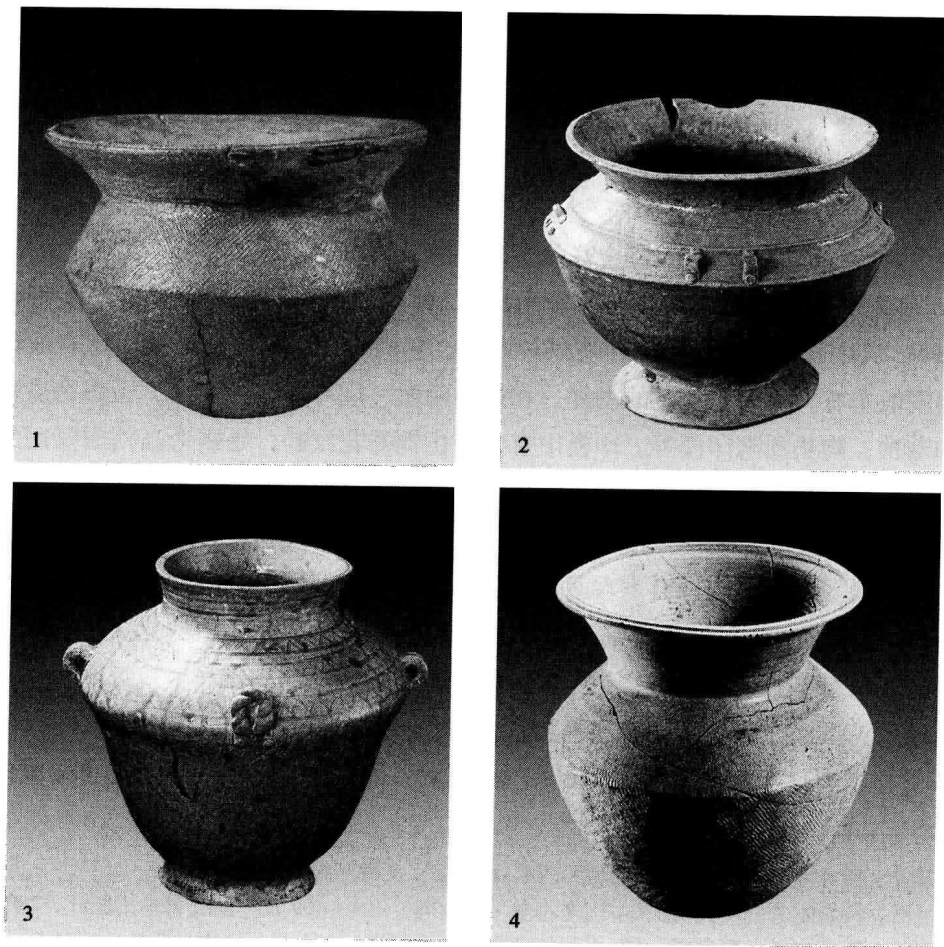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254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④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8年邢台地区古遗址古墓葬的发现与清理》，《文物》1959年9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441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进行的集中生产，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由于官方的重视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得这个时期的陶瓷业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突出的表现在原始瓷器的发明和各种仿铜陶瓷礼器特别是刻纹白陶的制造。原始瓷和硬陶十分接近，都是用氧化硅和氧化铝为主要成分而氧化铁含量极低的瓷土（又称高岭土）而不是普通的黏土烧成的，只是原始瓷含铁量更低，原始瓷上釉而硬陶不上釉。二者的胎质均接近白色，烧成温度达 1200°C ，比普通陶器高得多（当时普通陶器的烧成温度约为 $850^{\circ}\text{C} \sim 950^{\circ}\text{C}$ ）。因而硬度高（莫氏5度以上），吸水率低（低于3%，多数不足2%），这些特点均接近于一般意义上的瓷器。只因为质地还不够细腻，所以称为原始瓷，好的硬陶则可称为素烧瓷。原始瓷表面的釉多为青绿色或黄绿色，很像后来的青瓷；少数为古铜色，好像是仿铜器而作（图一）。



图一 商周原始瓷器

1、4. 尊（商代早期，郑州商城出土） 2. 尊 3. 罍（2、3均西周早期，洛阳北窑出土）

硬陶在长江以南发生较早也比较普遍。原始瓷数量相对较少，主要发现于都城和地方性城址或贵族大墓中。例如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存中，相当于夏代的第二、三期便发现有硬陶和原始瓷尊，相当于商代早期的四至六期更有尊、罐、瓮、碗等器，总数达93件之多^①。江西清江吴城相当于商代的遗址也出土了不少硬陶和原始瓷器。在吴城遗址近旁的新干大洋洲大墓中即出土原始瓷和硬陶器28件，另有7件器盖，占全部陶瓷器的20%以上^②。北方则主要见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郑州商城出土过多件原始瓷尊。其造型和纹饰同盘龙城的原始瓷尊接近，质量却更好。那里的两个陶器作坊中都没有发现硬陶和原始瓷，推测是南方的方国对商王朝的贡品。商代晚期的原始瓷略有增加。安阳殷墟发现的硬陶和原始瓷器有豆、壶、罐、甗等，质量也较佳，原始瓷的釉面均匀光亮^③。在殷墟范围内的王裕口发现过较多的原始瓷残片，其中有六片是烧坏的废品^④。推测当时高档的原始瓷就是在王室控制的陶瓷作坊里烧制。但那些原始瓷的个别造型和纹饰仍然具有南方的特点，也许那些工匠就是从南方征调过来的。

到了西周，原始瓷器明显增加了。北方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遗址都发现有原始瓷器。种类则以豆为最多，也有罐、尊、甗等。南方的江浙地区更是发达，其传统一直持续到后来六朝青瓷的出现。

在商代的高档陶瓷器中还有一种刻纹白陶。白陶的成分跟硬陶和原始瓷接近，也是瓷土或称为高岭土，只是氧化铝的比例稍高一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化验室曾经对殷墟出土的白陶、硬陶和原始瓷的成分进行过化验，其主要成分大致是白陶的氧化硅占57%，氧化铝占35%，氧化铁约2%；硬陶的氧化硅为70%，氧化铝为22%，氧化铁约3%；原始瓷的氧化硅约71%，氧化铝约20%，氧化铁约2%^⑤。由于白陶含氧化铝较高，所以烧成温度只有1000℃，比硬陶和原始瓷都低，但比普通陶器要高。硬度则多在4以下。刻纹白陶主要出自殷墟，一般是出于大墓中。例如20世纪30年代在侯家庄商代晚期的王陵和小屯较大的墓葬中曾经出土过十几件可以复原的白陶礼器和3块残片；附近的武官村大墓出土白陶残器10件，残片数十块；而传曾出土司母戊大方鼎的大墓中，20世纪30年代末被盗掘时曾经出土白陶片五六筐，1978年正式发掘时又出土白陶820片^⑥。可见这种白陶乃是王室专用的珍品。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488～493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②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159～181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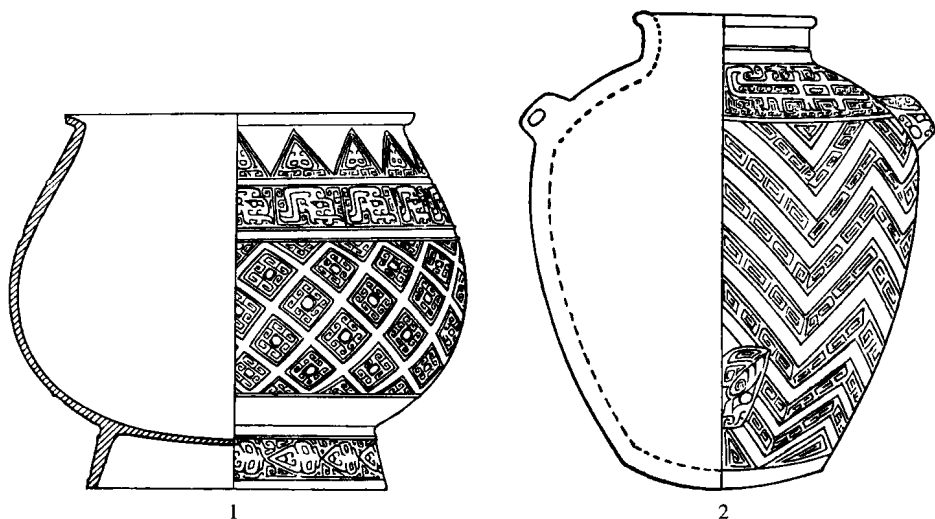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237～240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32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79页表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228～229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刻纹白陶一般只做用于礼器的容器，其种类有豆、簋、孟、盘、卣、尊、罐、瓮、匜、甗、甗等，尤以豆、簋、孟、甗、甗为多。其形制和纹饰多仿铜器，也有一些自己的特色。白陶的表面经过磨光处理，颜色洁白，温润如玉，显得特别华贵而高雅，几乎每一件都是上好的工艺品。白陶的纹饰是在陶坯晾干后刻上去的，刀工细腻，纹样丰富多变。主要纹饰有饕餮纹、夔纹、蝉纹、云雷纹、大三角纹、菱形纹、波折纹等，常有主体花纹和地纹配合，显得繁而不乱（图二）。



图二 安阳殷墟出土商代刻纹白陶

1. 簋 2. 甗

所谓普通陶器实际上也可以再分为三类。一类是日常生活用器，主要有用于炊事的鬲、甗、甗，饮食器簋、豆、孟、杯，盛储器盆、盘、罐、瓮等。二类是仿铜礼器，有簋、豆、觚、爵、尊、卣、解，多为酒器，是贵族专用的。三类是明器，一般个体较小，火候甚低，也多仿铜器，有觚、爵、盘、罐、豆等。这些陶器的生产虽然不能代表当时的最高技术水平，却是生产量极大的重要手工业生产部门。

玉器制造在商周时期也十分兴盛，在当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前玉器的重心在燕辽和江浙地区，中原地区并不发达。随着夏商周王朝的兴起和中原中心地位的确立，玉文化的中心也转移到了中原地区。最重要的玉器大多出于中原的都城和相关城邑。例如殷墟出土的玉器无论在数量、种类还是在工艺水平上都远远超出别的地方。仅仅一座中等规模的妇好墓就出土玉器 755 件^①。湖北黄陂盘龙城、江西新干大洋洲、山东青州苏埠屯和滕州前掌大等地方性城邑的贵族墓中也常常有玉器出土。当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时的玉器制作有专门的部门管理，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殷墟宫殿区附近有一个制造玉器的作坊遗址，在玉工的房址内发现有 600 多块玉石料，260 多块琢玉的砺石，还有铜刀等工具，许多加工的废品，其中大部是玉璋的碎片和小型雕刻品^①。这个作坊显然是为王室掌控以专门为王室生产玉器的场所。

商周玉器的原料多为和田玉，也有少量岫岩玉和独山玉。和田玉产自新疆，岫岩玉产自辽宁，距离商周王朝中心地区都非常遥远，只有独山玉产自河南南阳一带，但质地较差。这说明为了获取上好玉料不惜从遥远的地方进行交换或掠夺。

这个时期玉器的制造工艺已经十分成熟。制造一件玉器，一般要经过选料、开料、造型设计和施工、钻孔、施纹、抛光等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讲究。和田玉硬度比较高，要求加工的砣具的硬度更高，旋转速度更快，碾玉要用金刚砂，而且要有一定的纯度^②。因此，大量利用和田玉说明当时加工玉器的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玉器的质量也有显著的提高。

商周玉器最主要的功用是作为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有所谓“六瑞”、“六器”的说法：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可见璧、琮、圭、璋是当时最重要的祭祀用礼器，也是象征地位身份的礼器。《礼记·聘义》中有一段话记子贡问孔子君子为什么贵玉，是不是因为玉稀少而显得珍贵。孔子说不是的，并且讲出了一番道理：

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浊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这段话把玉的自然品质人格化，赋予了丰富的人文精神。这也是商周时期特别看重玉器的重要原因。郭宝钧先生把周人对玉的态度总结为三条，即“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③。这是一个很好的概括。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5年安阳的新发现》，《考古》1976年4期。

② 北京市玉器厂技术研究组：《对商代琢玉工艺的一些初步看法》，《考古》1976年4期。

③ 郭宝钧：《古玉新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下册，1949年。

一般把商周玉器分为礼器、祭器、工具、用具、装饰品和艺术品等六类或七类。祭器中有圭、璧、琮、璋等，礼器中有簠、盘、璜、环、戈、钺、大刀等（图三），工具中有斧、斨、凿、铲、刀等，用具中有梳、匕等，装饰品和艺术品中多各种人物和动物的造型，包括家畜、野兽、飞禽、水族和草虫等（图四）。实际上祭器也是礼器，工具和用具有些也是礼器，装饰品和艺术品有时难以区分，有些装饰品或艺术品是镶嵌在漆木器上的，另有一些装饰品实际上是佩饰，也具有礼仪性质。在一个讲求礼制的社会里，对人人都珍爱的宝物加以礼制化是很自然的事。



图三 安阳殷墟出土商代玉簠

商周时期的纺织业已很发达，但纺织品很难保存，只能从一些残留痕迹上加以辨认。当时一般平民穿葛、麻织物，贵族则多穿丝织物。在石家庄附近的藁城台西遗址曾经出土一卷几乎全部炭化的麻织物残片，属大麻纤维，经纱由两股合捻而成，用平纹织法，密度不大均匀。其中一片的经纱为每厘米14~16根，纬纱为每厘米9~10根^①。商人喜欢用织物包裹铜器随葬，因此在随葬铜器的锈迹上往往可以看到织物的痕迹。在殷墟的妇好墓中，就有五十多件铜器上留有织物的痕迹，其中多数是丝织品，只有少量是麻织品^②。

商代丝织品最常见的织法有三种。一是普通平纹织，经线和纬线基本相等，每厘米大约30~50根；二是畦纹的平纹织，经线比纬线多一倍，由经线显出花纹，其中细的每平方厘米经72根，纬35根；三是文绮织，地纹是平纹组织，花纹则是三上一下的斜纹组织，由经线显花^③。妇好墓铜器上的丝织物痕迹至少有五个品种，即平纹绢、经朱砂染色的平纹绢、经重平组织的缣类织物、回形纹绮和罗类织物。其中大孔罗密度为每平方厘米经32根，纬12根，孔眼较大。经纬都是正手加捻，每米大约有1500~2000个捻，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绞经机织罗标本^④。

西周的纺织物也主要是丝、麻两类。过去在河南浚县辛村几座大墓中曾经发现丝织

①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88~89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17~18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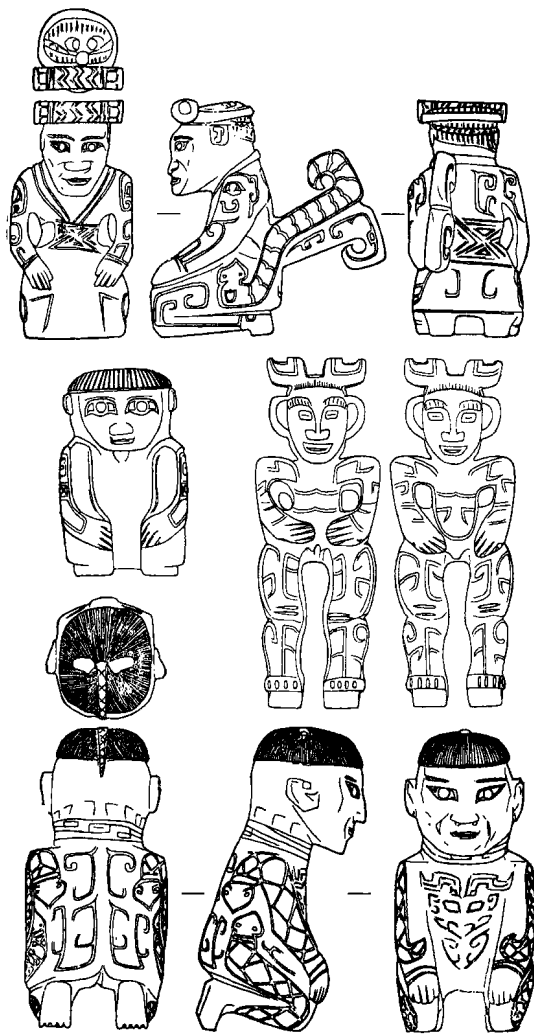
③ 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2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18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品印痕和麻布片^①。洛阳东郊摆驾路口的2号墓内四角发现有画幔痕迹，上面的图案有黑、白、红、黄四种颜色^②。陕西宝鸡竹园沟和茹家庄也出土了很多织物印痕。竹园沟有7座墓的铜器上有平纹丝绢包裹的痕迹，茹家庄一号墓死者尸体之下的淤泥中发现有平纹丝绢的绣品。刺绣法系锁线绣，绣圈每厘米10个，绣道宽2/3毫米。据推测原物应该是衾被之类^③。

商周时期的漆木业是很发达的。贵族墓的棺材上和车马坑的车子上多有用漆的情况。木质虽然已经腐朽而漆皮仍然能够保存。所用漆多为红、黑、黄、白等色，不少棺面漆红地黑彩、白地红彩或黑地红彩，花纹多云雷纹和夔纹等。日常用具中也常有漆器。例如殷墟侯家庄1001号王墓的圆形漆盘内就放置了7个漆豆，还有髹漆的“抬盘”。河南罗山县天湖墓地出土8件漆豆，内红外黑。漆器不论大小，都经常用几何形或动物形玉片、蚌片镶嵌，是一种高档的工艺品。

这个时期的骨器和象牙器制造业也很发达，许多城邑遗址中都有制骨作坊。例如郑州商城北的制骨作坊就发现有成千的骨制品和废料，其中除动物骨骼外还有不少人骨^④。殷墟花园庄南地的骨料坑中有兽骨数十万块，以牛骨为最多^⑤。陕西周原的制骨作坊（在扶风云塘）中的骨料和废品也数



图四 妇好墓出土玉人

① 郭宝钧：《浚县辛村》64、70页，科学出版社，1964年。

② 郭宝钧：《1952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9月。

③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强国墓地》上册654~656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④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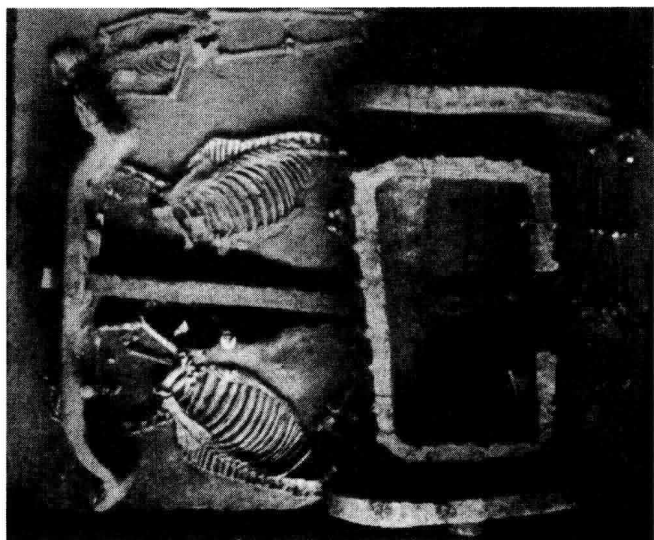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1期。

以万计，主要是牛骨，上面多有锯割的痕迹，同时伴出有铜锯和铜刀等。骨器制品通常有刀、凿、锥、镞、鱼镖、匕、梳、针、笄等，还有大宗动物形装饰品和镶嵌品。骨器作坊中还同时加工鹿角器和象牙器，仅殷墟所见象牙制品就有尊、簋、盂、杯、笄、梳等，其中有些是礼器，有些是高级工艺品。妇好墓出土三件象牙带柄杯，通体雕刻饕餮纹和夔纹，并且镶嵌许多绿松石片，造型典雅，是十分罕见的珍贵品（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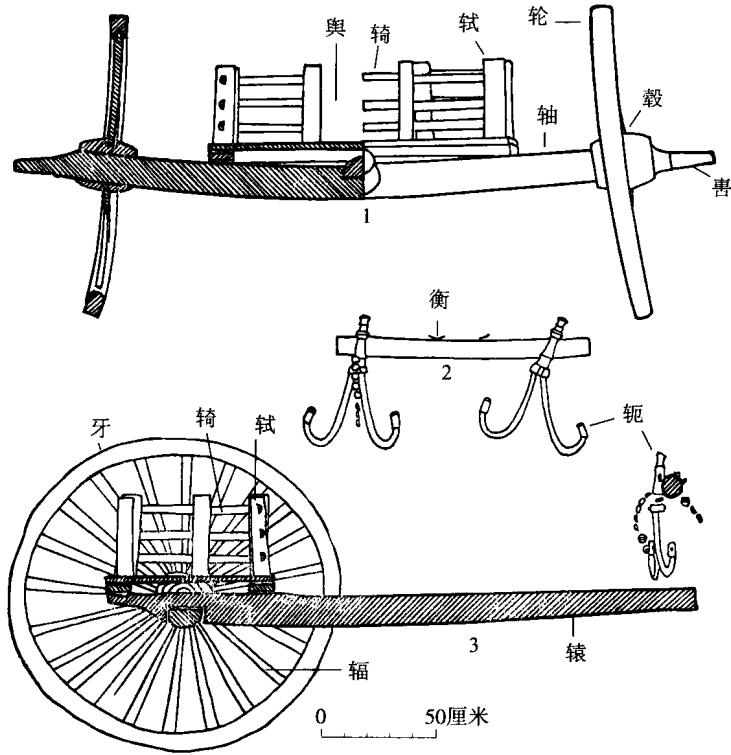
先秦文献中多有“奚仲作车”的记载。奚仲是夏代人，但是至今没有发现夏代的车。商周时期的车则有大量发现。据统计仅殷墟就已发现车马坑41座（图六），在殷墟之外的西安老牛坡、山东滕州前掌大、青州苏埠屯和山西灵石旌介村等地也发现有商代的车马坑。西周车马坑更是经常发现。一般都是一车二马，个别有一车四马的。有战车，也有乘坐的车。孔子主张“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说明商代的车子好坐，周代的



图五 殷墟妇好墓出土象牙杯



图六 商代车马坑（殷墟郭家庄出土）



图七 商代车的结构

衣服更讲究。商代的车都是单辕两轮，辕的前端置横木叫衡，衡两端置轭以便架在马肩上。辕的后端置轴，轴两端置车轮。辕和轴的上面置輿，也就是车厢。车厢的前面有扶手叫轳，后面是车门（图七）。制造车子需要有木工、金工、髹漆工、皮革工等多个工种配合，是当时手工业的杰作。

（原为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第四章第四节“青铜工业带动下的手工业生产”）

夏商周青铜文明的探研

李先登先生长期从事先秦考古学研究，论著不少。最近他将过去发表的论文辑成一书，名曰《夏商周青铜文明探析》，命我作序。我于夏商周青铜文明虽颇关心也有兴趣，但是从来没有有什么深入的研究。给先登作序，实乃狗尾“序”貂，于心有所不安。

现在治先秦史的人，除了必须有古文献的修养外，还要懂得考古学和古文字学，否则难以胜任。而治先秦考古的人也必须懂得古文字和古文献。先登是个勤快人，又是考古专业科班出身。从早年任职天津艺术博物馆和天津师范大学，到后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长期工作，数十年中，始终不忘田野考古，尽可能找机会参加一些田野考古工作，同时又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博物馆藏品和古文字与古文献的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夏商周青铜文明是个很庞大而复杂的研究领域，先登的研究比较重视这个文明的起源，包括城市的起源、文字的起源和青铜器的起源，以及这个文明的某些重要内容。这些都是当前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近年来研究者甚多。从表象上来看，各家的观点颇不一致，实际上差别并不很大。例如就进入文明的时间来说，目前主要有夏代说和龙山说，也有把时间定得更早或更晚的，乍看起来相差很远。但实际上，龙山说者并不认为当时已有成熟的文明，只不过是说当时的社会有了明显的分化，出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机构也就是国家的雏形，从而区别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或原始共产制社会。而夏代说者并不认为夏代的文明是一个早上突然出现的，在夏代之前还有一个长期的酝酿、转变的过程，龙山时代则是这个过程的关键时期。主张文明起源更早或更晚的也并不否认这些基本事实。这里固然有对文明概念的理解问题，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对考古资料的揭示、评价与解释的问题。先登基本上是夏代说者，但是他对龙山时代和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倾注了特别的关心，力求使自己的立论符合实际情况，而不至于犯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毛病。

由于对文明起源时间早晚的认识不同，从而对文明起源的地区与模式的看法也不相同。夏代说者强调中原的突出作用，认为中国早期文明基本上是一元的，但并不否认它

的起源除中原以外还有其他地区的多方面的影响。龙山说者强调起源的多地区性和文化多元的特点，同时指出多元文化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有显著的相互作用和逐步趋同的倾向，只是在进入夏代以后中原的中心作用才逐渐形成，因而主张起源的多元一体模式。

文明起源有一个过程，经历的时间相当长，可划分为若干阶段，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但文明究竟有没有一个标准，进入文明社会是不是应该有个标志，是不是可以根据某些标志的出现来确定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则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就中国而言，城市、青铜器和文字的出现似乎就是这样的标志，所以一些学者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应该是有意义的。读者不难看出，本书的作者是重视这些标志的，并且分别进行了研究和探索。鉴于目前考古资料还不能说是很充分的情况下，有些研究还属于探索性质，这是大家都容易理解的。相信今后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问题会日益明朗起来。那时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也必然比现在深入得多，必然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

先登治学态度谨严，他认为有把握的问题便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自己不熟悉的问题就设法向有关人士请教。例如三星堆青铜器的年代问题，除了注意从形制和花纹的比较研究以外，还特别注意到制作技术的特点。前者是自己熟悉的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当然是比较有把握的；但他觉得还不够，还必须从制作技术方面进行观察，必须虚心向有关专家求教。他是这样做的，从而得出了单是从类型学角度所得出的不尽相同的结论。不管这一结论是不是还有商榷的余地，这种治学的态度和精神却是值得大为提倡的。

（原为李先登著《夏商周青铜文明探研》序，科学出版社，2001年）

陈振裕的楚文化与漆器研究

陈振裕同志将自己多年撰写的学术论文选编成集，要我在卷首写几句话，我欣然应允。

早在大学期间，我曾忝为振裕的老师，带领他所在的五九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赴安阳殷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当时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天资不算很高，却十分勤奋好学，这是一个人获得成功的宝贵品格。记得那时国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实习队的生活非常艰苦，发掘工作又非常紧张。队里安排休大礼拜，两个星期才有一天洗洗衣服，料理一下个人的事情。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公休日，他也不放过学习的机会，和另外两个同学找了我一同到洹河岸边进行考古调查，接连发现了好几处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代的遗址，有的还有不同时期的文化层相互叠压的地层关系。实习的时候如此，平时在班里也是找老师请教最勤的一个，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被分配到湖北省博物馆工作，仍然和我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之间是比较了解的。

振裕在湖北省从事考古工作一晃就是 37 年了，从一名普通考古工作者，成长为一名全省考古工作的领导者，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其间经历了多少艰辛是可想而知的。按照他自己的意见，他的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时期：20 世纪 60 ~ 70 年代是打基础的时期，80 年代是主动按一定课题进行考古研究的时期，90 年代以来是抓重点和出成果的时期。这不但符合学者成长的一般规律，也是与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包括我国社会大环境的变迁息息相关的。不过在同样的社会环境条件下，有的人能够不断前进，有的人则少有成绩，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在 20 世纪 60 ~ 70 年代，不但生活艰苦，还会有政治上的无形的压力。早先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你不积极参加，至少会说你只专不红；接着是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那是每个人都很难逃脱的一场浩劫。振裕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坚持学习，坚持下田野，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记得有一次他在云梦发掘汉墓，我到他的工地去视察，窄小的房间搁一扇铺板，既当床又当工作台，其余的地方放满了用于发掘的工具、仪器，还有许多图纸和各种资料。饭食十分简单，多少天也难得洗一次澡。其实这种情况在别的工地也是差不多的，振裕却很少考虑生活的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考虑多也没

有用，就一心扑在工作上。他动作麻利，把工地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发掘完了，好多器物都修复好了，甚至图都画好了，资料也整理得差不多了。一个不大的工地，采取这种短平快的方式是很必要的。从单位来说避免了资料的积压，从个人来说可以从资料的及时整理中不断地得到提高。在省级考古单位，工作很难单打一，你不能说只能研究某某时期的考古，别的时期我不熟悉做不了；也不能够说只会做田野考古，筹备展览或者举办培训班之类的事做不了。往往是有什么事做什么事。这种情况多了，会使人难于集中精力；但如果调理得当，又可以是一种全面的锻炼。振裕正是由于长期坚持田野工作，又得到其他方面的锻炼，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才干和见识，才能做到厚积薄发，到后来抓课题时能够得心应手，在同代人中获得了较多的成果。

陈振裕是福建人，初时在湖北省工作，遇到困难不免产生思乡情绪。但既然命运让他长期待在湖北，那就只有铁下心来做好工作。在湖北做考古研究，课题自然是很多的，而最大的课题当数楚文化研究。虽然他参加的田野工作上自旧石器时代下迄明代，毕竟做得最多的是楚文化遗址和墓葬。这样他把楚文化作为重点研究的课题也就是很自然的了。振裕研究楚文化是从楚墓的研究开始的。早在到湖北省工作之初的1965年他就参加了江陵县望山和沙冢楚墓的发掘，从1980年撰写的《湖北楚墓综述》开始对楚墓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同时着手对早期楚文化的探索，进行了许多富有成果的调查。尽管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解决的，但是他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工作至少为更深入的调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此后，他为了更深入地研究楚文化，便分门别类地进行了多方面的专题性研究，其中涉及楚国的漆器工艺和装饰艺术、竹器手工业和竹器的装饰艺术、曾楚关系、秦楚关系、楚与吴越的关系以及东周楚城的研究等等，其中不少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在楚文化的研究中，城址的勘探与发掘较之墓葬的勘探与发掘更为重要，难度也大得多。在墓葬的考古研究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城址的研究自然会提到日程上来。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城，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调查的结果来看，数量都是很多的，在当时各诸侯国中也许是首屈一指。振裕参加过一些楚城的发掘和勘探工作，并且按层次等级进行过综合研究。尽管限于当时的条件，其研究还只能是初步的，但是他的思路和方法都是正确的，从而为今后楚城的进一步研究，乃至对于整个楚文化的研究都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振裕的研究是多方面的，除了楚文化的研究是重点外，对于漆器、先秦乐器和乐制以及农业考古等方面也有几篇力作值得一读，这里就不用多说了。他虽然已届耳顺之年，然精力旺盛，又勤于劳作，应该有更多和更好的研究成果问世。这是我个人的期望，相信也是广大读者的期望！

段宏振关于赵都邯郸的研究

在东周列国中，赵国的历史是较短的。邯郸是赵国后期的都城，从公元前 386 年到公元前 228 年，只有 158 年，但在历史上的知名度却不在其他国都之下。这不仅是因为邯郸城市本身颇为独特，更是因为在这里或以这里为中心曾经发生过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演绎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

赵国历史上最为人传颂的当为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此国力大振，屡征中山、楼烦、林胡等所谓胡人的国家，拓地千里，使赵国一下子成为不可小觑的强国，成为秦始皇统一六国进程中最大的障碍，可惜长平一战被秦军坑杀了四十多万将士，从此元气大伤。诸如廉颇、蔺相如的故事也是千古传颂。这些引起人们对赵都邯郸城的极大兴趣。

赵都邯郸城的遗迹中保存得比较好的是赵王城。记得我 50 多年前在邯郸考古实习时，曾经不时到赵王城的龙台上眺望，体验赵国都城的雄伟气派。登上丛台想体验一下赵武灵王检阅骑士的威风。还几次到插箭岭、梳妆楼和照眉池一带徜徉，发思古之幽情。以为插箭岭是当日胡服骑射的打靶场，梳妆楼和照眉池是宫女们梳妆打扮的地方，不管那些遗迹是否真实可靠，更不知道它们的年代是否合得上拍，可见那时了解的古都邯郸实在是太少了。现在通过多年的考古和不懈的研究，特别是对大北城和周围相关城镇的发现与研究，以及赵王陵的考古研究等，使得对赵都邯郸的了解有了飞跃的进展。段宏振的《赵都邯郸城研究》就是最好的说明。

本书全面总结了历年考古工作的成果，包括最近发掘勘探与航空测量的成果，并尽可能在现有认识的基础上给予必要的解读。赵邯郸故城除了王城的东城和西城外，绝大部分都已被现代城市所覆盖。考古工作只能随机地跟着街道或工厂的建设工程零敲碎打地去做。如何把这些发现有机地联系起来，是非常困难又必须努力去做的。如果没有全局的观点，就难以正确阐明那些零星发现的遗迹遗物的性质与作用。本书用了很大篇幅把大北城的真实面貌大致显现了出来，并且把大北城与王城等有机地联系起来。认为“大北城在建都之前完全代表着邯郸城，建都之后以王城不可替代的重要方面继续代表着邯郸城，废都之后大北城又继续全面代表邯郸城”。一个几乎完全被历史的尘埃所湮灭的大北城，第一次被提到了应有的地位。由此一个真实的邯郸城的全貌才基本上显现

出来。

作者本来是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他发表的有关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论文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好评。前不久出版的《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便是一部具有相当水平的发掘报告，并且通过对相关遗存的深入研究与全局性考虑，提出了所谓“文化走廊”的概念，说明作者具有相当的理论概括能力。由于作者长期担任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业务领导，自然不能局限于新石器时代考古，而必须有全局的把握。对以邯郸为中心的赵国的考古工作也是他关注的重点之一，并且主持过邯郸城址和赵王陵的部分发掘、调查与航空摄影等工作。正是因为他对新石器时代考古有较深的研究，很自然地将其中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也运用到邯郸考古研究中来。例如作者运用聚落考古的理论，系统地考察了邯郸如何从一个普通聚落逐步演变为地方性中心城镇。这里有着便利的交通，发达的采矿冶铁业和商业，还有丰富而颇具特色的文化娱乐生活，并且成为晋国赵家悉心经营的政治据点，三家分晋后遂成为赵国的都城，在秦汉时期统一王朝下邯郸角色有所变换的情况下，又如何作为一个地方都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把问题说清楚，作者全面考察了邯郸初起时沁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以及发展为都城时期的更大范围的环境，包括地形、地质、水文、交通、动植物资源和矿业资源等诸多方面。同时又用更多的篇幅考察赵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发展对聚落形态的影响，或者反过来从聚落形态演变的情况来考察不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在这方面，作者就不限于考古资料而大量引用文献资料，并且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是既有历史的真实感（考古发现的实物都是古人所做所用的实物的遗留），又有比较浓郁的人文生活气息，这两种资料天然的缺陷与不足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补。

作者特别注意到作为都城的邯郸的凝聚作用和辐射作用，这也是聚落考古的应有之意。因此本书的研究就不限于邯郸城本身，还分几个层次详细考察了周围广大地区的几个聚落集群的情况，特别是这些聚落集群与邯郸城的关系。如果把邯郸城本身的核心区作为第一个层次，那么近郊的聚落就是第二个层次。这些聚落主要分布在西郊和西南郊，其生活应该与邯郸城密不可分，自然也就成为邯郸贵族墓地的主要分布区。赵王陵则分布在西北郊区较远的地带。第三个层次是远郊的城镇，主要有西边的固镇—午汲集群区和北边的阳城集群区。其中固镇—午汲集群区发现有10座城镇遗址和近40座普通聚落遗址。由于附近有丰富的铁矿，邯郸又以冶铁业著称，邯郸城内也发现多处冶铁遗址。史载“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富埒王侯”。所以这个集群区应该是一个采矿和炼铁的中心，又是通往西方的门户。其中有些城址位居洺河上游，附近没有普通聚落，可能是扼守交通要道的军事性城堡。在阳城集群区中，阳城本身有较大规模，又处于南北交通的要道，作者推测可能是赵国的副都或陪都。更远一些的第四个层次有柏人、邢台和

北界城—讲武城集群区。柏人是赵国北方的重镇和门户。邢台遗址面积极大，作者认为也可能是一个副都或陪都。讲武城滨临漳河，遗址规模甚大，是邯郸的南大门，有人推测可能是赵国早期的都城中牟。这样以邯郸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超大型聚落群体。这种情况既是赵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赵国之所以强盛的物质基础。

关于邯郸都城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应该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来考察。作者注意到邯郸都城的布局甚为特别，但并非一次形成，而是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其实东周的大部分都城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并不是一次性规划的产物。为此他把东周列国的都城一一做了考察和比较，将其区分为单城制、双城制、组团式多城制和多层次的多城制四种类型。后二者各仅有一例，即晋国的新田和赵国的邯郸，实际上无所谓类型。几个双城制都城的具体情况也各不相同。从而打破了那种认为东周时期流行宫城与郭城的所谓两城制的传统看法，是很有说服力的。作者进一步探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东周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大有关系。因为东周是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转变的时期，铁器的广泛应用大大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兵器的改进。各地诸侯凭借自己的实力称霸一方，互争雄长，先后推行各种改革，打破以宗法制为基础的传统制度。商人和士人的兴起大大改变了城市生活的内容，思想的大解放造成文化的多元发展与繁荣，反映在都城设计思想上也就出现了不拘一格、多元发展的繁荣景象。

在古代文明研究中，城市考古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我国的城市考古虽然有多年的历史，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对都城全方位的个案研究还很缺乏。本书关于邯郸都城的研究不但视野开阔，方法新颖，而且多有创见，可以看做是铺路之作，为古代都城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原为段宏振著《赵都邯郸城研究》序，文物出版社，2009年）

八 科技考古及其他

自然科学与考古学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她的前身考古专业，早在1973年就开设了科技考古课程。但名称几经变动，有时叫现代科技与考古，有时叫现代科技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最后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名称科技考古学。这反映我们对于学科性质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一时还把握不准。

我个人认为，科技考古教学的目的，不在于让学生掌握多少技术，而首先是要让学生了解科学技术对考古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关注科技考古的最新信息，同时要培养考古人员的科学素质，掌握一定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按照科学的程序去处理资料、提取信息；研究各种信息之间的联系，从而推导出有科学根据的考古学结论。我认为整个考古教学都要贯彻这个精神，科技考古学更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讲清楚这个问题，还得从考古学的学科性质讲起。

考古学是依据古代人类社会留下的实物遗存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从学科目标和研究的主要内容来说，无疑属于历史学科。但考古学不是传统的历史学的自然延伸，传统的历史学不能直接产生考古学。考古学也不是金石学或古器物学的直接延伸，从金石学或古器物学也不能直接产生考古学。考古学的产生，是在历史学的发展提出了寻找新的证据和拓展研究领域的要求，在地质地层学和生物分类学初步形成的学术背景下，借用二者的基本原理，并且依据人类历史文化遗存的特点而加以改造为考古地层学（或层位学）和考古类型学（或标型学），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了测量、绘图和照相等技术，后来又引进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圈理论而改造为考古学文化的理论。只有具备了这些基本理论和操作技术，考古学才真正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而得到学术界的承认。这说明考古学的产生就是同自然科学技术的应用分不开的。此后考古学的发展，不但依赖于考古工作的开展和资料的积累，依赖于相关理论和方法论的探索，更有赖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

随便举几个例子：

人类的起源应该是历史学关心的头等大事。因为有了人类才会有人类的历史。可是传统的历史学完全无法解答这样的问题，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引述女娲造人或上帝造人

的神话。19世纪中叶在西欧多处发现人工打制的石器与已经灭绝的动物化石共存，德国莱茵河畔还发现了远比现代人原始，但显然不是猿类的尼安德特人。后来在欧亚大陆多处发现了比尼安德特人更为原始的猿人即直立人，证明人类本是由某种类人猿进化而来，上帝造人的神话便不攻自破。但人类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由何种猿类进化而来，是单一起源还是有不同的起源，仍是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东非发现了一系列原始人类的化石，并且往往与人工打制的石器共存。他们的脑量平均只有631毫升，被命名为能人。用钾氩法测量的年代大约在距今200万年前后。研究表明，他们是从某种南方古猿进化而来的。解剖形态和文化比能人更为进步的是直立人，也是以东非发现最多，年代最早。他们的脑量约在848~1067毫升之间，年代约在180万~40万年之间，但似乎不是能人的直接继承者，而可能是从另一种南方古猿进化而来。直立人在欧亚大陆有着广泛的分布，但目前还缺乏他们比东非直立人为早的确实证据。此外，作为人类直接祖先的南方古猿至今也只有在非洲发现，这样就产生了人类非洲起源说。假如没有科学的测年技术，仅仅依据人类化石形态是否原始来进行排比就缺乏说服力。近来一些学者根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提出现代人的祖先竟是非洲的一位“夏娃”。尽管还有许多疑问，需要与相关学科作进一步的研究。但能像这样提出问题在过去也是不可想象的。

农业起源曾经是引领人类文化大踏步前进的一场革命。传统的历史学也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只好用神农氏教民稼穡一类的神话充数。单靠农学家也无法正确解答这个问题，需要有多种学科的合作，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例如对稻作农业起源的认识就走过了一条颇为曲折的路程。过去农学家根据栽培稻谷的形态认定其野生祖本是普通野生稻，又根据普通野生稻分布比较集中的情况推定栽培稻起源于印度或东南亚或我国的华南地区，前些年山地起源说又盛极一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长江流域，因为那里只有很少野生稻的记录，是普通野生稻分布的北部边缘。但是近年来在长江流域发现的史前栽培稻遗存十分丰富，不但相关的遗址数量最多，经过碳-14测定的年代也最早，其中最早的标本可达一万年以上，而且连绵不断。至此长江流域起源说和边缘起源论便得以成立。稻谷的植硅石分析和基因分析也支持这一结论。

陶器起源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过去认为日本文化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以致把日本绳文文化陶器的年代推定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后。可是碳-14等方法测定的年代却早到公元前一万年以前，是全世界陶器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比一向被认为文化进程最先驱的西亚地区的陶器烧制要早好几千年。

我国的原始瓷最早见于商代，包括中原地区的郑州商城、小双桥及长江以南的江西吴城等遗址。到底哪里是原产地，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单靠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难以给出明确的回答。本书（《科技考古学》）作者曾经用中子活化分析方法测量各地原始瓷片

中多种微量元素的含量，并用多元统计中的判别分析方法来进行产地溯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中国最早的铜器到底是自行发明的还是由西方传入的，还是两者都有可能，是学术界颇为关心的热门话题。这问题的解决一要靠新的考古发现，二要靠相关科技的测试与分析，离开科技手段是难以得到正确认识的。

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现代科技对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记得曾经帮助利比（W. Libby）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碳十四实验室，后来又长期主持费城大学博物馆考古学应用科学中心（MASCA）的奈内（F. Rainey）于1974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回顾25年来科技考古的成就时，特别讲到由于碳-14等测年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人们关于人类在冰河时期的生存、农业的起源、陶器的发生以及新大陆的文化发展的一系列传统观念，对人类历史的年代结构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①。那还是早年的事。从那以后，科技考古又有长足的进展。前不久出版的伦福儒和保罗·巴恩所著《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②，是享誉世界的考古学教科书，其中有大量篇幅和个案研究介绍科技考古的方法和所取得的成果，可说是现代考古学的代表作。从中可以看出现代科技的广泛应用，如何大大改变了考古学的面貌。

时至今日，无论是考古学遗存的发现、勘探、发掘、资料整理、标本测试分析、考古资料库的建立还是有关研究软件的制作，几乎都离不开相关的科学技术。这已成为当今考古学发展的大趋势，使我们有可能从看似平常的考古遗存中提取越来越多的科学信息，极大地拓展了考古学研究的领域，也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过往历史的认识。认识到这个大趋势，并且在考古学研究中大力推行是十分重要的。只有这样，考古学才能跟上现代科学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强考古学研究的科学基础，提高考古学研究的水平。

陈铁梅教授长期从事科技考古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在我国高等学校中开设科技考古学课程的第一人，是推进我国科技考古事业发展的著名学者。他具有深厚的现代物理学基础和广博的自然科学技术知识。他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领导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液体闪烁法碳十四实验室，实验室后来又建立了铀系、电子自旋共振和碳十四加速器质谱等多种测年方法，扩展为考古与第四纪地质年代实验室。以此为基础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年代学，以及科技考古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他同国内外科技考古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不断捕捉科技考古的最新信息，还多次到国外著名的高等学校和实验室进行研究。由于他长期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工作，能够比较深切地了解考古学的特点和考古学对现代科技的实际需求，这方面他具有较大的优势，也充分地反映在本书的内容上。

^① Froelich Rainey, *Science and Archaeology*. *Archaeology*, Vol. 27, No. 1, 1974/1.

^② 伦福儒等：《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4年。

本书是作者在多年教授科技考古学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参阅国内外大量科技考古方面的资料，重新整理研究，集中精力写作而成。文笔流畅，可读性强。章节的安排大体上依据考古学科的需要，每一专题都介绍有哪些科技手段或测试方法可以利用。哪些方法比较成熟，哪些方法有待改进，哪些方法虽不完善但可能具有较好的发展前途。具体讲到某种方法时则着重阐述基本原理和国内外实际应用的情况，同时尽可能避开某些纯技术性的内容。作者认为这是读者正确理解科技方法的适用范围、条件和局限性，正确解读有关测量数据的基础。这个看法是非常正确的，也是本书贯穿始终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书稿在我的案头放了很久，我看了又看，爱不释手，从中获得了许多教益。相信本书的出版将不但有助于提高科技考古的教学水平，就是对于一般考古学者科学素质的培养，了解科技考古的重要作用，使其更加自觉地与科技人员合作，运用科技考古的成果以提高考古学研究水平，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原为陈铁梅著《科技考古学》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在第六次全国科技考古会上的讲话*

一 为什么讲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不新。记得 20 世纪 70 年代初我就看过一本题目叫《科学与考古学》的书，那里面的科学自然是指自然科学，内容主要是讲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实际上就是讲的“科学技术与考古学”。后来这个题目还有很多人在做，以至于出现了一个考古学的分支，叫做科技考古。

现在科技考古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我们有科技考古学会，中国科技大学有科技考古研究室和科技考古专业，全国性的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已经开过五届，现在是第六届了，有关科技考古的书刊也逐渐多了起来。考古学家在改善探察技术、进行标本测试、成分分析和年代测定等方面离不开有关科技界人士的合作，同样不少科学技术界的朋友也乐于同考古学家合作，双方在合作中增进相互的了解，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这是非常好的令人鼓舞的现象。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合作并不理想，总是觉得各是一张皮，不大容易磨合。我想这里有不少实际的问题，也有一个认识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科技考古，科学技术与考古学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是不是把科学技术应用于考古工作和研究就是科技考古？恐怕很多人没有深究。说实话我个人也没有什么研究，只有些体会和肤浅的看法，不揣简陋提出来讨论，希望得到各位的指教。

二 考古学发展的历史

考古学是研究历史的。历史学有悠久的历史，相比之下考古学显得十分年轻。但是考古学并不是历史学的自然延伸。从历史学不能直接产生考古学。人们往往把金石学和古器物学看成是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和古器物学发生得比较早，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从金石学和古器物学也不能直接产生考古学。

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或科学的考古学产生于 19 世纪中叶，是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

* 2001 年 11 月 1 日于广州。

出现之后，借用二者的方法和研究成果才得以建立的。最早的考古学是史前考古，最早的考古学家多是地质学家，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后来把史前考古的方法应用于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才形成一个完整的考古学学科。以生物学为基础提出的进化论是指导许多自然科学的理论，对考古学也有指导意义；考古学中的三期说和类型学方法，都是建立在进化论的思想基础上的。同时考古学的实践也丰富了进化论的内容。

考古学研究的实物资料主要是人类活动的遗留物，要通过这些实物遗存来研究人类的历史。因此它不能完全以自然科学的理论来解释一切，还必须有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关于考古学文化的理论就是从文化人类学中借用过来的。历史学的理论当然也是不可回避的。因此考古学一开始就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是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交叉的产物。

在科学的考古学出现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学科研究的内容、理论、方法和运用的技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方面是由于相关人文学科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学说不但影响了历史学，也深深地影响到考古学。这不仅在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等所谓东方国家的情况是如此，就是在西方也有相当的影响，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柴尔德的研究就是最好的说明。同时西方在历史学、文化人类学乃至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的一些理论也影响到考古学。另一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以碳-14测年为嚆矢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更是大大改变了考古学的面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没有钾氩法等测定远古年代的方法，也没有从化石中检测人类基因的方法，现在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和假说就无从产生，或者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假如只是按照传统的考古学方法，没有碳-14等测定年代的方法，没有农学家、遗传学家和环境科学等方面的学者参加，要研究农业的起源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人类起源和农业起源这一类的课题乃是研究人类历史的最重要的课题，于此可见自然科学的应用对于考古学和历史学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一般的说，科学技术的具体应用比较容易见成效，其重要性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其实自然科学理论的运用也很重要，例如近年来流行的系统论在一些考古学流派的著作中也有一定的体现。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方面的广泛应用，出现了许多过去从来没有或者仅有萌芽的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例如从遗址的发现与勘探就产生了航空考古、遥感考古、水下考古、地质考古等；从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来看则有所谓实验室考古、环境考古、农业考古、科技考古、陶瓷考古、冶金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等，可以说是不一而足。其结果不仅是大大拓展了考古学研究的领域，而且大幅度地提升了考古学研究的深度和准确度，提升了考古学科学化的程度，从而使考古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我认为这是一种划时代的变革，从此进入了现代考古学的时期，在此以前则可以划入近代考古学的范围。很显然，这一变革的实现也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互交叉的结果。如果没有自然科学的广泛参与，这一变革的实现是不

可想象的。

三 考古学的特点和研究方法

什么是考古学？人们有各种大同小异的回答。准确一点说，考古学是研究如何发现和获取古代人类遗留的实物遗存，以及如何通过这些实物来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这里的两个如何都包含了一定的理论和方法论。

考古学是怎样进行研究的？考古学研究的实物遗存绝大部分被历史的尘埃淹没了，怎样才能发现？一靠我们对于不同时期不同性质遗址分布规律的认识；二靠实地的勘察，特别要依靠各种科技手段，例如电磁探测、航空考古和水下考古等。如何获取资料？调查本身可以获取一部分，如果要得到详细而准确的资料就要靠考古发掘。考古发掘的方法论是地层学，它是从地质学中的地层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考古发掘的实际操作，包括测量、记录、绘图、照相和提取标本等等几乎全部是技术性的。考古资料整理工作中的方法论主要是类型学，它是受生物分类学的启发而发展起来的。整理工作中的统计、修复、测试、鉴定等许多工作也是技术性的。只有进入到考古学文化和历史问题的研究时才是属于人文科学的。我们不能只要前面一半而不要后面一半，否则就成了无学术目标的考古匠；也不能只要后面一半而不要前面一半，否则就会坐而论道，虚无缥缈，不着边际。有些人被讽刺为安乐椅中的考古学家，毛病就出在这里。

考古学研究的内容是什么？说考古学是研究历史的，或者说考古学是一门历史学科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考古学研究的历史跟一般人理解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一般人理解的历史或者说狭义的历史是以文献为基础的，而人类发明文字的历史不过四五千年，人类自身的历史却长达二三百万年；早年进入文明的地方也很狭小，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百分之一二；文献记载的历史多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制度史和杰出人物的历史，比较少涉及经济史、科技史和普通群众的历史，即使讲到科技史方面的问题，由于没有实物验证，有时难以得到正确的理解。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些局限，它研究的是比较完全的历史，是大历史，其中也包括某些自然科学的历史。考古学也有很大的局限，因为人类历史并非都是由实物解读的，而实物经过千万年风风雨雨能够保存下来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其中能够为考古学家发现和发掘的又只占极少的一部分。用这么少的资料来说明历史，需要有科学的复原。能不能复原，或能不能做到科学的复原，是测量考古学水平的试金石。由于考古学研究是以实物为基础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研究还可以不断深入，在同样的实物里可以提取更多和更加准确的信息。这是区别于文献史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个特点，不断关注科学技术与考古学之间可能的结合点，认真地进行实验和研究，使得考古学可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四 考古学人才培养的效果

考古学研究的历史很长，研究史前考古要加强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训练；研究历史考古除了要加强文献学方面的训练以外，也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训练。过去大学的考古专业设在历史系，对于明确学科性质和加强文献学训练有一定作用，但自然科学和技能的训练不足。有鉴于此，一些考古专业从历史系独立出来成立考古学系，调整了课程，加强了实验设备，情况好了一些。旧石器时代考古放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而没有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学生更加应该加强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训练，否则按传统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越来越难以胜任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任务。

五 结论

考古学是在自然科学的推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历史学科，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历史学科的特性，大幅度地扩展了研究的内容，是历史学科的一场革命。今后要发展考古学，就必须充分认清考古学科的性质和特点，除了要注意与相关人文学科的联系与整合，还必须加强与自然科学的沟通，借用自然科学中有关的理论和办法，积极运用新的科技手段以提高考古工作和研究的水平。

（原载《科技考古论丛》第三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3年）

现代考古学研究方法之一：定量考古

陈铁梅教授积二十多年从事定量考古学的研究心得和教学经验，老当益壮，以惊人的毅力写成了《定量考古学》一书。他拿着厚厚的一叠书稿给我，命我作序。我虽然不懂数学，看他的书稿也有些吃力，但仅凭一点数学常识也知道定量分析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所以很乐意在这里写几句话。

在人文科学中，考古学是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和数学方法最多的一个学科。考古学是通过实物资料来研究历史的。所有实物资料都是有形和可以量度的，量的关系乃是各种事物之间十分重要的关系。通过量的关系的考察可以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特征，这是定量考古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由于考古学研究的人类历史跨越数百万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反映人类社会历史的实物遗存不断积累又不断遭受自然与人为的破坏。考古学家的任务就是根据残剩下来的实物遗存来尽可能地再现已经消逝的历史。实际上这只是一个不断追求的学科的目标，要真正做到谈何容易！可是考古学家和相关的学者就是那么锲而不舍，孜孜以求，运用各种方法，包括数学方法来进行探索。残剩的实物遗存绝大多数已经掩埋在地下，需要考古学家去寻找。寻找固然要有一定的方法，更需要一个过程，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你不可能把所有实物遗存都找到，找到的部分跟实际存在的部分是个什么关系？这里便有一个概率问题。实际存在的部分跟被长期破坏之前原本应有的部分又是什么关系？这也有一个概率问题。根据找到的遗址固然可以研究某些历史问题，但要了解得清楚一些或真实一些就必须发掘。你不可能把所有找到的遗址都发掘完，选择哪些遗址进行发掘以及发掘遗址的哪个部位，在一定程度上说是随机的。发掘的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遗址的整体情况，还是有一个概率问题。

在整理资料进行器物排队和分期研究时也常常遇到概率问题。比如有两种器物共存，我们说二者有同时的可能性，如果有两次、三次共存，就意味着同时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共存的次数再多一些，意味着同时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或者用很可能、十分可能、非常可能等词语来加以说明。共存的次数达到一定数目，我们就说二者可视为同时或就是同时。这当然也是一个概率问题。我们用的词语再丰富也总是有限的，不够确切的。如果用数学逻辑来思考并用数学语言来表述就会明确得多。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

降水概率为 80%，而不用说有很大可能性，就是这个道理。不过我们要明白的是，概率表述再明确也是统计性的而不是绝对的。降水概率 80% 自然不是降 80% 的水。回过来说用共存关系来判断同时性的问题。如果有三件或更多的器物共存，只要重复一两次，凭经验就可以知道它们同时的可能性非常大。共存的器物越多，需要重复的次数越少。为什么会是这样，道理很难说清楚，可不可以用概率统计来加以说明呢！

其实考古学研究中需要运用数学的地方多得很，方法也不止概率统计一项。所有实物遗存都需要测量。大到遗址的形状大小及与其他遗址的关系，遗址中房屋、灰坑、窖穴、墓葬、城墙、壕沟、道路等等的形状大小、分布状况及相互关系，小至一件器物的形状、大小、厚薄和各种比例关系，人体和动物骨骼测量中的各种数据和比例关系等等，都可能并需要用数字、图表和必要的运算来加以说明。许多难以直观做出判断的事例，通过数学演算就可以有比较清晰的认识。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数量关系都可以通过初级的四则演算就解决问题的，这就需要考古学家学一点数学，学一点数理统计的知识。现在已经有一些学者试图用数学方法来研究考古学中的一些问题。例如对某些器物的类型学研究，对史家等地墓葬分期的研究，区域调查中对大量遗址及其关系的多角度研究，通过对陶瓷器或青铜器化学元素包括微量元素组成的数值变量来追溯原料产地的研究等等，都进行过一些有益的尝试。在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和地质考古学的研究中更是离不开数学方法。这些研究有的明显深化了原本的认识，有的更是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但也有一些研究与传统方法得出的结论不一致，甚至与常识相悖。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不同的原因，而大多数情况是对考古资料的性质认识不清，运算的前置条件设置不恰当，或者不适于用某种数学方法来处理。因此一些考古学上的问题能不能用数学方法处理，或者用何种数学方法来处理，也是考古学研究本身的问题。本书作者一再呼吁考古学家要学习和掌握基本的数学方法，正是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发出的肺腑之言。

本书针对大多数考古学者不甚熟悉数学方法的情况，从基本概念讲起，由浅入深地讲述考古资料定量研究的各种方法。每种方法又着重讲述基本原理、应用范围和应用方法，讲明应用这些方法的前提条件，同时说明要正确解读定量分析的结果。所有这些都结合了考古学研究中的实例，读起来不觉得枯燥和深奥难懂，反而令人有似曾相识或恍然大悟的感觉，能够引发人们运用数学方法的兴趣和自觉性。作为一部专著，本书很好地总结了我国定量考古学的进展情况、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同时介绍了国外的有关情况以供参考；内容充实，逻辑严密，图表配合也很好，在国内是第一部全面论述定量考古学的力作。

作为一部教科书，本书比较全面地讲述了定量考古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包括使用相关软件的方法，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书末还附有相关的习题，非常切合高等学校的

教学和有一定基础的考古人员的自学之用。我希望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提高考古专业的定量考古教学水平，同时吸引更多的考古人员学习和掌握定量考古学的方法，促进我国定量考古学的发展，最终为提高我国考古学研究的水平而作出贡献。

(原为陈铁梅著《定量考古学》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年

——考古学评论*

首先，请让我感谢东道主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参加“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成立七十周年的盛会，能够向各位著名的学者学习和交流心得，是我的荣幸。不过，让我担任考古学的评论人，心里有些惶恐不安。因为从史语所成立到现在都在这个机构工作，学术造诣极高，又最了解史语所考古组发展情况的老前辈石老璋如先生在座，应该由石老来做评论才是最权威的。现在让我坐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有些不安。如果有讲得不对的地方，请石老和各位同仁不吝指教。

刚才听了几位先生的精彩报告，特别是臧振华先生的主旨演讲，很受启发。臧振华先生在台湾和东南亚都作过很多考古工作，对内地的考古学也比较了解。我昨天拿到他的文章，粗粗翻了一下，觉得用了不少工夫，写得不错。后来才知道他原来并没有什么准备，是临时赶出来的。原来这个主旨演讲是安排由张光直先生来作的，因为健康关系医生不让他来，才改由臧振华先生来做。当时臧先生在伦敦，手头没有什么资料，多半是靠记忆，一个多礼拜就写出来了，没有相当的学术功底是办不到的。臧先生报告的中心意思是解决中国考古学的传承与创新问题，这是很多学科都会遇到的问题。事实上史语所的创立就是解决中国学术传承与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当时在傅斯年先生主持下，一方面注意继承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又大力推行学术的现代化，开拓了许多新的学术领域，在全国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史语所七十年的历史实际上是不断地解决传承与创新的历史。我们的考古学发展到现在，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会有一些不足之处，需要好好地总结，找出继续前进的方向。现在面临世纪之交，各门学科都在飞速发展，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的趋势也日益加强，势必影响到考古学今后的发展。我们究竟是故步自封，完全按照过去的老路走呢，还是勇敢地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在充分总结既有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探索新的路子，也就是解决好传承与创新的问题

* 本文为1998年10月23日于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年会议上的讲话。

呢？答案自然是非常清楚的。

几年以前，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赛克勒博物馆开馆的时候，我们主持召开了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准备的时候要确定会议的主题，筹备组研究了一下，几乎一致主张定为“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并且要我用同样的名称做主旨演讲。如何走向 21 世纪，自然要解决一个传承和创新的问题。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们要吸取，外国考古学发展的经验我们也要吸取，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创新的问题。我想在台湾的同仁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史语所成立七十年，分两个大阶段，前一段在内地，后一段到了台湾。前一段是创业和打基础，拿考古学来说，从设立机构、招聘人才到开展田野工作，都做得非常好。安阳殷墟连续十五次的大规模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把一个三千多年以前的辉煌的青铜文明展示在世人面前。与此同时还发现了一系列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为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后一段史语所迁到了台湾，而留在内地的部分考古学者和其他机构的考古学者共同建立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下属的许多博物馆设立了考古队或文物工作队，后来大多数从博物馆分离出来建立为文物考古研究所。一些大学设立了考古专业或考古学系。大家分工合作共同承当了整个内地的考古工作。史语所在台湾开始主要是整理在内地发掘的资料，特别是安阳殷墟的丰富资料，后来才逐步开展台湾地区的考古工作。这些在臧振华先生的报告里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内地考古学界对于史语所以前的工作是基本肯定的，并没有因为政治上的变动而低估那时的成绩。但社会政治环境与经济文化环境的改变自然也会影响到考古学的发展。正如臧振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内地的考古学几十年来有很大的发展，已经基本上建构起来了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直到元明清的全国范围的文化发展谱系，各种专门性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对于中国农业的起源、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特点与模式等都有了新的比较深刻的认识。但不可讳言也走了一些弯路。开始在学习前苏联的时候多少有一点生搬硬套，后来觉得不大合适，想走自己的路，又犯了简单化和急于求成的毛病。有些人用社会发展史的模式来框架具体的考古学研究，也有人抵制这种倾向而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路线。总之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曾经进行反思，可能认识还很不够，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检查。也欢迎台湾的同仁乃至外国学者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检讨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和策励将来，相信我们的考古学会在一个更加健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台湾的考古工作我们也一直是很关心的。我到台湾来过几次，每次都有一些收获。今天很高兴听到了刘益昌先生的报告，让我对台湾考古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刘先生认为台湾考古有自己的特点，不能完全用研究安阳殷墟考古的眼光来看待台湾考古。而且考古学发展到今天也要尽可能拓展研究的领域，引用新的研究方法，这样台湾考古就决不是普通的青菜豆腐，而是大有可为的。我很同意

刘先生的这个看法。这里面还涉及什么是考古学的问题，就是考古学是属于人类学的一部分呢还是属于历史学的一部分。这问题首先是美国人提出来的，现在内地也有人讨论。美国殖民时代以前是印第安人的天下，要研究印第安人的历史就必须由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乃至体质人类学等各个方面来进行了解，这就是美国的人类学。所以美国人比较自然地把考古学看成是人类学的一部分。中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研究中国的历史主要靠历史文献和地下的实物资料。从“五四”以来，一些学者提出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发现有很多文献记载不可靠，对古人的好多说法产生了怀疑。从过去盲目的信古到疑古虽然是一种进步，但总不能老是停留在怀疑上面，有必要寻找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史语所设立考古组的目的，一开始就很明确是要研究历史，是要用新的手段来拓展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以便解决单靠文献的研究难以解决的关键问题。安阳殷墟的发掘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采取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由于殷墟发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一下子就把中国的信史和文明史至少提早到了商代晚期。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在这个基础上，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发现了郑州商城和偃师二里头都城级遗址，把中国的信史和文明史一步一步地推进到了夏代。现在内地的一些学者想把夏商周年代的研究推进一步，搞了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和裘先生都参加了，但是我没有担任具体工作。我觉得年代学研究不一定要用某种工程的方法来解决，不过如果能够从上面拨一笔经费，把各方面的专家集中到一起进行研究还是有些好处的，现在也确实有一些进展。当然问题还是不少，还需要不断地进行研究。至于夏商周以前的历史，以前只能讲一点传说，没有多少可靠的证据。现在我们可以根据考古学资料写出一本远古时代的书了。这些成绩的取得固然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与我国的考古学一开始就定位在研究历史这一点是不无关系的。所以我们要感谢傅斯年先生。如果一开始就把考古学定位在人类学，那情况就可能很不一样。如果傅先生不是选李济先生担任考古组的主任，而是选资历和声望都更高的马衡先生，那情况可能也很不一样。这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传承与创新问题而在人事上所作的一项抉择，历史已经证明这一抉择是正确的。

学术带头人的任用是重要的，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是十分重要的。刚才李匡梯先生在讲到考古学与自然科学家合作问题的时候，特别讲到了人才的培养问题，我很有同感。考古学发展到今天，越来越需要进行多学科的合作，包括同许多自然科学家的合作，这是许多人的共识。但是在具体合作中往往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摩擦，不能相互理解而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不仅台湾有这个问题，内地也常常遇到这个问题，国外也往往是这样。人家以为你考古学家把地层一划，谁早谁晚就会清清楚楚。同样考古学家往往以为我请你科学家测年代或者分析什么成分，你用最先进的仪器来进行研究，难道还会不准确吗。实际上里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行比较复杂的研究。把不同学科的研究结果整合

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就需要考古学家有比较宽阔的知识面，有能够适应时代的新的知识结构。当然要求一个人什么都懂是不可能的，但相关学科的知识总要有一些，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契合点。在考古学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的时候，提出要培养新型考古人才是势所必然。李匡悌先生的这个意见提得很好，但是他举的年代学例子却没有把话说透彻。我原来想听听他关于摄食系统的研究情况，因为这是他的专长，如果举这个例子可能会说得透彻一些。

下面，我想简单地说一下颜娟英女士和陈芳妹女士的两篇文章。颜娟英女士的文章是讲美术考古或美术史的问题，陈芳妹女士的文章是讲艺术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从青铜器的研究来讲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两个人的说法不同，意思应该差不多，大概都是指对于古代的美术品或者艺术品作考古学的研究。我个人理解的所谓美术考古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有人觉得考古学不是这个样子，说考古学无非就是排排队、分分类，就是所谓类型学研究；还有所谓地层学研究，如此而已。地层学和类型学当然是考古学的重要内容，是考古学的基本功，但不是考古学的全部。考古学应该还有更加广阔和更深层次的研究，这在臧振华先生和刘益昌先生的报告里都已经涉及了。其实两位女士的报告里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通过考古学来研究的历史，在内容上是很广阔的。其中包括古代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有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宗教、风俗习惯，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其中就包括艺术品的内容、风格、流派及其历史价值等等许多方面。我不知道这种理解是不是正确，请各位批评指正。

总之，今天几位考古学同仁的报告都很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们考古学的天地大得很，需要我们去努力开拓。有人说现在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我觉得现在中国考古学确实有很大的发展，但还没有到达黄金时代。中国有那么大，历史那么悠久，文化那么发达，内容那么丰富多彩，是发展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最理想的地方。只有中国自己的或者带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建立起来，并且得到世界公认的情况下，才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我想那一天终究是要到来的。台湾的考古学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部分，同样是大有前途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有更多的台湾学者来关心内地考古学的发展，参与内地的考古学研究，也希望有更多的内地考古学者到台湾来看看，参与台湾的考古学研究。两岸的学者应该在考古学理论、方法和研究课题等各个方面进行充分的交流。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七十周年的时候，热切地期望两岸的交流与合作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为发展中国考古学而共同努力！谢谢！

中国考古学：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考古学是个既年轻又古老的学科。说她年轻，因为她只有八十年的历史，比西方考古学晚了许多；说她古老，因为她的萌芽其实很早，作为她的前身的金石学的发生已经有将近一千年，比西方的古器物学早得多了。关于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至今一些学者对于考古学究竟属于历史学还是人类学不能取得一致。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由于考古学的出现，已经大大充实和改变了人们关于世界古代历史的认识。因为考古学实质上是历史学科的延伸和发展，只不过在研究中可以选用人类学的方法而已。中国考古学就是在对历史的重新检讨中诞生的，中国考古学者一直致力于谱写一部全新的中国古代史。时至今日，人们高兴地看到，这个目的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

现在中国大约有二千名从事考古学研究的专业人员，每年都进行十分广泛的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出版二十多种期刊和许多专业书籍，大大拓展了考古学研究的领域。在史前考古方面，由于一系列早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的发现，证明二百多万年以来就不断有人类在神州大地生息繁衍。最近的研究表明中国还是农业和陶器起源最早的少数地区之一。中国文明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事实证明东方文明的摇篮就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夏代的历史已经逐渐从迷雾中呈现出来，商周的历史内容则已经大为充实，秦汉及其以后的考古研究同样是硕果累累，以至于现在编著的任何一部中国古代史，都不能不大量选用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为了集中地反映中国考古学的成就，由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教授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最近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科学出版社即将推出多卷本的《中国考古学的世纪回顾》，多卷本的《中国考古学》也正在积极编写中。

总结过去是为了策励将来。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中国考古学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成就，却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之处。现在已经进入新的世纪，中国考古学界面临着新的良好的机遇与严重的挑战。我们将充分利用这些机遇，勇敢地迎接新的挑战。

* 本文为2000年6月16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报告。

首先，中国继续进行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且着手实现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在土建工程中必然会涉及许许多多古迹和古代文化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的任务十分艰巨。这是考古学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可以预期今后还将不断有重大的考古发现，会有许多古代历史和考古学上的问题得到解答，至少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还将有可能改变边疆考古长期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拟订全国性和地区性的考古工作规划。过去也有规划，但是往往流于形式，现在则要切实加强。由于中国考古学已经建立了相当的基础，加上近期来各方面所做的总结，哪些方面是重点，哪些方面应该着力突破，底数比较清楚。因此可以在与工程建设相关的考古工作中更好地贯彻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经济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所谓两重两利方针，在重点学术课题上多下工夫。必要时还可以进行有控制的主动性发掘。例如近来对偃师商城的发掘，发现在大城之前还有小城，为在考古遗存中确认夏商分界提供了重要资料。安阳花园庄商城的发现，为商代都城系列的认定提供了新的线索。周原大规模宫殿基址的继续发现丰富了对周人旧都的认识。最近河南密县新砦的发掘，则为夏代早期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在史前考古方面将着重早期人类和旧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研究、农业和陶器起源的研究、文明起源的研究等。为了推进这些工作，有必要大大改进传统的田野考古方法，切切实实地发展田野考古学。在组织机构的调整、业务人员的培养和技术设备的更新等方面也要作出相应的努力。

其次，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其中许多方面都可以应用于考古工作和研究中，可以大大拓展考古学研究的内容，提取许多潜在的信息，加深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可是有些持保守观念的人认为科技考古不是考古学，只是科学技术，过分强调科技考古的作用将会影响考古学的根本性质。幸好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多，绝大多数学者还是看到了现代科技的应用是使考古学研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例如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现代天文学和碳-14断代方法（包括常规方法和加速器质谱法）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成立了科技考古学会，积极地发展了科技考古研究。今年3月在北京香山召开了一次科技考古会议，有多位院士和著名学者参加。会议中就科技考古的基础理念、遥感考古、生物考古（包括DNA技术等）、环境考古、断代技术、文物产地研究、冶金考古、陶瓷考古、数学和计算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等许多方面进行了研讨，是我国科技考古的一次盛会，对于促进今后科技考古的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培养科技考古方面的人才，最近在中国科技大学设置了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在一些大学的考古学系中也往往开设科技考古的课程，招收科技考古的研究生。可以预测中国的科技考古会有更好的发展，这对于整个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提升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要注意学科的交叉与整合。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学科的交叉与整合往往有助于学科本身的提升与新兴学科的发展。实际上，考古学科的产生就是学科交叉与整合

的产物。考古学中的地层学本是地质学中地层学的延伸和发展，考古学中的类型学是在生物分类学的启示下建立起来的，考古学文化的理论则是民族学中文化圈理论的变通与发展。很明显，当初如果没有学科之间的交叉与整合，就不会有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的出现。同样的道理，考古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学科的交叉与整合。例如聚落考古就与人文地理学和人类学中的聚落研究息息相关，环境考古则与环境科学的研究有密切关系，科技考古更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分不开来。说到底，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相关学科的发展和整个科学环境的变化，要在与相关学科的交叉与互动中找到自己学科的位置和发展方向。有了这个认识，就不必担心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就会使考古学的研究进入一个宽广得多的高水平的全新境界。

第四，要加强区域性和国际性交流与合作。中国考古学发展到现在，除了中央的一些考古机构外，各省的考古学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出现不协调的情况。例如一个考古学文化分布在不同的省区，如果各自命名，就会出现不同的名称，这种事例已经屡见不鲜。在田野考古操作方法上也出现了一些差别。有时候有些差别并不是不好的事情，但在基本要求上还是要有一定的规范。有些课题本来是超省区的，就更加需要相互协调与合作。多年来我们在东北考古、西北考古、西南考古和东南考古等领域都进行过一些有成效的合作，在长江三峡等牵涉面很广的项目中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但是还不够，还需要大力加强。至于国际性的交流与合作，近年来逐步有所开展，更需要努力推进。须知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古代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在世界文化史上有过重要的贡献，中国文化也受到外国文化多方面的影响，所以研究中国考古学一定要同时研究外国考古学，在这方面要采取切实的措施，纳入规划。要欢迎外国学者到中国进行考古工作，中国考古学者也要到国外开展考古工作。在考古技术、方法、理论和研究课题等各种层面展开充分的交流与合作。倘能如此，中国考古学必将出现崭新的局面！

（原载《石璋如院士百岁祝寿论文集——考古·历史·文化》，（台北）南天书局，2002年）

中国考古学的现状与思考*

讲两个问题。

1. 现阶段是发展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中国考古学起步比较晚，比欧洲晚了八九十年。从20世纪20年代到现在不过八十多年，中间又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停顿与破坏。在剩下的六十多年中，经过了起步、奠基到初步发展，现在则进入全面大发展的时期。史前考古的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历史时期的考古也有许多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现在任何一部中国通史或中国古代史的著作，都不能不大量引用考古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是得来不易的，其中凝结着几代考古人的辛劳与智慧，是值得我们珍惜和自豪的。

另一方面，如果与发展比较成熟的西方考古学相比，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明显不成熟。除了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没有第二个重要的考古学理论是从中国考古学研究中产生或由中国考古学家提出来的。我们的考古学方法还不够完善，现代科技的应用也不普遍，水平有限。尽管早就有人说现在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我看还不到真正的黄金时代。确切地说应该是发展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其理由如下：

(1) 中国有得天独厚的发展考古学的客观条件，那就是有大约200万年悠久的历史 and 多种自然生态环境下孕育发展的极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各种文化相互依存、交流、渗透乃至碰撞与融合，发生了极其复杂的关系，逐渐形成一个有中心、有主体、具有发展活力和极强凝聚力的多元一体格局。发展中有许多跌宕起伏，却始终没有中断而生生不息。通过对这样丰富而独特的历史文化的探索发现与研究，一定可以发展和丰富考古学理论，可以产生自己的考古学大师，这个客观条件是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

(2) 我们终于获得了一个长期和平发展的环境，可以安心地做田野考古和研究工

* 本文据2007年5月15日在国家文物局委托西北大学举办的全国考古所所长培训班上的讲话修改整理。

作。特别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大规模的工程建设迫使我们不得不以极大的规模开展田野考古工作，新的发现层出不穷，考古资料和相关的出版物都在快速地增长，为考古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土壤。

(3) 与此同时，我们的考古机构在扩大，管理逐步走向完善，设备不断更新，队伍不断壮大。研究人员的层次结构渐趋合理，高层次人员有所增加。这是提高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根本保证。

(4) 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自由学术环境的建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终于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能够实事求是地从事科学研究了。这是发展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考古学的发展自然也不例外。

从以上几点来看，现在应该是发展中国考古学的极好机遇，这个机遇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把握得好，必定会促进中国考古学的大发展，所以说当前是发展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2. 当前应该着重注意的几个问题与思考

为了紧紧把握住我国考古学发展的极好机遇，应当分析当前考古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且切实加以解决。下面讲的几点意见是我个人的一些思考，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1) 多年来，文物考古部门的方针都是以与基本建设相关的考古工作为主，严格控制主动性的考古发掘。这在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时期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必定会有许多古遗址遭受破坏，甚至破坏了也没有人知道。这是对文物保护和考古学研究的极大挑战。因此我们一定要把主要精力用在与基本建设相关的考古工地上，而不要分散精力去挖那些已知的、保护状况也比较好的大墓甚至是帝王级的墓葬。但是一些人对这个方针的理解和执行是有问题的，把与基本建设相关的考古工作一律说成是配合基本建设。讲配合就有主从，工程建设是主，文物保护是从，这显然不对。有些地方明明有重要的考古遗存，因为有所谓市长、县长的形象工程，考古部门就得去配合。像安阳殷墟那样世界知名的都城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门设立了工作站，负责遗址的保护、发掘与研究。偏偏在遗址旁边建立了一个安阳钢铁厂，而且这个厂要一再扩建，考古部门就一让再让。更有甚者，有的国家级保护的大遗址，因为农民要盖房或乡镇企业要开发，考古部门也去配合。这类事例实在太多，像这样配合下去，不知道有多少重要遗存被毁掉了。所以我认为有些文物干部对于开展与基本建设相关的考古工作的理解有问题。不是理直气壮地保护文物和为保护文物而开展适当的考古工作，而是跟着人家的屁股后头转，把自己搞得很被动。考古遗存是人类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破坏后就不可能再生，一定要加以保护。我们国家有文物保护法，我们的文物方针头两句就是“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保护文物是我们每个文物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更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既然发现有古代文化遗存，建设部门就必须避让。实在避让不过去也要考古部门先进行勘探发掘，根据发掘的情况再采取适当的措施。工程建设有各种情况，古代文物也有各种情况，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评估以确定如何有效地保护文物。当20世纪80年代初在河南偃师县城西侧计划建设首阳山电厂时，考古部门随即对该处进行了全面勘探，发现了著名的尸乡沟商代早期的城址。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先生认为十分重要，亲自找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反映情况。虽然那个电厂是国家建设重点项目，并且已经做了许多施工的准备，总理还是同意另找地方建厂，以便妥善保护商城遗址。辽宁修铁路要通过牛河梁遗址附近，考虑到那是红山文化的顶级遗址，并且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不能影响周围的环境，建设方案一再修改，以至要多花几亿元。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最近的南水北调工程为了避让重要的古代遗址，不少段落改变了渠道走向。要说配合，那是工程建设部门配合文物保护。所以我认为不要笼统地讲配合基本建设，最好用与基本建设相关的考古工作这样中性的提法，我曾经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全国考古工作汇报会上连续两届讲到这个问题。今年1月16日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关于加强基本建设工程中考古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要从工程建设的立项、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到实施的全过程中，文物考古部门都要介入。特别是在建设项目建议书阶段和可行性研究阶段，文物考古部门就要对项目可能涉及和影响区域内的文物状况提出“文物影响评估报告”，以便有效保护文物。请注意这里没有讲“配合基本建设”。建议大家好好学习，并且在工作中切实贯彻执行。

(2) 由于与基本建设相关的考古工作量极大，如何保证考古工作的质量成了十分尖锐的问题。有的工地专业人员偏少而发掘规模过大，工作粗放，缺乏必要的冷静思考和研究。资料收集不全或不合乎规范，记录毛糙，名义上发掘了多少面积，实际上损失甚多，收获甚少。有的领队不到位或一个领队管几个工地，发掘人员只好按老谱去做。要知道考古遗址是千差万别的，发掘固然要按一定的操作规程，实施过程中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做必要的变动。发掘工作本身也是研究工作，不能老是一个模子去套。苏秉琦先生曾经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在与基本建设相关的考古工作中要加强课题意识，现在仍然存在这个问题。有些工地课题意识淡薄，一味追求速度和发掘面积，以便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是非常错误的。单纯按发掘面积计算成本的办法也应当适当加以调整。再说过去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虽然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实践中已发现许多不足。前年北京大学为国家文物局办田野考古培训班时已对操作规程做了大幅度的修改，一是引进了一些新技术新概念和新的记录方法，二是给实际操作中预留了进行研究的较大空间。我想今后在实践中还可以改进提高。

(3) 与工程建设相关的考古工作,一般都是时间紧、任务重,容不得仔细琢磨。即使采取了很多措施和加强课题意识,也难免做得比较粗放而不能尽如人意。长此以往,不但对考古学科的发展不利,就是对考古人员严谨作风的培养也会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适当进行一些主动性发掘是必要的。考古学的发展总是不断地提出新课题,要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研究,寻找关键性的地区或关键性的遗址进行调查与发掘。这些地区或遗址不一定与工程建设相关。例如有些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就不一定与工程建设相关。一些大型的或都城级的遗址,为了更好地保护,必须进行全面的勘探,同时也要进行适度的发掘以做出准确的评价。这样做不但会促进考古学研究,也有助于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

(4) 过去因为田野考古任务重,没有时间进行资料整理与研究,有的只写了一个简报,有的连一个简报也没有。库房里资料越积越多,时间一长,有的器物损坏了,有的资料散失了,加上人员的变动,简直就成了一批搞不清楚的糊涂账,严重影响考古学的发展。近年来国家文物局采取了一些措施促使尽快出版考古报告,我觉得这是一个战略性的措施,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现在考古报告越出越多,有的是还多年的旧账,有的是新的考古成果,而且印刷质量也越来越精,这是十分喜人的现象。不过有些报告并不令人十分满意。你说要如实全面地报道考古资料,于是不厌其烦地按单位罗列,没有重点,没有严密的逻辑,眉毛胡子一把抓,缺乏必要的归纳和分析。报告越出越厚,水平却没有相应的提高,这问题需要好好研究并加以改进。

(5) 如果田野考古报告水平普遍提高了,我们整个考古学的水平也会大为提高。但考古报告毕竟只是田野考古工作的总结,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考古学要深入研究历史,还必须大量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要有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还应该尽可能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只有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果,我们考古学的黄金时代才算确实到来了。

(6) 最后讲一下学风问题。考古学是一门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有些情况你弄错了,别的发掘可以检验和纠正。但是有些遗迹和重要现象挖坏了或判断错了,就不好检验。所以要特别慎重,反复检查。如果马马虎虎,甚至挖错了造假账,那就是学术道德的问题了,你不是在搞研究而是在搞破坏。这问题已经暴露了一些,希望引起高度的重视。

学风问题是一个科学意识的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踏踏实实,不能想当然。现在总的倾向是浮躁,工作不扎实,研究不深入。有的问题别人早研究过了,你连人家的文章都没有看,又重复研究,一点新意也没有。有的是标新立异,既不尊重历史,也不尊重别人。发表见解只从自己小范围看问题而不顾及大局。这些都是要克服的。对国外的理论方法要了解,要有分析。过去一概排斥固然不对,现在有些人把它捧上天也不合

适。应该有分析地对待，并且在自己的工作 and 研究中加以检验。

我想这些问题解决了，中国考古学的水平就会大幅度地提高，就会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就真正到来了。作为一个考古老兵，我热切的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并愿与大家共同努力。

ISBN 978-7-5010-3250-1



9 787501 032501 >

定价：180.00 元